哈荣·雅荷雅

الله
رسول
محمد

进化论的欺骗性



绿色中华 荣誉奉献
www.xaislam.com

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在当今得到了世界各地密集地宣传的支持。在学校、科学资料以及各媒体中，该理论被提出是经被证明的一个事实，许多人也因此不经质问地接受了这个理论。

但是已逝的岁月里，在古生物学、遗传学或者生物化学等科学领域里，确实是否定进化理论的。为了证明进化论，140多年来他们不断地努力，终究除了使理论无效外什么也回答不了。

尽管事实摆在面前，进化理论仍旧如此广泛地被支持把理论强加于人们的原因在于，进化论与唯物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仅仅接受物质存在的唯物主义哲学，只能在进化理论中获得所谓的科学依据。为了使人们接受该理论而实施的全球性的宣传的背后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这本书，详细地论述了如何使进化理论崩溃，而且以一种易理解的方式叙述的。甚至，还向人们展示了那些支持进化论的“科学家们”的偏见和他们毫不犹豫地为了支持理论而歪曲事实的行为。

想要了解当今世界里的生物以及人类宗族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话，那么就必须阅读这本书。



作者简介

哈荣.雅荷雅为作者的笔名，一九五六年出生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在安卡拉完成了中小学学业之后，相继在伊斯坦布尔建筑师斯南大学美术系和伊斯坦布尔大学哲学系就读。自一九八零年以来在信仰，科学和政治方面创造出许多著作。作者同时还有一些关于揭穿进化论者们的伪面具，以及达尔文主义与血腥思想的黑暗关系的重要作品。

使古兰经的教训传遍世界各地，这样以来促使人们坚信真主的存在、真主的独一无二和后世等信仰问题，揭示抗拒言论的本质和脱离正轨的行为，是作者进行的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

哈荣.雅荷雅的一些著作还以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巴基斯坦文，阿拉伯文，阿尔巴尼亚文，俄罗斯文，波斯那文，维吾尔文和印度尼西亚文等多种文字出版，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发行。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作者简介

哈荣·雅荷雅是作者的笔名。他一九五六年出生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在安卡拉完成中小学学业之后，相继在伊斯坦布尔米玛·希南大学（Mimar Sinan）美术系和伊斯坦布尔大学哲学系就读。自一九八零年以来，在信仰、科学和政治方面写了许多著作。作者同时还有一些关于揭穿进化论者假面具、达尔文主义与其它血腥思潮之间阴暗关系的重要作品。

哈荣和雅荷雅，原是与没有信仰的行为作斗争的两位先知的名字，作者取用这个笔名，是出于对这两位先知的怀念和尊敬。作者在该书封面使用真主使者的圣章，其象征意义与本书内容有关。该圣章象征真主最后的启示《古兰经》和真主最后的使者穆罕默德。作者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向导，以逐一驳斥无神论思想的根本教条为目的，以“最后的启示”为武器，使反对宗教信仰的叫嚣鸦雀无声了。

作者所有著作的核心目标是：把《古兰经》的训示传给人们，促使人们坚信真主的存在、真主的独一无二和后世等信仰大纲；动摇腐朽的思想基础和无神论制度下反常的意识形态；驳斥抗拒性言论的本质及其脱离正道的行为。

哈荣·雅荷雅的著作，在印度、美国、英国、印度尼西亚、波兰、波黑、西班牙、巴西等许多国家深受读者的欢迎；部分书籍并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乌尔都文、阿拉伯文、阿尔巴尼亚文、俄罗斯文、波斯文、维吾尔文、印尼文和中文等多种文字，其作品在国外深受众多读者的欢迎。

在世界各地获得高度评价的这些作品，为许多人树立宗教信仰、加深对信仰的理解，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阅读和研究这些著作

的每一位读者，可以感受其简明、自然而流畅的笔调，以及合乎科学的观点。另外，这些作品还具有见效快、影响深远、无可辩驳等特点。阅读并严肃思考这些著作的读者们，不可能再去辩护唯物主义哲学、无神论和其它脱离正道的意识形态或哲学。即使他们继续为之辩护，也只能是感情上的挣扎而已；因为，这些作品已从根本上驳斥了那些思潮。如今，在哈荣·雅荷雅的作品面前，当代否认真主的所有运动，都从意识形态上遭到失败。

无可否认，这些特点来自《古兰经》的智能与透明。作者当然没有感到自满，他只是把它们作为人们寻求真主之正道的媒介。还有，出版这些作品，不是出于物质利益。

由此可见，鼓励人们阅读这些书籍，使人们睁开心灵的“眼睛”，看到鲜为人知的事实，并激励人们更加忠于真主，由此加强自己的信仰，是一项无法与价值衡量的工作。

与此相反，宣传那些误导人的思维，并削弱其信仰的书籍，将导致思想混乱，而且与早先的经验所证实的那样，根本不能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那只能浪费读者的时间和心血。而在本书作者颂扬真主永恒力量的作品面前，那类书籍是不会奏效的。通过阅读哈荣·雅荷雅的著作，在信仰方面存在疑心的人们，可以欣慰地看到：作者的目的就是驳倒无神论的观点，宣传《古兰经》的道德价值。这些工作的成功与影响，在读者当中是显而易见的。

人们应认识到的一点是，世界上之所以存在连绵不断的压迫与冲突，大多数人遭受那么多痛苦，其主要原因就是不信道的意识形态的盛行。结束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从理论上击败不信道的体系，并让人们认识到奇妙的造化和《古兰经》所倡导的美德，以便让人们按照《古兰经》生活。一想到使人们堕入暴力、腐败和冲突的当今世界，我们就应该更快更好地实施这项工作；否则就可能来不及了。

序言

进化论是反宗教的哲学基础，所以，本书和其它作品都着重对进化论进行反驳。近140年以来，否认真主存在的达尔文主义，导致众多人放弃信仰或怀疑真主的存在。因此，揭开该理论的假面具，是一项重要的宗教任务，并且对所有人进行这项工作是必要的。一部分读者也许读过我们的某一部著作，因此可以发现，在每一部作品中，我们都附加了关于进化论的摘要部分。

我们应强调的另一问题，与本书的内容有关。作者的所有著作中，都包含信仰内容和对《古兰经》章节的解释，并要求人们学习真主的经文。在读者的脑海中，对于真主的经文，是不会产生任何疑问的。在讲解过程中，作者以简单、明了和自然的笔调，使老老少少都可以明白书中的内容。就连坚决拒绝宗教的人们，也受这些书籍所说明的事实的影响，而无法否认书中讲述的真理。

读者可单独或以几人为一组，一起阅读本书和作者的其它作品。一组读者在一起阅读这些书籍，可以互相交流观点，将十分有益。

作者的书籍都以敬畏真主为目的而写的。因此，大家都来宣传这些著作，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作者的全部著作都有很强的说服力，并有充分的论据。所以说，对致力于传教的人们而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鼓励其它人阅读这些书籍。

在本书的尾页，我们附加了对作者其它著作的简介，意在使读者了解作者的其它一些著作，并将目睹包含信仰和政治内容的丰富文献。

在这些作品中，不存在作者个人的观点，不存在含有疑问的资料依据，也不存在令人失望和产生疑心的解释。

进化论的欺骗性

哈荣·雅荷雅

2003年12月于伊斯坦布尔

GLOBAL PUBLISHING
社址：Darulaceze Caddesi No:9
Eksioglu Is Merkezi B Blok D 5
Okmeydani-Istanbul, Turkey
电话：（+90.212）3208600

印刷厂：Secil Ofset
社址：MAS-SIT Matbaacilar Sitesi
4. Cadde No: 77 Bagcilar-Istanbul
电话：（+90.212）6290615

网址：www.harunyahya.com

目录

特别前言　达尔文主义与唯物主义实为恐怖主义的理论根源 8
导　　言　为什么要谈进化论？ 21
序　　言　相信进化论是现代最大的奇迹 24
第 一 章　从偏见中解脱出来 26
第 二 章　进化论简史 33
第 三 章　进化论只是想象中的体制 44
第 四 章　化石记录反驳进化论 52
第 五 章　从水中迁移到陆地的童话 61
第 六 章　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来源 65
第 七 章　含有欺诈成分的化石演绎 77
第 八 章　进化论的伪造品 80
第 九 章　人类进化的假想 85
第 十 章　进化论关于分子的僵局 112
第十一章　热力学否定进化论 148
第十二章　设计与巧合 154
第十三章　进化论的主张与事实 163
第十四章　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倾向 178
第十五章　媒体：进化论的沃土 186
第十六章　结论：进化论是个骗局 190
第十七章　创造的事实 194
第十八章　物质的真正本质 211
第十九章　时间的相对论和命运的事实 245
第二十章　科学研究基金会（SRF）研讨会：
向公众揭露进化论的活动 257

达尔文主义与唯物主义实为恐怖主义的理论根源

导言

大多数人认为，进化论是由查尔斯·达尔文首次提出的，是基于科学证据、考察和实验的一个理论。然而，达尔文并非进化论的首创者，这个理论也没有科学证据。进化论只不过秉承了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教条。虽然，进化论并没有任何科学的支持，但它打着唯物主义哲学的幌子，却得到了盲目的支持。

这种狂热给世界带来了各种灾难。达尔文学说的传播以及它所支持的唯物主义哲学，已篡改了“人是什么？”的答案。过去，用“人是真主创造的，人必须根据他教导的美德去生活”，来回答这一问题的人们，开始考虑“人是偶然产生的，是由生存斗争发展而来的一种动物”这样的假设。人们为这个巨大的骗局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基于冲突哲学的种族主义、法西斯、共产主义等许多其它残暴的世界观，都是从这个诡计中获得力量的。

本文将分析达尔文学说带给世界的灾难，并揭露它与当今最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之一，即“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

达尔文学说的谎言：“生存就是冲突”

达尔文从一个基本的假设，发展他的理论：“生物的发展依赖生存的斗争。强者在斗争中获胜；弱者注定失败和灭亡。”

根据达尔文的观点，自然界中存在着残酷的生存斗争和长久的冲突。强者永远战胜弱者，发展由此才能发生。他给《物种起源》一书起的副标题，就概括了这个观点：《物种起源》——自然选择的方式或生存斗争中特权种族的保留。

而且，达尔文甚至提出的“为生存而战”，同样适用于人类种族之间的“生存之战”。根据这个欺骗性的主张，“特权种族”总是斗争中的获胜者。在达尔文看来，特权种族就是欧洲的白种人。非洲或亚洲的其它种族，却在生存斗争中成了落后的种族。达尔文进一步断言，这些种族将很快完全失去“生存斗争”，并因之而灭亡：

> “也许在不久的数百年里，文明的人种将消灭、取代世界上之野蛮的族人。同时，人猿.....无疑地将灭绝。这样，人类与其最亲近的同类之间的差距将加大；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时，高加索人、与猩猩一样低等的猿，将取代目前介于黑人或澳洲土著及大猩猩之间的种类。”[1]

印度人类学家拉里塔（Lalita Vidyarthi），就达尔文进化论被社会科学中的种族主义所利用的事实，作了如下解释：

> “其（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论，受到当时的社会科学家的热烈欢迎，并相信人类在达到顶峰的白人文明中，获得各个层面的进化。到19世纪后半期时，大多数西方的科学家把种族主义作为一种事实接受了。”[2]

达尔文的灵感来源：“马尔萨斯的残忍理论”

达尔文在这个主题上的灵感，来自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马尔萨斯估计，人口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将快速增长。在他看来，控制人口的主要因素是战争、饥荒和疾

病等灾难。简言之，根据这个残暴的主张，为了一些人的生存，其它人就必须死亡。生存意味着“永远的战争”。

在19世纪，马尔萨斯的想法被广泛接受。欧洲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尤其支持这一残忍的想法。在“纳粹‘种族净化’计划的科学背景”一文中，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对19世纪之欧洲的重要性，这样写道:

> “19世纪伊始，全欧洲的领导层聚到一起，讨论新近发现的‘人口问题’，并找到按照马尔萨斯的要求，来提高穷人死亡率的办法: ‘我们不必劝说穷人干净地生活，应鼓励他们以相反的习惯去生活。我们城市的街道应该建得再窄些，应该使更多的人呆在家里，并使瘟疫重新传播。在乡下，应该把村庄建在死水边，特别鼓励他们生活在泥泞和不健康的环境中’，等等。”[3]

这种残酷政策的结果，使在生存斗争中失利的弱者将被灭绝，人口的高速增长也就得以平衡。19世纪，英国真正实施了这一所谓的“压迫穷人”的政策，并建立了一种工业体制: 让8-9岁的孩童每天在煤矿打工16小时，数以千计的儿童死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下。

达尔文受这些思想的影响，把冲突的观点应用于自然的所有方面，并提出强者与适者将在生存斗争中获胜。而且他还主张，所谓的生存斗争，是大自然合法而不变的法则。另一方面，他鼓励人们否认创造，并抛弃宗教信仰；因而，破坏可能阻碍残暴的“生存斗争”的所有道德规范。

随着这些残酷观点的盛行，20世纪的人类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们使人类走向残暴和专横。

“丛林规则”开辟的道路：法西斯

达尔文学说在19世纪滋养种族主义时，形成了在20世纪得以膨胀、给世界带来血风腥雨的意识形态：纳粹主义。

从纳粹的思想意识里，可以看到浓重的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分析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阿尔佛雷德·罗森博格(Alfred Rosenberg)所建立的理论时，可以发现像“自然选择”、“选择性的交配”、“种族间的生存斗争”等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多次阐述的概念。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斗争”与“适者胜利”的主张，激励希特勒把他的书叫做《我的奋斗》。他在书中特别提到了种族之间的斗争：

> “基于自然本身注定的新的种族等级制度，历史将登上举世无双的新世纪的帝国巅峰。”[4]

1933年，希特勒在纽伦堡市的集会上声称：“高级种族奴役低级种族.....我们在自然界见到的公理，并把它看作唯一可以得到的公理。”

纳粹深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这几乎是这方面的历史学专家一致承认的史实。

历史学家希克曼·希特勒（Hickman.Hitler）对此作了如下解释：

> “希特勒是一个坚定的进化论的追随者和传播者。不管他的脑袋里装着什么，他的《我的奋斗》一书，无疑明显地阐扬了一些进化论的观点，尤其强调了斗争哲学、适者生存以及为建设更理想的社会而灭绝弱者。”[5]

提出这些观点的希特勒，将世界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野蛮境地。许多种族和政治团体尤其是犹太人，在纳粹的死亡集中营里，遭到可怕的残害与屠杀。以纳粹分子的侵略行为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整整五千五百万人的生命，成了这种理念

的牺牲品。在世界历史上，藏在这场最大悲剧幕后的，正是达尔文主义“生存斗争”的概念。

血腥的联盟：达尔文主义与共产主义

当法西斯主义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右翼势力之上时，左翼就被共产主义所占领。共产主义者总是达尔文理论最狂热的拥护者。

达尔文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这种关系，可追溯到这些“主义”的创始人。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出笼，共产主义的创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阅读了该书，并惊叹书中“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他们之间的通信显示，他们看到了达尔文理论中的“包含共产主义之自然历史的基础”。而且，恩格斯还在达尔文的影响下，写下了《自然辨证法》一书，书中充满对达尔文的赞颂，并在“劳动：从猿到人之过程中的作用”一章里，就努力把进化论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

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俄国的共产主义者，如，彼克哈诺瓦（Plekhanov）、列宁（Lenin）、托洛茨基（Trotsky）和斯大林（Stalin）等，都赞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俄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彼克哈诺瓦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6]

托洛茨基说：“达尔文的发现，是辨证唯物主义在整个有机物领域的最大胜利。”[7]

在共产党干部的形成过程中，“达尔文主义教育”起了极大的作用。例如，斯大林在年轻时就信仰宗教，但读了达尔文的书籍后，才成了无神论者。这是历史学家们所证实的事实。[8]

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屠杀了数百万人的毛泽东，就公开宣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达尔文主义及进化论之上。”[9]

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詹姆士·若维·普塞（Reeve Pusey），在他的研究著作《中国与查尔斯·达尔文》一书中，就达尔文主义对毛本人及中国共产主义的影响，列举了大量的细节。[10]

一句话，进化论与共产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进化论声称生物是偶然产生的，这给无神论者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主张无神论思想的共产主义，也因此与达尔文主义牢牢绑在一起。进化论甚至提出：大自然的发展由于冲突（也就是说“生存斗争”）而得以实现，它支持了共产主义理论基础之“辨证”的概念。

如果我们想想“辩证的冲突”这一共产主义的理念——它在20世纪作为“屠杀机器”使一亿二千万人丧命，那我们就更好地理解达尔文主义出世后，它给世界所造灾难的程度了。

达尔文主义与恐怖主义

正如我们所见，达尔文主义是各种暴力思想赖以存在的根基；它们给20世纪的人类带来空前的灾难。躲在这种理解与方法背后的根本理念，就是与“非我族类的厮杀”。

对此，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世界上有着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的哲学；非常自然，这些不同观念具有互相反对的特点。然而，它们不同的态度，可以从两种方式中相互观察：

1，他们可以尊重“非我族类”的存在，努力与他们建立对话，采取一种人性化的方式。

2，他们会选择与他人搏斗，以损人利己的方式，即野兽般的行为去达到目的。这是唯物主义采用的方式，即反宗教的方式。

当我们考虑上述两种方式之间的差异时，就会看到达尔文

主义向人类潜意识里，灌输的“人是冲突性动物”的煽惑力。选择冲突方式的个人或团体，对达尔文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原理可能一无所知；但是，他们最终同意，其哲学基础完全基于达尔文主义。使他们相信这一观点正确的，恰恰是达尔文主义的这些口号：“世上强者生存”、“大鱼吃小鱼”、“战争是美德”、“人通过发动战争而进步”。一旦离开达尔文主义，这些口号也就失去意义了。

实际上，如果没有达尔文主义，也就不存在什么“冲突”哲学了。世上的大部分人信奉的三种有启示的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反对暴力。三种宗教都期望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宁，都反对滥杀无辜，都反对残暴与迫害。冲突与暴力破坏真主向人类所昭示的道德，是反常而有害的概念。但是，达尔文主义却认为，冲突与暴力必须存在，它们是自然、合理、恰当的理念。

因此，如果有人以伊斯兰教、基督教或犹太教的名义，并使用其概念和标志而实施恐怖行动的话，他们就不再是穆斯林、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实际上，他们是真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虽然披着宗教的外衣，但不是真正的信仰者，纵然他们宣称为宗教服务也罢。事实上，他们是宗教与信士的敌人。因为，他们干的是宗教本身所禁止的罪行，而且以这样的方式给宗教抹了黑。

因此，我们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恐怖主义行径，不会出自任何一种神圣的宗教，而是来自我们这个时代的无神论及其表达方式“达尔文主义”和“唯物主义”。

伊斯兰不是恐怖主义的根源，而是解决恐怖主义的办法

那些声称以宗教的名义而行事的人们，也许会错误地理解并实践其宗教信仰。因此，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中，得出对该宗教的看法是错误的。而认识伊斯兰的最好办法，是仔细阅读该宗教神圣的原始资料。伊斯兰神圣的原始资料就是《古兰经》；《古兰经》所倡导的道德规范，与当今某些西方人的脑海里，对伊斯兰的想象完全不同。《古兰经》的道德观基于博爱、善良、仁慈、谦和、自我牺牲、宽容与和平之上。而一个真正按照这些道德准则生活的穆斯林，是个温文尔雅、深思熟虑、宽以待人、值得信任并乐意助人的人。他给周边的人带去爱心、尊重、安宁和欢乐。

伊斯兰是和平与幸福的宗教

“伊斯兰”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是“和平”的意思。伊斯兰给人类带来一种充满和平与幸福的生活，安拉把他永恒的仁爱与慈悯展现在世界面前。安拉召唤地球上所有的人们：把《古兰经》的道德教诲作为一种典范，以此在世上体验仁爱、善良、宽容与和平的生活。在《古兰经》黄牛（百格勒）章第208节里，真主就这样命令道：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全体加入和平的宗教中，不要跟随恶魔的步伐，他确是你们的明敌。”

正如经文所说的，真主告诉我们，只有信奉伊斯兰，并根据《古兰经》的道德规范去生活，人类才能幸福地生活。

真主谴责邪恶

真主命令人们避免邪恶；禁止怀疑、不义、造反、暴政、侵略、谋杀、流血。那些不遵守真主命令的人们，在经文里被定义为“跟随恶魔的人”，而且真主已明确昭示：那是非法的行为。《古兰经》里有很多关乎这些问题的章节，其中的两节是这样表示的：

> **“与真主缔约，然后加以破坏的，断绝真主命人连结者的，在地方上进行破坏的，这等人将被诅咒，将吃后世的恶果。”**（雷霆章（赖尔得）：25）
>
> **“你应当借真主赏赐你的财富而营谋后世的住宅，你不要忘却你在今世的定分。你当以善待人，像真主以善待你一样。你不要在地方上摆弄是非，真主确实不爱摆弄是非者。”**（故事章（改赛素）：77）

正如我们所读到的《古兰经》文，在伊斯兰里，真主已禁止一切形式的有害行为，包括恐怖主义与暴力活动，并谴责做出这等行为的人们。穆斯林是美化和改良世界的人们。

伊斯兰保护言论自由与宽容

伊斯兰是这样一种宗教：给人类的生活、见解和思想以自由，严禁在人们之间制造紧张、冲突、诽谤与猜疑，甚至禁止对别人持消极的想法。

伊斯兰不仅严禁恐怖和暴力，而且不允许对他人的思想哪怕是最轻微的压制：

> **“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谁不信魔鬼而信真主，谁确已把握坚实的、绝不断折的把柄。真主是全聪的，是全知的。”**（黄牛（百格勒）：256）

“你绝不是监察他们的。”（大灾（阿史叶）：22）

强迫人们信奉宗教并接受其信仰形式，违背伊斯兰的精神和本质。因为，在伊斯兰看来，对真主的信仰，只能通过自由意愿和深思熟虑来接受。当然，为了实施《古兰经》确立的道德准则，穆斯林们可以互相劝勉，但绝不能使用强迫的手段，也不得施以任何身体或心理上的压力；它们都不能利用世俗的特权，促使某人归向宗教。

让我们假想一个与之完全相反的社会模式。例如，一个依靠法律强迫人们实践宗教的社会吧。这种社会模式与伊斯兰完全相反；因为，当个人自愿地信仰和崇拜真主时，才具有价值。如果用一种制度强迫人们去信仰与崇拜的话，那么，人们只因为害怕这个体制而显得虔诚。宗教本身的价值在于：宗教要在良心自由的环境中得到实施，即为了获得真主的喜悦去实践宗教信仰。

真主判定杀害无辜为非法

根据《古兰经》，杀害一个无辜的人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除因复仇或平乱外，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我的众使者，确已昭示他们许多迹象。此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地方上确是过分的。”（筵席章（马以代）：32）

“他们只祈祷真主，不祈祷别的神灵；他们不违背真主的禁令而杀人，除非由于偿命；他们不通奸。谁犯此类（罪恶），谁遭惩罚。”（准则章（弗尔干）：68）

如上述经文所示，毫无理由地枉杀无辜的人，将受到严

惩。真主已经昭示：杀害一个人的罪过与杀害众人一样的严重。捍卫真主尊严的人，别说是杀害数以千计的无辜者，甚至不给一个人造成任何损害。那些想逃脱今世审判与惩罚的人们，在末日无法逃脱真主的清算。所以，知道死后会受到真主审判的人们，将非常小心地遵守真主所确立的一切限度。

真主命令穆斯林们善良、仁爱

有一节经文是这样讲述穆斯林的道德的：

“同时，他是一个信道而且行善，并以坚忍相勉，以慈悯相助者。这等人是幸福的。”（地方章（白赖德）：17-18）

如本节经文所示，为了获得解放、怜悯和乐园，真主向他的仆人降示的最重要的道德准则，就是**“以慈悯相助”**。

《古兰经》中所描述的伊斯兰，具有现代、文明、先进的特色。穆斯林首先是和平之人；穆斯林本着民主精神宽容别人；文雅、开明、诚实、审美、科学与文明是穆斯林的个性。

在《古兰经》的美德下培养的穆斯林，永远以伊斯兰教规中的爱，来对待每个人；尊重各种思想观念；重视美学与艺术；中和地面对每一种事情，并且缩小不和、重归友好。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比那些当今最具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人们更为文明、社会公德更为高尚，生活更为欢乐、幸福、公平、安全和富有。

真主要求人们宽容

在《古兰经》的“艾耳法章”第199节里，用“**你要原谅**”这样的启示表达了“宽恕与宽容”的概念，这是伊斯兰的基本原则之一。

当我们关注伊斯兰的历史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穆斯林在社会生活中，是如何实施《古兰经》道德教诲中的这一重要规定的；还可以看到，在穆斯林所到之处，废除了非法的行为，创建了自由与宽容的环境。在宗教信仰的范围内，从语言与文化方面，使那些彼此完全不容的民众，能够在同一屋檐下自由、和平地生活，并使那些信仰宗教的人们获得知识、财富和地位。同样，拥有广大地域的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能够存在数百年，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伊斯兰带给人们的生活道路，是那样的宽容和善解人意。几个世纪以来，宽容和善良的品质造就了穆斯林。在每个历史阶段，穆斯林都是最公正、最仁慈的人群。在这个由多民族组成的社会中，人们可以自由地实行自己跟随多年的宗教信仰，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文化背景生活，并以自己的方式崇拜。

诚然，只有《古兰经》所实践的穆斯林所特有的宽容，才能给整个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宁。《古兰经》就此指出：

> “**善恶不是一样的。你应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对付恶劣的品行，那末，与你相仇者，忽然间会变得亲如密友。**”（奉绥来特章：34）

结论

这一切表明，伊斯兰供给人类的道德教诲，正是给世界带来和平、幸福和公正的准则。当今世界上，被人们称为“伊斯兰恐怖主义”的野蛮行径，是完全偏离《古兰经》的道德教诲的，是愚昧无知者的所为，是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的犯罪。对那些打着伊斯兰的旗号而蛮干的个人或团体，我们反对他们的办法，就是本着伊斯兰真正的道德教诲，去指导他们。

换言之，伊斯兰与《古兰经》的道德教诲，并不是恐怖主义与恐怖分子的支持者，而恰恰是把世界从恐怖主义的灾难中解救的办法。

---

1.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人的来由》（The Descent of Man）第178页,第2版,纽约: Burt Co,1874年
2. 拉里塔（Lalita Prasad Vidyarthi），《种族主义,科学与伪科学》(Racism，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第54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法国,1983年
3. 西奥多 D. 豪尔(Theodore D. Hall),《纳粹种族净化计划的科学背景》（Scientific Background of the Nazi “Race Purification” Program）, http://www.trufax.org/avoid/nazi.html
4. 亨利·摩里斯（Henry Morris）,《反对上帝的长期战争》第78页（The Long War Against God）, Baker Book House, 1989年
5. 希克曼（Hickman, R.）,《自创论》（Biocreation）第51-52页，华盛顿科学出版社，1983年 杰里·伯格曼（Jerry Bergman）:《达尔文主义与纳粹种族大屠杀》（Darwinism and the Nazi Race Holocaust）Creation Ex Nihilo Technical 杂志第13(2)期，第101-111页, 1999年
6. 罗伯特 M. 杨（Robert M. Young），《达尔文的进化论与人类历史》（Darwinian Evolution and Human History），Historical Studies on Science and Belief, 1980年
7. 艾兰与特德（Alan Woods and Ted Grant）,《理性的背叛: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Reason in Revolt : Marxism and Modern Science），伦敦，1993年
8. 亚历克斯（Alex.de.Jonge）,《斯大林与苏联的定型》第22页，（Stalin and The Shaping of the Soviet Uninon）, William Collins Sons & Limited Co. Glasgow, 1987年
9. K. Mehnert, Kampf um Mao’s Erbe,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7
10. 詹姆士·若维·普塞: 《中国与查尔斯·达尔文》，曼彻斯特，剑桥，1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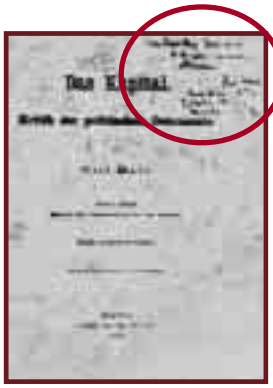
为什么要谈进化论？

对一些人来说，达尔文学说或进化论，仅仅属于一种科学的范畴。从表面上看，这种学说并不直接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当然，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事情并非如此：进化论不仅是生物学框架内的概念，而是形成欺骗哲学的基础——控制很多人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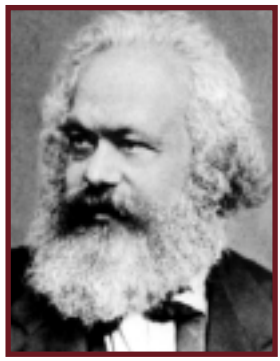
唯物主义哲学仅仅接受物质的存在，视人类为“物质的堆积”，并且断言：人类充其量只是一种动物，伴随其自身存在的唯一准则就是“冲突”。尽管有人利用宣传手段，声称它是现代哲学并具有科学依据，但在事实上，唯物主义只是毫无科学依据的远古教条。诞生于古希腊的这个教条，被18世纪的一些主张无神的哲学家们搬出来了。然后，唯物主义被19世纪的几个空想家接受了，例如，卡尔·马克思、查尔斯·达尔文、西格蒙·弗洛伊德等，他们都是科学的信徒。换言之，马克思、达尔文、弗洛伊德等理论家利用科学，更正确地说，为了使各学科的分支适应唯物主义哲学而扭曲了科学。

19和20两个世纪，已经成了唯物主义的一个血腥的“实验舞台”：基于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或是与唯物主义角逐但共享其基本原则的思潮），已给世界带来了持久的暴力、战争和混乱。在20世纪，应该为屠杀一亿二千万的生命负责的共产主义，是唯物主义哲学的直接“成果”。虽然，法西斯主义假装自己选择了与唯物主义不一样的道路，但它接受了唯物主义基本的发展观：通过冲突，实施专制统治，集体屠杀，世界大战和种族清洗，来达到其罪恶目的。

不仅这两种血腥的意识形态，深受唯物主义的毒害，而且个人和社会的道德规范，也同时受到了唯物主义的破坏。



卡尔·马克思清楚地说明，达尔文学说为唯物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德文版的《资本论》中对达尔文深表同情；而《资本论》被认为是马克思最伟大的作品。他如此表露了心迹：“……从对查尔斯·达尔文的敬仰到追随他……。”



唯物主义哲学骗人的讯息在于：把人降低到动物的地位上，并强调人是偶然产生的，从而无需对任何别人负责，进而毁坏了作为人的道德支柱，如：博爱、仁慈、奉献、谦虚、诚实和公正等美德。于是，在唯物主义“生活就是冲突”的“格言”的蛊惑下，人们眼中的生活，成了一种利益的冲突。这样，就把生活引向了按照“丛林规则”进行的游戏。

只要我们回顾唯物主义哲学的历史——它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对造成的人为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派生于这一哲学的每一种意识形态，把人类之间存在的差异归纳为“由于冲突”。这也包括当今的恐怖主义者，他们虽然声称是为了维护宗教，但又犯下了殃及无辜生灵的大罪。进化论或达尔文主义，如同完成了智力游戏中的所有拼图一样，对上述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将唯物主义的哲学蒙上神秘的色彩，并给这一教条戴上“科学思想”的桂冠。这正是共产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为了印证自己的世界观而写下达尔文主义是“自然科学史的基石”的原因。[1]

然而，这个基石是腐朽的。大量的现代科学发现表明：那种早已定性并把达尔文主义与科学扯到一起的做法是错误的。唯物主义已陷入一个巨大的欺诈中。科学发现已经驳倒了达尔文主义，并向人们显示，我们人类自身的存在，不是起源于“进化”，而是“创造”，即真主创造了宇宙、生物和人类。

你手中的这本书，正是为了告诉人们这个事实而写的。该作品自第一次面世以来，从土耳其到许多别的国家，数百万人已经阅读并欣赏着这本书。原书用土耳其语发表之后，已翻译成了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波斯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马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等不同的文字，并获得世界各国读者的关注。

同时，在对《进化论的骗局》中的观点，持反对意见的人们中间也引起反响。2000年4月22日，普及达尔文主义的重要杂志《新科学家》，刊登题为“燃烧的达尔文”的文章，用近30页的篇幅介绍了哈荣·雅荷雅的作品，称其著作“已传遍伊斯兰世界”，因而他是个“国际英雄”。

“美国国家科学教育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Education）发行的《报告》杂志，在1999年11月10日的封面上，刊登了《进化论的骗局》的照片。

在科学界举足轻重的《科学》杂志，强调了哈荣·雅荷雅的作品所产生的冲击与雄辩。2001年5月18日发表题为《宇宙创造说：在亚欧交汇处扎根》（Creationism: Takes Root Where Europe Asia Meet）的文章，指出在土耳其的许多地区，“哈荣·雅荷雅的书籍《进化论的骗局》和《达尔文学说的黑脸》，比教科书更有影响力。”该杂志评估其著作时说，它“在北美以外的地方，发起了最为强劲的反进化论的运动”。

在这场论战中，虽然维护进化论的期刊注意到《进化论的骗局》所产生的冲力，但仍然不能对该书做出任何科学的答复。原因当然只是他们不可能答复。因为，进化论已完全进入死胡同，对此，读者会从下面的章节中得到证实。在你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你将发现进化论所讲的并不是科学事实，而是伪科学的教条，尽管它以唯物主义哲学的名义，罗织了违背事实的证据和不遗余力的诡辩。

《进化论的骗局》的英文第八版，通过扩充和更新，进一步证实了这个学说的崩溃。在本书的最后两章，你将看到唯物主义已从根本上瓦解了，而且你对世界的看法将有重大的改变。

我们期待着《进化论的骗局》能对150年来，为人们看清欺骗人类的唯物主义、达尔文学说的崩溃有所帮助，并且将提醒我们注意生命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事实：人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对创造我们的真主，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

相信进化论是现代最大的奇迹

地球上数以百万计的生物都有神奇的特性、独特的行为方式和完美的身体结构。每一种生物都是具体、优美的造化。植物、动物、尤其是人类，从外部形态到细胞和肉眼看不见的一切，都是伟大智能与艺术的创造。今天，大量学科中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正研究这些生物的细微特征，揭示其分子奇迹般的特性，并努力得到他们怎样形成的答案。

当一些科学家发现这些结构神奇的特性和形成生命的智能时，他们震惊了，并见证了其中无限的知识与智能。然而，另一些人却惊奇地宣称，这一切奇妙的特性是盲目机遇的产物；这些科学家信相进化论。在他们看来，组成生物的蛋白质、细胞和器官，是一系列巧合的结果。这令人吃惊：对这些小得肉眼无法见到的单细胞，经过多年研究并着书立说的人，竟然会认为这些非凡的结构是偶然形成的。

一些有名的教授打着理性的旗号相信这些巧合；这使旁观者们极为惊讶。在这些教授看来，一些简单的化学物质先是聚到一起，并形成蛋白质——这比任意组合的单词变为诗歌更为不可能。然后，别的巧合导致其它蛋白质的出现。这些蛋白质也有组织地偶然结合了。不仅蛋白质如此，像细胞内的复杂构造酶、激素和细胞器也是偶然出现和结合的。由于亿万次的巧合，第一个细胞形成了。这种盲目巧合的神奇能力并未就此停止，因为，这些细胞随即又偶然开始繁殖了。按照这样的主张，另一巧合组合了这些细胞，并从它们当众产生第一个生物。

为形成生物的一只眼睛，必须同时发生亿万次“偶然事件”。这种盲目的巧合引出一个问题：首先以最大可能的位置，在头上张开两个所需尺寸的洞穴，然后，细胞在这些地方

偶然找到了自己，并开始建造眼睛。

我们已经看到，巧合扮演着为所欲为的角色。从一开始，“偶然”知道何谓看见、听到与呼吸，纵然那时世上任何地方，根本没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偶然”演示了伟大的智能与意识，拿出了可行的计划，并一步步地建造了生命。这完全是毫无理性的假想；那些教授、科学家和研究者也因此声名鹤起，他们的观念促使自己陷入其中。既是现在，他们孩子般的固执，排斥所有拒绝相信这种童话的人们，并把这些人看作不讲究科学的愚顽之辈。这的确与中世纪愚昧、狂热和无知的思想境地没有区别；他们惩罚那些主张地球并不平坦的人们。

如果你在这些人的面前雕刻一尊石头或木头偶像，告诉他们“看，这个偶像创造了这个房间和其中的一切”时，他们就会说，那是绝对愚蠢的，并拒绝相信之。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宣称“偶然的无意识过程，逐渐带来这个世界，亿万种奇妙的生物随之产生”，是最科学的解释。

简言之，这些人把偶然当作一个神，并声称它的聪明、知觉和力量足以创造生物和宇宙间灵敏的平衡。当听见拥有无限智能的真主创造了所有生物时，这些信奉进化论的教授们则拒绝接受这个事实，并坚持本身没有意志的无知觉、无智力、无力量的亿万次巧合，才是真正的创造性力量。

事实在于，历史上曾受过教育、智力健全的人们，是这种最不符合理性和逻辑之主张的“信士”；这似乎才是真正的“奇迹”。同样，对真主奇妙的造化，如具有非凡组织与特性的细胞，这些人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细胞是真主的奇迹之一，而进化论者无视连小孩子都会看清的事实，且不愿掌握真相——不论告知他们多少次。

当你读本书时，会不断遇到那样的奇迹。你还会看到，进化论在科学事实面前覆灭的现实，达尔文主义是完全违背理性和逻辑的大骗局，并戳穿维护它的人们的阴谋。

从偏见中解脱出来

大多数人相信，从科学家那里听到的每件事肯定是真实的。他们甚至从不考虑科学家们，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哲学或思想上的偏见。实际上，进化论者正是在科学的掩盖下，把个人的片面意见与哲学观点强加给公众的。例如，虽然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偶然事件除导致不规则及混乱外，并不形成任何别的事物，但他们仍然坚持其主张，自己在宇宙和生物中看见的神奇秩序、计划和设计是偶然产生的。

例如，某位生物学家明知形成生命基础的蛋白质分子的结构，具有不可理解的和谐性，并且这样的结构决没有偶然形成的可能性。尽管如此，他仍会声称蛋白质是几十亿年以前，在原始地球条件下偶然产生的；他不仅如此认为，甚至还毫不犹豫地声称并且坚持：不仅一个蛋白质偶然形成，数百万的蛋白质也是偶然形成的，然后又难以置信地组合在一起，进而创造了第一个活细胞。此外，他搬出一个“瞎强者”来维护自己的观点：这个“瞎强者”就是“进化论者”。

也是这位科学家，在一条平坦的道路上散步时，如果他发现堆积在一起的三块砖，他绝不会认为这些砖会偶然相遇、然后偶然堆积起来。他肯定会把这样主张的人看成疯子。

那么，能够合理地评价普通事件的人们，当他们研究自己如何存在的问题时，怎能表现出这样一种没有理性的态度呢？

当然，这种态度也不可能是以科学的名义表现的；因为，按照科学的观点，如果同一事件存在两种可能的因素，那

么，就必须将两种因素都考虑进去。如果两种因素之一的可能性低得多，比如说是百分之一，那么，要做到合理而科学的判断，就必须考虑另一个因素——其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九，这样才有科学性。

让我们记住认识论中的这个科学的衡量标准吧。关于生物是怎样在地球上产生的，有两种观点：第一，一切具有复杂结构的生命，是由真主创造的；第二，生命的形成通过无意识和随意的巧合。后者显然是进化论的观点。

从科学资料来看，例如，当我们留心分子生物学时，就会发现单个活细胞、甚至出现在这一细胞中的数百万个蛋白质，没有一个会像进化论者宣称的那样，是偶然存在的。正如我们下面的章节将看到的一样，概率方程也多次证明了这一点。进化论者关于物种起源之观点的真实性的概率只能为零。

这就是说，第一个观点的正确率是“百分之百”，即，生命是有意识的产物。换成另一种方式，这是“被创造”。一切生命的存在，是具有超凡能力、智能和知识的创造者——真主创造的。这一现实不仅仅是一种信念，而是依靠人的智能、逻辑思维和科学推论而得出的一般结论。

在这个现实面前，我们的“进化论者”应放弃他们错误的主张，并且重新审视显然得到证明的另一种事实。反之，若一味坚持己见，那只能证明他们实际上是为坚持自己的哲学、意识形态和教条而牺牲科学的人，而且不能作为一位真正的科学家。

然而，每当所谓的“进化论者”面对现实的时候，他们的那种愤怒、偏见和顽固只会进一步地增加。他们的这种态度也只能用一个词来解释：“信仰”，不过这是一种迷信。对此，他们无法作出别的任何解释；因为，当他们面对现实时，竟全然不顾事实，将双目紧闭，终身依附于全凭想象而建立起来的荒谬故事里。

盲目的唯物主义

我们现在谈论的信念，涉及唯物主义的哲学；它争辩说，物质的存在是永恒的，而且不承认物质之外的任何存在。进化论是唯物主义哲学所谓的“科学基础”，为了支持这种哲学而盲目地为进化论辩护。当科学宣布进化论无效的时候——二十世纪末科学业已证明的事实，他们为了滋养唯物主义的生存却歪曲科学，并强迫人们去支持进化论。

在土耳其有名的进化论生物学家中，其中有人写下的几行话，使我们能够看清这个盲目的信念，造成错误判断的好例子。这位科学家试图探讨细胞色素C偶然形成的可能性；它是构成生命的最基本的酶元素之一。他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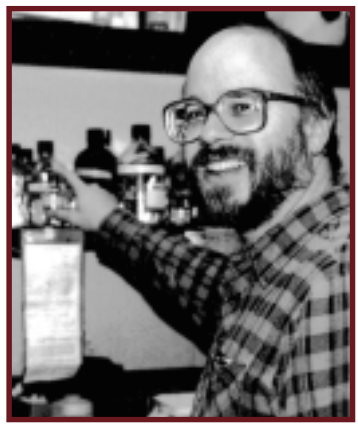
> “一个细胞色素C有序形成的可能性接近零，也就是说，如果生命的形成需要某种顺序，那么可以说，这种可能性相当于在整个宇宙中才觉察到一次。反之，超乎我们解释的一些超自然的力量，在其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而接受后者，对科学的目标是不适宜的。因此，我们必须分析第一种假说。”[2]

这位“科学家”觉得，宁愿接受一种“近乎零”的可能性“更为科学”，而不愿接受创造的事实。但是，根据科学规律，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一件事有两种可供选择的解释，只要其中的一个有“近乎零”的可能性，那么另一个则是正确的选择。然而，教条的唯物主义采取的手法是，禁止人们接受更大的创造者的存在。这种禁令驱使我们的这位科学家，以及同样相信唯物主义教条的很多人，去接受与理智完全相反的主张。

信赖这些科学家的人们，被唯物主义的符咒弄得茫然不知所措；他们阅读唯物主义的书籍或文章时，心理上变得麻木不仁了。

正是这种独断的唯物主义观点，使科学界的许多显赫的人物，成了无神论者。那些从这种唯物主义的符咒中，解放了

自己的人们，依靠明智的判断力去思考的科学家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创造者的存在。近几年来，在科学界又鼓吹“智能设计”的理论，其中最有名的是美国生物化学家迈克尔·杰·比赫博士，他这样描述拒不接受生物“设计”或“创造”的科学家们:



迈克尔·比赫:
“一种难耐的沉默弥漫在复杂的细胞周围。”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现代生物化学已经公开了细胞的大部分秘密。为了揭开细胞的秘密，数以万计的人们将他们生命中美好的时光奉献在了乏味的实验室里，.....为了研究细胞付出的大量努力——从分子阶段研究生命——其结果便是一声响亮、清楚、震耳的呼喊‘设计！’。这个结果是那样的明确，那样的富有意义，以致人们把它看作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面对极其复杂的细胞结构，留下的却是古怪而窘迫的一片沉默。为什么科学界没有敞开胸怀，去接受这一令人震惊的发现呢？为什么‘设计’的观察报告经过了‘智能手套’的处理呢？这种必居其一的选择是：大象的一个侧面贴上‘智能设计’的标签，而另一面必须贴上真主，即接受有意识的‘智能设计’的同时，无形中也接受了上帝的存在。”[3]

这就是你们从杂志、电视或书本中，所看到的无神论进化论者的尴尬境地。他们进行的科学研究，向自己证明了真主的存在。然而，他们所接受的唯物论的教条教育，使他们变得如此的迟钝和盲目，他们还是决意坚持否认真主存在的事实。

那些曲意忽视创造者明显迹象和证据的人们，则变得愚顽不化了。被这种迂腐的傲慢和顽固俘虏以后，他们甚至会搬出一种道德，来支撑其谬论了。这方面的一个绝妙的例子，是

著名的进化论者理查德·道金斯向基督徒们发出的号召：如果你们看见圣母玛利亚的塑像向你们挥手时，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见到了一个奇迹。按照道金斯的逻辑，“组成塑像右手臂的全部原子，可能碰巧同时向一个方向运动——一种有待确认的可能性事件，而非可能的存在。”[4]

《古兰经》恰如其分地描述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切不信教者所共有的心态：

> **“即使我命众天神降临他们，即使死人能对他们说话，即使我把万物集合在他们的面前，除非真主意欲，否则，他们不会信道；但他们大半是无知的。”**（牲畜章6（艾奈阿姆）：111）

就像本节《古兰经》所解释的一样，进化论者的教条思想既不是他们固有的思维模式，也不是他们的思维特权。实际上，进化论者主张的更不是一种现代的科学思想，而是从最不开化的异教徒群体中，坚持下来的愚昧无知。《古兰经》讲述与此相同的另一种心态：

> **“若我为他们开辟一道天门，而他们从那道天门继续登天，他们必定说：‘我们的眼睛受蒙蔽，不然，我们是中了魔术的民众。”**（《古兰经》15：14-15）

用进化论教化公众

如上述《古兰经》章节所表明的那样，人们之所以看不清自身存在的真相，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有一种“符咒”在阻碍他们去论证生命的现象。进化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被接受，依靠的也是这个“符咒”。我们所说的“符咒”，正是一种条件反射般的教化。人们受到进化论正确性的强烈的思想灌输后，即所有生物是偶然形成的这一教化后，他们居然长期地意识不到那是歪曲的事实。

这种教化对人的头脑造成负面影响，并且使其丧失正确的判断力。最终，在这种连续不停的思想灌输下，大脑开始不能自觉地感知客观事实，而是相信灌输进去的才是现实。这个



忙于鼓吹进化论的
理查德·道金斯

现象，我们也能在其它例子里遇到。

例如，把一个人施以催眠术后，再告诉他躺的床是一辆小汽车；在催眠状态消除后，他依然会觉得那张床的确是一辆小汽车。他认为这非常合乎逻辑并合情合理；因为，他认为当时真地看见了躺倒时的样子，并且对其正确性毫无疑问。

这些例子显示，机械式的教化，其威力与效率是何等的大，而且是经过无数次的科学实验与文献所证实了的，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心理食品和精神病学的教科书。

进化论及其附庸唯物论，就是用这样的灌输方法施加于公众的。那些不断从不同的媒体、学术资料和“科学”讲坛中，受到进化论教化的人们，已经无法意识到，接受这个理论其实违背最基本的理性原理。

相同的思想灌输也俘获了很多科学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科学事业中刚刚起步的那些年轻人，更多地接受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受这种符咒的迷惑，很多进化论者依然在探索，并试图证实19世纪的科学事实所否认了陈旧的进化理论。

另外，还存在强制科学家成为进化论者和唯物主义者的机制。在西方国家，一个科学家为了晋升职务、获得学术界的认可，或者能在科学杂志上出版自己的文章，就必须达到一些标准。无条件地接受进化论便是头号标准。这种制度驱使一些科学家们，为一个教条的信念而贡献了他们的一生及整个科学事业。

这就是你们常听到的“进化论仍然被科学界所接受”之声明背后，所隐藏的事实。进化论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不是由于它的科学价值，而是因为它是一种势在必行的意识形态。在知道这个事实的科学家中，只有少数人敢于冒险地指出：国王是一丝不挂的。

在本书后面的篇章中，我们针对进化论者所漠视的现代科学事实，将展开评论，并向大家展示真主存在的明显证据。读者们将见证：进化论其实是个骗局——在每个造假阶段都对自己巧妙伪装、但在创造的事实面前会原形毕露的骗局。我希望读者从误导人的思想、阻拦人的判断力的进化论中醒悟过来，并希望严肃地反思一下与本书相关的问题。如果读者能从这种符咒中解脱出来，并清醒、自由、不带任何偏见地去思考，就会很快发现昭然若揭的事实。这个必然的事实，也通过现代科学在各方面得到证实，表明生物的存在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创造的结果。

人类只要想想自己是如何存在的，又是如何从一滴水而形成生命的这种事实，或是观察任何一种其它生命机体的完美特征，那他们就会很容易地认清创造的事实。

为了揭穿进化论的真相，我们所有的努力，正是对那些长期在传媒及影视机构做进化论宣传的人们，所作的一个必要的答复。

进化论简史

进化论者的思想根源，与古代试图否认创造事实的独断的信条一样久远。大多数古希腊的无神论哲学家都为进化论做辩护。当我们回顾哲学史时，就会发现进化论的观点，是由很多无神论哲学的脊骨组成的。

然而，在现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并非古代的无神论哲学在起推进作用，而是对真主的信仰起着推进作用。在现代科学的开拓者中，大多数人都相信真主的存在；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时，把发现真主所创造的宇宙，认知真主的法规，观察创造过程中的每个细节作为目的。例如，天文学家莱昂纳多·达芬奇、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古生物学之父古伟尔、动植物学的先驱林尼厄斯，以及被称为“最伟大的科学家”的伊萨克·牛顿等，他们在研究科学时都相信：真主不仅存在，而且整个宇宙的产生是真主创造的结果。[5] 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天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相信真主的虔诚的科学家，并且如此诚恳地说道：“我无法想象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深刻的信仰。这种情形可以这样来表达：没有宗教信仰的科学是瘸子。”[6]

现代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德国的物理学家麦克思·普朗克说道：“任何以严肃的态度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必须认识到，进入科学殿堂的门上写着：你必须有信仰，这是科学家不可或缺的一种品质。”[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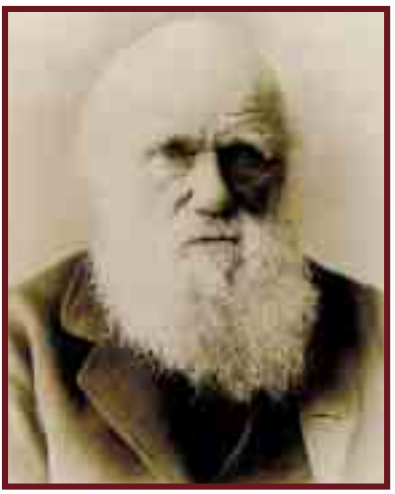
进化论是古老的唯物论哲学的再度复苏，并在19世纪广泛地得到传播，是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物。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唯物主义只是通过物质因素来解释自然的。由于它一开始就否认创造的存在，所以就断言每一件事物，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都不是创造而来的，而是偶然形成的，然后获得一种有序的状态。然而，人类的智力结构足以理解该秩序的存在——当他们看到那种秩序的时候。与人类的基本智能相反的唯物主义哲学，却在第19世纪中叶提出了“进化论学说”。

达尔文的想象

提出进化论的是一个业余的英国自然学家，即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至今仍有人在维护他的理论。达尔文从未在生物学方面接受过正规教育。他只是个对自然和生物现象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这种兴趣激励他自愿乘坐“贝格尔号”（小猎犬号）的英国皇家军舰，参加了航游世界的远征。

1832年，他们从英国出发，在世界不同的地区旅行了五年。特别在经过加拉帕哥斯群岛时，各种各样的生物物种，给年轻的达尔文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一些特殊的雀鸟。他认为那些不同雀鸟嘴部的变异，是由于为了适应不同的栖息地而引起变化的。正是这种想法促使他想象：生命与物种的起源，来自于“对环境的适应”。根据达尔文的假设，不同的生物物种并不是真主造化的，而是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并且为了适应自然环境，结果彼此才产生差异的。

达尔文的假说并没有经过任何科学发现或试验的检验，而是在当时一些知名的唯物主义生物学家们的支持和怂恿



查尔斯·达尔文

下，他及时把它变成了一种自命不凡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生物的个体先是以最好的生存方式，适应自己的栖息环境，然后再把它们的特性传承给后代；这些有利的特性逐步累计起来，并把个体转变成完全不同于它们祖先的新物种。（这些“有利特性”的起源在当时是不得而知的。）按照达尔文的想法，人类是最适应这种体制的产物。达尔文把这个过程称为“由自然选择引起的进化”。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物种起源”：一个物种的起源来自另一个物种。于是，他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对这种假想做了“破译”。

当时，达尔文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理论会面对许多不能解答的问题。他在该书“学说的难点”一章里公开承认这一问题。这些“难点”主要是化石记录，无法用“偶然形成”来解释的生命体的复杂器官（例如眼睛），以及生物的本能等问题。达尔文希望这些难点能通过新发现来解决；可是，这并未阻止他进一步提出许多毫无根据的解释。

美国物理学家利普森，对达尔文所提出的“难点”作出以下解释：

> “初读《物种起源》，我发现达尔文远没有像描述的理论那样，对自己具有信心；例如‘学说的难点’一章，其中就显示了相当多的自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我对他关于眼睛是如何产生的解释尤其疑惑不解。”[8]

达尔文的种族主义

达尔文最重要但鲜为人知的特点，就是他的种族主义：达尔文认为，欧洲的白人要比其它人种更“高级”。当达尔文推测人类从猿类动物进化而来时，一些人种比其它人种发展得更快，而后者仍保留了猿的特征。《物种起源》出版后，他写的《人的来由》一书狂妄地评论了“不同人种间截然的差异。”[1] 达尔文在书中认为，黑人和澳洲的土著等同于大猩猩，然后他们将被“文明的种族”及时地“弄死”。他说：

> 也许在不久的数百年里，文明的人种将消灭、取代世上野蛮的族人。同时，人猿……无疑地将灭绝。这样，人类与其最亲近的同类之间的差距将加大；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时，高加索人、与猩猩一样低等的猿，将取代目前介于黑人或澳洲土著及大猩猩之间的种类。[2]

达尔文的这种荒谬想法不仅为社会学所接受，而且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



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现有的人种处于“进化阶梯”的不同档次上，欧洲的人种是最“高级”的人种，而许多其它人种仍然具有“猿”的特征。



1 本杰明·法林顿（Benjamin Farrington）《达尔文真要说的话》第54-56页，伦敦，“半球图书”，1971年;

2，查尔斯·达尔文：《人的来由》（第二版）第178页，纽约，A.L.Burt.Co，1874年。

达尔文原以为这个理论上的难点，会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然而，事实上科学更进一步地证实了他的错误。

达尔文发展他的理论时，受到了他之前的很多进化论生物学家的影响，特别是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根据拉马克的观点，生物把他们在生存期间获得的特性，通过代代相传、逐步形成了进化。例如，长颈鹿是类似于羚羊的一种动物，为了能吃到高处树枝上的树叶，经长期的“努力”，逐步延长了脖子，从而进化成了现在的长颈鹿。达尔文也是利用拉马克提出的“传承习惯秉性”的论点，来解释生物进化的。[9]

然而，达尔文和拉马克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对生命的研究仍处在技术原始和水平幼稚的阶段。在当时的科学领域中，例如，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的名称都不存在。因此，他们的理论必须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想象力。

当达尔文的书产生一定反响时，一位名叫格雷戈尔·门德尔的奥地利植物学家，与1865年发现了遗传的规律。在19世纪末，门德尔的发现依然鲜为人知，直到20世纪初，他的发现才成为科学界的重大成果。这就是遗传学科学的诞生。

那以后，基因和染色体的结构也先后被发现。20世纪50年代，遗传学信息中的DNA分子结构的发现，使进化论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因为，生命具有难以置信的复杂性，这使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变得无效了。

这些发展表明，达尔文的理论早该抛入历史的垃圾坑中。但是，事情并非如此。某些圈子里的人们，依然站在科学的讲坛上，坚持对进化论进行修补、更新，并且设法把它提升到科学的位置。这些努力的目的，并不是对科学的关注，而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图谋。

新达尔文学说的垂死挣扎

二十世纪初，由于遗传学规律的发现，使达尔文的理论完全陷入危机。虽然如此，一群决心忠于达尔文的科学家，企图找到维护达尔文的办法。1941年，在“美国地质学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他们聚集到了一起。参加会议的人有：遗传学家G·莱迪亚德·斯特宾斯、提奥多斯·多詹斯凯，动物学家厄恩斯特·梅尔、朱利安·赫克斯利，古生物学家乔治·盖洛德·辛普森、格伦·L·杰普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他们最后一致同意“修补”达尔文学说。

这些骨干把精力集中在：有利变异起源的问题上，即想象中的导致生命机体进化的变异上——连达尔文自己都不能解释的观点上，而且只是依靠拉马克的观点来解释的。对此，他们变更为“随意的突变”（“随机突变”）。通过把突变的概念，增加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理论中，并当作新的理论，命名为“现代合成的进化理论”。不久，这一理论被称为“新达尔文学说”，把提出这个理论的人称为“新进化论者”。众所周知，“突变”或“事故”，也就是说一个生物基因，在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分裂、异位或破坏总是有害的。

然而，新进化论者仍努力通过数千次的突变实验，来确定“有利突变”的一个实例。在以后的数十年里，他们为了证明新达尔文学说而做的尝试，终于进入了绝望的境地；他们的全部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此外，他们也努力证明自己假想的理论，即第一个活着的生物体，在原始地球的条件下偶然产生了。不幸的是，他们试图证明生命是偶然产生的每一次实验都破产了。

达尔文时期科学的原始水平

当达尔文提出他的假设时，遗传学、微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等学科还没有形成。如果我们所说的这些知识，在达尔文理论提出以前就被发现的话，那达尔文可能容易认识到，他的理论是不科学的，并且也不会试图提出这种毫无意义的主张了。因为，基因信息决定物种的存在，而对自然选择来说，通过改变基因，来产生新的物种是不可能的。



同样，当时的科学界对细胞结构及其功能的认识还相当浅薄。如果达尔文拥有电子显微镜的话，他将亲眼目睹细胞器惊人的复杂性，看到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系统，不可能发生微小、偶然地变化。如果他知道生物数学的话，就意识到别说完整的细胞，连单一的蛋白质分子，都不可能偶然存在。详细研究细胞结构，是电子显微镜发明以后的事。在达尔文的时代，只能观察到细菌的表面结构。

能观察到细胞结构只有电子显微镜能做到。达尔文时代最初所观察到的细菌细胞只不过是它的表面结构而已。





构成生命结构的单一蛋白质，都不可能是偶然产生的；作为最小生命单元的细胞，在二十世纪最先进的实验室里甚至都无法合成，进化论者们却声称，它们在原始的不受控制的地球条件下会偶然形成。

新达尔文学说的理论也被化石记录所击败。在长期的考古工作中，新达尔文学说关于“活着的生命体，从原始到高级种类的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过渡变种’”的化石，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过。同时，比较解剖学显示：假设一个物种从另一物种进化而来，实际上它们具有不同的解剖特征，即它们不可能互为祖先或后裔。

不论如何，新达尔文学说从来就不是一个科学理论，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教条；如果不是这样，则可以把它说成一种宗教。新达尔文主义的开创者、哲学和动物学教授朱利安·卢塞(Julian Huxley)，在1958年出版的《没有启示的宗教》（Religion Without Revelation）一书中，清楚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在其它作品里，就进化论之所以是一种宗教信仰，做了如下的解释：

> “宗教基本上是倾向世界大众、包罗万象的一种观点。因此甚至可以说，进化论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替代上帝所担负的职责，即人类的信仰和希望可以结合成一种强有力的原则。”[10]

这就是为什么进化论的拥护者，仍然维护它的原因，尽管所有的证据已经表明它是错误的理论。他们不能同意的一点是，在实现进化的过程中，究竟哪一种不同的模式是“正确的”，即实现进化的不同模式，成了他们中唯一的异议。这些模式中最重要一个是：被称为“跳跃的进化论”的荒谬脚本。

试验与错误：跳跃的进化论

新达尔文学说的这一模式，是当今世界提及“进化论”时，首先想到的一种学说。但在新近的几十年里，又诞生了一个新的模式：“断续性的平衡”或“跳跃的进化论”模式。

在20世纪70年代，两名美国古生物学家奈尔斯·埃尔德雷奇（Niles Eldrege）和史蒂芬·简·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开始高声拥护这个模式。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新达尔文理论的主张，已经被地质记录绝对地驳倒了，化石证明生物不是通过逐渐进化而来的，而是突然、完整地出现的。这些新达尔文者沉湎于多情的希望中，即总有一天，失去的过渡性化石会被发现。埃尔德雷奇和古尔德也知道这个希望是毫无依据的，但面对这种情形，为了不放弃他们的进化论教条，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式：断续性的平衡，即进化的步骤不是由小的变化形成的，而是靠相当突然和较大的变化形成的。

这个模式其实是一个幻想。例如，为埃尔德雷奇和古尔德的“跳跃的进化论”提供了指导的欧洲古生物学家O.H新德沃夫（O.H.Schindewolf），声称最初的鸟，是从一个爬虫的蛋里孵化出来的，是一个“总突变”，即由于遗传结构发生一次巨大的“意外事故”的结果。[11] 根据相同的理论，一些陆地动物经过突然和全面的变异，就有可能变成巨大的鲸。这些主张就像青蛙变成王子的童话故事一样的具有科学性；虽然它们与遗传学、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的全部规律相抵触。



史蒂芬·简·古尔德



今天，数以万计的科学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科学家，拒绝接受进化论学说，并出版了大量宣告进化论无效的书籍。上面是其中的一些代表。

不过，新达尔文主义者也为自己所处的危机而感到苦恼。一些持进化论观点的古生物学家，信奉了新达尔文学说，这比新进化论本身更具新奇性。

这个模式的唯一目的，是为新达尔文学说在化石中的断层纪录，提供一种解释。但是，试图解释鸟类在进化过程中的“化石缺口”，而声称“鸟突然从爬虫蛋中诞生”，是近乎无理的臆测，因为进化论者自己就承认：从一个物种到另一物种的进化，需要在遗传信息方面，发生大量和有利的转变。

突变不能改进遗传信息或增添新的信息。突变只能导致遗传信息的紊乱。跳跃的进化论的维护者们幻想的“大突变”，只会使遗传信息大量减少和破坏。

此外，“断续性平衡”的模式，其最初阶段就由于不能触及生命起源的问题而瘫痪了，这也是一开始就驳倒新达尔

文学说的问题。当发现单个的蛋白质不能偶然产生后，那幺，由亿万个蛋白质组成的生命体，经历了“断续性的”或“逐步”进化的说法，也就毫无意义了。

虽然这样，当今人们头脑中的“进化论”的模式，依然由新达尔文学说所占据。在随后的章节里，我们将首先分析新达尔文学说之模式中的两个想象出来的体制，并通过地质记录来检验这一模式。然后，我们将谈及生命起源的问题；这在新达尔文学说及其它进化论的模式中，都不存在有效的答案，比如他们提出的“跳跃的进化”模式。

我们早些提醒读者，或许是有益的：我们将在每个阶段中都会看到，进化论的“剧情”纯属童话故事，是脱离现实的一个大谎言。它是一场把世界欺骗了140年的游戏。多谢近期的科学发现，谁还想继续维护进化论，就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进化论想象中的机制

新达尔文主义的模式——我们姑且把它叫成进化论的“主流”——依然争辩说，生命是经过两个自然的机制逐步进化的：“自然选择”和“突变”。该理论的基本主张是：自然选择和突变是两个互补的机制。进化变异的起因，是生物基因结构的随机突变。引起突变的特性，通过自然选择的体制而选择，从而使生物逐步得到进化。

当我们进一步探索这个听起来非常合理的理论时，就会发现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像进化这样的事情。根本没有自然选择和突变的说法——不同的物种相互地转变，它们的主张是毫无根据的。

自然选择

在自然的变迁过程中，“自然选择”已为达尔文之前的生物学家所熟知；他们将它定义为：“物种不受破坏而保持稳定机制”的一个自然过程。达尔文是第一个提出这一主张的人，即自然选择的过程具有进化的力量，并且在此基础上树起自己的全部理论。他的书名就表明，自然选择是达尔文理论的基础：《物种起源：自然选择的途经》

但是，从达尔文时期起，没有一个证据显示，自然选择引起了生物的逐步进化。英国著名的进化论者、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高级古生物学家科林·帕特森强调，从来没有观察到自然选择，会有力量引起生物的进化：

“没有人曾通过自然选择的机制生产出一个物种；也没

有人曾经接近过这一机制，而新达尔文主义目前的争论就关乎这个问题。”[12]

自然选择的观点认为，那些更加适合于它们栖息地的自然条件的生物，将会繁衍后代并存活下来，而不适合的生物将会消失。例如鹿群，在其它野生动物的威胁下,那些跑得快的鹿，就自然地存活下来。这是真的。但是，不论这个过程延续多长，它将不可能把那些鹿转变成另一个生物物种；鹿总是鹿。

当我们看了进化论者证明自然选择的一些例子后，就会很容易地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企图蒙蔽我们眼睛的把戏。

“工业飞蛾”

1986年，道格拉斯·傅图马出版了《进化生物学》一书,该书被当成对进化论最佳解释的资料之一——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进化论。就此，他提出了最著名的例子：飞蛾的颜色，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变黑了。并非只是在傅图马的书中有这样的故事，关于“黑色革命”的故事，几乎在所有进化论者的书中都可以找到。故事基于英国唯物论者、生物学家伯纳得·凯特维尔（Bernard Kettlewell）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试验。我们可以简述如下:

根据记载，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时，曼彻斯特附近树木的树皮是浅色的。而栖息于这些树上的那些黑色飞蛾，很容易被捕食它们的鸟类所发现，所以，飞蛾几乎没了存活的机会。50年后，由于工业污染，林地中的青苔枯死，树皮变黑；可是这一次，栖息在树上的浅色飞蛾，却成了鸟类的猎物。结果，浅色的飞蛾逐步减少，而深色的飞蛾开始增加——就因为不易看见。于是，进化论者把飞蛾当作他们理论的重大证据。另一方面，他们躲在窗帘后面聊以自慰，就凭浅色飞蛾何以变成深色飞蛾这样的变化。这怎能成为进化论学说中“自然选择”理



工业黑症当然不是进化的例子；因为，期间没有出现新的飞蛾物种。选择只存在于已有的差异之中。而且，这种经典的黑症故事是骗人的。上面是教科书中使用的图片（画出的仿真照片）。实际上，这是进化论者粘贴或钉在树身上的死飞蛾的标本。左图，工业前期的浅色飞蛾；右图，工业革命后期的深色飞蛾。

论的重要证据呢？甚至在这个事实中，根本没有进化的形式，因为根本没有新的飞蛾物种的出现。

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情形决不可能作为进化论的证据；因为，自然选择不可能生出原前并不存在的一个新的形态。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出现以前，深色飞蛾就生存在浅色飞蛾当中。只是飞蛾存活的比率，随着飞蛾总量的不同在变化。飞蛾也没有获得可以引起“物种变化”的新的特征或器官。例如，为了让一只蛾变成另一生物物种，鸟的身上就必须增加新的基因，也就是说，必须给鸟输入完整、单一的遗传程序，以便包括鸟的物理特性在内的信息。

简而言之，与进化论者所想象的理论相反，自然选择不可能具有使生物产生新的器官组织，或者从一个物种转变成另一物种的特性。

从达尔文时代至今，进化论者所提供的最大“证据”，也只有这个工业革命“黑症”的故事。

自然选择能够解释复杂性吗？

自然选择的假想无助于进化论。因为，这种假想永远不能增加或者改进一个物种的遗传信息，任何时候也不能把一个物种转变成另一物种：海星转成鱼，鱼转成青蛙，青蛙转成鳄鱼，或是鳄鱼转成鸟。跳跃的进化学说最强烈的拥护者古尔德，提及自然选择时面临这样的僵局：

> “达尔文学说的本质，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短语来说明：‘自然选择是完成进化转变的创造性力量。’谁都不会否认，自然选择在淘汰不适者时将扮演负面角色。达尔文的理论也要求‘创建适者’。”[13]

在自然选择的问题上，进化论者利用的误导方法之一，是他们作为有意识的阴谋者，才努力提出这个机制的。但是，自然选择没有意识。它没有区分何为有利、何为有害于生物的意识。但是，自然选择本身是没有意识的，也根本没有能够决定生物好坏的意志。其结果是，自然选择不能解释生物系统和器官所具有的“不简化的复杂性”的特征。这些系统和器官，由许多部件的相互合作组成，甚至这些部件的任何一项一旦丢失或有缺陷，它们就将无用。（例如，人的眼睛就不能简化，除非其全部组件同时存在，否则眼睛将不起任何作用。）

所以，将所有部件组合到一起的意志，应该能够预估未来，并瞄准在最后阶段将得到的好处。由于自然选择本身没有意识和意志，从而它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达尔文对这个同样毁坏进化论之基础的事实，也表示担忧：“如果能够论证



像飞蛾那样的自然选择，适应于某一物种内部弱势个体的淘汰。这是使已有物种不致退化的保守力量。除此之外，它没有能力把一个物种转变为另一物种。

任何复杂器官的存在，即不可能经过大量、连续、轻微的修正形成复杂的器官，那么，我的理论将绝对失败。”[14]

自然选择仅仅挑选某一物种内具有损伤、虚弱、不适特征的个体，它不能产生新的物种、新的遗传信息或器官。就是说，它不能进化任何物种。达尔文接受这个现实：“自然选择在不发生有利变异时，将不起任何作用。”[15]这就是为什么新达尔文学说，在自然选择理论之后，又被迫提出接近自然选择的“有利变异因素”的突变之概念的原因。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突变只能是“有害变异的因素”。

突变

突变被定义为：发生在DNA分子里的破裂或替换；DNA分子存在于有生物的细胞核中，它保存所有的遗传信息。这些破裂和替换是外部作用的结果，如辐射或化学反应。每一突变是一次要么破坏组成DNA的核苷，要么改变其位置的“意外事故”。多数时间，突变造成的破坏与改变，大得使

细胞不能再修复它们。

进化论学家一再隐瞒的突变，决不是一根把生物转变得更为先进、更为完美的魔杖。突变的直接作用是有害的。突变作用下的变化，看起来只能像人们在广岛、长崎和切尔诺贝利的遭遇：死亡、残疾和畸形.....。

这个原因非常简单：DNA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分子，而随机效应只能破坏这个结构。美国遗传学家B.G.苒甘纳森（B.G..Ranganathan）说：

> “第一，自然界中真正的突变是罕见的；第二，大多数突变是有害的，因为它们是随意的，而不是基因序列结构的改变；高度序列中的随意变更，使事情更糟糕，而非更好。例如，地震会震撼建筑物有序的结构，建筑框架会随意改变，但这并非改进。”[16]

好不足奇的是，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观察到突变的实例。全部突变已被证明是有害的。为调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核武器可能引起的突变，而成立的“原子辐射的遗传效应委员会”所准备的调查报告中谈到了突变。进化论者沃伦·威卫就此评论道：

> “很多人得知突变了的基因有害的说法后，都会感到迷惑。因为突变是进化过程的必要部分。向更高级形式的生命进化时，怎样才能产生好的效果——从实际上导致伤害的突变中？”[17]

为证明“有利变异”而付出的每一次努力都失败了。数十年来，进化论者利用果蝇进行了很多实验；因为这些昆虫繁殖迅速，所以，突变也能迅速显露。在这些果蝇一代一代的突变过程中，依然没有发现有利变异。进化论者、遗传学家戈登·泰勒这样写道：

> “这是个颇具戏剧性，但又不能回避的事实：50多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对繁殖出来的蝇类所作的数千次试验表



明，从未出现一种独特的新的物种，甚至连一种新的酶都没有出现。”[18]

另一个研究者，迈克尔·彼特曼(Michael Pitman)对果蝇实验的失败，作了如此评论：

“摩尔根、金氏密兹、穆勒及别的遗传学家，依靠化学和辐射的方式，使一代代的果蝇置身于热、冷、亮、黑的极端条件下。所有形式的突变，其实是细小或肯定有害的突变业已产生。是人为的进化吗？可惜不是：遗传学家所繁殖的怪物，很少能在饲养的瓶子之外存活。实际上，经突变繁殖的果蝇，面临的不外乎是死亡或不育，或是回归到野生果蝇中去。”[19]

人类的情况与此相同。在人类身上发现的全部突变都是有害的。在这一问题上，进化论者抛出了一种烟幕，甚至企图把这种有害的变异作为“进化的证据”。在医学书中列举的“突变例子”说明，发生在人身上的所有变异，均导致体格缺陷、先天愚型、特瓦综合症、白化病、侏儒症或癌症等。在进化论者的课本中，把这些突变当成“进化机制奏效”的例子。无疑，使人残疾或得病的过程，不可能是“一种进化机制”——进化论者声称要创造的适合生存的较好形式。

概括而言，不能支持进化论者所声称的突变的三个主要原因是:

1、突变的直接作用是有害的: 因为它们是随意发生的，所以它们几乎总是损坏经历突变的生物体。理智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完美、复杂的结构，在无意识的干预下不可能改进，相反，只会削弱它。的确，还没有发现“有利变异”。

2、突变没有给生物体的DNA添加新的信息: 组成遗传信息的粒子从原位置分裂出来后，要么损坏，要么移到DNA的其它位置。突变不能使生命体获得新的器官或特性；它们只能引起畸变，如在背上长出一条腿，或从腹部生出一只耳朵。

3、为了把突变转移给后代，它必须在生物体的再生细胞里进行: 身体的任一细胞或器官所发生的变异，都不能传给下一代。例如，人的眼睛因辐射或其它原因所造成的变化，将不会传给后代。

简而言之，生物的逐步进化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然界中不存在引起它们逐步进化的机制。同时，地质记录证明，这个不实际的假想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化石记录反驳进化论

根据进化论，每一生物物种起源于同一祖先。一个以前存在的生物物种，逐步变成其它种类，而且全部物种都以这种方式产生。根据该理论，这种转变需要经过数百万年以上的时间，才能逐渐形成。

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无数种过渡种类的物种应该曾经存在着，并存活在这一漫长的转变过程中。例如，在过去，必然存在一些半爬行半鱼类的动物；它们除已有的鱼类特性外，早该具有爬行动物的特性。或者说，也必然会有一些除鸟类特性外，还具有爬虫特性的爬行鸟。进化论者相信，这些想象中的动物，是过去存在的动物的“过渡形式”。

如果这样的动物真的存在，那么，它们应该会有上百万、甚至几十亿的数量和种类。更重要的是，这些奇异动物的遗迹，应该出现在地质记录里。还有，这些过渡形式的物种数量，应比目前的物种数量更多，它们的遗迹应该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对此解释道：

> “如果我的理论是真的，那与之相同的无数中间变种肯定已经存在……。从而，它们早先存在的证据，也只能在化石遗迹中发现。”[20]

甚至达尔文自己也明白，这样的过渡形式在地质记录里是不存在的。他希望能在将来发现它们。虽然他对此不抱希望，但也意识到，其理论中最大的绊脚石，就是缺少这样的

过渡形式。因此，他在《物种起源》的“理论的难点”一章中写道:

“如果物种是从其它物种一点点地逐渐演变的，那幺，为什幺我们没有处处看到无数的过渡类型呢？为什幺自然界的物种——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精巧，而没有混乱状态呢？.....但是，依照这种理论，无数过渡的类型一定曾经存在过，可为什幺我们没有看到它们大量埋存在地壳里呢？.....但是，在具有中间生活条件的中间地带，为什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与之密切相关的、不同的中间变种呢？这一难题长期地困扰着我。”[21]

达尔文对这个缺憾的唯一解释，主要是由于当时地质发现的记录不完全。他声称，只有详细地研究地质记录时，才会找到那些失去的中间变种。

从第19世纪中叶起，相信达尔文这一预言的进化论者们，狂热地在全世界搜寻和挖掘这些失踪的中间变种的化石。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没有发现过渡形式。从洞穴中发掘的全部化石显示，生命是以突然和完全的形成，在地球上出现的；这与进化论者的信条正好相反。进化论者还在努力证明他们理论的时候，自己便不知不觉地已经把它推翻了。

英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德莱克·V·艾格承认了这一事实——虽然他是个进化论者:

“关键在于：如果我们详细研究化石记录，不论从顺序还是从科目的标准来研究，我们一次次地发现，不是逐步的进化，而是一个群体在牺牲另一群体的形式下突然的爆炸。”[22]

活化石

进化论声称：生物连续性地进化成别的物种。但是，当我们用这些活物比较它们的化石时，发现它们在数百万年中毫无变化。这是进化论伪造的明显事实。



百万年前的蜜蜂的化石
与当今的蜜蜂毫无差异。





1,35亿年前的蜻蜓的化石，
与当今的蜻蜓相同。





比较一亿年前的蚂蚁化石与今天的活蚂蚁，
清楚地显示：蚂蚁绝没有进化的历史。



另一位进化论者、古生物学家马克·查尔内基的注解如下:

“化石记录是证实该理论（进化论）的一个主要障碍;化石是在地球的地质形态中，已消失的物种留下的烙印。这个记录从未显示达尔文假说的中间变种的踪迹——物种是突然产生并且突然消失的。这种超乎常人想象的事实，为所有物种都是上帝创造的论点提供了支持。”[23]

化石纪录的缺口，不能解释为尚未找到足够的化石，但某一天会找到的。美国古生物学家R·维森，于1991年出版的《不全是自然选择》一书中，在注释“化石纪录的缺口是真实而有意义的”说法时，他说:

“是的，化石纪录的缺口是真实的。在重要的分歧上没有纪录是相当异常的。长时期内，物种的存在通常是静态或接近静态的，物种很少而属类从不变成新的物种或属类，而只是相互替换，或者或多或少地突然改变。”[24]

生命以复杂的结构在地球上突然显现

当我们观察地层和化石时，会发现所有生物在地球上同时出现。人类发现的最古老的有生物化石的地层，是估计拥有5亿至5.5亿纪年的“寒武纪”地层。

从寒武纪时期的地层发现中显示，所有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化石，都是突然显现的——并没有先存的祖先。在寒武纪岩石上发现的化石属于:蜗牛、三叶虫、海绵、蚯蚓、水母、海刺猬和其它复杂的无脊椎动物。这一壮观的生物画卷，构成了非常复杂的动物群体，而且它们在同一时期突然出现;因此，地质文献将这一神奇的事件称为“寒武纪爆炸”。



化石记录证明:
绝不存在过渡形式,
也没有发生进化,
一切物种都以完
美的形式独立出现。

在这一地层中发现的大多数生命形式，与现代生物并没有区别，如都具有像眼睛、鳃、循环系统、高级的生理结构等复杂的系统。例如，三叶虫的眼睛结构是双倍透镜、蜂巢结构，实则是一个完美的设计。哈佛、罗切斯特和芝加哥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大卫·劳普说：“四亿五千万年前的三叶虫的眼睛，应用了最佳的设计；只有受过良好教育和非凡想象力的光学工程师才有可能设计它。”[25]

这些具有复杂结构的无脊椎动物，与它们之前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体之间没有任何关连，也不存在任何过渡形式，而是突然以完整的生命形式出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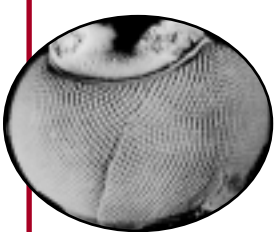
《地球科学》（Earth Sciences）杂志是普及进化论的出版物；其编辑理查德·莫纳斯特斯凯在下文中讲述了“寒武纪爆炸”，这使进化论者们大为惊讶:

> “五亿年以前，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具有非常复杂形态的动物突然出现了。此刻，正好是5.5亿年前的寒武纪初期，标志着进化的爆炸——使海洋充满世界上第一批复杂生物的爆炸开始了。当今世界庞大的动物族系早在寒武纪时已

经出现了……而且它们与今天的情形一样，有着截然不同的形态。”[26]

对寒武纪大爆炸更深的研究表明，进化论遇到了何等困难的选择。新近的发现显示，几乎所有最基本的动物族系，都是在大爆炸时期突然出现的。2001年，《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指出：“5.45亿年以前开始的寒武纪大爆炸，从化石纪录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主要类型的动物都是突然出现的，而这些动物依然主导着现在的动物。”[27] 文章还解释，进化论对如此复杂而独特之生物群体的解释，即试图通过早该发现的丰富化石来证明：它们经历了逐渐进化的过程；但这是仍然

三叶虫的眼睛



这眼睛是在5，3亿年前的寒武纪时期，突然以极为复杂的形式产生的。当然，这样的设计是进化论无法解释的，这只能证明创造的存在。甚至，三叶虫的眼睛的蜂巢结构至今仍未变化。例如，一些类似蜜蜂及蜻蜓的虫类，依然拥有相同的眼睛结构。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化论关于物种从初级到复杂结构发展的解释，则是无效的。



——见R · L · 格雷戈里《眼睛与大脑：看的生物学》第311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

不可能加以证实的: “微量及分散进化必须具备该群体的历史——化石纪录并不存在的历史。此外，节肢类动物的发育史揭示了三叶虫——像eucrustacean，是节肢类动物树上相当先进的‘嫩枝’。但是，并没有这些所谓的‘动物祖先’的化石.....即便找到它们更早起源的证据，可仍面临这样的挑战: 如何解释为什么那么多的动物，在寒武纪爆炸的基础上，能在短期内其体格增大并获得了甲壳？”[28]

地球上，怎样在突然之间充满如此众多的生物，这些没有共同祖先却形态各异的生物，又如何得以出现，是进化论者依然不能回答的难题。

全世界最著名的进化论思想的倡导者、英国牛津大学的生物学家达尔文·道金斯，对他曾维护过的毫无根据的论点，作了现实的注解:

> “比如，六亿年前发现无脊椎群体的寒武纪岩层，是最古老的地层。我们发现，它们第一次出现时，就已经进化到最先进的状态了；它们好象没有任何进化的历史，早在那里安置了一样。不用说，这些‘装置’的突然出现，使创造论者们相当高兴。”[29]

正如道金斯被迫承认的一样，寒武纪爆炸是创造的强有力的证据。因为，创造是唯一能够解释生物没有进化的祖先，而突然在寒武纪时期出现了。

杰出的进化论者、生物学家道格拉斯·缚图马承认这一事实并且说明:

> “生物体要么完整地在地球上出现，要么就根本没有出现。如果它们没有完整地出现过，那它们必须从预先存在的物种中，经过一些调整性的发育过程。如果它们的确以

完整的状态出现，那它们一定是由无所不能的智能创造的。”[30] 事实上，达尔文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写道：“如果许多属于相同科目的物种，真的突然同时开始了生命，那么，对于通过自然选择，由同一祖先逐步进化的理论来说，这是个致命的打击。”[31]寒武纪时期正是达尔文所描述的“致命打击”最恰当的证明。因此，瑞士进化论者斯蒂芬·本斯顿描述寒武纪时期时，承认缺乏“过渡连接”，并说道：“使达尔文尴尬的这一事件，仍然使我们感到困惑。”[32]

我们所看到的地质记录表明，生物并没有经历像进化论所声称的那样，从原始阶段逐步演变到高级阶段的过程，而是在突然之间、以最完美的形式出现的。

简言之，生物没有通过进化产生，而是经过创造的结果。

分子的比较加剧了进化论的尴尬

在寒武纪爆炸方面，使进化论者陷入窘境的另一事实，是对不同生物类别的比较。这些比较揭露了进化论关于动物族类是“近亲”的推断；直到最近才发现，它们在遗传上的不同。这也使理论上存在的“中间形式”的假想，陷入更大的尴尬境地。2000年，一篇文章在《国家科学研究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对DNA的分析，替代了过去的“中间形式”的说法：

“对DNA序列的分析，表明了对动物种类历史的新解释。动物类别曾被认为是后生类动物，在低级阶段连续进化的复杂阶段，并将这个阶段从后生动物内部转移到更高的位置。这并没有留下进化的‘中间形式’，并迫使我们重新考虑bilaterian复杂的起源。”[33]

在同一文章中，进化论的作家们说，由于发现了新的遗传因素，所谓动物单元的“中间形式”已不复存在，并且在创立如此“进化谱系”的努力中“失望了”：

> “新分子组成的发展有几个重要的含义。其中最重要的，是‘中间形式’的消失……。在早先的进化推理中那么平常的事，现在已令人失望了：不能重构‘有体腔动物祖先’的形态学——通过基于解剖学‘原始’族系复杂阶段的假想。”[34]

从水迁移到陆地的童话

进化论者们假想，在寒武纪时期，海洋中的无脊椎动物，经过数百万年间的进化而成了鱼类。但是，正象寒武纪的无脊椎动物没有祖先一样，这些无脊椎动物和鱼之间，也不存在任何能表明进化的过渡形式。应当指出，无脊椎动物和鱼在结构上有巨大的区别。没有脊椎而在体外只有硬组织的无脊椎动物，转而进化到体内拥有脊椎的鱼，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期间应该存在无数个过渡形式。

为了这些虚构的形式，进化论者大约用140年的时间，寻遍化石地层。他们已经找到了数百万块无脊椎动物和鱼的化石。然而，没人能够找到这些化石之间“中间形式”的化石。

进化论者、古生物学家杰拉尔德·T·托德在一篇题为“多骨鱼的进化”的文章里，被迫承认了这个事实:

> “多骨的鱼有三个种类，在地质记录里，它们大约在相同的时间突然出现。那么，它们的起源是什么呢？是什么允许它们具有如此广泛的差异和复杂性？它们出现时，怎



根据“从海洋到陆地”的假想，一些鱼类因为缺乏食物，才需要从海洋迁到陆地的。该主张得到这些投机图画的“支持”。

幺都有笨重的手臂呢？它们为什幺没有早期存在的踪迹和中间形式？”[35]

进化论的假想进一步声称，鱼类先从无脊椎动物经过进化，然后离开海洋而转变成两栖生物的。然而，这个假想同样没有根据：甚至没有一件化石能证明曾经有过“半鱼、半两栖的”生物。因为“中间过渡”的不可能性，有着许多生理学及解剖学上的因素；也根本找不到一块能支持这种过渡——从海洋迁到陆地之童话的化石。《脊椎动物的古生物学与进化论》的作者、知名进化论者罗伯特·L·卡罗尔针对这个事实，不情愿地发表了意见：“早期的爬行动物与两栖动物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它们的祖先尚未找到。”他1997年出版的新书《脊椎动物进化的方式与过程》中承认：“现代两栖动物的起源，以及与早期四足动物之间的过渡”，与其它很多族群一样，“仍然知之甚少”。[36] 另两个进化论者、古生物学家科尔伯特（Colbert）和莫拉雷斯（Morales），对两栖动物中的蛙类、火蜥蜴和蚓螈的三种基本种类，作了如下评论：

> “我们找不到能显示古生代时期的两栖动物，其拥有同一祖先的哪怕一个证据。人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蛙类、火蜥蜴和蚓螈，与它们活着的后代非常相似。”[37]



上图是4亿1千年前的腔棘鱼化石：进化论者根据这个动物的化石，称它是从水迁移到陆地的过渡形式。从1938年以来，多次捕到的这种鱼的活标本，揭示了进化论者投机取巧的程度。



为什么从水中迁移到陆地是不可能的呢？

进化论者声称，总有一天，无论如何，水中生存的生物都向陆地迁移、生存，并向陆地动物进化。但是，这种物种所以没有过渡的可能性，是由于存在不计其数的生理及解剖学方面的因素。这些明显的事实是:

1、体重的承载：栖息在海洋中的动物，在承载自身重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问题。但是，大多数栖息在陆地上的动物，需要消耗40%的体力，来承载自身的重量。海水动物迁移到陆生环境，就必须发展新的肌肉和骨骼系统——为了达到同时需要的能量！而这一切不可能通过偶然的突变来形成。

2、热量的保存：在陆地上，温度变化快，起伏也大。为了能够适应这样大的温度变化，陆生动物就必须具备相应的身体机制。但在海洋中，温度变化缓慢而且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发生变化。根据海洋中常温调节体温的生物，需要具备因陆地温度变化，而产生最小危害的保护系统。毫无疑问，声称鱼类一旦进入陆地后，它们就会通过随机变异获得这样的系统，是非常荒谬的。

3、水的使用：就新陈代谢而言，需要严格使用水量甚至湿度，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因陆地上的水源并不充足。例如，表皮必须有利于蒸发一定量的水分，同时防止过量挥发。因此，陆地生物必须具有海水动物所没有的渴感，而且海水生物的表皮不适合无水的栖息地。

4、肾：由于水生动物的栖息处有丰富的水，因此它们通过身体中的过滤，很容易地排泄体内的废物，特别是氨水。但在陆地上，必须经济地使用水。这是这些生物具有肾的原因。由于有了肾，氨水变为尿液储存起来，并在排泄期间使用了最小的水量。另外，新的系统需要用来供给肾功能。简言之，为了从水中迁移到陆地，原先没有肾的生物必须突然长出肾来。

5、呼吸系统：鱼类通过鳃吸入溶解在水中的氧气，只要离水几分种，鱼类就无法生存。很明显，为了在陆地生存，它们必须拥有一套完美的呼吸系统。

这些戏剧性的生理变化，显然不可能在偶然的短时间内突然产生。

乌龟永远是乌龟

进化论连类似于鱼类、爬行动物这样最基本的动物都无法解释，他们又怎能解释这些群体的起源呢？例如，在化石记录中，爬行类的乌龟也是随着其特殊的外壳突然出现的；而进化论者却说："……到三迭纪中期时（大约175，000，000年以前），其（乌龟）成员已大量存在，并且具有乌龟的基本特征。乌龟与杯龙之间的联系、由此联想它是从杯龙中派生的说法，也几乎毫无根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第22章第418页，1971年。）



从1亿纪年的乌龟化石看：它与现代的"副本"毫无差异。（The Dawn of Life，Orbis Pub，London，1972）

最古老的乌龟化石与当今活着的乌龟之间毫无差异。总之，乌龟根本没有"进化"，而始终是以乌龟本来的面貌生存着。我们只能说：乌龟永远是乌龟！

但直到大约50年前，进化论者一直认为，这样一种动物的确是存在的。他们把估计有4.1亿纪年的鱼类，当作中间形式的例子；声称该鱼具备了在陆地上活动的原始的肺、发达的头脑以及消化与循环系统，甚至具备了原始的行走功能。直到20世纪30年末，科学界仍接受这些不容争辩的故事。他们把腔棘鱼作为从海洋进化到陆地的真正的过渡形式。

1938年12月22日，在印度洋有过一次非常有趣的发现：7，000万年以前已经绝种、并被作为过渡形式的腔棘鱼家族中活着的一个成员被抓住了！腔棘鱼作为"有血有肉"的例子，无疑给进化论者一次巨大的震动。进化论者、古生物学家J·L·B·史密斯（J.L.B.Smith）说："如果我能遇到活着的恐龙，我将不会更加惊讶。"[38] 之后的几年里，在世界的不同地方抓到了200多条腔棘鱼。随着这些腔棘鱼的捕获，进一步揭示了进化论者想象中的解释，还能坚持多久。恰恰与他们想象的相反，腔棘鱼既没有原始肺也没有发达的头脑。进化论者推断的所谓的原始肺，其实只是一个类脂囊。[39] 而且，他们当作"准备从海洋迁移到陆地的候选动物"的腔棘鱼，实际上是栖息在海洋最深处的一种深海鱼，并且从未接近离表面深度180米的地方。[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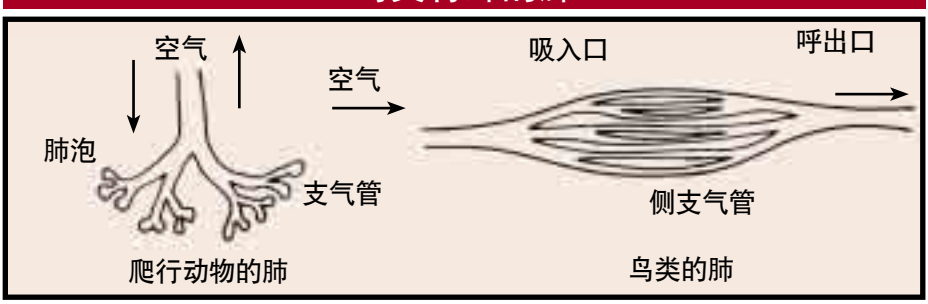
鸟类与哺乳动物的起源

根据进化论，生命的起源来自海洋，并且逐步进化成两栖动物，然后迁移到陆地上的。这个学说认为，两栖动物进化成爬行动物后，才形成了陆地动物。在生理学与解剖学中，如此的进化是不可能的。例如，在水中孵化的两栖动物的卵，逐步进化成在干燥环境下孵化的爬行动物的卵，其没有可能性的证据大量存在。当我们注意地质记录时就可以发现，这样的进化是不存在的：爬行动物与无脊椎动物之间毫无联系，也不是以同一“祖先”出现在地球上的。在脊椎动物古生物学方面，就连权威的进化论者、古生物学家罗伯特·L·卡罗尔也不得不接受“早先的爬行动物与两栖动物有着极大的区别，并且至今仍未发现它们的‘祖先’。”[41]

然而，进化论者注定没有希望的童话故事，依然没有结束。他们还面临着让陆生动物“飞翔”的难题呢！进化论者相信，鸟类必须是以一定的形式进化而成的，因此，他们认定鸟类是从爬行动物“改造”而来的。但是，陆地动物与鸟类有着完全不同的身体结构，这种逐渐进化而来的解释也是不合理的。首先，鸟的显着特性——翅膀，仅仅这一点就使进化论者面临很大的困境。土耳其进化论者安金·柯儒（Engin Korur）认为，翅膀没有进化的可能性：“眼睛和翅膀的共同特性在于，只有在它们完全发育了的时候，才能起到有价值的作用。换句话说，残缺发育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单翅鸟的翅膀是飞不起来的。至于这些器官是怎样形成的，仍然是需要说明的自然秘密之一。”[42]

正如我们所见，结构完美的翅膀怎样形成的这一问题，用连续的偶然突变而形成的解释，是完全回答不了的；根本没有办法解释，爬行动物的前臂怎么能在基因不破坏（突变）的情况下，形成了完美的双翼。而且，进化成鸟类的陆地动物，仅仅拥有翅膀是不够的；陆生动物缺乏鸟类用于飞翔的其它结构性机制。例如，鸟类的骨头比陆生动物的轻得多；还有，它们的肺功能是非常不同的；它们有不同的肌肉和骨骼系统，以及非常专业化的心脏循环系统。所有这些机制必须同时并完整的存在，它们不会逐渐通过“积累”来形成。这就断定陆生动物向飞行动物的进化，是一个荒谬的理论。这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使我们认为这种不科学的假想是真的，那么，为什么还是不能发现一些“半翼”或“单翼”的飞行动物的生物化石，来支持他们的假想呢？从解剖学来看，鸟类和爬行动物有很大的区别。

鸟类特殊的肺



鸟类的肺系统和爬行动物的肺系统完全相反。陆生动物都是用同一进气管道来呼吸的，而鸟类从肺的前面吸气、从肺的后面呼气。这种系统是为鸟类在高空飞行时，对氧气的需要增多而特别“设计”的；这种设计依靠陆生动物的进化是不可能形成的。因为，这两种肺系统的过渡形式，不可能具备呼吸功能。

另一所谓的过渡形式：始祖鸟

面对为什么找不到“单翼”、“半翼”的动物化石的问题，进化论者们提出了一种特别的动物，他们仍然声称那是少数过渡形式中最有名的、叫做“始祖鸟”的鸟类化石。进化论者认为始祖鸟是现代鸟的祖先，它们生活在大约1.5亿年以前。其理论认为，在一些名为Velociraptor或者Dromeosaur的小体形恐龙中，有一部分通过进化获得了翅膀，然后开始飞行。始祖鸟被认为是从恐龙祖先中分离出来，并且开始飞行的第一个生物。进化论者很快把这个故事广泛地宣传起来。但是，从对始祖鸟化石的最新研究来看，证明这种动物绝对不是一个过渡形式，而是一种与现代鸟类，有些不同特性的鸟类罢了。至于始祖鸟是不能完全飞行的“半鸟”的观点，直到最近，进化论者仍不断提到它，而且认为这个生物的胸腔内缺乏胸骨，这便是它不能持续飞行的最重要的证据。（胸骨是飞行时用来固定胸腔肌肉的一块骨头。现今，在会飞行和不会飞行的鸟类中，甚至与鸟类完全不同的哺乳动物蝙蝠，都拥有这样的胸骨。）

可是，在1992年发现的第七块始祖鸟的化石，在进化论者中间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因为，在这块新发现的始祖鸟的化石中，进化论者长时期认为并不存在的胸骨，实际上却存在着。

《自然》杂志对这块化石的描述如下：

> “最近发现的第七块始祖鸟化石，显示了长期以来所怀疑的、然而从未得到证明的一块矩形胸骨的存在。这证明它具有强壮的飞行肌肉。”[43]

这个发现使始祖鸟属于不能完全飞行的“半鸟”的说法无效了。

另一方面，始祖鸟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鸟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就是鸟类的羽毛结构；始祖鸟与现代鸟毫无区别的非

对称的羽毛结构，表明了始祖鸟能完美地飞行。正如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卡尔·O·邓巴所说的：“就因为它的羽毛，从中可见始祖鸟显然属于真正的鸟类。”[44]

始祖鸟的羽毛还揭示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该鸟温血性的新陈代谢。众所周知，爬虫动物和恐龙是随环境温度而影响其体温的冷血动物，而不是独立调节它们体温的。而鸟类羽毛的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保持体温。始祖鸟有羽毛的事实显示，它是需要保持体温的真正的温血动物；这与恐龙形成了对比。

进化论者的假想：始祖鸟的牙齿和爪子

进化论者把始祖鸟当作一个过渡形式的两个要点是：它的牙齿和爪子。是的，始祖鸟的嘴里有牙齿，翅膀上有爪子。但是，这些特性并不意味着它与爬行动物之间，有任何一种联系。而且，当今存在的两种鸟类：焦鹃（Touraco）和麝雉（Hoatzin）都有可以抓住树枝的两个爪子；它们是完全没有爬行动物特性的鸟。就凭始祖鸟的翅膀上有爪子，而认定它是过渡形式的主张是无效的；同样，凭借始祖鸟嘴里的牙齿，而认定它是过渡形式也是无效的。进化论者利用这些牙齿，证明始祖鸟具有爬行动物的特性，是有意识的欺骗。况且，牙齿并不是爬行动物的一种典型特性。今天，一些爬行动物有牙齿，另一些则没有牙齿。更重要的一点是，始祖鸟不是有牙齿的唯一鸟类。我们可以确信，有牙齿的鸟类今天已不存在，但从化石记录看，可以发现与始祖鸟相同及以后的时期内，甚至与我们更近的时期里，有过这样一种特殊的鸟种，人们将之分类为“齿鸟”。

最重要的一点是，始祖鸟和其它齿鸟的牙齿结构，完全不同于被说成是它们祖先的恐龙的牙齿。根据著名鸟类学家马丁（Martin）、施缔沃特（Steward）和威茨同（Whetstone）

的观测，始祖鸟和其它齿鸟的牙齿上端是平整的，而且有宽大的牙根。然而，进化论者当成这些鸟的祖先的兽脚亚目食肉恐龙（theropod）的牙齿，却像锯一样的突出，而且牙根狭窄。[45]

研究人员也比较了始祖鸟和当成它们祖先的恐龙的腕骨，结果并没有发现它们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46]

约翰·奥斯特罗姆，这位声称始祖鸟从恐龙逐步进化而来的权威，根据解剖学家塔尔斯坦诺（Tarsitano）、赫克特（Hecht）、A·D·沃克（A.D.Walker）的研究，指出那些存在于这种动物与恐龙之间的“相象”，实际上是错误的解释。[47]

所有这些结论表明，始祖鸟不是过渡形式，而是只能分类为“齿鸟”的一种鸟类。

始祖鸟与其它古老鸟类的化石

当进化论者花费数十年时间，根据始祖鸟与其它古老鸟类的化石，指出那是始祖鸟从其它古鸟进化而来的最大证据时，而近期发现的化石却从其它方面使这个假想变得无效。

1995年，中国脊椎古生物学研究所的两名古生物学家侯联海（Lianhai Hou）、周中和（Zhonghe Zhou）发现了一块新的鸟化石，他们把它命名为“孔子鸟”。这只鸟几乎与始祖鸟同龄（约1.4亿岁左右），但它的嘴里根本没有牙齿。还有，它有着与今天的鸟儿一样的嘴巴和羽毛，有着与现代鸟一样的骨骼，翅膀上还有与始祖鸟一样的爪子。被称为“尾综骨”的特殊结构，支撑这种鸟的尾毛。一句话，这种与始祖鸟同龄的鸟（被认为是所有鸟类最古老的祖先，并称之为“半爬行动物”），与现代的鸟很相似。这个事实使进化论关于始祖鸟，是所有鸟类祖先的说法无效了。[48]

鸟毛的设计

就鸟的骨骼结构而言，鸟类的肺系统和常温下的新陈代谢，都不同于爬行动物。鸟类与爬行动物之间另一巨大的差别，就是鸟类具有完美形式的羽毛结构，爬行动物的身体覆盖着鳞片，而鸟的身体上长满了羽毛。

进化论者考虑爬行动物是鸟的祖先的同时，又声称鸟类的羽毛是从爬行动物的鳞片上进化而来的。但是，鳞片和羽毛之间并没有任何相象之处。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神经生物学、生理学教授，A·H·布拉士，尽管他是个进化论者，但仍接受这个现实："就发育而言，每一羽毛的基因结构和组织，外貌形成与软组织都是不相同的。"[1] 而且，布拉士教授检查鸟毛的蛋白质结构后争议道，那是"脊椎动物所独有的"特征。[2]

没有化石证据表明，鸟毛是从爬行动物的鳞片进化而来的。相反，如布拉士教授所说的："在地质记录里，羽毛是突然出现的——作为区别鸟类特征的'不可否认的独特'出现的。"[3] 而且，在爬行类动物中，并没有发觉它们的表皮结构给鸟类提供羽毛的根源。[4] 1996年，古生物学家制造了一个"所谓有羽毛的恐龙的化石在中国被发现"的故事，并称之为"中国始祖鸟"。1997年，人们发现，这些化石事实上与鸟的羽毛结构毫无相似之处。[5]

另一方面，当我们仔细检查鸟的羽毛时，发现了用进化论无法解释的复杂结构。著名鸟类学家艾伦·费都克斯雅（Feduccia）说明："羽毛具有空气动力学的功能。它们重量极轻，有足够的缓慢提速的飞行能力，并且非常容易地恢复到原有的位置。"他在错误的进化论学说面前承认："我无法理解为适应飞翔而设计的这个器官，怎样会在当初由另一个功能转变而来。"[6]

羽毛的设计也使查尔斯·达尔文不得不考虑它们。而且，孔雀羽毛奇妙的美学形态已使他的理论"得病了"（他自己的话）。1860年4月3日，他给朋友阿萨·格瑞的信中写道："我记得很清楚，在考虑眼睛的理论时，我浑身发冷，但我已经熬过了这个阶段……"。他继续说："……现在，一些不重要的生物结构性方面的细节，使我经常感到不舒服。孔雀尾巴上的那些羽毛，我每每注视它们时，使我得病了！"[7]

这就是进化论无法解释的奇妙设计——鸟的羽毛。

资料出处:

1, A.H.布拉士着"羽毛的起源"，《进化生物学》杂志1996第9卷，第132页。

2, 同上，第131页。

3, 同上，第133页。

4, 同上，第131页。

5, "采集有羽毛的恐龙"，《科学》杂志第278卷1229页，1997年11月14日。

6, 道格拉斯·帕默尔《学会飞翔》（"评艾伦·费都克斯雅《鸟的起源与进化》"，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年）《新科学家》杂志第153卷第44页，1997年3月1日。

7, 诺曼·麦克佩斯《呼唤理性：重审达尔文》的"开场白"，第101页。波士顿，1971年。

1996年11月，在中国发掘出另一块化石，这引起了更大的混乱。侯（Hou）、马丁和艾伦·费都加（Feduccia）在《科学》杂志上宣布，发现了一个命名为“辽宁鸟”、有着1.3亿年岁的“老家伙”。辽宁鸟有一块可以支撑飞行肌肉的胸骨——与现代鸟一样。这只鸟在其它方面与现代鸟也没有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嘴里的牙齿。这表明这种有牙齿的鸟，根本没有像进化论者所声称的那样，有一个原始结构。[49] 就像艾伦·费都加在《发现》（Discover）杂志里解释的那样:



“这些（辽宁）鸟来自何处？其化石说明它并非来自恐龙。”[50]

另一个使进化论者关于始祖鸟的主张崩溃的化石是Eoalulavis。Eoalulavis据说比始祖鸟年轻3千万岁，约有1,2亿年，其翅膀结构与当今的一些飞鸟相似，飞起来缓慢。这证明，在1.2亿年前，它们和现代鸟在很多方面没有什么区别，同样在空中飞行。[51]

这些事实再次证明，始祖鸟和与其相似的别的古老鸟类，决不是什么过渡形式。化石没有显示不同的鸟类会相互进化。相反，地质记录证明，今天的鸟类和诸如始祖鸟的原始鸟类，实际上是同时共存的。但是，其中的一些鸟类，像始祖鸟和孔



仔细察看鸟的羽毛，就会发现那是数千根细毛彼此相连的。这种独特的设计基于空气动力学原理。

子鸟都已经灭绝了，仅有一些先存的种类能够延续至今。

总之，始祖鸟的某些特别的特征，无法说明它是一种过渡形式的鸟！

事实上，哈佛大学的两个有名的进化论家、古生物学家斯帝芬·简·古尔德和奈尔斯·埃尔德雷奇也接受：始祖鸟是形体上具有各种不同特征的“镶嵌式的”生命体，但它永远不能被看作是一个过渡形式。[52]



“孔子鸟”与始祖鸟同龄

想象之鸟——与恐龙的联系

进化论者试图断定，始祖鸟是一种过渡形式的鸟，进而宣称鸟是从恐龙进化来的。但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鸟类学家之一、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艾伦·费都加，尽管他自己是个进化论者，可反对鸟与恐龙有亲缘关系的理论。费都加就此指出：

> “我研究鸟的头颅已经25年了，然而，我没有看出它们之间有任何相象之处，我只是看不见它们……。在我看来，兽脚亚目食肉恐龙是鸟的起源的理论，这将是二十世纪古生物学中最大的尴尬。”[53]

哺乳动物的起源

正如我们前面所陈述的那样，进化论试图把一些想象中的海洋生物转变成爬行动物，把鸟类也说成由爬行动物进化而来。按照进化论相同的假想，认为爬行动物不仅是鸟，而且还是哺乳动物的祖先。但是，爬行动物之间存在大的结构性差异；它们的身上有鳞片、属于冷血动物，并且通过产卵繁殖后代；而哺乳动物的身上有皮毛、属温血动物、通过直接生育活生生的后代来繁衍的。

苍蝇的起源是什么？

[图片下方文字] 进化论假想的一个例子：恐龙捕捉苍蝇时突然展翅起飞的。

进化论者声称鸟类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同时，又这样支持他们的断言：一些恐龙扑打着前腿去捕捉苍蝇，如图所示的“展翅飞翔”。

这种毫无科学基础与十足的想象，还存在简单的逻辑上的矛盾，那就是进化论者解释苍蝇起源的例子，即苍蝇是已经拥有完美飞行能力的物种。



进化论脚本的一个例子：
捕捉苍蝇时鼓翼起飞的恐龙

人类的眼睛不能在一秒钟开合10次，而一只苍蝇能在一秒钟平均拍打其翅膀达500次。而且，苍蝇同时移动它的双翅；翅膀在振动过程中最轻微的不协调，将使苍蝇失去平衡。但是，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进化论者首先应该解释，苍蝇如何获得飞行能力。甚至家蝇完美的造化形式，使进化论的假想无效了。

英国生物学家罗宾·伍顿在一篇题为“苍蝇翅膀的机械设计”的文章里写道：“我们更好地理解昆虫翅膀的作用时，更为精细和美丽的设计就显露了。结构的设计在传统上尽可能少地使其变形；机械设计也是便于用预设的方式移动其组件的。”

昆虫的翅膀把上面提到的构造合为一体：使用具有广角弹性的组成部分的双翼，这些高雅的组合允许适当的变形，以便适应外界阻力，并最大可能地利用空气。尚无任何技术上与苍蝇的翅膀相似的设计。

另一方面，也没有哪怕一块能证明苍蝇想象中进化而来的化石。法国动物学家格拉塞（Grass）因之说道：“关于昆虫的起源，我们仍然处在黑暗之中。”2

---

1. 罗宾·J·伍2　顿：“昆虫翅膀的机械设计”，《科学美国》月刊，第263册第120页，1990年11月。
2，格来塞：《有生物的进化》第30页，纽约学术出版社，1977年。

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结构性的差异，在于它们的颚结构上。哺乳动物的下颚只由一块颚骨组成，牙齿就成长在这块骨头上；在爬行动物中，其下颚的两边各有三块小骨。另一个基本的差别是，所有哺乳动物的中耳内有三块骨（砧骨、锤骨和镫骨）。在所有的爬行动物中，它们的中耳内只有一块骨。进化论者声称，爬行动物的颚和耳，逐步进化成了哺乳动物的颚和耳。然而，对这种变化怎样发生的问题，依然无法给予答复。单骨的耳朵怎么逐步进化到三骨的耳朵？在此期间听力怎样起作用？这依然是他们永远不能回答的难题。这并不奇怪，因为连接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之间过渡形式的一块化石都没有发现过。因此，进化论古生物学家罗杰·卢因被迫说道：“第一个哺乳动物的过渡仍然是个谜，它大概经过一个或至多两个世系才会发生。”[54]

在20世纪，进化论权威、新达尔文学说的创始人之一乔治·盖洛德·辛普森，针对进化论者困惑的事实做了如下评论：

> “在地球上生命历史的长河中，最让人迷惑的事情，来自中生代的变化，即爬行动物时代向哺乳动物时代的突然转变。这好象原本由爬行动物唱主角的舞台突然谢幕了，尤其是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恐龙，立即站起来再次搭起了场地，只不过演员变成了哺乳动物——恐龙根本没有出现的新角色；别的爬行动物被推到一边，所有主角由早先‘演过戏’的不同种类的哺乳动物出演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55]

这个出现的哺乳动物，好象在过去的时代里从未出现过似的。此外，当哺乳动物突然出现时，他们彼此互不相同。像蝙蝠、马、老鼠和鲸鱼等全都是哺乳动物，并且在相同的地质时期出现。不论使用多么奇异的想象力，在它们之间建立进化关系也是不可能的。

进化论者、动物学家埃里·克朗伯特在《进化》杂志里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为了在哺乳动物的族类里建立进化的亲缘关系（解剖学的链接）， 而寻找信息的人们将会感到失望。”[56]

这一切证明，所有的生物都是突然出现并且完全形成的，其间没有任何进化的过程。这是它们被创造的具体证据。但进化论者们却努力解释说， 生物物种作为进化的迹象，以特别的顺序产生的。然而，生命体出现的顺序是“创造的顺序”， 因为根本谈不上进化的过程。化石记录显示: 通过完美无缺的创造，地球上先是海洋、然后是充满生命体的陆地，直至最后创造了人类。与“南方巧猿”的故事恰恰相反——他们凭借强大的媒体渲染， 强迫人们接受人类是从猿变来的。而人类在地球上也是突然出现、完整形成的。



进化论者认为，所有的哺乳动物来自同一个祖先， 但是象熊、鲸、鼠及蝙蝠等动物之间却有着很大的区别， 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特殊结构。例如， 蝙蝠具有在黑夜里辩明方向的、非常敏感的声波系统; 连现代技术都无法设计出如此复杂的系统。进化论者却声称这是偶然形成的; 这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地质记录显示，现代蝙蝠的完美结构突然产生，并没有任何进化的迹象。



5000万年的蝙蝠化石与现代的蝙蝠毫无两样。（《科学》杂志154卷）

马的进化的神话

直到最近，按照一个虚构的顺序推测，把马的进化作为进化论学说主要的化石证据。但是，今天很多进化论者自己坦白地承认，马的进化的假想已经破产。1980年，在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博物馆召开了为期四天的专题座谈会，有150位进化论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就没有化石记录、也没有逐渐进化记载的假想作了讨论——对马的进化的假想。进化论者博伊斯·仁斯博格（Rensberger）在会上说:

“马的进化的例子很流行:　是由差不多5000万年以前就有的四趾狐狸型生物，按照渐进顺序，进化成今天比狐狸大得多的一趾蹄的马；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错误。与所谓逐渐变化相反，每个过渡形式的化石的出现，是截然不同、始终不变的，随后绝种以及过渡的形式都是未知的。[1]

仁斯博格发表针对马的进化假想的诚实观点的同时，事实上也提出了该学说在地质记录中所面临的最大困境“过渡形式”。著名古生物学家、英国自然史博物馆主任科林·帕特森，在博物馆的底层仍然给公众看的关于“马的进化”展览会上说:　“在究竟何谓那段生命（马的进化史——译注）的历史方面，有太多的故事，其中一些比其它更具想象力。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仍在楼下展览的、或许在50年以前就已经准备好的关于马进化的展品。马的进化已经作为真理不断写入教科书中。现在，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愉快的，尤其是提出这些故事的人们，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些材料中有投机的成分。”[2]　那么，“马的进化”的假想的基础是什么？进化论者用丰富的想象力，通过对生活在印度、北美洲、南美洲及欧洲不同时期不同生物化石有序地排列，阐释了这一骗人的假想图表；由不同研究人员提供的、马的进化的图表达20多张。对这些彼此不同的谱系图，进化论者之间并没有达成共识。其中唯一的共同点是，5500万年前生活在始新世时期的、类似于狗的一种被称为“始祖马”的动物，是马的最初祖先。但是，这种虚构的从始祖马到马的进化联系，是完全矛盾的。这种马与至今生活在非洲、甚至与马没有一点联系与相似之处的“蹄兔”是同类动物。[3]

有关马的进化的毫无根据的断言，从不断发现的地质记录中破灭了；始祖马与现代马种（西方马种和内华达州马种）的化石显示，现代马和他们所称的马的祖先，是在同一时期生存的物种。这清楚地说明马的进化在任何时候都不存在。[4]

进化论者、作家戈登·R·泰勒，在《大进化秘密》一书中，对达尔文缺乏根据的观点解释道:　“也许，达尔文学说最大的弱点，是古生物学家没能发现令人信服、演示生物体主要进化性变化的发育与顺序的证据……。马是经常用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例子。但是，实际上始祖马与马类的联系是不可思义的；他们声称马的体型连续增加着，可一些变化显示，它们却比始祖马变小了，而不是变大了。把不同来源的标本放到一起，就构成看似具有说服力的进化顺序，但实际上并不存在按时、按序排列的证据。[5]

这些雄辩的事实证明，达尔文学说作为牢固的证据，来描绘马进化的图表，不过是荒谬和难以置信的故事而已。

1，博伊斯·仁斯博格,《休斯顿编年史》，第四章,第15页，1980年11月5日

2，科林·帕特森，“哈珀”，1984年2月，第60页

3，弗朗西斯·赫廷，《长颈鹿的脖子:　达尔文误入歧途》,纽约Tick nor and Fields,1982年,第30–31页

4，弗朗西斯·赫廷,《长颈鹿的脖子:　达尔文误入歧途》,第30–31页

5，戈登·拉特雷·泰勒,《大进化秘密》,伦敦,天体书第230页,1984年]

含欺诈成分的化石演绎

讲述所谓人类进化的神话之前，我们需要介绍公众接受过的宣传：从前有过半猿半人的生物。这种宣传方式，是进化论者利用化石的“重建”；所谓重建就是以单块骨头——有时只是发掘的一些碎片——为基础，绘制生物图片或创立生物模型的过程。我们在报纸、杂志或电影里看见的“南方巧猿”都是重建的结果。由于有关人类起源的地质记录往往是凌乱和不完整的，所以基于化石的任何推测完全是投机取巧。因此，进化论者依赖化石所做的重建（图片与模型），正是为了使进化论理论奏效而设计好的骗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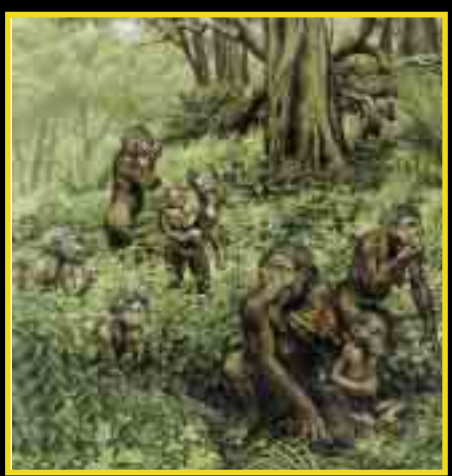
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大卫·R·皮尔贝母（David R Pilbeam）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至少在古人类学方面而言，资料依然相当贫乏，以致理论极大地影响了对事物的解释。理论在过去明显地反映了我们当今的思想意识，而不是实际的资料。”[57]

由于人们非常容易受直观信息的影响，所以，这些重建的生物，是对进化论者意图的最佳帮助，以此让人们相信它们曾经的确存在过。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强调一个独特之处：基于骨骼遗物的重建，只能展示物体的一般特性，因为真正与众不同的细节，是随着时间很容易消失的软组织。所以，进化论对软组织牵强附会的解释，重建的图片或模式，靠的完全是制造这些东西的人们的想象力。哈佛大学的鄂讷斯特·A·胡滕（Earnst.A.Hooten），对此解释道：“试图复原软组织是

想象与骗人的图画









进化论者靠重建捏造的这些图片中，没有化石的影子：骨架上并没有唇、眼睛、耳朵、鼻尖、头发、眉毛、体毛等。他们展示想象中的人类家庭一起散步、打猎、日常生活的情景。而这些图片正是想象力的产物，它们与化石毫无联系。

同一头骨上的三种不同的重建



出现在1964年4月5日
《星期日时报》上



莫里斯·威尔逊的
绘画



“N·帕克的重建”，
1960年9月刊登在
《N地理》杂志上。

更加危险的举动。比如说，你能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尼安德特人的头颅与黑猩猩或是哲学家的尊容之间的联系。这些所谓根据古人类遗物的重建，几乎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并且只能误导公众.....。因此，你不必相信重建的说法。”[58]

其实，进化论家杜撰了如此“荒谬的故事”，以致他们把不同的东西安放在同一块头骨上了。例如，他们给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粗壮原始人（robustus）、东非原始人(Zinjanthropus)）的化石，分别绘制了完全不同的三幅重建的图片。这是一个有名的伪造的例子。进化论者想象中的重建——对用于重建的化石或构造的解释往往具有偏向性。然而，比较他们在进化史上精心的伪造时，这一切似乎都很天真。

进化论的伪造品

没有具体的化石证据可以支持这个图像——不断在媒介和进化论学术圈兜售的“南方巧猿”的图像。进化论者大笔一挥，就编造出想象中的生物；但他们面临的严重问题是，没有与之相配的化石。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有趣的方法是：“制造”他们不可能发现的化石。他们炮制的辟尔唐人(1912年在英国辟尔唐发现的头盖骨,当时认为是史前人类的化石，1953年经鉴定是伪造——译注)是个典型的例子；这是科学史上最大的丑闻。

辟尔唐人：人的头颅上安装了猩猩的下巴！

1912年，著名医生、业余古人类学家查尔斯·道森声称，在英国辟尔唐地区附近的一个坑里，找到了一块颌骨和一个颅骨的碎片；纵然那个颌骨更像猿颌，但是牙齿和头颅看起来像人的。这些样品贴上了“辟尔唐人”的标签，声称它有50万年的历史，并作为人类进化的绝对证据，在很多博物馆中展出。40多年来，关于“辟尔唐人”的科学论文很多，还有许多相关的注解和图画，并且把它的化石作为人类进化的重要证据。以“辟尔唐人”为论题的博士论文不下500篇。[59]美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1921年访问大英博物馆时说道：“.....我们一再受到启发，自然界充满了相互矛盾的事物，而这是一个关于早期人类的惊人发现.....”[60]

1949年，大英博物馆古生物部的肯尼斯·奥克利试图利用“氟测试”——可确定古代化石年代的新测验，来检验“辟尔唐人”的化石。结果令人震惊：检验期间，他发现“辟

愚弄人的故事

1

查尔斯·道森找到、并交给亚瑟·史密森·伍德瓦得（Arthur Smith Woodward）的化石。



2

重新组成著名头骨的碎片。

人的头骨上的碎片

猩猩的下颚骨



3

用重建的头颅，绘制了许多图片，大量论文和注解由此产生。原头骨在大英博物馆展出。

4

这个头骨被发现40年之后，一些研究者用“辟尔唐人”的化石来欺骗世人。]



尔唐人”的颌骨中不包含任何氟的成分。

这表明埋葬的颌骨不过数年而已,只包含少量氟的头骨只有几千岁。用氟测试的方法最近获得的编年学研究，也显示头骨只有几千岁。

这也说明颌骨中属于猩猩的牙齿是人工磨成的，以及与化石一起发现的“原始”工具，也是用钢具削磨的仿造品。[61] 1953年，韦纳完成的详细分析报告，向公众揭露了这一伪造:头颅属于一个500纪年的男人，下颌骨则属于最近死去的一个猩猩！那以后，为了使牙齿更像人的牙齿，就把它们用一种特殊的排列方式安置到下巴上，连接处也被锉过了。然后，为了使年代显得久远，就用重铬酸钾在标本上染上污点；把标本浸入酸中时，上面的污点便开始消退。揭露这个伪造的小组成员戈劳斯·克拉克也无法掩饰这种境况下的惊讶:“牙齿被人工磨制的痕迹立即映入眼中。真的，痕迹明显得使人不能不问:人们以前怎幺会没有注意到它们呢？”[62] 真相大白后，“辟尔唐人”被仓促地从展示了40多年的大英博物馆里搬走了。

内布拉斯加人:源自猪的一颗牙齿

1922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经理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宣布，他已经在西内布拉斯加的蛇溪附近，找到了属于上新世时期的一块大牙的化石。这颗牙齿据说具有人和猿的共同特征。于是，更深的科学争论开始了。一些人把这颗牙齿解释为属于伊拉斯塔斯爪哇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有些则宣称它更接近于人类。这块引起广泛辩论的化石被命名为“内布拉斯加人”，也立即获得一个“科学的名字”:黄昏鸟石（Hesperopithecus haroldcooki）。

很多权威人士支持奥斯本的解释。就凭这颗牙齿，他们描绘出重建的内布拉斯加人的头颅和身体，甚至还画出了内布拉斯加人与他的妻子和孩子——在一个自然环境里生活的



上图就是根据一颗牙齿描绘出来的。这幅画于1922年6月24日刊登在《伦敦新闻》画报上。然而，那颗牙齿既非猿牙也非人牙,而属于一种已经灭绝的猪类；这使进化论家们非常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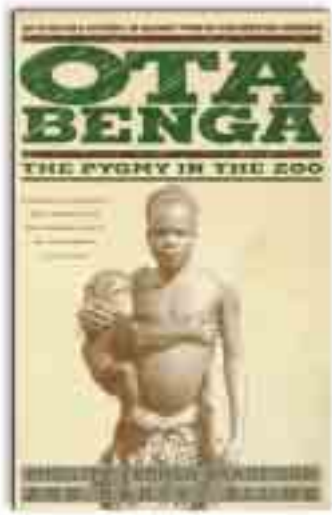
“全家福”。所有这些假想，依靠的仅仅是一颗牙齿。进化论者对这个“鬼人”深信不疑；一个叫威廉·布赖恩的研究人员反对单凭一颗臼齿而做出的这些片面决定时，他却受到严厉的批评。

1927年，那些骨骼的其它部分被发现了。根据这些新近发现的碎片，人们认定以前找到的牙齿既不属于人类也不属于猿；它属于一种已经灭绝的、名为原猪属的美洲野生猪类动物。威廉·格里高利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把这一错误宣布为：“很明显，内布拉斯加人即非猿也非人。”[63] 于是，它和它的“家人”的所有图画，很快就从进化论的文献中除去了。

澳塔·本嘎（Ota Benga）：笼中的非洲人

达尔文在他的《人的来由》一书中进一步声称，人类是从猿一样的生物中进化而来的之后，便开始寻找支持这个论

点的化石了。但是，一些进化论者相信，“半人半猿”的生物化石不仅可以找到，而且类似生物在世界各地还存活着。20世纪初，寻找“活的过渡连接”的追求，导致了不幸的事件；其中最残忍的一次，就是名为澳塔·本嘎的矮人的故事：



澳塔·本嘎：动物园里的矮人

1904年的刚果，一个叫沙米尔·韦内尔的进化论研究人员捕获了澳塔·本嘎。在他的母语里，其名字是“朋友”的意思。他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但是，他却像动物一样地用铁链拴住，然后关进笼子，带到了美国——进化论者在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把他与其它猿类动物关在一起公开示众了，并作为“人类最接近的过渡形式”向大家介绍。两年后，他们把他带到纽约的布朗克斯动物园；在那里，他以“人类古老的祖先”的名称，与几只小猩猩、一只名为蒂纳的大猩猩、一只叫东红的猩猩一同作为“动物”展览。该动物园的董事、进化论者威廉·T·霍纳迪博士发表长篇演说，对这幺一个特别的“过渡形式”能在他的动物园里展出而感到自豪，并把他像普通动物一样关在笼子里。参观者也把关在笼里的奥塔·本嘎看作一种普通的动物。他最终因为不能承受强加于他的如此待遇而自杀了！[64]

辟尔唐人、内布拉斯加人、奥塔·本嘎……这些丑事充分证明，进化论者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竟然毫不迟疑地利用一切非科学的手段。我们看到这些丑恶的同时，再看看“人类进化”的神话的另一些“证据”，就面临相似的情况：显然还存在着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并且还有一支志愿者大军，准备不择手段地验证这个故事。

人类进化的假想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看到自然界里不存在引起生物进化的机制，生物物种的产生也不是进化的结果，而是像现今完美的结构一样，都是在突然之间出现的。也就是说，他们是逐一被创造的。因此，“人类进化”显然也是一个从未发生过的故事。

那么，进化论者讲述这个故事的根据是什么呢？

根据就是大量的化石，进化论家利用它们，才能编造富有想象力的解释。整个历史上，曾经生存过超过6,000种猿类，其中的大部分已经灭绝。今天，只有120种猿类生活在地球上。也正是这6,000多种猿类——大多数已经灭绝——成了进化论家丰富的资源。

进化论者这样书写着人进化的历史：为了顺应他们的目的，按照从最大到最小的排列顺序，把一些头骨组合起来，并把一些已灭绝人种的头颅掺杂在那些头骨中。根据这样的拼装，便提出了进化论：人和现代猿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些生物及时得到了进化，只不过一些成为今天的猿，而另一些则随从一种进化了的猿，就变成了今天的人类。

但是，古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物学的所有结论向我们证明：与其它的进化一样，人类进化的这个断言，是虚构而无效的假想。除了伪造、曲解、误导与骗人的图画和想象中的注解，就从来没有过能够证明人与猿之间有关系的可靠或真实的证据。

化石记录向我们表明，在整个历史上，人始终是人，猿始终是猿。进化论家当作人的祖先拿出来的那些化石，实际上属于离我们较近的人种——大约10,000年前的人类，后来消失

了。而且，目前活着的很多人类群体，与已经灭绝的人种有着相同的外貌和特性；进化论家把他们说成了人的祖先。所有这些证据清楚地表明，在任何历史时期，人类从未有过进化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是，猿和人之间存在着许多解剖学上的差异，他们都没有通过进化而变为另一个物种。“两足动物”是他们中的一个物种。在后面的篇章里，我们将更加详细地介绍，“两足”是人类的特性，是区别人类与其它动物的最重要的特性之一。

想象中的人类族谱

达尔文学说坚持认为，现今的人是从某种猿一样的动物中进化而来的。在这一所谓的进化过程中——400万-500万年以前，他们声称现代的人与其祖先之间存在一些“过渡形式”。根据这个完全想象中的情节，他们列出了四个基本的“类别”：

1.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
2.南方巧猿;（Homo habilis）
3.直立人（Homo erectus）
4.智人（现代人的学名.）（Homo sapiens）

进化论家将所谓的人类和猿的最初的共同祖先称为“南方古猿”，其意思就是“南非之猿”。南方古猿不过是已经灭绝的一种古猿而已；这种古猿有着不同的类型。其中一些体格强壮，一些则矮小、瘦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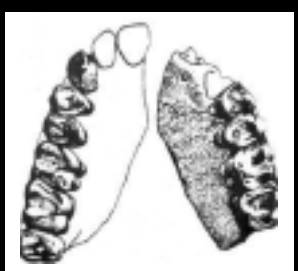
进化论家将人类进化的下一阶段分类为“人属”，即“人类”。按照进化论家的说法，人属系列的生物比南方古猿更发达，而且与现代的人没有多少差别；他们声称现今的人即所谓的“智人”，是这个种类进化的最新阶段。

传媒中不时出现的“爪哇人”、“北京猿人”和“露西”的化石，可以从进化论的出版物、教科书里看到；他们

一块颚骨燃起灵感的火花







最初找到的腊玛古猿（Ramapithecus）的化石,是由两块缺损的颚骨组成的（右下图）。就这样，进化论者仅仅根据这块颚骨的碎片，大胆地绘制出了腊玛古猿之家庭及生活的环境。

把它归入上面列举的四个种类中。这些种类也被假定为亚种的一个分支。

腊玛古猿（Ramapithecus）被断定是中间形式以前的候选者。当认识到它们只是普通的猿之后，进化论者不得不把它们从想象中的人类族谱中排除了。[65]

进化论家描绘出这样一个链条：南方古猿→南方巧猿→直立人→智人，并暗示这些种类各自互为祖先。但是，古人类学家的新近发现已经显示，南方古猿、南方巧猿和直立人在世界各地同时存在着。而且，被归类为直立人的某个部分一直生存到现代。智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萨平人（现代人）在同一地区共存着。这显然表明，他们曾互为祖先的说法是无效的。[66]

就本质而言，所有的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已经揭示：化石记录并不像进化论者所提出的那样，反映了人类进化的过程。事实上，进化论者声称是人类祖先的化石，既不属于人类，也不属于猿类。那么，哪些化石是人类的，哪些又是猿的呢？有可能把它们中的任何一种，看作一个过渡形式吗？为了得到答案，让我们逐一分析上面的类别。

南方粗猿：一种猿类

南方古猿属于第一个类别，指的是“南非猿”。可以假定，这些动物大约400万年前首先在非洲出现，并且直到100万年以前它们还活着。南方古猿之间存在一些差异。进化论家认为最老的南方古猿是南方粗猿（A.Afarensis），那以后是拥有细长骨头的南方小猿（A.Africanus），然后是骨头较大的A.Robustus。至于A.Boisei，一些研究人员把它看作不同的物种，另一些则认为是A.Robustus的亚种。

所有的南方古猿，是一种类似于现代猿的绝种了的猿。它们的头颅和当今的黑猩猩的一样大或者更小些。它们的手脚有突出的部分，常用来爬树，就像今天的黑猩猩一样，而且它们的脚还有抓住树杈的能力。它们身材矮小(最高130厘米)——正如当今的黑猩猩一样，雄性南方古猿的数量多于雌性。它们的很多特性，如头颅的细节、眼睛间的狭窄距离、锋利的大牙、颚骨的结构、长臂、短腿都证明这些生物与今天的猿毫无差异。

进化论者声称，虽然南方古猿在解剖学上具有猿的特征，但它们却像人一样地直立行走，而不像猿一样地爬行。这种“直立行走”的主张，实际上是另一种观点的翻版，如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和唐纳德·约翰逊（Johanson）维持了几十年的观点。然而，很多科学家对南方古猿的骨架结构经过大量的研究，证明这个论据是无效的。英国和美国的两位著名

的解剖学家罗德·扫利·朱克曼和查尔斯·奥克斯纳德教授，经过对各种各样的南方古猿标本的广泛研究，已经表明这些生物不是两足动物，并且具有与今天的猿相同的活动方式。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朱克曼勋爵和他的五位专家小组，对这些骨骼化石作了长达15年的研究后，他们得出了结论：南方古猿只是一种普通的猿类，并且明显的不是两足动物——虽然朱克曼本人是个进化论者。[67] 同样，因研究该主题而出名的另一个进化论家查尔斯·E·奥克斯纳德，也把南方古猿的骨架结构比作现代猩猩的结构。[68]

1994年，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一个小组，为了得到关于南方古猿的明确结论，他们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最终，他们断定“南方古猿是四足动物”。

简言之，南方古猿与人类没有任何联系，它只是一个绝种的猿类。

南方巧猿：被提出作为人的猿

南方古猿的骨架及头颅结构与黑猩猩的巨大的相似，以及这些生物直立行走的断言的垮台，使进化论的古人类学家碰到了大难题。原因在于，根据想象中的进化方案，南方古猿之后就是直立人；直立人名字的前缀“homo”的意思是“人”，并暗示直立人是一种人类，其骨架也是直立的，头颅的容积比南方古猿的大两倍。看上去像黑猩猩的南方古猿，直接转变为与现代人的骨骼没有差异的直立人，即便根据进化论家的理论，也大有疑问。因此，他们就需要抛出“连接”，即“过渡形式”。南方巧猿（Homo habilis）的概念由此产生了。

南方巧猿的分类，是20世纪60年代的李基一家提出的；他们全家都是“化石猎人”。根据李基们的观点，他们归入南方巧猿的新物种，具有相对大容量的头颅，并且具有直立行走和使用石制工具的能力。因此，它可能是人类的祖先。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掘的相同种类的新化石，完

南方粗猿：一种灭绝的猿



图1，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第一块化石，被认为是南方古猿的化石。化石编号：AL288-1或称为“露西”。长期以来，进化论家使劲证明：“露西”会直立行走，但最近的研究明确断定：这个动物其实是弯曲行走的普通的猿。



图2，南方古猿编号为AL333-105的化石，属于这个种类的年轻成员。这是其头颅上的突出部分仍然没有形成的原因。



南方古猿

上图为南方古猿的化石头骨,编号：AL444-2;
下图为与南方古猿同时代的猩猩的头骨化石。
明显的相似验证：南方古猿是没有任何“人样”特征的一种猿。



现代黑猩猩

全改变了这个观点。一些研究人员，如伯纳德·伍德和洛林·布雷司，他们依赖那些新近发现的化石指出：把“南方巧猿”应该归类为“会使用工具的南非猿”。因为，南方巧猿与南方古猿拥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与南方古猿一样，它们也有长臂、短腿和猿的骨骼结构；其手指和脚趾适于攀登，下颌骨的结构与现代猿的完全相似。它们平均600毫升容量的头颅也清楚地表明，它们是一种猿类。总之，一些进化论者作为一个不同物种提出的会用工具的猿，实际上是与其它南方古猿一样的猿类。

后来的研究的确证明，会用工具的猿与南方古猿并无不同之处。蒂姆·怀特发现了名为OH62的头颅和骨架化石，该化石显示这种生物具有小的头颅、能够爬树的长臂和短腿等特征——就像现代的猿一样。

美国人类学家豪利·史密斯（Holly Smith）经详细的分析处理后，于1994年指出：会用工具的猿不是“人属”，换句话说，不是“人类”，而是“猿”。在对南方古猿、会用工具的人、直立人及尼安德特人的牙齿进行分析后，她说明如下：

> “对这些牙齿化石结构的严格分析表明，它们符合更新纪灵长动物之牙齿发育的标准与方式，而南方巧猿仍然属于非洲猿的范围。但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由于与现代人具有相同的结构，而被归入人类。”[69]

同年，三位解剖学专家弗雷德·司博尔、伯纳德·伍德和弗朗斯·左奈威尔德（Frans Zonneveld），通过全然不同的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种方法基于对人类和猿的内耳半圆形导管的比较分析；该导管起保持平衡的作用。直立行走的人的内耳导管，不同于弯曲行走的猿的内耳导管。根据司博尔、伍德和左奈威尔德的分析，发现南方古猿及南方巧猿的内耳导管，与现代猿的完全相同，直立人的内耳导管与现代人的相同。

这个发现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

南方巧猿：另一种灭绝的猿



上图：长期以来，进化论家为他们称之为“南方巧猿”、会直立行走的生物而辩解。他们认为已经找到了能显示南方巧猿过渡到人类的一个连接点。但是，提姆·怀特于1986年找到的命名为OH62的“南方巧猿”的化石，使这个断言崩溃了。这块化石碎片显示：南方巧猿具有与当今猿的长臂、短腿一样的特征。这块化石宣告，南方巧猿属两足生物，且能直立行走的主张破产了。事实上，它只不过是另一种猿而已。



左图：南方巧猿的化石，编号：OH7，最清楚地反映了南方巧猿的颚的特征。在这块颚骨上有大门牙和较小的臼齿。颚骨的形状呈四方形，颚骨的所有特征与当今的猿非常相似；换言之，“南方巧猿”的颚骨再次证明了它只是一种猿。

1　称为“南方巧猿”的化石，实际上不

2　属于“人属”的种类，例如人类，而属于南方古猿，比如猿类。

3　“南方巧猿”和南方古猿都是弯曲行走的、具有猿的骨骼特征的生物。因此，无论怎样讲，它们与人都没有关系。[70]

鲁道夫猿人：错误粘合的脸

“鲁道夫猿人”的术语，是1972年发掘的一些化石碎片的名字。因为这些化石是在肯尼亚的鲁道夫河附近发现的，所以，根据推测把这一化石归类为“鲁道夫猿人”。大多数古人类学家认为，该化石不属于已经灭绝的另一叫做“鲁道夫猿人”的动物，实际上也是“猿人”，即一种猿类。

发现化石的理查德·李基将它命名为“KNM-ER1470”，并说它有280万纪年，是人类学史上最大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影响。在李基看来，这个小头颅像南方古猿、脸部又像人脸的生物，正是南方古猿与人之间缺少的连接。然而，那以后不久，类似人脸的KNM-ER1470的头颅，频繁出现在科学杂志的封面上；那实际上是头颅碎片拼合的结果——可能是故意所为。1992年，蒂姆·布罗米奇教授在电子计算机的帮助下，对人脸进行了解剖性研究，并透露了这个事实：

“当它（KNM -ER1470）被第一次重建时，脸部几乎垂直地附着在头盖骨上，很像现代人平整的脸。但新近的解剖学研究显示，生活中的脸必须相应地突出头颅，产生看似猿的外貌，从而更像南方古猿的脸。”[71]

进化论家、古人类学家J·E·克罗宁也说道：

“.....在这张结构粗糙的脸上，鼻梁塌陷(使人想起更新纪灵长动物中凹的脸部)，额头较宽，犬牙坚固，磨牙硕大，这些相应的原始特征，使这个物种与南方小猿的成员连在一起。”[72]

密执安大学的C·洛林·布朗司，对1470号牙齿和下巴的结构研究后，也总结出相同的结果：从下巴尺寸及包围磨牙的部分可以看出，ER1470化石具有与南方古猿一样的脸和牙齿。[73]

约翰·霍金斯大学的古人类学家艾伦·沃克教授，至少做了与李基对KNM-ER1470一样多的研究，他也支持这种生物不应该归在“人属”类，包括“南方巧猿”或者“鲁道夫猿人”，即人类；相反，它们应归为南方古猿类。[74]

总之，进化论提出的作为南方古猿和直立人之间过渡形式的“南方巧猿”或“鲁道夫猿人”，完全是想象中的产物。正如当今很多研究人员所证实的那样，这些生物是南方古猿系列的成员。它们的所有解剖特征揭示，它们分别是一种猿。1999年在《科学》杂志上，这个事实得到两个进化论人类学家——伯纳得·伍德和马克·考拉得的证实。他们解释说，“南方巧猿”和鲁道夫猿人（1470号头骨）的分类是想象出来的；强加在这些类别上面的化石，应是南方古猿的属性：

“离我们更近的是，将化石中的物种确定为‘人’，是以绝对的大脑尺寸为基础的，由此推论出语言的运用能力、手的作用和制作石器的能力。人类进化种类的作用和定义、‘人猿’的划分似乎已毫无问题了——只有一些异议。但是，.....新近的资料对现存证据的重新解释，古人类学档案的局限性，使现有的人猿归类的标准无效了。

“.....换言之，从赋予南方巧猿和鲁道夫猿人的种型群来看，‘人猿类’不是好的分类。因此，南方巧猿和鲁道夫猿人**应该从‘人猿’中除去**。明显的分类应必居其一：将一类或两类都转变成早期的原始人类之一，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忠告：南方巧猿和鲁道夫猿人应暂时转变成南方古猿类**。”[75]

伍德和考拉得的结论，核实了我们在这里的解释：历史上不存在“原始的人类祖先”。这样的生物实际上是属于南方古猿的猩猩一类的动物。化石纪录也显示，这些灭绝的猩猩

与“人属”即人类之间，没有任何进化关系；化石中的人类是突然出现的。

直立人与其后：人 类

根据进化论者富于想象力的安排，人类内在的进化顺序如下：先是直立人，然后是古代智人（Homo.sapiens）和尼安德特人，接着是克罗马农人（Cro-Magnon），而最后才是现代人。不管怎样分类，原先的人类种族的存在是真实的。他们之间的差异不会大于因纽特人与黑人、俾格米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差异。

首先，让我们来观察直立人，他被称为最原始的人类。与“直立”的词义一样，“直立人”意味着“直立行走的人”。进化论者通过加上“直立”，必须把这些人从早先的人中分开，因为现有的直立人的化石都很齐整；这在更新纪灵长动物或南方巧猿中是见不到的。现代人的骨架与直立人的没有区别。

进化论者把直立人定义为“原始”的主要理由，是头骨的容量900-1100毫升——这比现代人的平均值要小，还有它那茂密而突出的眉毛。然而，今天活在世上的人中，很多人具有与直立人同样的“大脑袋”（如俾格米人），还有人长着浓密的眉毛（如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头颅容量的差别，并不代表智力或能力的差别，智力取决于头脑的内部组织，而不是它的体积。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76]

北京猿人和亚洲爪哇人的化石，使直立人的化石闻名于世。而这两种化石是不可靠的。北京人的化石是用一些熟石膏做成的，其原物不为人知；爪哇人则是用一块头颅碎片，再加上几米外的一个地方找到的盆骨一起“组建的”，并且没有迹象表明，它们属于同一生物。因此，在非洲获得的直立人化石就逐渐重要起来。(应注意的是，一些进化论者把其中一些称为直立人的化石，划归到第二类：“Homo.ergaster”。在



直立人：一种古代人种

“Erect”是“直立”的意思，“Homo erectus”表示“直立步行的人”。这一物种的化石属于特殊的人种。由于直立人的大多数化石没有共同特征，所以，很难用他们的头骨来说明这些人。这是不同的进化论研究者，得出不同的分类与名称的原因。左上图是1975年在非洲的库比·弗拉（Koobi Fora）找到的头骨,它是通常用来定义直立人的依据。右上图，编号为KNM-ER3733的头颅的“身份不明”。所有不同的直立人的头颅的容量，在900到1100毫升之间。这些数据在当代人头颅容积的范围内。



右图，编号KNM-WT15000或“土坎纳孩子”，可能是业已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人的化石，对该化石研究后估计，这块160万年以前的化石，属于一个12岁的孩子，身高180厘米——如果活到成年的话。这块与尼安德特人种非常相似的化石，是关于人类进化的故事无效的最明显的证据。进化论者唐纳德·约翰逊这样描述这块化石：“他高而瘦，体型和肢体的比例，与当今赤道上的非洲人相同，肢体的尺寸与现今北美的白种成人完全一样。”

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的意见不一致。我们将把这些化石放到直立人的类别中。）

在非洲发现的直立人化石中，最著名的是在肯尼亚土坎纳湖(Turkana)附近找到的“纳里库土目直立人”(Narikotome homo erectus)的化石，或称“土坎纳男孩”的化石。据考证，这是一个12岁的孩子的化石，成年时的身高为1.83米。化石直立骨骼的结构与现代人完全相同。就此，美国古人类学家艾伦·沃克说，他怀疑“一般的病理学家能够说出这块化石骨骼与现代人之间的区别。”[77] 关于头颅，沃克说，“它看起来非常像尼安德特人。”[78] 就如我们将在下一章里看到的那样，尼安德特人是现代人种。因此,直立人也是现代人种。

连进化论者理查德·李基也陈述，直立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差异顶多是人种的变化:

> “我们还要看到每个人之间的差异：头颅的形状、脸的轮廓、眉毛的浓度等等。这些差异或许并不比当今不同地区的现代人种的大。这种生物性的变化，只有当人们从地理上长期分离时才会发生。”[79]

康涅狄格大学的威廉·拉弗林教授，对纽因特人和生活在阿留申岛上的人，做了大量解剖学研究后发现，他们与直立人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拉弗林因此得出结论，所有这些人种实际上是智人(现代人)的不同人种:

> “当我们考虑到在边远地区生活的群体，如爱斯基摩人和澳大利亚的丛林居民——他们就是智人的单一人种——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时，我们有理由推断，北京猿人（标本编号：ALC）属于这同样变化颇多的物种。”[80]

对智人的分类是多此一举，将化石归类给直立人，其实与近来在科学圈听到的说法，并无不同之处：他们把智人看作一个不同的物种。《美国科学家》对此作了讨论，结果在2000年召开了一次关于这个主题的学术会议:

> 参加学术会的大多数人，就直立人在分类学上的地位，展开激烈的辩论；论点是密执安大学的密尔福特·沃尔普

70万年前的水手


THIS WEEK

Ancient mariners

Early humans were much smarter than we suspected

“原始人比我们想象的机灵得多……”

1998年3月14日刊登在《新科学家》上的新闻：进化论者称为直立人的人，70万年前就当上“海员”了。这些具有足够知识和技术的人， 会建造船舶、利用海上运输的人，几乎不能说成是“原始的”。

弗、堪培拉大学的阿兰·托恩及其同事提出的。他们争执的焦点是：直立人作为一个人种是无效的，应该把这一分类完全取消。“人属”类的所有成员——从二百万年前到现在——是变迁复杂、广泛分布的物种； 智人没有过自然的突变或细分。学术会的主题是：直立人并不存在。[81]

维护上述论点的科学家所得出的结论为： “直立人不是不同于智人的一个种类，而是智人之内的一个人种。”

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人种的直立人与原先提出的“人类进化”的假想， 还有一个巨大的缺口； 这一假想进化的顺序是：南方古猿、南方巧猿、鲁道夫猿人。这就是说，地质记录中最初的人类，并没有早先进化的历史，而是突然出现的；也许没有更清楚地表明他们被创造的迹象了。

但是，接受这个事实，完全违反进化论家所奉行的独断的哲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结果，他们竭力将真正的人种——直立人描绘成半猿生物。他们“重建”直立人时，顽固地给他绘上

猿的相貌。还有，他们用同样的描绘方式，使猿猴彻底人性化，就像南方古猿或南方巧猿那样。用这种方法，他们还寻找与其理论“近似的”猿猴和人类，以弥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物间的鸿沟。

尼安德特人

尼安德特人是10万年以前在欧洲突然出现、35,000年以前迅速而悄然消失、或被其它人种所同化的人类。他们与现代人唯一的区别，就是其骨骼更为壮健、头颅容量稍大。

尼安德特人是一个人种。这是今天几乎人人都承认的事实。进化论家已极力想把他当成一个“原始人种”；然而，所有的发现显示，他们与今天走在大街上的“壮健”的人类毫无两样。新墨西哥大学该学科上的权威、古人类学家埃里克·特林考司(Trinkaus)这样写道:

> “仔细比较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遗骨后发现，尼安德特在人解剖学方面，其运动方式、操控能力、智力水平或语言能力等都不比现代人的差。”[82]

当代许多研究人员把人定义为现代人的亚种，并称之为“尼安德特智人”。调查结果清楚地证实，尼安德特人掩埋逝者、制作乐器，在文化上与生活在同一时期的现代智人有密切的关系。确切地说，尼安德特人是一个随时日消失的“壮健”的人种。



假面具：尽管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毫无两样，但进化论者依然把他描绘成猿猴的模样。





尼安德特人：壮健之人

图上方是在以色列发现的智人尼安德特人“阿姆得1号头骨”。尼安德特人一般个小而健壮。但这块化石主人的身高估计为180公分。他的脑壳容量是迄今最大的一个：1740毫升。因此，这块化石在推翻所谓尼安德特人是原始人种的主张中，是个重要的证据。左边的“卡拉巴2号化石”（Kebara2），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的遗骨，这个身高为170厘米的骨架与现代人的根本无法区分。

古代智人、Homo.Heilderbergensis与克鲁马努人

“古代智人”是进化论想象中的阴谋，是当代人之前的最后一步。实际上，进化论者对这些人解释不了太多，因为他们与现代人只有细微的差异。一些研究者甚至说，这一人种的代表今天还活着，并把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作为例子来说明。像智人一样，土著人也有突出的粗眉、内倾的颚骨和较小的头颅。而且，一些有意义的发现已经暗示：这种人不久前就曾住在匈牙利和意大利的一些小村子里。

在进化论家的文献中，划分为Homo.heilderbergensis的族群，实际上与古代智人属于同一种类。把两个不同的术语用在同一人种上面，是由于进化论者之间的异议。包括Homo.heilderbergensis分类的所有化石无非想提出，从解剖学的角度讲，他们与生活在50万年的现代欧洲人非常相似，也与早在74万年前的英国和西班牙人相似。据估计，克鲁马努人是直到30,000年以前还存活的一个人种。他的头骨有1,600毫升大，比当代人的平均值还要大。其头颅前有突出的浓眉，头颅后部的骨头突出；这些正是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的特征。

结果，这些人类中并没有“原始人种”。他们是早先生活的人类，后来要么为别的人类所同化或融合，要么灭绝并退出历史舞台。

与祖先同时生存的人种

迄今为止，我们的研究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清晰的画面：“人类进化”的假想完全是一种捏造。为了使这样的族谱存在，应该发生从猿到人的逐步进化，也应该发现这个过程的化石记录。但是，猿和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诸如骨骼结构，头颅容量，直立或大幅弯曲的行走等，这是区别人和猿的特征。(我们提到过1994年所做的内耳平衡导管的研究，也提到将南方古猿和南方巧猿归在猿类，而把直立人划分为人类的事。)



另一有意义的发现证实，在这些不同的种类中不可能存在族谱，那是因为作为其它种类的祖先，其实他们是同时共存的。如果像进化论家所声称的那样，南方古猿转变成南方巧猿，随后再转变成直立人的话，那么，他们生活的时代应该也是彼此跟随的。可是，并没有这样的编年顺序。

根据进化论家的估计，南方古猿从400万年前生存到100万年前。另一方面，归类为南方巧猿的生物，被认为在170万-190万年以前还活着。据认为比南方巧猿更“高级”的鲁道夫猿人，估计有250-280万年那样古老！那就是说，鲁道夫猿人差不多比南方巧猿老100万岁，它是假定的“祖先”。另一方面，直立人的纪年可以追溯到160-180万以前，这就是说，直立人在地球上与其所谓的祖先南方巧猿，是同时出现的。

阿兰·沃克如此说明这一事实：“从东非来的证据看，较晚生存的小的南方古猿先与南方巧猿、后与直立人共同生存过。”[83] 路易斯·李基在坦桑尼亚的奥尔杜卫峡谷地区的第二地质床，已经找到了南方古猿、南方巧猿和直立人几乎相邻的化石。[84]

当然没有这样的族谱。哈佛大学的古生物学家史蒂芬·简·古德虽然是个进化论者，但对进化论的这种僵局作了解释:

“如果有三种共存的原始人，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的族谱会如何？没有一个是从另一个派生而来的，这还不明显吗？而且，这三种人类在地球上落脚时，都没有显示任何进化的趋势。”[85]

我们沿着直立人向智人前行时，还是看不见这样的族谱。有证据表明，直立人和古代智人连续生存了27,000年，甚至在我们之前的10,000年中还生存着。在澳大利亚的沼泽地喀乌，发现了大约13,000岁的直立人的头颅。在爪哇岛上，发现了一块27,000岁的直立人的头颅。[86]

智人的秘史

最有趣、最有意思的事实表明，使进化论想象中的族谱的基础彻底动摇的事情，是现代人出乎意料的古老历史。古人类学资料显示，远在100万年以前的智人，看上去与我们一摸一样。

著名的进化论古人类学家路易斯·李基，找到涉及这个主题的第一批发现。1932年，在肯尼亚的维多利亚湖周围的坎杰拉（Kanjera）地区，李基找到几块属于更新世时代中期的化石，并且与现代人的化石没有差别。而更新世时代的中期，是在100万年以前了。[87] 由于这些发现完全翻转了进化论的族谱理论，因此，他受到了一些进化论古人类学家的强烈反对。然而，李基总力辩他的估计是正确的。

当人们快要忘记这场论战时，1995年在西班牙发掘出一块化石，以非常惊人的方式揭示，智人的历史要比假设的久远得多。这块引起问题的化石，是由马德里大学的三位古人类学家，在西班牙的阿特普卡（Atapuerca）地区的“奶奶水帘洞”内找到的。化石是一个11岁男孩的脸，看起来完全像现代人。而且，化石自孩子死后已有800,000年了。1997年12月号的《发现》杂志对此作了非常详细的报告。

这块化石甚至动摇了正在洞内进行挖掘工作的小组组长

费尔拉思(Ferreras)，对人类进化的信念。费尔拉思说:

> “我们期待一些大的、广阔的、膨胀的事物……以及你所知道的‘原始’的事物。我们对一个800,000年前的男孩的期望，有点像‘土坎纳男孩’。可我们发现的却是一张完全现代的脸……。对我来说，这是最为壮观的事——这种事使你震撼。找到了那种完全意想不到的东西：不是在找化石，而是找到了预想之外的化石，这算是好事。可最引人入胜的事情，是发现了你认为本来属于现在、过去的东西。这看起来像是在那个洞里发现了一台录音机一样。这使人非常惊奇。我们并不期望在更新世地层里找到磁带和录音机，但找到一张800,000岁的现代脸，是与此相同的事情。我们看见那张脸时就非常惊讶。”[88]



兜售进化论的最流行的杂志之一《发现》，在1997年12月号的封面上刊登了80万纪年的一张人脸图，并配以进化论者的问题：“这是我们从前的脸吗？”

这块化石突出了一个事实：智人的历史可推至80万年以前。发现化石的进化论者，从最初的震动中恢复之后，确定它属于另一不同的种类；因为根据进化的族谱，智人在80万年以前不应该存在。所以，他们虚构了称为“人属前辈”（Homo-antecessor）的种类，并且将阿塔普卡的头颅归于此类。

170万年的棚屋

已有许多发现证明，智人的历史甚至比80万年更早。其中一个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路易斯·李基在奥尔杜维(Olduvai）峡谷中发现的。在第二地质层里，李基发现南方古猿、南方巧猿和直立人的种类，同时共存着。更有趣的是，李基在相同的地层(第二地层)里发现了一个建筑物——一所石屋的遗迹。这个事件不寻常的地方在于，这个只能由智人建造

的方式，仍在非洲的一些地区沿用着！因此，李基根据这些发现得出结论：南方古猿、南方巧猿、直立人和现代人，肯定在170万年以前已经共存了。[89] 这个发现的确使进化理论无效了，即声称现代人是从猿一样的南方古猿中进化的。



这个170万年的小屋的发现，震撼了科学界。它看上去与今天的一些非洲人使用的一样。

现代人的足迹已有360万年了！

诚然，一些别的发现也证明现代人的起源，可追溯到170万年以前。其中最重要的是玛丽·李基1977年在坦桑尼亚的拉托里（Laetoli）地区发现的脚印。据估算，这些脚印是在360万年前的一个地层里发现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同时代的脚印没有不同之处。

玛丽·李基发现的脚印，后来被唐纳德·约翰逊、蒂姆·怀特等著名的古人类学家核查了；他们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怀特写道：

> “不要在这一点上犯错了……。它们就像现代人的脚印。如果今天这些脚印留在加利福尼亚海边的沙滩上，向一个四岁的小孩问这是什么时，他立刻回答某人曾在那里走过。他不能从海滩上100个别的脚印中说出它，你也不能。”[90]

加利福尼亚北部大学的路易斯·罗宾斯仔细观察这些脚印后，做了以下评论：

> “脚弓凸出——小体型的人的脚弓比我的还高，大脚趾较大，并与第二个脚趾排成一行……。脚趾像人的脚趾一样紧扣地面。你从其它动物看不见这一点。”[91]

从形态学上观察这些脚印，会再次表明：它们属于人类，确切地说，是现代人(智人)的脚印。观察过这些脚印的拉塞尔·塔特尔写道：



虽然拉托里脚印数百万年了，但它们属于现代人。

“这些脚印应该是一个赤脚的智人留下的.....。从形态上可以辨别，留下脚印的个体的脚，与现代人的脚很难区分。”[92]

对这些脚印公正的观察，表明了其真正的主人。实际上，这些脚印是由20块10岁现代人的化石脚印组成的，以及27块更年轻的脚印。他们当然是像我们一样的现代人。

这使拉托里脚印数年中成为了讨论的中心。进化论古人类学家拼命地想拿出解释来，因为他们很难接受现代人在360万年以前，就已经在地球上行走的事实。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解释”开始成型了。进化论者决定，这些脚印理应是南方古猿留下的，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人属（Homo）种类不可能在3，6万年以前就存在！1990年，拉塞尔·塔特尔在他的文章里写道:

“总之，拉托里地区350万年的足迹，与惯于赤足的现代人的非常相像。拉托里原始人的脚印显示，他们的两足并不比我们的差。如果那些足迹不怎么古老，我们会欣然推断：这些脚印曾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属（Homo）成员留下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应该搁置那种不精确的设想，即拉托里脚印是露西的种类——南方粗猿留下的设想。”[93]

概括而言，360万年的这些脚印，不可能属于南方古猿。把这些脚印当作南方古猿留下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它们是在360万年的火山地层里发现的。进化论者将化石放在南方古猿身上，旨在假设人类不可能在这么久远的时期生存过。对拉托



另一个使假想的人类族谱无效的例子：进化论者绘制的现代人（智人）的颚骨；它有230万年了。颚骨编号：A.L.666-1；发现地：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尔（Hadar）。在进化论者的出版物中把它捧为“非常惊人的发现”。（D.约翰逊,布莱克·埃得加合著：《从露西到语言》第169页。）

里脚印的解释，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进化论者的理论不是基于科学发现，而是根本无视科学发现的。不管怎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被盲目维护的理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些不利于自己理论的全新发现，他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肆意歪曲。

一句话，进化论不是科学，而是抛开科学的教条。

进化论两足动物理论的绝境

迄今为止，我们所获得的化石资料显示，人和猿之间存在着不可互通的解剖学上的差距，同时这也使人类进化的假想无效。这个差距之一就是行走的方式。人类靠双足直立行走，这是在其它种类中看不到的非常特别的动作。虽然一些别的动物双足站立时也能移动，如熊和猴子，但它们用爪子想够到食物时才这样，而且持续的时间很短。通常它们的身子向前弯曲，并且用四足行走。那么，真的像进化论者声称的那样，两足生物是从猴子这种四足动物，通过行走进化的吗？这当然不可能。研究显示，两足生物的进化从未发生过，也不可能发生。首先，两足行走并不是进化的优势。猴子活动的方式，要比两足的人类更为容易、快捷和高效。人类即不能像黑猩猩那样，不着地面地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也不能像豹子一样每小时以125公里的速度飞跑。相反，因为人靠

两足行走，所以，在地面上移动时就缓慢得多。由于同样的原因，人类在自然界里，是最缺乏运动与防卫能力的生物之一。按照进化论的逻辑，猴子早该进化到两足行走的地步，而人类应该逐步进化成四足生物。

进化论面临的另一绝境，是两足动物根本不适合达尔文学说的“逐渐发育”的模式。作为进化基础的这个模式，要求在进化过程中必须存在两足动物和四足动物之间“混合”的行走方式。但是，在计算机的帮助下，英国古人类学家罗宾·克朗普顿，于1996年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这样的“混合”行走是不可能的。克朗普顿得出结论：一种生物要么只能直立行走，要么只能四足行走。[94] 不可能存在介于两者之间的行走方式；因为，那是极度消耗能量的。这也是没有单足生物的原因。

人和猿之间巨大的差异不仅限于两足。很多其它问题也是进化论者根本不能解释的，例如大脑的思维能力、交谈的能力等等。进化论古人类学家伊莱恩·摩根就此承认道：

> “人的四个最重要的秘密是：1，他们为什么用两条腿行走？2，他们为什么失去皮毛？3，他们为什么具有如此发达的头脑？4，他们为什么学会了说话？
>
> “这些问题的传统答案是：1，我们还不知道；2，我们还不知道；3，我们还不知道；4，我们还不知道。问题还可以不断增加，但是影响不了这千篇一律的答案。”[95]

进化论：反科学的信仰

扫利·朱克曼勋爵是英国最著名、最受尊重的科学家之一。十多年来，他研究了化石记录，并且作了很多详细的调查；由于他对科学的贡献，被授予了“勋爵”的头衔。朱克曼是个进化论者。所以，他对进化论的评论不能看作是故意而不合适



最近的研究显示，适合四足行走、骨骼弯曲的猿，不可能进化成两足行走、骨骼直立的人类。



的意见。但是，他对进化论用来证明人的进化的化石，作了数年的研究后，得出实际上根本没有这种族谱的结论。朱克曼也作了个有趣的“科学谱系”。他把自认为科学的成分和不科学的成分列入这个谱系。根据他的谱系，最“科学的”领域是——依靠科学数据——化学和物理，然后是生物科学，再后是社会科学。谱系的末尾被认为是最“不科学的”，是“超感知觉”——心灵感应术与第六感觉，最后是“人的进化”。他这样解释自己的推理:

> “于是，我们从客观领域中走出，进入假设的生物科学领域，像超感知觉或对人类化石历史的解释中去；对于相信该理论的人们来说，那里的一切都是可能的，热心的信徒有时会同时相信几种矛盾的事情。”[96]

《考古发现》是发表关于人类进化资料的重要刊物，其编辑罗伯特·劳克在该刊写道：“对人的祖先的探索放出的热比光多。”他引用了著名进化论古生物化学家提姆·怀特的表白:

> “我们所有人由于‘我们已不可能回答的所有问题’受挫了。”[97]

劳克的文章回顾了进化论在人的起源方面陷入的僵局，并回顾了毫无根据的传媒对这个理论的炒作:

> “在科学界，也许再没有比探索人的起源，更具争议的

> 事了。古生物学的精英们甚至不同意人类族谱最基本的框架。在一片鼓噪中生长的嫩桠，只有在新发现的化石面前枯萎和死亡。”[98]

同样的事实近来也被亨利·基所接受；他是有名的《自然》杂志的编辑。在1999年出版的《寻觅纵深时代》（In Search of Deep Time）一书中，他把进化论关于人的进化的图谋，说成“完全是抛开事实、出自偏见的人为发明。”他补充道:

> 拿出几块化石，并声称它们代表着一个族系，不仅是经不起检验的科学假想，而且想说明床头故事的真实性——有趣、也许颇具启发性，但并不科学。[99]

那幺，是什幺原因促使那幺多科学家，如此固执地支持这种教条呢？为什幺他们总是花费那幺大的劲头，来保留这个理论呢——以承认无数的矛盾、无视自己找到的证据为代价？

唯一的答案，是他们害怕面对一个事实：将必须放弃进化论。当他们放弃进化论时，就必须面对真主创造人的事实。然而，由于他们怀着假想，相信唯物主义哲学，从而创造论不是进化论可以接受的观点。

因此，他们利用与其合作的媒介，不仅欺骗了自己，而且欺骗了世界。如果他们找不到需要的化石，就“虚构”它们——不是想象中的图片就是虚假的模型，并且留给人们一种印象：的确存在可以证实进化论的化石。
赞同他们唯物论观点的大众媒体，也企图欺骗公众，并且将进化论渗透到人们的潜意识中。

不管他们怎样努力，真相已经大白。人不是进化来的、而是由真主创造的。因此，人应向真主负责，无论情愿与否，他可能承担这项责任。

进化论关于分子的僵局

在本书前面的章节，我们已讲述了化石记录怎样使进化论无效的。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对它多说什么，因为声称“物种进化”的进化论以及相关的化石证据，很久以前就破灭了。使这个理论一开始就显得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最初的生命如何出现在地球上？

面对这个问题，进化论声称生命由偶然形成的细胞开始。根据这一假想，40亿年以前，在原始地球的大气层内，各种没有生机的化合物，在雷电和压力的影响下，促成了第一个活细胞。

我们必须阐述的第一件事，是这种无生命的物质能够凑在一起、构成生命的主张是不科学的；因为，它迄今没有通过任何实验或观察的证实。生命只能从生命中产生。每个活细胞依靠复制另一个活细胞而形成。即便在世上最先进的实验室里，也没有人能够成功地通过把无生命的化合物放到一起，而组成一个活细胞。

进化论声称，这个连人类的智能、知识和技术都无法制造的生物细胞，却能够在原始地球的条件下偶然诞生。在下面的篇章里，我们将分析为什么这一主张，是与最基本的科学和理性相反的。

“细胞偶然诞生”的童话

一个相信活细胞能够偶然产生的人，也会很容易地相信我们在下面叙述的一个类似的故事。这是一个城镇的故事:

有一天，一块粘土被挤压在一片贫瘠土地上的岩石之间，雨后它变得湿润了。太阳升起时，湿湿的粘土变干了，形成了坚硬的形状。之后，覆盖粘土的岩石，不知何故纷纷变成了碎片。然后，一块平整、美观、坚固的砖出现了。多年来，这块砖在相同的自然条件下等待着，等待着形成像自己一样的砖。这一等待持续了几百年、几千年，直到数千百块相同的砖在相同的地方形成。早先形成的砖也没有偶然受到损坏，虽然经历了数千年的风吹、雨淋、日晒和严寒，可那些砖并没有破损或被谁拉走，而依然在相同的地方、用同样的决心等待其它砖的形成。

当砖的数量够多时，它们就在周围砌起了墙，然后竖起了一个建筑，而且在墙的顶部，互不经意地靠自然条件的影响，把砖拿来拿去——依靠狂风、暴雨或龙卷风。同时，像混凝土等原料也在“自然条件”的影响下，恰到好处地把它们彼此粘接了。当这一切发生时，泥土下的铁矿石也以“自然条件”的方式成型了，并铺设在堆砌这些砖的建筑物的地基上了。最后，一个利用材料、工匠及安装才能完成的大楼，就这样完全建成了。

当然，一座大楼不只是由地基、砖瓦和水泥组成的。那幺，其它缺少的材料又是怎样得到的呢？答案很简单：建造大楼所需的各种材料，在它即将矗立的土地中存在着。玻璃所需的硅，电缆所需的铜，柱子、大梁、水管所需的铁等等，全部在地面下大量蕴藏着。这一切只需“自然条件”的技

进化论者的自白

在进化论面对的问题中，没有比解释生命的出现更大的了。因为，分子的结构相当复杂，想解释它在巧合中形成是不可能的；而活细胞的偶然形成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在二十世纪中叶，进化论者面对了生命起源的问题。分子进化理论的主要权威、俄国进化论者亚历山大.A.奥帕林，在他1936年出版的《生命的起源》中说：

> 很遗憾，细胞的起源仍然是个问题，也是全部进化理论中最黑暗的一点。[1]



A.Oparin 教授："我们无法解释细胞的形成。"



Jeffrey Bada教授："生命是怎样形成的依然是最大的秘密。"

自奥帕林以来，为证明细胞曾是偶然形成的，进化论者们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研究和调查。但是，每次努力只能更详细地说明了细胞的复杂设计；因此，更进一步反驳了进化论者的假说。德国约翰内斯堡大学生物化学学院院长克劳斯·道斯（Klaus.Dose）教授说：

在化学和分子进化领域里，关于生命起源的实验已做了30多年；这些试验实际上扩大了这个问题，而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目前，所有关于这些理论的讨论和实验，不是陷入僵局就是对无知的招供了。[2]

圣地亚哥斯克利·普斯学院的地球化学家杰弗雷·巴达（Jeffrey Bada）下面的陈述，说明了进化论者面对僵局时的无奈：

> 今天，当我们告别20世纪时，我们仍然面对进入20世纪时的最大的未能解决的问题：生命怎样在地球上开始？[3]

1，亚历山大.A. 奥帕林：《生命的起源》第196页(1936年)；纽约：多佛出版社，1953年（再版）。

2，克劳斯·道斯："生命的起源：问题多于答案"，《跨科学的评论》第4期第13卷，第348页,1988年。

3，弗雷·巴达：《地球》杂志第40页,1998年2月号。

巧去形成，这些技巧又把所有材料安置在大楼里。全部装置、木工和附件都是借助强风、暴雨和地震，来放到砖里面的。一切进展顺利，顺利得砌砖时还留下了安装窗户的位置，它们好象知道叫玻璃的东西，以后会仰赖自然条件形成似的。还有，它们没有忘记留下安装水、电、暖设施的空间，这些都要在以后偶然形成。事情太奇妙了：“偶然”和“自然条件”做出了一件完美的作品。

至此，如果你把这个故事信以为真的话，那你就没有麻烦猜出城里的其它设施是如何产生的，如楼房、工厂、道路、人行道、通信及运输系统。如果你具备技术知识并熟悉这个主题的话，你就会写出几卷非常“科学的”著作了，讲述关于“排污系统的进化过程与现有结构的一致性”的理论了。你也许因为卓越的学术成果而获得荣誉，也许认为自己是人类中才华横溢的天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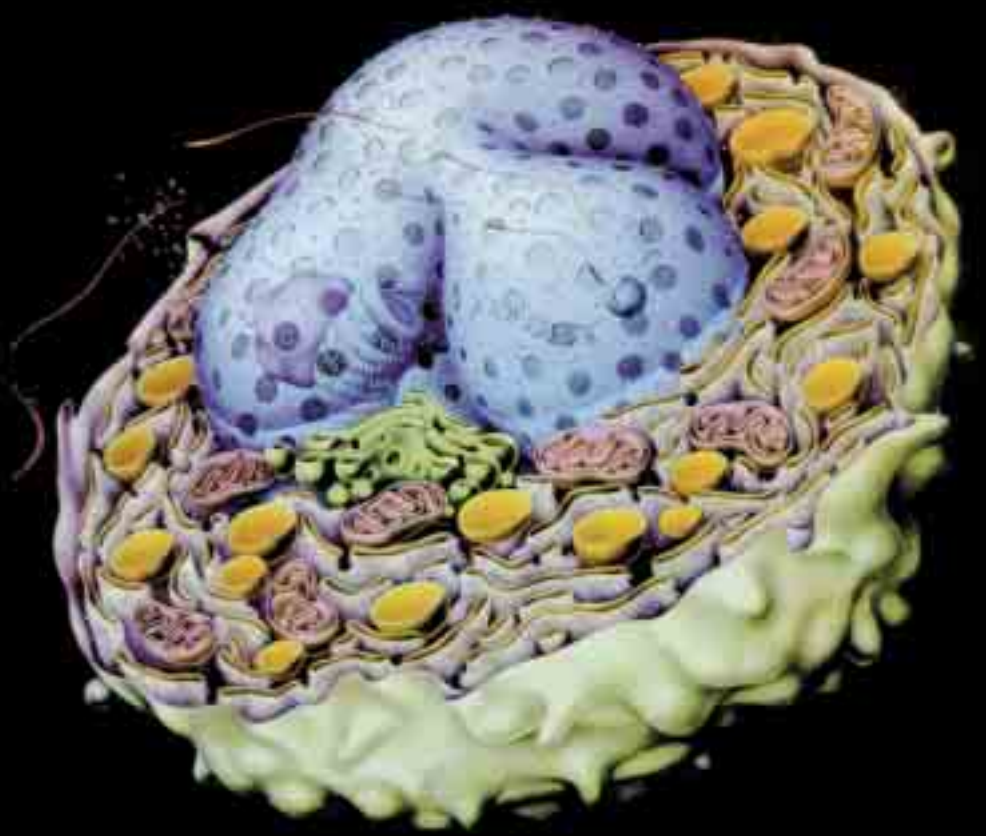
进化论主张生命来自偶然；其荒唐程度并不亚于我们讲述的故事，因为就整个运作系统、信息、承载及管理系统而言，一个细胞的复杂性决不小于任何城市。

细胞的奇迹与进化论的终结

在达尔文时期，人们并不知道活细胞的复杂结构，进化论者把生命归因于“偶然和自然事件”的说法就足有说服力了。

二十世纪的技术，已深入到生命最小粒子的研究，并且揭示细胞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复杂的系统。今天，我们知道细胞包含生产细胞所用能源的发电厂；生产生命需要的酶和激素的工厂；记录全部待生产产品的数据库；运送原料和产品的复杂的运输和管道系统；把外部原料分解成可用部分的高级实验室和精炼厂，以及适用于控制细胞材料出入的专业化细胞膜蛋白。这些还只是这一不可理喻的复杂系统的部分作用。

细胞的复杂性



细胞是人类已经见证的最为复杂、最为优化的系统。生物学家迈克尔·丹顿（Michael Denton）在名为《进化论：危机中的理论》一书中，举例解释了细胞的复杂性:

> “为了领会由分子生物学所揭示的生命事实，我们必须把细胞放大十亿倍，直到其直径达20公里，即相当于伦敦和纽约等大城市的面积。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复杂且结构完美的设计。在细胞的表面，我们看到数百万个通过闭合允许物质不断流动的开口，就像巨型宇宙飞船的舱口。如果我们进入其中的一个开口，那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技术高超、极端复杂的世界上；其复杂性超越我们的创造性能力，并使我们打消试试看的念头；因为，人类的职能不可能达到那种优越的境地。

进化论者W.H.索普（Thorpe）承认，“就其结构而言，最初级的细胞组成的‘机械装置’，比人类难以想象的机器还要复杂。”[100]

用人类今天的最高技术水平，也不可能做出哪怕一个细胞！制作细胞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于是，人们最终放弃了这样的尝试。进化论却声称：人类用全部的智能、知识和技术都无法成功制成的这个系统，在原始地球的条件下会“偶然”产生。换个例子说，细胞偶然形成的可能性，就像在一家印刷厂爆炸时，偶然地印出一本书那样地不可能。

英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爵士，在1981年11月12日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做了类似的比较：自己虽然是个进化论者，但他仍表示，细胞的偶然形成，等于龙卷风横扫垃圾场后，从中偶然地装配成一架波音747飞机。[101]这说明细胞不可能偶然形成，而肯定是“创造”的。进化论不能解释细胞怎样产生的基本原因之一，是细胞“不能削减的复杂性”。活细胞的生存依靠许多协调合作的细胞器。这些细胞器缺一不可，否则细胞就不能存活。细胞的发育不允许等待像自然选择或突变等无意识的机制。因此，地球上的第一个细胞形成时，一定具备必需的全部细胞器和功能。这清楚表明细胞一定是被造物。

蛋白质挑战偶然性

我们对细胞先谈这些。但进化论甚至无法解释单个细胞的基本组件。在自然条件下，在构成细胞的数千种复杂的蛋白分子中，形成单个蛋白质也是不可能的。

蛋白质是由叫做“氨基酸”的更小单位组成的、按照一定数量和结构排列而成的庞大分子群。这些分子群组成活细胞的建筑群。最简单的蛋白质，由50种氨基酸组成；但有些蛋

白质则由数千种氨基酸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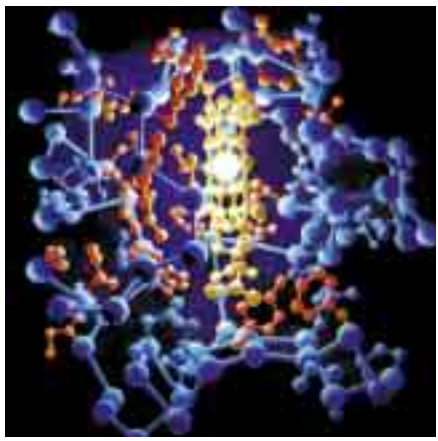
更重要的是，在蛋白质内单个氨基酸的短缺、增加或移位都会使蛋白质成为无用的分子堆。每一种氨基酸必须以合适的位置和顺序排列。面对这样惊奇的顺序，声称生命偶然出现的进化论绝望了。(而且进化论也不能解释氨基酸“偶然形成”的主张，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论述。)

蛋白质功能的结构，绝对不可能偶然产生的事实，是人们不难观察到的，甚至通过任何人都会理解的简单的概率来推算。一个平均形状的蛋白分子，是由12种不同类型的288种氨基酸组成的；这些蛋白分子可以用10的300次方的不同方式排列。（这是一个1后面跟着300个零的天文数字！）在所有这些可能的排列序列中，只有一种可能形成蛋白质分子的方式；其余都是氨基酸连接起来的、要么完全无用要么对生物有潜在为害的方式。

换言之，形成仅仅一个蛋白分子的可能性只有“10的300次方分之1”。而这种“1”的可能性实际上等于不可能。(在数学概念中，小于10的50次方分之一的可能性即为“零概率”。)

而且，一个由288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分子，与一些由数千个氨基酸组成的庞大蛋白分子相比较，那还是相当适度的一个结构。当我们使用类似的概率，来估算这些庞大的蛋白分子时，我们甚至会发现连“不可能”这个词也变得不适合了。我们进一步观察生命的发育时，就会发现蛋白质对它本身毫无意义。我们所知道的最小的细菌之一支原菌H39（Mycoplasma Hominis），含有600“种”蛋白质。这样的话，我们必须重复对上面600种不同蛋白中的、单个蛋白估计的

概率了。结果得出根本没有可能性的概念。



蛋白质是生物最重要的元素。它们不仅联合起来组成活细胞，而且在身体的化学变化中起着关键作用。从蛋白合成到荷尔蒙通讯，会看到活跃的蛋白质。

正在读上述文字以及迄今仍接受进化论为科学的一些读者，也许怀疑这些数字被夸大了，而且这并不反映事实。事情绝非如此:

这一切都是明确而具体的事实。还没有进化论者能够对此提出异议。他们承认，单个蛋白质偶然形成的可能性，就像是“猴子不出差错地在打字机上书写人类的历史”一样的不可能。[102] 但是，他们宁愿继续维护这种不可能，而不想接受创造的事实。

事实上，很多进化论者意识到这种情况。例如，著名的进化论者哈罗德.F.布卢姆说：“我们所知道的形态最小的蛋白质中的、多肽的偶然形成绝无可能。”[103]

进化论者声称，分子的进化是长时间内发生的，并且这个漫长的时期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然而，不管他们给出的时间有多久，氨基酸不可能偶然地形成蛋白质。美国地质学家威廉·司多克在他所写的《地球历史的本质》（Essential of Earth History）一书中，承认了这一事实，即这种可能性小得“在几十亿年间，附着在几十亿颗行星上的（蛋白）将不会出现——每一颗行星上覆盖着一层必要的氨基酸的浓缩水溶液。”[104]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化学教授佩里·李(Perry.Reeves)

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我们检查导致氨基酸随意结合的众多可能的结构时，会将信将疑：生命会以这样的方式产生。这样一项任务的实现需要一个精于计划的‘大师’ 这更为似是而非。”[105]

如果连一个蛋白质都不可能偶然形成，那幺大约100万个蛋白质偶然而适当地聚在一起，并且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类细胞，其不可能性就高达数十亿倍。而且，细胞决不是由蛋白质堆组成的。除蛋白质以外，细胞还包括核酸、碳水化合物、类脂、维生素及许多别的化学成分，如在结构和功能方面按一定比例，和谐、精巧安排的电解液。每个蛋白在各种各样的细胞器里起着“楼房单元”或共同分子的作用。

纽约大学的化学教授、DNA专家罗伯特·夏皮罗计算，在单一细菌里发现的2000种蛋白质偶然形成的可能性。(人体细胞有200,000种不同的蛋白质。）他得到的数字是10的40,000次方。[106] （这个在1的后面跟着40，000个零的数字是难以置信的。）

威尔士“加的夫大学”的应用数学与天文学教授卡尔迪亚·维克拉玛辛赫（Chandra.Wickramasinghe）对此解释道:

“从无生命的物质，自发形成生命的可能性是：一个数字后面跟着10的40,000次方.....。这个数字大得足以埋葬达尔文和所有的进化理论。在这个星球或其它星球上没有过‘原始粥’——如果生命不是随意形成的话，所以，它们必须是有意的智能产物。”[107]

弗雷德·霍伊尔对这个难以置信的数字评论道:

“的确，这一理论（生命由智能组合）如此明显，以致使人想知道：人们为何不能广泛地以自我证明的方式去接受它呢？其原因在于心理，而非科学。”[108]

霍伊尔使用“心理”一词的原因是：进化论者的自我作用，促使他们不接受生命是被造的事实。这些人已决意把拒绝真主的存在，作为他们主要的目标。单凭这一理由，他们继续维护连自己也承认不可能的无理的假想。

L-蛋白质

让我们现在仔细分析一下，为什么进化论者关于蛋白质形成的假想是不可能的。适当氨基酸正确的排列顺序，不足以形成蛋白质分子。除此以外，在20种不同类型的氨基酸中，每一种蛋白质的合成物必须是“左手型的”。

氨基酸有两种不同的类型：L-型(左手型)和R-型（右手型）。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其立体结构中的镜面对称性，就像一个人的左手和右手。

两种氨基酸中的任何一种，都能容易地相互结合。研究结果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动植物的全部蛋白质中，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生物体，都是由L-氨基酸组成的。如果单个的R-氨基酸附着在蛋白结构上的话，那这个蛋白质就毫无用处。有趣的是，在一些实验中，给细菌加入右手型氨基酸时，就立即破坏了这些氨基酸；有时，它们从那些破碎的部分中组成左手型氨基酸，以便能够使用它们。

让我们暂时假定，生命就如进化论者所声称的那样，是偶然产生的。这样，偶然产生的左、右手型氨基酸的自然数量应大致相等。因此，所有生物在构造上，应该同时拥有左、右手型氨基酸；因为，化学地讲，两种类型的氨基酸有可能相互结合。实际上，所有生物里的蛋白质仅仅由左手型氨基酸组成。

至于蛋白质何以从氨基酸中唯独选择左手型，甚至连一个

右手型氨基酸，也不介入生命活动的问题，仍然是进化论者面临的难题；他们无法解释这样一个特殊而有意识的选择。

还有，蛋白质的这种特性，使主张“偶然性”的进化论陷入不能自拔的绝境。为了产生一个“有意义的”蛋白质，氨基酸按一定的数量，以完美的序列并用正确的立体结构来排列，是仍然不够的。另外，这些氨基酸必须是左手型的：甚至连一个氨基酸都不能是右手型的；也不存在任何自然选择的机制，来鉴别右手型氨基酸加入这个序列，并意识到它一定从氨基酸链中移出了。这种情形再一次有力地排除了偶然性的可能。

公开维护进化论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说：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体的氨基酸和诸如蛋白质一样具有复杂结构的集合单元，同样具有左手型的不对称性。还说，这等于把一块硬币投掷了一百万次，而且总是正面朝上投掷一样。该书又说：不可能理解分子怎幺会变成左手和右手型，而这种选择与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密切相关。[109]

如果一个硬币向空中抛掷百万次都能正面朝上，我们接受这是偶然的呢，还是有人有意识地向空中抛掷？哪个更符合逻辑呢？回答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面对这样明显的事实，进化论者仍然把“巧合”当成庇护所，就因为不愿接受“有意干预”的存在。

类似氨基酸左手型的情形也存在于核苷——DNA和RNA的最小单位。与蛋白相反，其中的氨基酸只是左手型，而核苷只选择右手型结构。这又是另一个无法用偶然性来解释的情形。

结论：我们已做的分析清楚地证明，用偶然不能解释生命的起源。如果我们试图计算400个选自左手型氨基酸、所组

成的蛋白分子的可能性，得到的概率是2的400次方分之1，也就是10的120次方分之1。为了与这个数字作个比较，让我们记住，宇宙中电子的数量约为10的79次方，这个数目虽然庞大，但比前面的小多了。这些氨基酸根据所需的顺序和功能组合起来的话，将会产生更大的数目。如果我们把这个概率互相加起来，并继续算出更多数目和类型的蛋白质，其得数就变得不可想象了。

适宜的结合是关键

上面列举的资料还结束不了进化论的僵局。氨基酸按正确的数量和次序排列，并获得立体结构是不够的。蛋白质的组成同时需要多于一个、并通过一定数量相互结合的手臂的氨基酸分子。这种结合被称为“肽键结合”。氨基酸能使不同的键相互结合，而蛋白质也只能由这些结合起来的键组成。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来阐明这一点：假设一辆汽车的所有零件完整、准确地安装了，可只有一个例外：其中一个轮胎没有用螺丝固定，而是用一根金属丝把连到地面上。这样的汽车不论其技术含量多高，发动机何等强劲，连一米都不可能移动。乍一看，似乎一切各就各位，但其中一个轮胎不按要求安装，汽车就没用了。同样，在蛋白质分子中，如果氨基酸不是通过肽键结合，而是用其它键的结合，那整个蛋白分子则无用了。

研究显示，氨基酸与肽键随意结合的比率只有50%，其余由蛋白质中找不到的别的键来结合。为了适当地发挥作用，每个由蛋白质组成的氨基酸，必须用只能从左手型选出的肽键来组合。

这种概率与左手型蛋白质的概率一样。也就是说，当我们考虑一个由400种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时，所有氨基酸仅仅通过肽键自我结合的概率为：2的299次方分之1。

零概率

正如我们从下表所见，形成由500个氨基酸组成的一个蛋白分子的概率是：1后面跟着950个零分之“1”，这是头脑不能想象的天文数字。这只是在纸上的预估。务实地说，实际发生的几率为“0”。如我们早些时候见到的，数学中小于10的50次方分之1的概率，统计学认为发生的概率是“0”。

10的950次方的概率更是远远超乎上面的定义。

由500个氨基酸组成的一个蛋白质分子，其偶然形成的不可能性，到这般地步时，让我们进一步开动脑子，使不可能性更大：在组成生命蛋白的血色素分子中，有574种氨基酸；这比上面所举的组成蛋白分子的氨基酸还要多。现在，请你想一想：在你体内亿万个红细胞中，仅一个中就有280,000,000（280百万）个血红蛋白。

假设的地球年龄，甚至还不够形成一个蛋白质——用反复试验的方法，更不用说一个红细胞了。即使我们假定，利用地球形成以来的全部时光、通过反复试验去构成一个蛋白分子，从而使氨基酸结合并分解，可用10的950次方的概率，获得某物的时间仍然大大超过估计的地球年龄。

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就在试图构成一个蛋白的阶段，进化论堕入可怕的不可能的深渊中。

偶然形成蛋白质的可能性为零

形成有用蛋白质的基本条件有三:

第一个条件: 蛋白质链中的所有氨基酸具有正确的类型和序列;
第二个条件: 链中的所有氨基酸属L-氨基酸;
第三个条件: 所有这些氨基酸之间的连接, 一律通过形成称为“肽键”的化学键来完成。

为了使蛋白质偶然形成, 这三个基本条件必须同时存在。蛋白质偶然形成的概率, 等于与每个条件各自实现的概率相乘。

例如, 为了得到一个由500种氨基酸组成的通常的蛋白质:

1, 序列正确的氨基酸的概率:
蛋白质的组成中有20种氨基酸。根据这一点:
-从20种氨基酸中正确选择每一种氨基酸的概率 =1/20
-所有500种氨基酸得以正确选择的概率 $=1/20^{500}=1/10^{650}$
$=10^{650}$分之1的概率

2, L-氨基酸的概率:
-一种L-氨基酸的概率 =1/2
-500种L-氨基酸同时的概率 $=1/2^{500}=1/10^{150}$
$=10^{150}$分之1的概率

3, 由“肽键”结合的氨基酸的概率:
氨基酸能够与不同种类的化学键彼此结合。为了形成有用的蛋白质, 链中的所有氨基酸, 必须由叫做“肽键”的特别的化学键结合。据估算, 不是由另一个化学键、而是由肽键结合的氨基酸的概率是50%。据此:

-两种由“肽键”结合的氨基酸的概率 =1/2
-全由肽键结合的500种氨基酸的概率 $=1/2^{499}=1/10^{150}$
$=10^{150}$分之1的概率

总概率$=1/10^{650} \times 1/10^{150} \times 1/10^{150}=1/10^{950}$
$=10^{950}$分之1的概率

自然界中有反复的机制吗?

最后，我们根据上面所给的一些与基本逻辑相关的、预估可能性的例子，得出很重要的一个结论：上面天文般的概率估算表明，这样的数字不可能偶然出现。而且，这对进化论者是更重要也更混乱的方面。在自然条件下，这些概率一开始甚至根本经不起试验；因为，自然界中没有试图产生蛋白质的反复的机制。

我们通过估算具有500种氨基酸的蛋白形成的可能性，从中看出：只能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理想的、反复试验的环境中才会生效。即，只有当我们假定：有一只我们看不见的手，随意地将500个氨基酸合成后，立刻又发现了错误，然后将它们一个个地分离，第二次按不同的序列排列时，获得有用之蛋白的概率才是10的950次方。每次试验中，氨基酸必须

由500种氨基酸按正确的数量和序列组成一个普通蛋白质，其偶然形成的概率，除了它所包含的左手型并由肽键结合的氨基酸之外的概率:

“1”的后面是10^{950}。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字写下来:

$$10^{950} =$$

100,000,000,000

一个接一个地分离，并按新的序列再次排列；加入第500种氨基酸后，合成应该停止，并且保证甚至没有一个额外的氨基酸介入。然后，停止试验，观察蛋白质是否已经形成；如果失败，一切则应解散，然后为另一个序列做试验。另外，每次试验中，连一种外来物质都不应掺合进来。试验期间，在未得到第500种氨基酸以前，这个链子不应分开和破坏。这些条件意味着，我们上面提到的可能性，只有在受控的环境中才能发生；那里有一种每个阶段指挥整个过程开始、终结的有意识的机制，而剩下的只是凑巧的“氨基酸的选择”。无疑，这样的环境在自然条件下不可能存在。因此，暂且不论蛋白质在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概率”，在逻辑与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谈论这种事件的可能性本身是不科学的。

一些未经指导的进化论者，并没有领会这一点。由于他们假定蛋白质的形成，来自简单的化学反应，所以，就提出诸如“氨基酸经化学反应结合，然后形成蛋白质”这种可笑的推论。但是，在一种无生命的组织中，偶然发生的化学反应，只能产生简单而原始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数量固定而有限。对一些更复杂的化学物质来说，必须要有大型工厂、化工设备和实验室。药物及我们日用的很多化学制品就属于此类。蛋白质的结构比这些化工产品更复杂。因此，我们认为设计奇妙、各个部件恰到好处的蛋白质，不可能来自偶然的化学反应。

我们暂时撇开已提到的所有不可能的事，来做个假设：一个有用的蛋白分子，通过“巧合”仍然自发地逐步形成了。不过对这一点，进化论者再次没有答案；因为，要维持蛋白质的存在，需要与自然装置隔绝，并加以保护的特殊环境；否则，蛋白质不是暴露在自然地球条件下而破裂，就是溶入别的酸、氨基酸或化合物，同时失去自身特性，并变成一种完全不同而无用的物质。

进化论对生命起源的瞎说

“有生物最初怎样形成”的问题，使进化论者陷入如此危险的僵局中，以致他们通常甚至不想触及这个主题。他们试图通过类似于“第一个动物的产生，是水中某些随意事件的结果”的说法，来绕过这个问题。他们因此处在无法逾越的障碍面前。在这一问题上，尽管古生物的进化上有争议，但他们还没有得到可以用来歪曲事实的化石——如他们侈望支持其主张的种种曲解。因此，进化论的起点显然站不住脚。

首先，有一个必须考虑的要点：一旦证明进化过程的任何阶段是不可能的，那就足以证明整个理论完全是虚假而无效的。

例如，已经证明蛋白质不可能偶然形成。于是，与进化论相关的、随后阶段的进化主张也就推翻了。在这个阶段之后，他们又拿出几块人和猿的头颅并大做文章，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生物怎样从无生物产生，是进化论者长期不想提到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不断忽略的问题，最终还是说出来了，并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一系列的实验，企图来解决了。

主要的问题是：第一个活细胞怎样在原始地球的氛围中产生了？换句话问，进化论者对此会做出怎样的解释？

他们试图通过试验寻找问题的答案。为回答这些问题，虽然进化论者及其研究人员展开了实验，但这些举动并没有引起多少兴趣。对生命起源最引人瞩目的研究，是美国研究人员斯坦利·米勒，在1953年所做的“米勒实验”。(由于芝加哥大学米勒之老师哈罗德·尤里的贡献，该实验也称为“尤里-米勒实验”。)

这个实验是进化论者用来证明所谓“分子进化课题”的唯一“证据”；他们把它作为引起生命进化的第一阶段。尽

管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科技高度发达了，但还是没有人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可是，米勒实验依然作为最早生物进化的解释，而编进教科书中加以传授。当进化论者意识到这样的研究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遭到驳斥时，他们就故意回避这样的实验了。

米勒的实验

斯坦利·米勒的目的，是通过实验中的发现，显示形成蛋白质结构单元的氨基酸，可能在几十亿年以前无生命的地球上“偶然”产生了。

米勒在实验中使用了假定存在于原始地球的一种气体混合物（但后来证明这是不合实际的），它是由大气层里的氨水、甲烷、氢和水蒸汽组成的。由于这些气体在自然条件下不能互相反应，他就从外部加入能量来刺激它们反应。米勒假设这些能量可能来自原始空气中的闪电；于是，他用人造电能作为电源。

米勒把这种气体混合物在100℃度的温度下加热了一周，并加入了电流。到一周末时，米勒分析了罐子底部的化学物质，并发现组成蛋白的基本元素、20种氨基酸合成了。

这个实验在进化论者中间引起巨大的骚动，并把它看作一次了不起的成功。此外，处于极度兴奋状态下的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出版物，传播题为“米勒创造了生命”的新闻。但是，米勒设法人工合成的分子，只是几个“无生命”的分子罢了。

在这个实验的鼓舞下，进化论者立即编造新的假想。所以，氨基酸的假设阶段便匆匆出笼了。他们推测，随后偶然按适当顺序结合的氨基酸，可以形成蛋白质；这些偶然形成的蛋白质，自己成为细胞膜结构的物质——“莫名其妙”地出

现并形成一个原始细胞。然后，细胞随时间结合在一起，并形成多细胞的生物。但是，米勒的实验只不过是作假而已，并在许多方面证明是虚构的。

“米勒实验”只是假象

米勒实验企图证明，氨基酸能在原始地球条件下自己形成，但它在很多地方存在着矛盾:

1 米勒实验中，通过使用一个称为“冷陷阱”的机制，氨基酸一旦形成，就把它们与环境隔离。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形成氨基酸的环境将会立即毁掉分子。无疑，在原始地球条件下，这种有意识的隔离机制并不存在。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即使获得任何一种氨基酸，它也会立即被破坏。化学家理查德·比里斯就此反驳说：“的确，如果没有这个冷陷阱，化学制品的生产会遭到电源的破坏。”[110]

可以肯定的是，在早先的实验中，米勒使用同样的物质，在没有冷陷阱机制的实验中，连一个氨基酸都没有得到过。

2 米勒试图在实验中，模拟原始大气环境是不现实的。在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一致同意，在取代甲烷和氨水的人为环境中，应该存在氮和二氧化碳。事实上，经过长期的沉默之后，米勒本人也承认，他在实验过程中使用的大气环境是不合实际的。[111]

那么，米勒为什么坚持强调这些气体呢？答案很简单：如果没有氨水,合成一种氨基酸是不可能的。凯文·米基恩在《发现》（Discovery）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告诉我们:

> “米勒和尤里用一种甲烷和氨水的混合物，模仿地球古老的大气环境。在他们看来，地球是金属、岩石和冰块的混合体。但最新的研究显示：我们可以理解，那时的地球酷热难当，并且是由融化的镍和铁组成的。因此，那时的

大气应该主要由氮(N_2)、二氧化碳(CO_2)和水蒸汽(H_2O)组成。可是，与甲烷和氨水一样，在产生有机分子时，这些元素同样是不适当的。”[112]

美国科学家J.P.费里斯和C.T.陈，在含有二氧化碳、氢、氮和水蒸汽的大气环境下，重复了斯坦利·米勒的实验，结果没能获得哪怕只是一个氨基酸分子。[113]

3　导致米勒实验无效的另一要点是，认为已经形成的所有氨基酸，会被大气中足够多的氧气所破坏。米勒所忽略的这个事实，由氧化铁和铀的遗留物揭示了；它们是在具有35亿纪年的岩石里发现的。[114]

一些别的发现表明，氧的数量在那个阶段比进化者最初声称的高得多。研究也显示，那时的地球所受紫外线辐射的程度，比进化论者估计的要高出一万倍。这种强烈的紫外线辐射，将不可避免地通过分解大气中的水蒸汽和二氧化碳来释放出氧气。

这种情形完全否定了米勒的实验；他在实验中完全忽视了氧。如果在实验中使用了氧，那幺甲烷就会被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氨就会被分解成氮和水。另一方面，在无氧的环境中，也没有臭氧层；因此，氨基酸会很快因暴露于非常强烈的、没有臭氧层保护的紫外线的辐射而被破坏。换句话说，在原始地球上是否有氧，其结果对氨基酸来说，都是一种致命的环境。

4　在米勒实验的末尾，形成了很多对生物结构和功能有害的有机酸。如果氨基酸没有被隔离，并且与这些化学元素一起留在相同的环境中，通过化学反应，它们会不可避免地因受到破坏或转变，而成为不同的化合物。

此外，实验后期形成了大量的R-氨基酸。[115]　这些氨基酸的存在，甚至在进化论自己的逻辑内遭到了反驳，因为，

右手型氨基酸是不能在有生物体内起作用的那种氨基酸。结论是，米勒实验中形成氨基酸的环境，并不适合于生命。的确，这种形成酸性化合物的催化剂，破坏并氧化了已经得到的有用的分子。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米勒实验不能证明，生物在原始地球条件下偶然形成。整个实验只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一种有目的、可控性的氨基酸的合成。为了能够生成氨基酸，在实验中使用的气体数量和类型是理想的安排；向这个系统提供的能量不多也不少，正好使必要的反应能够发生。为了生成或许在原始地球条件下存在的氨基酸，并防止有害、破坏性或别的元素泄漏，所有的实验仪器都被隔离了。原始地球条件下，并不存在供化学反应及改变实验过程的元素、矿物质或化合物。因为氧化反应而防碍氨基酸形成的氧气，只是这些破坏性的元素之一。既是在理想的实验室里，一旦没有“冷陷阱”的存在，已经形成的氨基酸的生存则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随着米勒实验的发生，进化论者自己反驳了进化论；因为，就算实验证明了什么，即氨基酸只能在一种可控的实验室环境中产生，而且其中的所有条件都是有意设置的。就是说，导致生命的力量，不可能是无意识的巧合，而是有意识的创造。

进化论者拒绝这一明显事实的原因是，他们盲目坚持与科学完全对立的偏见。有趣的是，与自己的学生斯坦利·米勒一起组织试验的哈罗德·尤里，就该课题做了以下坦白：

> “我们当中所有研究生命起源的人们发现，我们对此观察得越多，就越发感到，事情太复杂了，复杂得任何地方未曾发生过进化。我们教条地相信：生命在这颗星球上，从死物中进化而来。就因为它如此复杂，我们很难想象出生命的起源会是那样。”[116]

原始地球空气与蛋白质

尽管米勒实验充满矛盾，但进化者仍然试图用它来回答氨基酸形成的根源。他们通过留给人们一种印象，即这一无效的实验早已解决了氨基酸形成的问题，企图弥合进化论的裂缝。

然而，在解释生命起源的第二阶段时，进化论者甚至面临比氨基酸的形成更大的问题，如蛋白质——由数百种不同的氨基酸按一定的序列互相结合并组成的生命单元。

声称蛋白质在自然条件下偶然形成，比声称氨基酸偶然形成更不现实、更不合理。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通过数学中的不可能性，已经看到氨基酸以适当顺序偶然形成蛋白质的概率。现在，我们将检查在原始地球条件下，用化学方法产生蛋白质也是不可能的。

蛋白质不可能在水里合成

正如我们在前面见到的那样，当氨基酸组合成蛋白质时，它互相形成一种叫“肽键”的特殊键。在肽键形成期间，释放出一个水分子。

这个事实明确反驳了进化论者关于原始生命起源于水的解释；因为，根据化学中的“勒夏忒列原理”，释放水的反应（浓缩反应），在一种氢氧化物的环境中不可能发生。这种在氢氧化物环境中的反应，在所有化学反应中被说成“最小可能的反应”。

因此，进化论者声称生命开始，并产生氨基酸的海洋，显然不是氨基酸形成蛋白质的适宜环境。另一方面，进化者改变主意，转而声称生命源自陆地，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氨基酸免于紫外线辐射的唯一环境正是海洋。在陆地上，氨基酸由于紫外线而受到破坏。勒夏忒列原理证明：在海洋中形成生命的

最新进化论资料反驳米勒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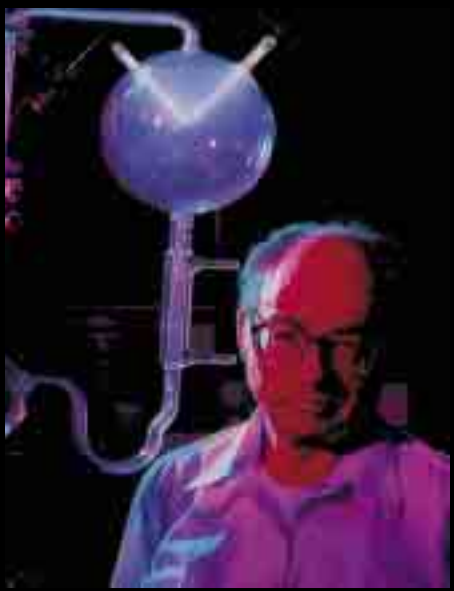
今天，米勒实验已经成为进化论科学家完全忽略的一个课题。1998年2月，在有名的进化论杂志《地球》上，刊登题为“生命的严峻考验”的文章。文中说道:

现在，地质学家认为，原始空气主要由二氧化碳和氮气组成；这些气体的反应性，要比在1953年的实验（米勒实验）中使用的气体更弱。即使米勒假设的空气存在，那么，怎样才能使氨基酸这样简单的分子，通过必要的化学反应，将它们转变成更为复杂的化合物或蛋白质这样的聚合物呢？米勒本人也在这个问题上手足无措：“它是一个问题。”他恼火地叹息道：“你怎样制造聚合物？那并非易事。”[1]

正如我们所见，甚至米勒自己如今也发现，他的实验在解释生命的起源问题上，得不出任何结论。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化论者抱住不放的这个实验，只能表明他们的苦恼和对其维护后的绝望。

1998年3月，《国家地理》杂志上刊登“生命在地球上的出现”一文，针对这个问题写道:

现在，很多科学家怀疑，早期大气不同于米勒当初假设的大气。他们宁愿认为它由二氧化碳和氮组成，而不是氢、甲烷和氨水。这对化学家来说是



个坏消息！当他们试图激活二氧化碳和氮时，却得到了一些毫无价值的有机分子——等于把一滴食用色素溶解在一个装满水的游泳池里。科学家们很难想象，生命会从这样一份稀释的汤里显现。[2]

总之，米勒实验和进化论者的其它尝试，都不能回答生命怎样在地球上形成的问题。这些研究表明，生命不可能偶然形成。因此，确认生命是被创造的。

1,《地球》（Earth），“生命的严峻考验”第34页，1998年2月;

2，《国家地理》，“生命在地球上的出现”第68页，1998年3月。

主张是错误的。这是进化论面临的另一进退维谷的难题。

另一次徒劳的努力：福克斯实验

面对上述进退两难的局面，进化论者开始发明基于“水问题”的、显然驳斥他们自己理论的不合实际的假想。这些研究人员中，最有名的是悉尼·福克斯（Sydney Fox）。为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了后面的理论。他认为，第一个氨基酸在原始海洋中刚刚形成后，一定传送到火山附近的岩石上。岩石上的氨基酸的水的混合物，当温度高于沸点时，一定会蒸发。这样，“干透的”氨基酸就会结合成蛋白质。

可是，很多人不认可这种“复杂的”的方式；因为，氨基酸不能承受如此高温。研究证实，氨基酸会在高温下立刻遭到破坏。

然而，福克斯并不善罢甘休。他在实验室的“非常特殊的条件下”，通过在干燥环境中的加热，组合净化了的氨基酸。氨基酸是结合了，但仍然没有获得蛋白质。实际上，他得到的不过是些简单、无序、彼此任意结合的氨基酸链，而且这些链远远不像任何活蛋白。还有，如果福克斯在固定温度下保住了氨基酸，那么，这些没用的链也将破裂。[117]

使实验失效的另一点是，福克斯没有使用在米勒实验中所获得的氨基酸，而使用了来自生物体内的纯氨基酸。但是，这一旨在继续米勒实验的实验，本来应该从米勒获得的结果开始。然而，福克斯和其它研究人员都没有使用米勒生产的无用的氨基酸。[118]

福克斯实验既便在进化论者中，也没有受到欢迎；因为，他所获得的无用的氨基酸链(类蛋白)，显然不可能在自然条件下形成。而且，他依然不能生产作为生命单元的蛋白质。蛋白质的起源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在20世纪70年代，一



在实验中，福克斯制出了一种叫“类蛋白”的物质，类蛋白是氨基酸随意的拼合。与生物的氨基酸不同，那是无用、无功能的化学物质。这是类蛋白粒子在电子显微镜下的情形。

篇文章刊登在大众科学杂志《化学工程新闻》上，对福克斯的实验描述如下:

“悉尼·福克斯和其它研究人员，设法通过在地球原始阶段，根本不存在的非常特殊的加热技术，把氨基酸连接成‘类蛋白’的形状。同样，它们根本不同于生物中的非常规则的蛋白质。它们只是一些无用、不规则的化学污点。有人解释，即使这样的分子在早期曾经形成过，那它们也一定会被破坏。”[119]

的确，福克斯所获得的“类蛋白”，在结构和功能上，全然不同于真正的蛋白质。蛋白质与这些“类蛋白”之间的差异，就像一件高科技设备与一堆未经加工的钢铁之间的差异一样大。

此外，这些不规则的氨基酸链，甚至没有在原始大气里幸存的机会。强烈的紫外线和变幻的自然条件，引起的破坏性的物理和化学效应，将导致这些类蛋白的瓦解。因为，根据勒夏忒列原理，氨基酸就算在紫外线达不到的水中结合，那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类蛋白质是生命基础的想法，最终失去了科学家们的支持。

不可思议的分子: DNA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分析已经显示，进化论在分子水平

上仍处于绝境；进化论者对氨基酸的形成仍不知所措。另一方面，蛋白质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秘密。

而且，问题还不止于氨基酸和蛋白质，这只是问题的开始。出乎进化论者预料的是，细胞极其复杂的结构，又是他们面临的另一尴尬。因为，细胞不只是呈氨基酸结构的蛋白质的堆积，而是人类从未遇过的最为复杂的系统。

进化论对细胞结构的基础——分子的存在无法作出前后一致的解释的同时，遗传学的发展和核苷酸（DNA和RNA）的发现，又成了进化论的新难题。1953年，科学家詹姆士·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对DNA结构所做的研究，开始了生物学的一个新时代。不久，很多科学家把注意力转移到遗传科学上。今天，经多年的研究后，从很大程度上揭示了DNA的结构。

在我们体内的100万亿个细胞中，其每个细胞核内发现的DNA分子，包括人体完整的“蓝图”。从身体外表到内部器官，关于人的全部特性的信息，都有序地纪录在组成庞大分子的四种特别的基数里。这些基数就是按照其名称的第一个字母表示的A、T、G、C。人们之间所有结构上的不同，取决于这些字母排列顺序的变化。

DNA字母排列的顺序，决定人体结构最细微的资料。除人的身高、眼睛、皮肤颜色外，单一细胞中的DNA，同时包括人的206块骨头、600块肌肉、10，000亿个神经细胞（神经元）、1，000万亿条脑神经元、9,700公里长的血管，以及体内的100万亿个细胞的整个设计。如果把我们的DNA信息编码写在纸上，那我们将组成一个大型图书馆：拥有900卷每卷长达500页的图书馆。但是，这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内的信息，写进细胞核中的DNA分子中时，其容量要比长度只有百分之一毫米的细胞所容纳的小得多。

无生机的物质不能产生生命

进化论的一些实验，如米勒实验和福克斯实验，试图证明他们的主张，即无生机的物质能够自我组建，并产生复杂的生物。这实在是非学术的捏造：每次观察与实验无疑表明，物质没有如此能力。英国有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弗雷得·霍伊尔解释说，一旦没有充分的外部干预，物质不能自我产生：

> 如果存在一种基本的物质原理，莫名其妙地使器官趋于生命，那么，该原理的存在，应在实验室里轻松地得以演示。例如，一个人用游泳池来描述原始汤一样。把你所喜欢的非生物性质的化学品注入池子，以你喜欢的方式抽走气体，上面点燃引起你遐想的发光体。让这个实验进行一年，然后看看：2,000种酶中（活细胞产生的蛋白质），会有多少在池子里出现。我来给出答案：一旦省去实际做试验的时间、麻烦与费用，你将一无所获，除非有可能得到一团组成氨基酸的淤泥或别的简单的有机化学品。[1]

进化论生物学家安德鲁·斯克特承认同样的事实：

> 拿出一些物质，在搅拌、等候的时候加热。那正是现代版的《创世记》。假定重力、电磁及强弱不同的核子等“基础”力量，去完成剩下的一切……。但是，这个优美的童话到底有多么可靠？有希望的思考又有几多？其实，从早先的化学发现，到第一个可辨的细胞，几乎每个重要的步骤，不是论争的话题，就是纯粹的困惑。[2]

1,弗雷得·霍伊尔：“聪明的宇宙”（The Intelligent Universe）第256页，1983年，纽约Holt, Rinehard & Winston;

2,安德鲁·斯克特：“修正创世记”（Update on Genesis），《新科学家》第106卷30页，1985年5月2日。

DNA会偶然出现吗？

对此，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组成基因的核苷的序列，只要出现一个错误，整个基因就完全无用了。据认为，人体内有20万个基因，组成基因的数百万核苷，以正确的序列偶然形成，显然是何等地不可能。进化论生物学家弗兰克·索利斯伯利，说明了这种不可能：

> “一个中等的蛋白质，可能包含大约300种氨基酸，控制它的DNA链上大约有1,000个核苷。由于一个DNA链中有四种核苷，那么，由1000个链接组成的一个DNA中，会存

在4^{1000}种形式。只要运用一点点代数计算，我们就会发现：$4^{1000}=10^{600}$。10乘以600倍，则得出“1”后面跟着600个零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120]

4的1000次方分之一，等于10的600次方分之一。这意味着“1”的后面跟了600个零。因为“1”后面跟12个零表示1万亿；所以，600个零代表一个不可想象的数字。核苷通过偶然的堆积，不可能形成RNA与DNA。法国进化论学家保罗·奥格就此说道：

“在核苷这样复杂的分子，通过化学方式偶然形成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严格区分两个阶段：一个一个地生产核苷——这是有可能的，以及把它们以特殊的顺序结合。第二个阶段绝对不可能。”[121]

既是相信分子进化理论多年的弗朗西斯·克里克，在发现DNA之后自己也承认，这样一个复杂的分子，不可能通过进化本能地偶然形成：

“用现有知识武装起来的、一个诚实的人只能这样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生命出现的时刻几乎是个奇迹。”[122]

土耳其进化论者阿里·得米尔松（Ali Demirsoy）在这个问题上被迫承认：

“实际上，蛋白质和核苷酸(DNA、RNA)形成的可能性，超乎人们的预料。而且，某种蛋白质链子出现的概率，与天文数字一样的小。”[123]

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而进退两难的局面：DNA只能借助蛋白质中的一些酶来复制，但这些酶的合成只能依靠DNA的信息码得以实现。它们相互依存时，要么为了复制必须同时存在，要么其中的一个，在另一个之前被“创造”。美国微生物学家郝玛·雅各布森对此评论道：



生物所有的信息储存在DNA分子中。这一难以置信的有效信息的储存方式，其本身清楚表明：生命绝非来自偶然，而是有意的设计，或更好地说，是奇妙的创造。

“设计的再现，能量及其从现有环境中的提取、生长的顺序、将效应机制译为成长说明，这些指令那时（生命开始时）必须同时出现。这一系列结合，已经不像是偶然的事件，而是常常所描述的上帝的干预。”[124]

上面的引述，是在詹姆士·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揭开DNA结构秘密两年之后写成的。尽管科学在发展，但进化论者依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两位德国科学家俊克和谢勒也解释，每个分子的合成，需要化学方面的进化、截然不同的必要条件；他们认为利用不同的途径，从理论上合成这些物质的可能性为零：

“直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获得化学进化所需要的所有分子的试验。因此，在不同的地方、以非常合适的条件产生各种各样的分子，才是本质所在；然后，把它们带到另一个可以反应的地方，并使之不受水解和光解因素的伤害。”[125]

简而言之，进化论不能证明它所说的、在分子水平上发

生进化的过程。科学的发展不但没能回答这些问题，而且使它们更为复杂和难解了。

非常有趣的是，进化论者竟然相信这些不可能的假想，似乎它们都是科学事实。因为，他们一贯不承认创造的现实。所以，他们除相信不可能外，再没有别的选择。澳大利亚著名的生物学家迈克尔·登顿在他的《进化论：危机中的理论》一书中告诉我们：



沃茨顿和克里克与DNA分子中的一个模型棒。

> “对怀疑宗教的人们而言，高级生物的遗传程序，在大约由10亿位（计算机单位）的信息组成的程序中，这等于按字母顺序存储1,000卷书籍的小型图书馆，包含按编码组成的无数混合运算，以此控制、区分、命令亿万个细胞的生长与发育，使其形成复杂的生物体；把这一切简单地说成完全随意的拼凑，实在是对理性的冒犯。但是，达尔文主义者毫不迟疑地接受进化的观念——承前启后的范例！”[126]

进化论者另一徒劳的挣扎：“RNA世界”

20世纪70年代的发现证实，最初在原始地球大气层存在的气体，不可能促成氨基酸的合成，是对分子进化理论的沉重打击。于是，进化论者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米勒、福克斯、赛里尔·庞南佩鲁马的“原始大气实验”无效了。因此，

在八十年代，进化论者试图寻找新的出路。结果，他们提出了“RNA世界”的假想：假定首先形成的不是蛋白质，而是包含蛋白信息的RNA分子。

1986年，按照哈佛的化学家沃尔特·吉尔伯特推出的这个假想——基于托马斯·赛池发现“核糖酶”（RNA构成酶）的假想，数十亿年前的RNA分子，不知何故，能够自我复制并偶然形成了。然后，这个RNA分子被外部作用激活，进而开始形成蛋白质。此后，就有必要把这一信息储存在第二个分子中，并且不知怎么，DNA分子跑出来做这件事了。

在每个环节上拼凑起来的、不可能的链接，即这个不可信的假想，对生命的起源远远没有做出解释，只是扩大了这一问题，并引出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

1　既然我们不可能接受组成RNA的单个核苷的偶然形成，那么，想象中的核苷，怎么可能通过排列特定顺序，来形成RNA的呢？进化论者约翰·霍根承认，RNA不可能偶然形成：

> 当研究人员继续密切研究“RNA世界”的概念时，会出现更多的问题。RNA最初是怎样出现的？RNA及其成分难以在实验室最好的条件下合成，它在真正的似是而非的条件下更难合成了。[127]

2　即便我们假设它是偶然形成的，那仅仅由核苷链组成的RNA，又如何“决定”自我复制，并根据哪一种机制来实现自我复制呢？又从哪里获得自我复制时所需的核苷呢？连进化论微生物学家杰拉尔德·乔伊斯和莱斯·奥格尔教授，在他们的《RNA世界》一书中，也极力表达了这一情形：

>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讨论集中到稻草人上了：RNA分子自我复制的神话——重新从随意的、多聚核苷酸汤引

发的神话。这个概念不仅不切合目前我们所理解的生命起源以前的化学概念，同时也损伤了RNA通过自我复制而成为分子的乐观派的观点。[128]

3　我们还可以假设，在原始地球有过RNA的自我复制，即大量供RNA使用的每一类氨基酸准备就绪，而这些不可能的事情总算发生时，依然没有形成哪怕一个蛋白质。因为，只有RNA才包含与蛋白结构相关的信息。另一方面，氨基酸也是蛋白质的原材料，可仍旧不存在产生蛋白质的“机制”。认为足够的RNA可以产生蛋白质，与如此得到一辆小车一样的荒唐：把图纸扔到汽车的千百个部件上，让它自我装配、自我生产。如果没有工厂、没有工人、不按图纸规定装配部件，图纸不会自己造出小车。同样，一旦没有别的、听从RNA指令的细胞组件的配合，RNA图纸也不会自己生出蛋白质。

在许多酶的帮助下，蛋白质是在核糖体工厂里生产的，是细胞内发生极其复杂过程的结晶。因此，这种情况也引起另一不合理的假设：核糖体也理应同时偶然形成。甚至进化论最狂热的拥护者、诺贝尔奖获得者雅克·摩诺德解释说，为了仅仅依赖核苷酸信息，而不能低估了蛋白质的合成：

“如果不翻译，密码（DNA和RNA的信息）就毫无意义。现代细胞密码翻译器，至少由50个大分子组成，且在DNA中自我编码：密码不能翻译，而靠产品自己的翻译。这种循环何时、以何种方式才会密切起来？这是极难想象的。”[129]

在原始地球上，RNA链怎能作出决定，并用何种方法来“制造”蛋白产品——自己替代50种专门粒子的功能？进化论者们对此无言以答。

加州圣地亚哥大学的斯坦利·米勒和弗朗西斯·克里克的合作伙伴莱斯利·奥格博士，针对“生命通过RNA世界产

进化论者的自白

概率计算表明，像蛋白质和核酸（RNA和DNA）这样复杂的分子，不可能独立地偶然形成。可是，进化论者必须面对更大的问题：为了生存，这些复杂的分子必须同时共存。这个必备条件把进化理论彻底搅乱了。一些主要的进化论者已承认了这一点。例如，加州圣地亚哥大学的斯坦利·米勒和弗朗西斯·克里克的亲密同事、著名的进化论者莱斯利·奥格尔博士说：

> 结构非常复杂的蛋白质和核酸（RNA与DNA），同时在相同的地方自然形成的可能性极小。而且，如果一个不存在，那另一个也不可能存在。因此，人们也许不得不断定，生命其实决不能以化学方式形成。[1]

其它科学家也承认了同样的事实：

> 如果没有蛋白质或酶的催化作用的帮助，DNA不起任何作用，也形成不了更多的DNA。一句话，没有DNA，蛋白质就不能形成；但没有蛋白质，DNA也不能相成。[2]
>
> 基因密码及其翻译机制（核糖酸雨RNA分子）是如何产生的呢？目前，我们将不得不利用惊奇与敬畏聊以自慰，而不是答案。[3]

《纽约时报》科学记者尼古拉·维得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评论：

> “涉及地球生命的一切都是神秘之事，似乎我们知道得越多，问题就越敏锐。”[4]

1，莱斯利.E.奥根尔，“地球生命的起源”第271卷,1994年10月,第78页；
2，约翰·霍根，“开端”：《科学美国》，第264卷,1991年2月,第119页；
3，道格拉斯.R.霍夫施塔特，“永远的金色编制”（An.Eternal.Golden.Braid）第548页，纽约：Vintage.Books,1980年。
4，尼古拉·维得：“愈暗愈乱的生命起源”，《纽约时报》2000年6月13日。

生”的可能性，使用了“假想”一词。奥格就RNA必须具有何种特征及为何不可能具备如此特征，于1994年10月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题为《地球生命的起源》一文：

> “我们的记载表明，如果生命起源以前的RNA，具有今天并不明显的两种特性，那这种‘假想’可能发生过；

这两种特性是，没有蛋白质帮助的复制智能和催化蛋白质合成的每一阶段的能力。”[130]

现在应该清楚了：从RNA这样的分子中，指望得到这两种复杂而本质性的过程，也只是出于进化论者的想象与观念。另一方面，具体的科学事实清楚地证明，“RNA世界”的理论作为假定生命偶然产生的新模式，是个完全不可信的神话。

得克萨斯大学的生物化学家高登·C·米尔斯，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丁·肯杨评估了“RNA世界”之假想的缺陷，并在他们“对RNA世界的批评”一文中，得出简短结论：“RNA是非凡的分子。‘RNA世界’的假设是另一回事。我们看不出该假设·得以建立的基础，甚至看不到希望。”[131]

科普作家布里格·克莱斯（Brig Klyce）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解释，虽然进化论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固执己见，但直到今天得到的结果显示，这些努力均徒劳无益：

“对‘RNA世界’的研究算是中型行业。研究证明，从地球上曾经有过的无生物中，偶然产生活细胞会是多么困难。那样的实证，是对科学有价值的贡献，附加的研究同样有价值。但是，一味坚持生命从无生物化学产生细胞，却是莫名其妙的。这是中世纪的炼金术士，企图让铅变成金的翻版。”[132]

生命是超越分子堆的一个概念

我们的检查已经表明，生命偶然形成是何等地不可能。我们再次先把这些不可能放到一边。我们来假设，蛋白分子在最不适宜的、最难控制的环境中——如原始地球条件下——真地形成了。仅仅形成一个蛋白质是不够的，这个蛋白质还必

须在这种不可控的环境里，不受破坏地耐心等待数千年、也许百万年，直到另一个蛋白质分子，在同样的条件下偶然地在它旁边形成，直到数百万正确的蛋白质，在相同的地方偶然地并肩形成。那些早些时候形成的蛋白质，为生成旁边的其它蛋白质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候，并在紫外线和猛烈的机械效应下不致破损。然后，这些在完全相同的地点上形成的蛋白质，以适当的数量通过有意义的结合，与细胞器官的形成必须聚到一起。外来物质、有害分子或无用的蛋白质链，也许对它们无妨。那幺，既是这些细胞器非常和谐地结合，并有计划有秩序地合作，它们也必须获得周围必需的酶，并被隔膜覆盖，其内膜中必须充满能提供理想环境的一种特殊的液体。就算这些“非常不可能”的事件真地偶然发生，那幺，这个分子堆能够变活吗？

答案当然是“不”，因为研究已经显示，仅仅结合生命基本的物质，不足以启动生命。即使把生命的所有基本蛋白质聚合，并放进试管里，这些努力也不可能产生一个活细胞。这个问题上的全部实验都没有成功。所有的观察和试验都表明，生命只能起源于生命。生命从非生命的物质进化而来的断言，即“自然产生”，只是进化论者梦中的童话，并与每一次试验与观察结果完全相左。

在这种情况下，地球上的第一个生命，也必须起源于别的生命。这就是真主“Hayy”（生命的主宰）的反映。生命只能依照他的意愿开始、继续和结束。进化论连生命的起源都不能解释，更不能说明生命的基本物质，是怎样汇集到一起的。加的夫大学应用数学家、天文学教授卡尔迪亚，作为毕生相信生命偶然诞生的科学家，面对这样的现实解释道:

“作为一个科学家，回顾早期接受的训练，我被彻底洗脑了：相信科学不可能与任何形式的有意创造兼容。我必须痛苦地摆脱这种观念。眼下，我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论据，去击倒关于信仰上帝的争论。我们曾有过清醒的头脑，而今我们意识到，对生命起源唯一合乎逻辑的答案是：创造——决非偶然的编造。”[133]

热力学否定进化论

热力学第二定律是物理学的基本定律之一，它认为在正常条件下所有的孤立体系都随时间的流逝，趋于混乱、离散和毁坏。所有的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都将耗尽、腐败、朽坏、分解直至毁灭。这是确定的结局。这条规律是万物都将面对并不可避免的。

这是我们都看到的现象。比如说，你把一辆汽车丢弃在沙漠中，几年后，你再次回来时，你绝不会期望它的状况会变得更好。相反，你可能见到的是另一番景象：车胎瘪了、玻璃破了、底盘锈了、引擎不工作了。生命同样躲不开这样的过程。

而热力学第二定律运用这样的公式，精确地描述了这一自然过程。

这个著名的定律也被人们称为“熵定律”。在物理学中，熵是用来衡量一个系统的混乱度的。当一个系统的熵增加的时候，说明它正从一个有秩序、有组织、有计划的状态，走向一个更为混乱、离散和无计划的状态。系统越无序，其熵值也就越大。熵定律认为整个宇宙无可避免地会走向更加无序、无组织、无计划的状态。

热力学第二定律或熵定律，已经在实验和理论上得到了证实。所有著名的科学家都同意，熵定律在未来仍是一个首要的准则。伟大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将它描述成“科学定律之首”。阿瑟·爱丁顿也称之为“整个宇宙最高的演变定律”。[134]

进化论忽视了物理学这一基本的定律。进化论所提出的机制，完全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进化论认为无序、离散、无生命的原子和分子，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按照某种秩序自发地集合起来，形成极为复杂的分子，比如蛋白质、DNA和RNA；接着，结构更为复杂的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种类逐渐地出现

了。照进化论的说法，这个假设的过程——将产生一个更有计划、秩序、复杂、组织的结构——在自然的状态下自己可以形成。第二定律清楚地表明，这个所谓的自然过程，其实违背了物理定律。

进化论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J.H拉士说:

“在进化的复杂过程中，生命显然具有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趋势；尽管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了一个不可违反的熵增和趋于混乱的进程，但生命进化却不断走向更为有序的水平。”[135]

进化论者罗杰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明进化论在热力学上遇到的难题:

“生物学家面临的问题，是进化论明显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将朽坏，表现的秩序会更少，而不是更多。”[136]

主张进化论的乔治，在著名的进化论期刊《科学美国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陈述生命的自发形成，在热力学上不能成立，并且按照一般的自然法则，也无法解释复杂的生命机制是如何发生的:

“.....然后，按照第二定律，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自发地形成复杂的大分子，而可能发生的则往往是分解。事实上，越是复杂的分子，将越发的不稳定，也就更加容易分解。光合作用、生命方面甚至生命本身的过程，从热力学或其它确立的科学观点来看，仍不可理喻；尽管使用了模糊或微妙的言语。”[137]

正如我们所见，不论从科学还是从逻辑角度讲，热力学定律成为进化论假想难以逾越的障碍。既然不能用科学的解释来跨越这个障碍，进化论者就只有依靠想象了。例如，著名进化论者热雷米注意到，自己所相信的进化论，带有一种“魔法般的力量”，是凌驾于物理定律之上的:

“熵定律认为，进化消耗了生命在这个星球上所获得的总能量。我们对进化论的看法完全相反；我们相信进化

在地球上、以某种方式魔术般地创造了更大的总能量和秩序。”[138]

这充分说明，进化论只是一个教条，而非科学理论。

“开放系统”的神话

进化论的一些支持者开始转而争辩：热力学第二定律仅适应“封闭系统”，而“开放系统”不受此定律的约束。

所谓的“开放系统”，是一种热力学系统，其中能量和物质是可以进出的。进化论者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断接受来自太阳的能量流，熵定律不会应用到整个世界，有序、复杂的生命，可以从无序而简单的无生命结构中产生。

然而，这里明显存在着歪曲。一个系统有能量的流入，并不足以使这个系统有序化；要有特殊的机制才能使这些能量发挥作用。例如，汽车需要引擎、转换系统以及相关的机制，来转换汽油中的能量，并用于工作。一旦没有这样的能量转换系统，汽车永远不能发挥汽油中的能量。

这一点对生命而言也是一样。是的，生命可以从太阳中获取能量。然而，太阳能只有通过生命中极为复杂的转换系统，才能转换成化学能，比如，植物的光合作用、人和动物的消化系统。没有这样的能量转换系统，生命就不可能存在；没有这样的转换系统，太阳能就只会是一种燃烧、炙烤或熔化的破坏性能量。

正如我们所见，无论是开放还是封闭系统，没有能量转换机制的热力学系统，对进化论毫无意义。没有人敢断言，如此复杂和有意识的机制，能够在原始地球的环境中存在。事实上，进化论者所面临的问题正像植物中的光合作用，这个用现代科技仍无法复制的复杂的转换机制，是如何自己产生的呢？

仅靠阳光来供给世界能量，并不能为它自己带来秩序。另外，不论温度有多高，氨基酸都不会连结成有序的序列。能量

并不能指导氨基酸形成更加复杂的蛋白质分子，或者使蛋白质成为更加复杂的、有组织结构的细胞器。这个组织在所有阶段的真正根源，是职能的设计：用一个词可以表示——创造。

“物质自我组织”的神话

进化论者明明知道，热力学定律使进化论不可能了；于是，就有人妄图将这二者互相配合，以便让进化论成为一种可能。

为此，他们构想的两个最有名的理论，就是“物质的自我组织论”和与之相关的“耗散结构论”。前者认为简单的分子能够组织起来，形成复杂的生命系统；后者认为有序而复杂的系统，可以产生无序而高熵值的系统。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进化论这方面的文章，就会看到他们已进入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区。为了使进化论适合热力学，进化论者不断地试图证明，开放系统也可以产生某种秩序。他们的问题在于——“有序的”和“有组织的”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139]

我们看看这个例子就清楚了：想象有一个平整的海滩，当一阵狂风猛烈地冲击海滩之后，一垛垛大小不一的沙堆，形成了海浪冲击沙滩的痕迹。

这是一个“有序化”的过程；海滩是个开放的系统，能量（海浪）的到来，就会形成沙滩上简单的、看起来有规则的图案。从热力学的角度看，它的确带来了有序的状态，而这之前没有什么秩序。但我们也必须知道，同样的海浪并不能在沙滩上垒起一座沙堡。如果我们看到一座沙堡，就一定不会怀疑，那是某人建造的；因为它是一个“有组织的”系统。换句话说，它含有明显的设计和信息；其每个部分都由某个有意识的个体按计划完成。

沙堡和沙滩上的痕迹之间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一个有组织的复杂个体，而后者是由不断的简单重复带来的状态。重

复带来的有序形式，就像一个物体（好比流入系统的能量）掉在打字键盘上，写下了几百个“aaaaa.....”。但是，这一串有序重复的“a”并无特殊的含义，也没有任何复杂性。要想写出一串复杂而有序的字符，或有意义的句子、段落、书籍，就必须依靠职能。

当风吹进满是尘埃的房间时，同样的事情也出现了；风吹进来时，物体表面上的灰尘，被风吹到了的另一边。这是比先前更有秩序的状态；然而，尘粒不会自己组织起来，形成某人的肖像。

这说明，复杂而有组织的系统，永远不会自发产生。尽管可以出现一些简单有序的例子，可它们不能超越一定的限度。

但是，进化论者却把这种自然过程中出现的“自我有序化”，当作最重要的进化论证据。他们把这样的事例描绘成“自发组织”的例子。这种概念上的混淆导致的后果是，他们设想生命系统，能自发地随着一些自然反应而发育。

然而，正如我们一开始所指出的，有组织与有序的系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构。有序的系统只包含简单的重复结构，而有组织的系统含有相当复杂、彼此衔接的结构和进程。为了形成这样的结构，就需要意识、知识和计划。

“有组织的系统”必须与“有序的系统”区别开来；两个系统虽然不是“随机的”，可有序的系统是按照简单的算法形成的，因而也就缺乏复杂性；而有组织的系统必须逐一个单元地、按照含有大量外部信息的“布线图纸”来装配完成.....因此，所谓组织就是具备复杂功能，并带来一定信息的系统。

美国科学家布莱德雷和奥尔森在他们的《生命起源的奥秘》一书中解释:

> “.....在每一例子中，分子在液体中的随机运动，都自发地被高度有序的行为所取代。普雷苟贞、艾根及其它人已经提出，类似这样的自我组织，也许是有机化学所固有的，并且能为生命系统所具备的、高度复杂的大分子

的产生提供解释。但是，这样的类比与生命的起源毫无关系；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把有序和复杂区分开来.....。规则或有序不能用来储存生命系统所必需的大量信息。由于需要非周期的、又很特别的结构——而不仅仅是有序的结构；所以，这就成为类比中一个严重的缺陷。能量流入产生的自发有序化和非周期性的含有大量信息的大分子，如DNA和蛋白质，所需工作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140]

事实上，连普雷苟贞本人也承认，他在分子产生水平上的理论，并没有应用于有生命的系统，比如活细胞：

“生物学秩序的问题，包括从分子的活动到细胞大分子序列的转移。这个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141]

那幺，为什幺进化论者仍然相信没有科学基础的“物质的自我组织”这样的假想呢？为什幺那样坚决地拒绝生命系统中清晰可见的意识与计划呢？答案在于：他们把唯物主义作为信条，并相信物质具有创造生命的神秘力量。纽约大学的化学教授、DNA专家罗伯特·沙皮罗，解释了进化论关于“物质自我组织”的信条及其唯物主义的核心根基：

“因此，我们需要弥合进化论另一原理的裂缝：从简单的天然化合物到第一个有效的复制品。这个原理还没有详细的描述或演示，但有人却用诸如‘化学性进化’和‘物质的自我组织’的名称加以预测。该原理的存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赞同，正如亚历山大·奥帕林把它应用于生命的起源一样。”[142]

这清楚地表明，进化论是违背科学的危险教条，而生物的起源只能解释为超自然力量的干预；那种超自然的力量就是真主的造化——它从虚无中创造了整个宇宙。科学已经证实，只要想想热力学第二定律，进化论就是不可能的假想。生命起源的解释只能是创造。

设计与巧合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讲述了生命的偶然形成，是多么的不可能。让我们再次暂时接受这些不可能的事，假设在数百万年以前，形成了具备生命要素的细胞并“成为生命”。进化论在这一点上还是要瓦解；因为即使这个细胞能存活一会儿，但最终会死亡；死后，将一无所留，一切将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是因为，缺乏遗传信息的第一个活细胞不能够繁殖，也不会开始新一代细胞。生命终止于死亡。

遗传系统不只是DNA组成的。下列情况应存在于同一环境中：从DNA中读取信息的酶，在读取这些编码时产生的RNA“信使”——RNA根据这一编码将一种核糖体，通过转移RNA，把氨基酸转移到用于生产的核糖体中，并且极其复杂的酶，完成无数的中间过程。这样的环境只能存在于像细胞这种完全隔离和受控的环境中；其中存在所有基本的原料和能源。

结果，有机物只有在完全发育了的、拥有全部细胞器的细胞中才能自我复制；在细胞能够生存、交换原料，并从周围得到能量的适当环境下，实现自我复制。这表明，地球上的第一个细胞，以无法相信的复杂结构“突然间”形成。

因此，如果一个复杂结构突然间产生，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让我们举例说明问题：把细胞的复杂性，比作一辆高科技的小汽车。(其实，细胞的构成比装备发动机和全部设备的小汽车更为复杂。) 现在，我们来提问：如果你穿行在密林深处，并在树丛中偶然发现一辆最新款式的小汽车，你有何感

想？你会认为森林里的各种因素，在数百万年中突然组合起来，并且生产出这样一辆小汽车吗？小汽车的全部组件由诸如钢铁、铜及橡胶等组成；其原料均来自地球。但这个事实会使你认为，这些材料是“偶然”合成，然后，聚到一起生产了这辆小汽车吗？

无疑，任何理智健全的人都知道，小汽车是厂家有意设计的产品，并且想知道，它在森林中干什么。一种复杂结构，以完整的形式突然出现，这显示它是智力代表的产物。无疑，像细胞这样复杂的系统，显然是高级意志与智能的结晶。换句话说，它作为真主的创造而形成的。

相信偶然事件能产生完美的设计，是超越理智的行为。然而，进化论关于生命起源的每一种解释都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直言不讳的权威、法国科学院前院长、著名动物学家皮埃尔·格莱司（Grass），虽然作为唯物主义者，但他承认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能解释生命，也不能构成符合逻辑的“巧合”；那正是达尔文主义的主心骨。他说：

> “很难相信，恰好的突变，会准许动植物达到自身的需要。然而，达尔文理论甚至要求得更多：单一的动植物需要数千次的运气和适当的机遇方可造出。也就是说，奇迹必须成为普通规律：可能性极小的事件会轻易发生……。没有禁止白日做梦的法规，但科学不可沉迷于其中。”[143]

格拉斯（Grass）就“巧合”的概念对进化论者意味着什么，总结道：

> “……‘巧合’成为无神论掩盖下的一种天意，人们不仅这样命名，而且暗中崇拜它。”[144]

进化论者在逻辑上的失败，是他们推崇巧合理念的结果。《古兰经》把那些崇拜真主以外的生物的人，描述成缺乏理解力的人们：

> **“我确已为火狱而创造了许多精灵和人类，他们有心却不用去思维，他们有眼却不用去观察，他们有耳却不用去**

听闻。这等人好象牲畜一样,甚至比牲畜还要迷误。这等人是疏忽的。”（《古兰经》7：179）

达尔文公式！

除迄今我们触及的全部技术性证据以外，让我们再一次用小孩子都能理解的例子，来检查进化论者的迷信，究竟属于哪一类:

进化论认定生命偶然形成。根据这个主张，无生命、无意识的原子聚到一起形成了细胞，随后，原子又形成了其它包括人在内的生物。让我们细想那样的主张。当我们汇集组成生命单元的碳、磷、氮和钾等元素时，只是元素的堆积而已。不管怎样处置这个原子堆，它不会形成哪怕一个生物。如果你愿意，我们就此做个“实验”，并分析进化论者维护的主张，实际上只是没有声张的“达尔文公式”：

让进化论者在大桶里放置大量组成生物体的磷、氮、碳、氧、铁和镁等元素。此外，在桶里也加入正常状态下不存在、但他们认为必需的任何材料；让他们在这一混合物中尽可能多的加入氨基酸（在自然状态下氨基酸不可能形成）和蛋白质——其形成的可能性是10的950次方分之一；让他们按喜欢的方式加热、加湿该混合物，并用任何技术先进的设备来搅拌之；再让最著名的科学家站在桶的旁边；让这些专家在桶旁等候十亿、甚至万亿年，自由地利用他们相信人类形成时所必需的各种条件。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过自己细胞的一位教授说：无论他们怎样做，也无法从这些桶里生产出一个人来。他们不能生产任何类似于长颈鹿、狮子、蜜蜂、金丝雀、马、海豚、玫瑰、兰花、百合、荷兰石竹、香蕉、橙、苹果、椰枣、西红柿、西瓜、无花果、橄榄、葡萄、桃子、孔雀、野鸡、多色蝴蝶等数百万种其它的生物。的确，他们从这些物质中，甚至得不到一个单一的细胞。

一句话，无意识的原子不可能通过集合而形成细胞，也不

可能作出新的决定并将该细胞一分为二；然后，做出另一个决定：创造出先是发明电子显微镜、接着从那里观察自己细胞构造的教授们。物质是无意识、无生命的堆积；只有真主超凡的创造才使生命成为现实。

进化论与之恰恰相反，它是与理智完全相反的大谬论。像上述例子一样，只要稍微想一下进化论的主张，就清楚地露出这个现实。

眼睛与耳朵的技术构造

进化论仍然不能答复的另一个问题，是眼睛和耳朵极好的感觉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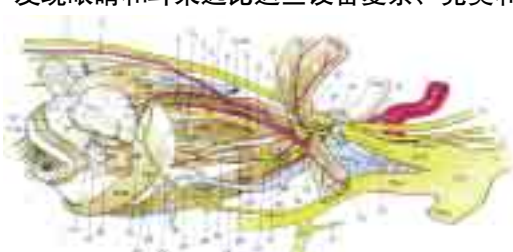
在谈论眼睛之前，让我们简要地回答“我们怎样看见”的问题。来自物体的光线倒着进入眼睛的视网膜上。这些光线由细胞转换成电子信号，到达脑后部之视觉中心的一个极小的点上。这些电子信号，经过一系列的过程之后，脑子里的视觉中心将之变为图像。根据这个技术背景，让我们作些思考。

大脑与光线隔离。这说明大脑里面一片漆黑，且光线到不





当我们把眼睛和耳朵与照相机、录音机相比时，
发现眼睛和耳朵远比这些设备复杂、完美和多功能。





了大脑所在的位置。在称为视觉中心的地方，也是光线从未进入的黑暗之地，这甚至是你所知道的最黑暗的地方。然而，你从黑暗中却观看一个光明灿烂的世界。

眼睛里形成的清晰图像，是二十世纪的技术不可能得到的。例如，看看你所读的书，看看拿书的手，然后抬头看看周围。你曾在别处见过如此清晰亮丽的图像吗？世界一流的电视生产商制造的最先进的屏幕，也不能向你提供如此图像。这是立体、彩色而清晰的图像。100多年来，数以千计的工程师们，试图获得这样的清晰度。为此，他们建立了工厂和车间，作了大量的研究、计划与设计。那么，再看看电视屏幕和你手中的书，

你将发现它们之间的清晰度和品质有着很大的差异。况且，电视屏幕给你的是二维图像，而你用眼睛看到的，是有纵深感的立体图像。当你仔细看电视时，就会发现电视里有模糊感，那你的视觉中有这样的现象吗？当然没有。

多年来，成千上万的工程师，试图造出达到眼睛视觉品质的立体电视机。是的，他们已造出了立体电视机，但不戴立体眼镜就不可能看到立体效果；而且，它只是人造立体图像，背景更为模糊，前景像纸上的布景。所以，绝不可能造出与眼睛一样亮丽、清晰的视觉效果。照相机和电视机都有图像失真的弱点。

进化论者声称，产生这种亮丽与清晰图像的机制是偶然形成的。现在，如果有人告诉你，你房间里的电视机是偶然形成的，其全部原子偶然集合，并组成产生图像的这个设备，你会想到什么？原子怎能做到数千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呢？

近一个世纪以来，数以万计的工程师，一直使用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在高科技的实验室和大工业联合体中努力着，他们也顶多能达到这个程度。

如果一个设备生产出比不可能偶然形成的眼睛更原始的图像，那么，眼睛和眼睛看到的图像就不会偶然形成。这需要

比电视机更详细更精明的设计和构思。这样亮丽而清晰影像的设计和构思，属于对一切拥有支配权的真主。

耳朵的情况与此相同。外耳通过耳廓收集声音，并且将其传输到中耳；中耳通过加强振动传输声波；内耳把声波翻译成电子信号，再传输给大脑。正如眼睛一样，听的动作最后在大脑的听觉中心实现。

眼睛的情形与耳朵的情形一样。即，正如光线不能射入头脑一样，声音也不能进入头脑：任何声音都进不来。因此，不论外面如何嘈杂，大脑内部却悄然无声。虽然如此，大脑能感知最刺耳的声音；用你与声音隔绝的大脑，去听管弦乐队的交响乐以及嘈杂环境的噪音。但是，如果此时用精确的仪器，来测量你大脑中的音量，里面则是一个完全寂静的世界。

让我们再次用大脑的品质与技术，来比较人类的技术。与我们前面的比喻一样，人们付出几十年的努力，试图模拟并复制原声。努力的结果只是录音机、高保真音响和识别声音的系统。尽管动用了所有的技术、数千位工程师和专家，也最终没能获得耳朵听到的清晰而美妙的声音。我们想想音乐产业中，最大的公司所生产的高保真系统Hi-Fi；即使在这样的设备中，录音过程中会损失部分音质，或者当你打开高保真音响时，音乐开始前，总有一些嘶嘶声。

但是，出自人体技术的声音产品，却极为清晰而完美。人耳从不接收像音响设备一样的嘶嘶声或静电噪声，它接收的完全是清晰、保真的原声。这是自真主创造人类以来，一直采用的方式。

简要地说，我们体内的技术，比人类通过积累信息、经验和机遇而产生的技术远远先进。没有人会说音响或照像机是偶然形成的。那么，把人体内形成的技术，怎能说成是一系列“进化”的偶然结果呢？

显然，眼睛、耳朵和人的其它所有器官，都是超凡创造的产物。这显示了真主独特的迹象、无可匹敌的创造和永恒的知识与力量。

我们特别提到视觉和听觉的原因是，进化论者无法理解如此清楚的创造证据。如果有一天，你请某个进化论者向你解释，耳朵和眼睛这种卓越的设计与技术，怎么有可能是偶然的结果，那你会发现他不能给你任何符合理性与逻辑的回答。既是达尔文本人也答复不了这些问题；他在1860年4月3日写给阿萨·格雷的信中说“一想到眼睛就使我不寒而栗”。他承认进化论者在生物卓越的设计面前，处于绝望的境地。[145]

进化论：世上最有效的符咒

本书全面说明进化论缺乏科学依据；同时说明，与进化论相反，许多学科向世人证明了进化论的彻底破产，如古生物学、微生物学及解剖学等。书中强调，进化论与科学发现、理性和逻辑相矛盾。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任何不怀偏见、不受某种意识形态影响、仅仅依靠理性和逻辑的人们，都将清楚地懂得：相信进化论是极不可能的，它是给人类社会带来没有科学知识或文明依据的迷信思想。

像上面解释的那样，信仰进化论的人们认为，把一些原子和分子扔进大缸里，就能产生会思考、有理性的教授、大学生及诸如爱因斯坦和伽利略那样的科学家或其它艺术家，还会产生羚羊、柠檬树及康乃馨。况且，相信这些胡说的人，还是受过教育的科学家和教授们。这正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才把进化论说成“世上最有效的符咒”。以前还没有别的信仰或观念，如此剥夺过人类理智的力量，不让他们理智、逻辑地思考问题，并把来自人类自身的真理隐藏了。这比埃及人崇拜太阳神、非洲部分地区的图腾崇拜、萨巴人的太阳崇拜、先知伊布拉欣的部族对亲手制造的偶像的崇拜、先知穆萨的族人对“金牛”的崇拜，更为糟糕更加不可思议。

事实上，这是真主在古兰中指出的缺乏理性的行为。真主在许多经文中启示：一些人的心智将被关闭，并丧失看到真

理的力量。其中的经文是:

“不信道者，你对他们加以警告与否，这在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毕竟不知道。真主已封闭他们的心和耳，他们的眼上有翳膜；他们将受重大的刑罚。”（《古兰经》2：6-7）

“……他们有心却不用去思维，他们有眼却不用去观察，他们有耳却不用去听闻。这等人好象牲畜一样，甚至比牲畜还要迷误。这等人是疏忽的。”（《古兰经》7：179）

“假若我为他们开辟一道天门，而他们从那道天门继续登天，他们必定说：‘我们的眼睛受蒙蔽了，不然，我们是中了魔术的民众’。”（《古兰经》15：14-15）

用言语不能表达这是多么震惊的事情：150多年来，进化论的符咒连续奴役了如此广泛的群体，并使人们远离了真理。一些人相信这一不可能的假想和充满愚弄与矛盾的主张，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世界各地的人们一旦相信：没有意识、没有生命的原子突然集合起来，并形成神奇的宇宙，那么，对此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魔术”。宇宙的运行需要完美的组织、规律、理智和意识，地球的所有特性，均绝妙地符合充满无数复杂体系的生命和生物的需要。

其实，真主在古兰中启示了先知穆萨与支持无神论哲学的法老的民众之间的史实：他们实际上受了魔术的影响。当法老被告知真正的宗教信仰时，他让先知穆萨与他比试魔术。先知穆萨这样做时，法老先让他们演示他们的魔术。《古兰》启示道:

“他说：‘你们先抛吧！’当他们抛下去时，[变出的大蛇]眩惑了众人的眼睛，而且使人们恐怖。他们施展了大魔术。”（《古兰经》7：116）

如我们所见，除先知穆萨和相信他的人以外，法老的魔术欺骗了其它所有的人。可是，先知穆萨拿出的证据摧垮了那个符咒，“法老等当场败北”：

“我启示穆萨说：‘抛出你的手杖吧。’于是，那条手杖

立刻消灭了他们所幻化的[大蛇]。于是，真理昭著，而他们所演的魔术变成无用的。法老等当场败北，一变而为屈辱者。”（《古兰经》7：117-119）

我们从本节经文中看出，那些首先将这个符咒传给别人的人，他们所作的事只是幻境；他们已失去了所有的信任感，进而忘乎所以了。今天也一样，那些受类似符咒影响的人，打着科学旗号相信荒谬主张的人，并终生维护它们的人，当真理出现、符咒破裂时，他们也会蒙受羞耻。实际上，无神论哲学家、进化论的支持者马尔克木·马格利季（Malcom Muggeridge）承认，他所担忧的正是这些：

“我个人确信，进化论尤其是应用它的范围，将是未来史书中的大笑话之一。后辈们将大为惊奇：如此肤浅而可疑的假设，却能够得到难以置信的轻信。”[146]

未来并不遥远。相反，人们不久会看到“偶然”不是神灵，并将回顾世上最恶劣的骗局、最可怕的符咒进化论。在全世界范围内，那个符咒已开始快速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很多识破进化论真实嘴脸的人，正惊讶地想知道：他们是怎样被它所迷惑的？

进化论的主张与事实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依据化石记录和分子生物学所提供的证据，分析了进化论的无效性。在本章中，我们将阐述进化论者作为理论根据的一些生物学现象和概念。这些话题尤为重要，因为它们显示：并没有支持进化论的任何科学发现，而且把进化论者的曲解与蒙蔽公布于众。

变异与物种

“变异”是遗传学的专有名词，涉及遗传方面的事件；它引起某一物种的个体或群体具有互不相同的特征。例如，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基本上拥有相同的遗传信息，但有些人则有所不同，如斜眼、红发、长鼻，或者有人体形矮小。这取决于遗传信息潜在的变异。

进化论者把一个物种内部的变异，当作其理论的依据。然而，变异并不构成进化论的依据；因为，变异只是已经存在的遗传信息，不同结合的结果，它们没有给遗传信息添加任何新的特性。可是，对进化论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崭新的信息如何造出崭新的物种。

变异总在遗传信息的限度内发生。遗传学把这个限度称为“基因池”。一个物种在基因库中的所有特性，由于变异而出现各种各样的方式。例如，作为变异的结果，在某些爬行动物中，相对地出现较长的尾巴或较短的腿子；因为长腿和短腿的信息，在这些动物的基因库中同时存在。但是，变异不会通过给爬行动物增加翅膀或羽毛，或者改变其新陈代谢的方式，使它们转变成鸟类。这样的变化，需要增加生物的遗传信息；这种情形在变异中绝不可能存在。

达尔文在阐述他的理论时，并未意识到这个事实。他认为变异毫无限度。1844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大多数作者都假定，自然界的变异的确存在限度，虽然我无法揭示作为这个信念基础的哪怕一个事实。”[147]在《物种起源》一书中，他把不同的变异例子，作为其理论的最大证据。例如，根据达尔文的观点，为了获得新品种的高产奶牛，动物饲养者让奶牛与不同的种牛交配，最终把牛转变成另一不同的生物。《物种起源》一书中的几句话，最能说明达尔文“无限变异”的观念：

> “我能够看得出，熊类通过自然选择，获得更多适应于水中生存的习性，形成愈来愈大的嘴巴，直到成为鲸鱼那样大的动物。”[148]

达尔文引用如此牵强的例子，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科学原始的理解程度。那以后，20世纪的科学，基于生物实验而提出了“遗传稳定性”(遗传的动态平衡)的原理。该原理认为，通过配种试图产生新的变异，并不是决定性的手段，而不同生物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屏障。这意味着动物饲养员，绝不可能通过不同动物之间的交配，把牛转变成像达尔文假定的另一不同的物种。

驳斥进化论的诺曼·麦克佩斯在他的《重审达尔文》一书中写到：

> “问题的核心在于，生物是否确实毫无限度地改变形态.....。物种是稳定的。我们已听到了饲养员们的失望；他们没能推进将动植物回归到它们起点的工作。尽管经过两三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但他们从来没有生产出兰玫瑰或黑郁金香。”[149]

卢瑟·波班克是最有名的动物饲养专家，他针对这方面的事实说：“可能的发育存在着限度，并且这些限度遵循规律。”[150] 丹麦科学家W.L.约翰逊就此评论说：

> “达尔文和华莱士强调的变异，不可能有选择地推到





熊是从鲸鱼进化来的吗?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声称，鲸鱼从试图游泳的熊进化而来！达尔文错误地假定：在某一物种内，变异的可能性毫无限制。20世纪的科学已经表明，进化论纯粹是想象出来的假想。

某一点上，即这样的可变性并不包括模糊起点中的秘密。”151

抗生素的抵抗力和DDT的免疫性不是进化论的证据

进化论者当作证据，努力拿出来的一个生物概念，是细菌对抗生素的抵抗力。几乎所有的进化论资料显示，他们把这种抗生素的抵抗性作为“生物通过有利突变而发育的例子”。类似的主张同样，应用于昆虫杀虫剂的免疫性机制，如DDT（二氯二苯三氯乙）。

然而，进化论者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错了。

抗生素是从微生物中产生的、抗击其它微生物的“分子杀手”。最早的抗生素是青霉素（盘尼西林），由亚历山大·弗雷明（fleming）于1928发现。弗雷明认识到，霉菌中产生可以杀灭葡萄状球菌的分子，而这一发现是医学界的一个转折点。抗生素来自抗细菌的微生物，其结果是成功的。

不久，发现了一些新东西。细菌随时间的过去，形成了对

抗生素的抵抗力。该机制是这样运作的：大量的细菌造成抗生素的死亡，而另一些不受抗生素影响的细菌，快速繁殖并组成了整个细菌队伍。这样，所有的细菌对抗生素产生抵抗。

进化论者试图把这种现象看成“细菌适应环境的进化”。

但是，真理远远不同于这种肤浅的解释。在这方面做过详细研究的以色列生物物理学家、因1997年出版《并非偶然》一书而闻名的李·斯普特纳（Lee Spetner），主张细菌的抵抗性来自两种不同的机制，但没有一种会成为进化论的证据。这两种机制是：

1 转变抵抗力的基因已经在细菌中存在；
2 细菌形成对抗生素的抵抗，是由于突变而失去其基因数据的结果。

斯普特纳教授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了第一种机制：

“一些微生物具有抵抗这些抗生素的基因。这种抵抗以退化抗生素分子或将之逐出细胞的形式实现……。具备这些基因的机制，会把它们转移给其它细菌，使之也产生抵抗力。虽然抵抗机制对某种抗生素有效，但大多数病原体细菌，已成功地积累几组基因，由它们对不同的抗生素产生抵抗力。”[152]

于是，斯普特纳进一步说，这不是“进化的证据”：

“以这样的方式，产生对抗生素的抵抗力……不是用来说明进化论突变之说的原型。可能注解该理论的遗传性变化，不必只是给细菌的基因组增加信息，而必须给biocosm增加新信息。基因水平式的转变，仅仅分散一些生物中已存在的基因。”[153]

所以，我们在此不能谈论进化论，因为没有产生新的遗传信息：已存在的遗传信息只在细菌间转化。

由突变产生的第二种机制，也不是进化的例子。斯普特那写道：

> “……有时候，微生物通过单一核苷的取代作用，获得对抗生素的抵抗力……。链霉素由赛里曼·沃克茨曼（Selman Waksman）和阿尔伯特·斯凯茨（Albert Schatz）发现，并于1944年首次报告；它是细菌用这种方式获得抵抗力的一种抗生素。可是，尽管他们经历的突变，对链霉素面前的微生物有益，可它不能当作新达尔文理论(NDT)的那种突变所需要的原型。抵抗链霉素的那种突变，在核糖体中是明显的，并使对抗抗生素分子的分子退化。这种在微生物核糖体表面上的变化，妨碍链霉素分子的抗生素作用。这一退化是链霉素作用的损失，因此，也是信息的损失。关键在于，不论有多少抵抗力，进化不可能从这种突变中获得。进化不能建立在仅仅积累使原有特性退化的突变上。”[154]

概括而言，与细菌核糖体接触的突变，使细菌抵抗链霉素。其原因是突变“分解”了核糖体。也就是说，细菌中没有增加新的遗传信息。相反，核糖体的结构被分解了，即细菌“残废”了。（还有，研究发现，变异细菌的核糖体的作用，不如正常细菌的作用。）由于这种“无能”妨碍使之附着于核糖体的抗生素上，所以“抗生素抵抗力”发育出来了。

最后，并没有出现“发育遗传信息”突变的例子。

同样，昆虫对DDT及类似杀虫剂的免药力也确有其事。大多数例子说明，已经存在的免疫基因都被利用了。进化论生物学家弗兰西斯克·阿亚拉承认这个事实：“遗传的量变对大多数杀虫剂有抵抗力；这在现有的每一种人造混合物中明显地暴露了。”[155] 突变解释的其它例子，就像上面提到的核糖体的突变，是导致昆虫“遗传信息不足”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不能声称，细菌和昆虫的免疫机制，是构成进化理论的证据。那是因为，进化论主张生物通过突变而发育。但是，斯普特纳解释说，抗生素的抵抗力和别的生物现象，都没有显示过如此突变的例子:

“从未有人观察到需要种外进化（大进化）的突变。表现新达尔文理论需要的那种随意的突变，就在分子阶段一无所获地完蛋了。我的问题是：用来支撑这种理论的突变，还需要支持吗？回答只能是‘不！’”[156]

退化器官的谬论

很久以来，“退化器官”的概念作为进化的“证据”频繁出现在进化论文献中。当证明该概念无效后，它终于悄然搁置起来了。但是，一些进化论者仍然相信它，并且有人不时努力把它作为进化论重要的证据。

“退化器官”的观念，最早在一个世纪以前提出。像进化论宣称的那样，某些生物的体内存在一些非功能性的器官，是从祖先那里继承的、不被使用而逐渐退化了的器官。这个假定很不科学，缺乏必要的知识。这些“非功能性器官”，实际上是“功能还没有被发现”的器官。

最能说明这种提法的，是进化论者所列举的长长的“退化器官表”。进化论者S.R.斯卡丁（Scadding）在《进化理论》（Evolutionary Theory）杂志发表“退化器官能构成进化论的证据吗？”一文，谈到了这个事实：

“既然不可能含糊地鉴别无用的器官，用来争论的器官没有科学依据，那我断定：‘退化器官’给进化论提不出任何特别的证据。”[157]

德国解剖学家威德希姆（R.Wiedersheim）1895年列出的退化器官清单，包括阑尾、尾骨等大约100个的器官。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威德希姆列表中的所有器官，其实在人体内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被当成“退化器官”的阑尾，实际上是与人体内的感染作斗争的淋巴器官。1997年，这个事实清楚了：“身体的其它器官与组织：胸腺、肝、脾脏、阑尾、骨髓，以及一些小的淋巴组织，如喉内的扁桃体和小肠中的皮尔补丁（Peyer's patch）等，也是淋巴系统的部分。它

们同样帮助身体与病菌作战。”[158]

列入“退化器官”中的扁桃腺，在保护喉咙抗感染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在人的青春期；位于脊椎骨末端的尾骨，起着支撑盆骨和收缩肌肉的作用；因此，没有尾骨就不可能坐得舒服。在随后的几年中，人们认识到，胸腺借助T细胞激活人体内的免疫系统；松果腺负责一些重要激素的分泌；甲状腺作用于婴儿和孩子的稳定成长；脑垂体控制许多激素腺的正确运作。而所有这些器官曾被当作“退化器官”。后来，达尔文看成“退化器官”的眼睛中的泪器，实际上负责清洁和润滑眼球。



很久以来，这个出现在进化学理论文献中的，但在被证明无效后悄然搁在一边的主张之一是 "退化器官" 概念。被达尔文定义为 "退化器官" 的眼睛的半月褶层，实际上是负责清洁和润滑眼睛。

进化论者关于退化器官的断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错误。正如我们刚才解释的那样，进化论者声称生物的退化器官，是从它们的祖先那里继承的。然而，一些所谓“退化了的”器官，并没有在称为人类祖先的生物中发现过！例如，阑尾在被认为是“人类祖先”的猿类中并不存在。挑战“退化器官”理论的著名生物学家H.伊诺克，论述了这个逻辑错误：

> “猿拥有阑尾；由于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较为低级的猿却没有阑尾；袋鼠也有阑尾。进化论怎能解释这些现象呢？”[159]

进化论者匆匆提出的退化器官的假想，存在许多逻辑缺陷，并犯了科学上的错误。人体根本不存在所谓从祖先那里继承的任何退化器官；因为，人类并非从其它生物偶然地进化而来，而是以现有、完整、俊美形式的创造。

“异体同形”的神话

在生物学中，把不同物种之间结构上的相像叫作“异体同形”。进化论者试图将那些相像作为进化论的证据。

达尔文认为器官(同族体)相像的动物，互相有进化的关系，而这些器官一定是从一个共同祖先那里继承的。按照他们的假定，鸽子和鹰都有翅膀，这样，它们和全部有翅膀的其它鸟类，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的。

异体同形是毫无依据的骗人的论点，它只是凭外观形体上的相像而提出的假设。自达尔文时代起，至今没有任何具体的发现，来证实这个论点。任何地方也没有发现这一想象中的“异体同形”之共同祖先的化石。而且，下列论点清楚表明，同族体并没有提供发生进化的证据:

1 人们发现同族体的器官属于不同的动物物种，进化论者在它们当中，没能建立任何一种进化关系;

2 某些具有同族体器官之生物的遗传密码，完全互不相同;

3 不同生物同族体器官的胚胎发育阶段完全不同。

现在我们对这些要点逐一加以分析。

完全不同生物的相像器官

在进化论者无法建立任何进化关系的不同物种间，共享不少相似的（同源性）器官。翅膀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除了鸟类，作为哺乳动物的蝙蝠也有翅膀，并且昆虫甚至一些灭绝的恐龙也有翅膀。进化论者无法在这四种不同种类的动物中，建立任何进化关系或亲缘关系。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不同生物的眼睛惊人的相似和结构上的类似。例如，章鱼和人是两种无法建立任何进化关系的不同生物，而两者的眼睛在结构与功能上却极为相似。就算他们的眼睛很相似，进化论者也不能声称人和章鱼具有共同祖先。这些以及许多别的例子证实，进化论者所谓“同源性器官

证明生物从一个共同祖先进化而来”的主张并无科学依据。

实际上，同源性器官使进化论者相当尴尬。著名进化论者弗兰克·索利斯伯里（Frank Salisbury）在谈到不同物种具有非常相似的眼睛时说:

> “像眼睛一样复杂的器官，在其它群体中出现过，如鱿鱼、脊椎动物和节肢动物。把这些生物的起源解释上一次，事情就够糟糕的了；但根据现代合成理论（新达尔文学）的观点，把它们想上几次，则使我一头雾水。”[160]

尽管许多生物的形体极为相似，但这并不支持它们之间有进化关系的主张。两种大型哺乳动物，如胎生动物和有袋动物就是例子。进化论者承认，这两种哺乳动物一开始就彼此分开，并完全独立地发育。然而，在这两类生物中，形体非常相似的大量动物，据说已彻底灭绝了。美国生物学家丁·肯扬和泼斯沃尔·戴维斯（Dean Kenyon and Percival Davis）评论道:

> “根据达尔文理论，狼、猫、松鼠、地猪、食蚁动物、鼹鼠和老鼠需要进化两次：第一次进化成胎生动物，第二次完全独立地进化成有袋动物。这等于随意、不受指导的突变和自然选择的惊人主张：在广为分散的生物体中，偶然地找到同样的特征。”[161]

像这些极其接近和类似的器官显示，从共同祖先进化的理论并没有证据；进化论生物学家不能把“同源体”作为其理论的例子。

异体同形在遗传与胚胎学上的僵局

为了认真对待进化论者“异体同形”的主张，不同生物的类似（同源性）器官，应该用类似的DNA密码编码。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在多数情况下，遗传密码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不同生物在DNA中相似的遗传密码，常常与不同的器官相联。

澳大利亚生物化学教授迈克尔·登顿在其《进化论：危

机中的理论》（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一书中，描述了进化论者对异体同形，在遗传学上的解释所面临的尴尬:“异体同形结构常常列入非同源体遗传系统中，而同源体的概念很少扩大到胚胎学的范围中。”[162]

这方面的著名例子，是几乎在进化论所有教科书中引用的四足动物的“五位数骨骼结构”。四足动物即生活在陆地上的脊椎动物，在前后爪子上的指关节都是五位数。尽管它们并不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但由于它们的骨头而被认为长有五指。青蛙、蜥蜴、松鼠或猴子的前后爪也是那样。鸟类和蝙蝠的骨骼也有这种基本的结构。

进化论者关于所有生物来自一个共同祖先的主张，其长期引用的证据就是“五指”。这一主张是20世纪的生物学，把它作为进化论有力证据的基本源泉。但20世纪80年代的遗传学发现，驳倒了进化论的这一主张。人们认识到，不同生物的“五指”，是由不同的基因控制的。进化论生物学家威廉姆·菲克斯，用这样的方式描述了这一理论的破灭:

> “进化论老式的教科书，大量利用了同源体进化的概念，即不同动物间肢体骨骼上的明显类似。这样，人身上的‘五指’型肢体、鸟的翅膀、鲸的鳍状肢，都预示着它们共同的起源。如果这些形式多样的结构，是由同样的基因、由突变时而不同，并以自然选择的形式遗传的，那么，该理论就有意义了。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人们现在知道，同源体器官完全是在不同生物中的基因产生的。从同一祖先传承类似基因的同源体概念已经破产了.....”[163]

还有一点，为了慎重地看待进化论的同源性，在相似结构的胚胎发育阶段，即在卵阶段或母体子宫内的发育时期，需要类似的发育；虽然在现实中，每一种生物在类似的胚胎阶段彼此很不一样。

结论：我们可以说，遗传与胚胎方面的研究已证明，达尔文作为“生物从同一祖先进化的证据”的同源性概念，绝对

不是证据。科学在这方面，一再证明了达尔文论题的错误。

分子同源性主张的无效性

进化论者把同源体作为进化的证据，不仅在形态学上无效，而且在分子上也是无效的。进化论者说，不同生物的DNA密码或蛋白质结构是相似的，而这种相似是这些生物来自共同祖先或彼此进化的证据。

但真相在于，分子比较的结果对进化论根本无用。在看上去很相似的生物中，它们的分子有巨大的差异。例如，对呼吸至关重要的细胞色素C，在同类生物中具有难以置信的差异。根据这方面的研究结果，两种不同爬虫间的差异，要比鸟跟鱼或鱼跟哺乳动物的大。[164] 另一研究显示，同一鸟类分子间的差异，比这类鸟与哺乳动物的还要大。人们还发现，看上去相似的细菌，在分子中的差异，要比哺乳动物、两栖动物或昆虫的大。在血色素、肌球素、激素和基因中也作了这样的比较。[165]

考虑到类似发现，迈克尔·邓肯评论道:

> “在分子水平上的每一生物种类是独特、孤立的，并且与任何媒介没有关联。因此，像化石一样，分子没有给长期寻找难懂的中间形式的进化论生物学家以证据.....。在分子水平上，任何生物体没有可以比作‘祖先’、‘原始’或‘高级’的亲缘关系.....。无疑，如果这些分子证据在一个世纪以前存在的话.....器官进化的观念也许根本不会存在。”[166]

20世纪90年代，对生物基因密码的研究，加剧了进化论这方面进退维谷的尴尬。在实验中，取代早些时候局限于对蛋白质序列的比较，而用“核糖体RNA”（rRNA）序列来比较了。从这些发现中，进化论科学家竖起了一棵“进化树”。然而，这个结果使进化论者感到失望。根据法国生物学家赫维·菲利普和帕垂克·福特拉（Hervé Philippe and Patrick

Forterre）1999年写的文章，“随着越来越多的序列比较，大多数蛋白pyhlogenies彼此抵触，rRNA树也一样。”[167]

除rRNA的比较外，生物基因中的DNA也得以比较。但是，结果与进化论者所预料的“生命树”恰恰相反。1999年，分子生物学家詹姆士·莱克、拉维·杰因、马莱亚·李沃拉在一篇文章中详细描述:

> “科学家对不同生物体的各种基因的分析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与进化论的生命树相冲突——仅仅源自对rRNA的分析。”[168]

组成蛋白质的比较和组成rRNA或基因的比较，都不是证实进化理论的前提。伊利诺斯大学有名的生物学家卡尔·沃塞承认，在分子发现的面前，生物的“发展史”概念失去了意义:

> “从众多已产生的个体蛋白的发育中，没有出现生物体兼容的发育历史。动植物的不适应性，在普通树上随处可见，从根部到主干，以及组成自身初级分组的各种（基）当中。”[169]

分子比较的结果，不是对进化论的赞同而是反对。1999年《科学》杂志上发表“到根除生命树的时候了吗？”一文，也承认这个事实。作者伊丽莎白·潘妮斯说，进化论生物学家对基因的分析与比较，本来想竖立“生命之树”，但结果正好相反；并说“新资料正毁坏进化论的画卷”:

> “一年前，观察从众多微生物中重新排列的基因组的生物学家认为，这些数据可能支持生命早期的历史。但是，他们对看到的一切却迷惑了。当时对基因组的比较，不仅没有澄清生命的主要组件进化的过程，而且对此大惑不解。现在，看着手里掌握的另外八种微生物的序列，情况

更加迷茫了……。许多进化论生物学家原以为，他们能够大致看到生命开始的三个王国……当完整的DNA序列，打开与别的基因比较的道路时，研究者们却期望，只是简单地给这棵树增加细节。但‘没有什么比真理更遥远’，马里兰的‘基因组研究所’的负责人克莱尔·弗拉赛说。与研究者的初衷相反，比较产生了生命之树的许多版本；它们不同于rRNA树，而且互相冲突……。”[170]

概括而言，随着生物学的发展，同源体概念失去了存在的土壤。由蛋白质、rRNA和基因组成的比较显示，按照进化论的说法，那些近亲的生物其实一一灭绝了。1996年的一次研究，使用了88种蛋白质序列，把兔子归在灵长目而非啮齿目动物中；1998年，分析了放在脊索动物海胆中的19种动物的13种基因；1998年基于12种蛋白质的另一次研究：使牛比马更接近鲸。2000年，分子生物学家乔纳森·维尔斯概括了这一情形：

“树之间基于不同分子的矛盾，对这种怪诞之树所作的分子分析，已使分子的发展历史陷入危机。”[171]

胚胎重演的神话

以前常说的“重述理论”早就从科学文献中清除了，但仍有一些进化论的出版物，把它作为科学事实提出来。“重演”一词是由进化论学生物学家厄恩斯特·赫克尔（Ernst Haeckel），在19世纪末提出的，是“个体发生学重演族系发展史”理论的概括形式。

这个理论假定，活胚胎再次经历了其假冒祖先经历的进化过程。赫克尔把在母体子宫里的发育理论化了：人的胚胎首先显示鱼的特征，然后是爬行动物的特征，最后才是人的

特征。

据证实，这个理论完全是伪造的。人们现在知道，假定在人类胚胎早期出现的“鳃”，实际上是人的中耳导管、甲状旁腺和胸腺的初级阶段。比作“卵黄囊”的胚胎部分，是为婴儿生产血液的育儿袋。赫克尔和他的追随者鉴定为“尾巴”那个部分，实际上是脊椎骨；它之所以像尾巴，只是因为它在腿子之前成型了。



厄恩斯特·赫克尔为了支持自己提出的进化论胚胎学，公然伪造科学资料和绘制赝品。

在科学界，这是普遍公认的事实，甚至进化论者也接受这个事实。新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乔治·盖洛德·辛普森写到：“赫克尔说错了进化原理。现在可以肯定地确立，个体发生学并不重复族系发展史。”[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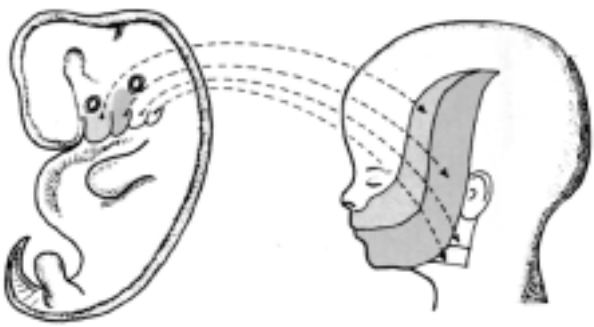
我们在《美国科学家》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

> “的确，生物起源的法则已经完全灭亡了，最终从20世纪50年代的生物教科书中除去了。作为一个受到质疑的严肃的理论话题，它在20年代就熄灭了.....。”[173]

“重演”的另一有趣之处是，厄恩斯特·赫克尔为了支持自己提出的“重演理论”，成了伪造自己图画的高手。赫克尔的伪造企图说明，鱼和人的胚胎互为相似。当他露出马脚后，唯一的答辩就是其它进化论者，已经承认犯过类似的错误：

> “对‘伪造’做出折衷的供认之后，如果看不到与我并肩工作的、数百位囚徒同事的安慰，我应该考虑自己受到谴责与消灭；那些同事中，有许多最值得信赖的观察者

赫克尔的伪造图象



边上是赫克尔的伪造的图象，先面是这些如象的其中一个详细的例子：为了证明人类的胚胎与鱼类的胚胎的相似所伪造的图解。实际上，可以看见人类胚胎器官的大部分是被故意绘制的。（Francis Hitching, The Neck of the Giraffe: Where Darwin Went Wrong?，第205页）

和值得尊重的生物学家。他们出版的最好的生物学教科书里，其中的大多数图表、论文和杂志，将受到与我的‘赝品’一样的指控；因为，它们都是不准确的知识，或多或少地被篡改、公式化及编造了。”[174]

的确，有“数百位最值得信赖的观察者和最值得尊重的生物学家”在搞研究；其中充满带着偏见的结论、曲解甚至编造。因为，他们总是习惯于维护进化理论，虽然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来支持这个理论。

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倾向

我们在本书中已列举的资料显示，进化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理论；相反，这个主张显然是违背科学的。换言之，使进化论活跃的力量不是科学。进化论也许得到一些“科学家”的维护，但躲在背后的却是另一种影响。

这种影响就是唯物主义哲学。

唯物主义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信仰之一，它把物质的存在作为其基本的原则。按照这种观点，物质永远存在，一切都是由物质组成的。当然，这对创造者的信仰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如果物质永远存在，一切都是物质组成的，那么，就没有创造物质的超越物质的创造者了。所以，唯物主义一向敌视信仰真主的各种宗教信仰。

因此，我们的问题之一，就是唯物主义观点是否正确。检验一种哲学是真是假的方法，就是应用科学方法，研究这种打着科学招牌的主张。例如，十世纪的哲学家可以声称，月球表面上有一棵神树，而所有生物像水果一样，实际上在这棵大树上生长，然后跌落到地球上。有人可能觉得，这种哲学有吸引力并相信它。但在20世纪，当人们试图在月球上行走的时候，再也不可能严肃地厮守这种信念了。这样一棵树是否曾在那里存在，能够用科学的方法确定，即通过观察与实验。

所以，我们能够通过科学途径，来调查唯物主义的主张：物质已永恒存在，物质在没有超越物质的创造者的情况下，自我组织并导致生命的开始。当我们这样做时，就会看见唯物主义已经瓦解了；因为，物质固有的概念，已被说明宇宙从无到有的创世大爆炸理论推翻了。物质自我组织并形成生命的主张，正是我们叫作“进化论”、并早已破灭的那个主张

——本书调查的主张。

而且，如果有人决意信仰唯物主义，并且全身心地优先投入唯物主义哲学，那么，他的行动会是不一样的。如果他首先是个唯物主义者，然后才是位科学家的话，当他看到进化论被科学驳倒时，他不会放弃唯物主义。相反，无论如何他会通过努力扶持进化论，来支持和维护唯物主义。这正是维护进化论的进化论者今天自身的处境。

有趣的是，他们有时也承认这个事实。哈佛大学著名的遗传学家、坦率的进化论者理查德·雷温廷（Lewontin）承认，他“首先是唯物主义者，然后是科学家”：

> “并非科学方式与机构，迫使我们接受对世界的唯物主义解释的；相反，我们坚持的先验的物质理由，造就了研究机器以及对物质的一系列解释，才使我们信仰唯物主义的；且不论怎样违背直觉、怎样迷惑外行。还有，唯物主义是绝对的。所以，我们绝不允许在唯物主义的门口出现‘神的足迹’。”[175]

雷温廷在这里使用了“先验”一词，这很重要。这个哲学术语表示非经实验证实的一种假设。一种想法虽然没有可以用来证实它的信息，你就认为那是正确的，并加以接受，那正是“先验”。正如进化论者雷温廷坦陈的：唯物主义是进化论者“先验的”约定；他们努力让科学符合这个假设。因为，唯物主义把明确否认创造者的存在，作为其必要的内容；所以，他们相信手中的唯一选择——进化论。在这些科学家看来，用科学事实掩盖进化论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已经“先验地”认为它是真理。

这种偏执的行为，使进化论者把“无意识的物质的自我组建”，当作一种信仰，这不仅违背科学而且有违理智。纽约大学的化学教授、DNA专家罗伯特·夏皮罗，解释进化论者的这种信仰，并指出唯物主义把它作为其教条：

> “所以，另一个进化原理是，我们需要跨越从简单的天然化合物，到第一个有效复制品的缺口。这个原理尚未详细

描述，也没有演示过，但可以预见，我们给它诸如化学进化和物质自我组织的名称。这个原理的存在，成全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并应用于亚历山大·奥帕林的生命起源说。”176

遍布西方的进化论宣传机器，著名而“受人尊重”的刊物，是这种意识形态必要的喉舌。由于进化论是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因此，它在以此为科学标准的唯物主义圈内，成了一个不容争议的禁区。

为了维持自己的声誉，有些科学家发现自己被迫维护这个虚假的理论，或者至少避免说出发对它的话。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必须在一些科学刊物上发表文章，以便得到或保住“教授”的头衔。进化论者控制了所有涉及生物学的杂志，他们不允许任何反对进化论的文章，在杂志上出现。因此，生物学家必须在这个理论的统治下进行研究。他们同样是进化论意识形态需要的一部分；这就是他们盲目维护我们已在本书中检验过的“不可能巧合”的原因。

唯物主义者的自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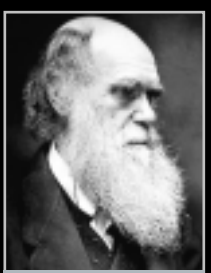
德国生物学家、著名进化论者霍马尔·冯·迪思伏特，正是一个顽固的唯物主义者的绝妙例子。他引证生命极其复杂的成分后，进一步讲述生命是否偶然出现的问题:

“偶然的出现会如此协调，这在现实中可能吗？这是整个生物进化论的基本问题。用‘这是可能的’来回答这一问题，有点像核实对现代自然科学的信念。从批评的角度讲，我们可以说，接受现代自然科学的人，只有说‘是’的选择；因为，他意在通过可以理解的方式解释自然现象，并不受形而上学的干扰，努力从自然法则中得到答案。是的，用自然法则即巧合来解释这一点，是他无处脱身的表现。因为，除了巧合，他还能相信别的什么呢？”177

是的，正如迪思伏特所说的，唯物主义所采用的基本原

达尔文主义与唯物主义


托洛茨基


达尔文


马克思

尽管科学明显地驳倒了达尔文学说，但它仍然得到维护的唯一原因，是这个理论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达尔文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于自然科学，也是这个学说的鼓吹者。唯物主义的前锋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不断维护达尔文主义。

当代最有名的进化论倡导者之一、生物学家道格拉斯（Douglas Futuyma）写道：“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样.....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唯物机制及唯物主义理论至关重要。”这赤裸裸地说明，进化论对其维护者具有重要作用的原因。[1]

另一个著名的进化论者、古生物学家史蒂芬·简·古尔德说：“达尔文把与唯物主义相一致的哲学，应用到对自然的解释中。”[2] 与列宁同时代的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策划者之一、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评论道：“达尔文的发现，是整个有机物质领域的辩证的（辨证唯物主义的）最高胜利。”[3] 但是，科学已经显示，达尔文主义不是唯物主义的胜利，而是推翻该哲学的一种迹象。

---

1 道格拉斯（Douglas Futuyma）：《进化论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第2版第3页，Sunderland,MA: Sinauer，1986年，

2 艾伦·伍3 兹(Alan Woods)、特德·格兰特(Ted Grant)：《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Marxism and Darwinism）；《反叛的理由：马克思与现代科学》（Reoson in Revolt: Marxism and Modern Science），伦敦，1993年。

3 艾伦·伍5 兹(Alan Woods)、特德·格兰特(Ted Grant)：《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Marxism and Darwinism），伦敦。

理，就是以否认“超自然的干预”，来解释生命现象即创造。一旦采用这个原理，既是最不可能的假想，也会容易被接受。几乎在所有的进化论文献中，很可能找到这种教条思想的例子。土耳其知名的进化论者之一阿里·得米尔索依教授，正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所指出的，得米尔索依的看法是：生命必需的蛋白质细胞色素C偶然形成的概率，“就像猴子在打字机上、不犯任何错误地书写人类历史一样的不可能。”[178]

毫无疑问，接受这样的可能性，实际上背离基本的理智和常识。即使在纸上看到写下的一个字母，那也是人写的。当我们看见一部世界史时，自然会想到其作者。一个具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不会同意这部巨著中的字母会是“偶然”放到一起的。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进化论科学家”阿里·得米尔索依教授却接受这个失去理性的主张：

> “本质上讲，细胞色素C形成的概率小到了零。即，如果生命需要一定的序列，就可以说，这种可能性在整个宇宙中只能实现一次。否则，在我们定义之外的超自然力量，一定在它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相信后者则不符合科学的目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审视第一种假设。”[179]

得米尔索依写道，为了“不去非得接受超自然力量”，他更喜欢“不可能性”，即不承认真主的存在。这并不奇怪，当得米尔索依引用另一个主题——关于细胞中的线粒体的起源时，他公然接受巧合的解释，纵然它“完全与科学思想相反”也罢：

> “问题的核心，是线粒体怎样获得这一特征；因为，即使个体偶然得到这个特征，也需要不可理喻的极端概率.....提供呼吸作用、在形式各异的每一步骤中，起催化剂作用的酶，组成了机制的核心。细胞必须完整地包含这个酶的序列，否则它就毫无意义。在此，尽管违背生物学原理，但为了避免更多独断的解释或投机行为，我们必须不

唯物主义的灭亡

在19世纪，以进化论为哲学基础的唯物主义理论提出：宇宙是永恒的存在，即宇宙不是被造物，所有的生物世界可以解释为物质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二十世纪的科学发现，已经使这些假说完全无效了。

宇宙永恒存在的假设，因宇宙起源于大爆炸的发现而瓦解；“创世大爆炸”发生在150亿年以前。创世大爆炸显示，宇宙中的所有物质是从“无”到“有”的：即，他们都是被创造的。唯物主义有名的倡导者之一、无神论哲学家安东尼·弗鲁(Anthony Flew)承认：

> 难听地说，坦白有益于灵魂。因此，我将开始坦白：无神论者必须为大爆炸而觉得尴尬。因为，宇宙学家似乎提供了科学证据.....宇宙有一个开端。[1]

创世大爆炸同时显示，宇宙的每个阶段，都是由可控的创造成型的。这使大爆炸以后的秩序很清楚了：如此完美的秩序，不可能来自不受控制的随意爆炸。著名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对此解释道：

> 必须开口说话了，宇宙现有的构造，显然对微小的量变如此敏感，对此一定要仔细地加以考虑.....外观上大量奇迹的并存，自然被赋予的基本变数，一定保留着宇宙设计中相当有力的证据。[2]

同样的现实，使美国天文学教授乔治·格林斯坦（George Greenstein）教授说话了：

> 当我们调查所有证据时，一种强烈的想法产生了：（宇宙形成时）必须介入某种超自然的代理——或者干脆说成代理者。

如此说来，把生命仅仅解释成物质相互作用的唯物主义假设，在科学发现面前也崩溃了。特别是，确定所有生物遗传信息的起因，绝不能解释为纯粹物质的因素。进化论的主要维护者之一乔治.C.威廉斯(George C Williams)，在他1995年写的一篇文章里，承认了这个事实：

> 进化论生物学家并没有注意到，他们在两个不同的区域里工作：信息与物质.....基因是一个信息包，而非一个物体.....这种描述符号的缺省，使物质和信息在两个单独的区域存在；它们必须以各自的术语分别论述。[3]

这种情形是超越物质之“智能”存在的证据；它使遗传信息存在了。物质不可能在自身中产生信息。德国“联邦物理与科技研究所”的主任沃纳·吉特教授评论道：

> 经验表明，需要一种有意识的存在——自愿实施其自由意志、认知与创造力的存在。没有已知的自然法则，也没有已知的物理过程或物质自身产生信息的事件序列。[4]

所有这些科学事实说明，宇宙及所有生物，是拥有永恒力量和知识的创造者——即真主的创造。至于唯物主义，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说：“它再也不能标榜为科学哲学了。”[5]

1. 亨利·玛格奴（Henry Margenau）等：《宇宙、系统与理论》（Cosmos,Bios,Theos）第241页，Open Court Publishing,1992年;
2. 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上帝与新物理》(God and the New Physics)第189页,纽约，1983年;
3. 乔治.C.威廉斯（George C Williams）:《第三文化：科学之外的革命》（The Third Culture:Beyo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第42-43页，纽约，1995年;
4. 沃纳·吉特（Werner Gitt）：《信息就是开端》（In the Beginning Was Information）第107,141页，德国;
5. 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总结两面神》（Janus:A Summing Up）第250页,纽约，1978年。

情愿地接受：细胞首先与氧接触之前，所有起呼吸作用的酶，曾在细胞内完整地存在。”[180]

我们从这些文字中得出的结论是，进化论绝不是经过科学研究的理论；相反，该理论的形式与本质，都是应唯物论哲学的要求而产生的。然后，在具体的科学事实面前，它依然变成一种信仰或教条。我们还可以从进化论文献中发现，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有“目的”，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其目的就是排斥“由造物主创造所有生物”的一切信仰。

进化论者给这个目的披上“科学的”外衣。但是，他们推崇的不是科学，而是唯物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绝对否认物质“以外的”(或超自然的)任何存在。科学本身不必接受这样的教条。科学意味着探索自然，并从人类的发现中得出结论。如果这些发现得出自然是被创造的结论，科学就必须接受它。这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的职责，而不是为迎合19世纪过时的唯物主义教义，去维护不可能的假想。

唯物主义者、假宗教与真宗教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偏爱唯物主义哲学的人们，如何使科学发狂，如何利用进化论的童话来欺骗盲信者，并如何隐瞒了真相。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唯物主义圈子本身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们却做着重要的“服务”。

他们的这种“服务”，是为了借此证明自己虚假而无神论的思想是正确的，是为了假借伊斯兰的名义，制造荒谬而矛盾的东西。他们打着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招牌，已经编造了与《古兰经》和伊斯兰没有任何联系的虚假宗教；他们凭借传闻、迷信和空谈来攻击伊斯兰。因此，那些凭空以伊斯兰的名义，去维护充满矛盾、不合逻辑的假宗教的集团，其荒谬的行为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样，唯物主义者使许多人看清了盲信者的嘴脸，认识到传统的思想，并鼓励人们通过阅读、坚信《古兰经》，来探索

宗教的本质及其真正的源头。虽然这是无意的，但他们服从真主的命令，并服务于真主的宗教。

此外，他们揭露了各种简单的思想——以真主的名义发明的假宗教，并把伊斯兰带给公众；他们削弱了威胁大众、动摇信念的迷信体制。因此，他们成了维护真主所喜悦的真正宗教的中坚力量，并使宗教的敌人们相互攻击。真主在《古兰经》中说:

“要不是真主以世人互相抵抗，那么，大地的次序必定紊乱了。”（黄牛章（百格勒）：251节）

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有必要给进化论唯物主义思想的鼓吹者，留下一条退路。这些人曾有过真诚地追索，但受伊斯兰的名义下所产生的迷信的影响及假使者的蛊惑，他们被逐出了真正的宗教；孩提时代灌进心灵的谎言，使他们没有机会自己发现真理。

他们也许从宗教的敌人写的书中了解宗教；那些人企图绕开《古兰经》、借助习俗与固执、利用谎言和谬论来曲解伊斯兰。伊斯兰的起源和本质，与他们的企图完全不同，而且与人们长期受到的教化完全相反。因此，我们建议他们尽早找到《古兰经》，抱着敞开胸怀、负责任且不怀偏见的态度，去读读真主的经典，并从真正的源头上学习“原装的”宗教信仰。如果他们需要协助，可以参阅本书作者以《古兰经》为基础的其它书籍。

媒体：进化论的沃土

正如我们的检验所示，进化论没有任何科学基础。但是，世上的大多数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进化论是科学事实。造成这个骗局的最大原因，是媒体对进化论有系统地教化和宣传。因此，我们也必须论及这种教化与宣传的特点。

当我们悉心关注西方媒体时，会频繁地遇见关于进化论的新闻。主要的媒体集团、著名而“高尚”的期刊，在这个主题上推波助澜。当人们走近他们的圈套时，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进化论是不容讨论的、经过证实的绝对事实。

这类新闻的普通读者自然地认为，像数学公式一样，进化论是肯定的事实。这些由主要媒体牵头的新闻，立刻被各地的报刊收编起来，并以大号标题转发：“《时代》杂志报道：一块填补化石链缺口的新化石已被发现”；《自然》显示：“科学家已攻克了进化论的最后难题。”发现“进化链遗失的最后链接”毫无意义，因为本来就没有可以证明进化论的哪怕一件东西。正如我们在前面描述的一样，他们的一切证据都是假的。除媒体外，科学资料、百科全书和生物学教科书，都是传播进化论的帮手。

总之，作为反宗教的前哨，媒体和学术机构彻底维护进化论，并把它强加于社会。这种强制教化如此有效，以致它把进化论变成了一种不容质疑的信念；否认进化论，则被当作违背科学和忽视现实的举动。这也是进化论的许多缺陷曝光后

进化论的宣传品



科普杂志在进化论中占据主导地位，扮演着鼓动大众接受进化论的关键角色。

（尤其从20世纪50年代起），甚至连进化论者自己早就承认这些事实后，今天，在科学或传媒界依然找不到批评进化论的原因所在。

被西方广泛接受的、最受“尊重的”涉及生物和自然科学的出版机器《科学美国人》、《自然》、《聚焦》、《国家地理》等杂志，把进化论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接受下来，并且努力把它当作一个经过证明的事实。

伪装的谎言

进化论者充分利用了媒体“洗脑”计划的优势。很多人无条件地相信进化论，以致他们甚至懒得去问“怎样”和“为何”了。这意味着为了轻易地诱骗人们，进化论把谎言伪装起来了。

进化论的寓言故事

进化论曾是著名科学家写给成人的童话。它是完全丧失理性和科学的假想;提出没有生命的物质，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和职能，去创造复杂的生命。这个漫长的故事，在某些特殊的命题上编造了非常有趣的童话。其古怪的进化童话之一，是刊登在《国家地理》上的“鲸的进化”；该杂志作为世上最权威和严肃的科学读物而受到广泛尊重:

6,000万年以前诞生的鲸鱼，其个头显然是无与伦比的；它是有毛的四足巨兽，为寻找食物或藏身处，才斗胆进入水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化慢慢发生了：后腿消失了，前腿变成了鳍肢，毛发变成了又厚又光的鲸皮，鼻孔移到了头顶，尾巴扩充为鲸爪，身体在水的浮力世界中变大了。[1]

除毫无科学依据外，这样的事情也违背自然规律。在《国家地理》上发表的这个童话，暴露了所谓严肃的进化论出版物，引人注目的谎言。

进化论的另一童话，是不值一提的关于哺乳动物的起源。进化论者诡辩，哺乳动物的祖先是爬虫。但是，一旦解释这种所谓变异的细节时，有趣的讲述出现了。其中的一个是:

一些生活在寒冷地区的爬虫，开始让身体向保暖的方式发展。当天气变冷时，它们输出的热量提高了；当数值变得更小更突出时，其热量的损失随之减少，而且毛皮进化出来了。排汗也是为了调节体温，是在需要时通过水分的蒸发，给身体降温的手段。与此同时，小爬虫们为获取营养，开始舔食妈妈的汗水。某些汗腺开始分泌愈来愈丰富的分泌物，直到最后变成奶子。于是，这些早来的小家伙，开始过上了更好的日子。[2]

像奶子那样精制的食物，会从汗腺中产生，以及上面的种种描述，纯粹是进化论者毫无科学依据的异想天开。

1，维克多.B.谢弗：《探索鲸的生命》（Exploring the Lives of Whales），《国家地理》第50卷第752页，1976年12月;

2，乔治·伽茂等：《自身之中的汤姆金先生》第149页，伦敦，1968年。

例如，既是在最“科学”的进化论书籍中，“从水中迁移到陆地”是进化论无需解释的最大的进化现象，并用可笑的简单方式加以“解释”了。根据进化论，生命起源于水，第一种发达的动物是鱼。该理论认为，有一天，这些鱼不知何故，把自己从水中抛到陆地上(大多数时间，据说是干旱的原

因)，这些选择在陆地上生活的鱼，偶然用脚替换了鱼翅，并用肺替换了鳃。

大多数进化论的书籍，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是“怎幺”来的。甚至在最“科学的”资料里，这一荒唐的主张，隐藏在诸如“生物完成了从水到陆地的迁移”这样简单的句子里。

请问，这种“迁移”是怎样实现的呢？我们知道，鱼离水几分钟就无法生存。如果我们假定发生过所谓的干旱，鱼被迫向陆地迁移了；那幺，在这种情况下，对鱼意味着什幺呢？答案是明显的：从水中出来的鱼，会在几分钟内一个个地死去。即使这个过程持续1,000万年，答案依然相同：鱼一定会死去。因为，像肺这样完善的器官，不可能在突然“事件”中形成——即通过突变；另一方面，半个肺也是根本无用的。

但是，这正是进化论者的计划所在。“从水中迁移到陆地”，“从陆地飞跃到天空”和许多所谓的“飞跃”，都以不合逻辑的术语加以“解释”。至于像眼睛、耳朵等复杂器官的形成，进化论者宁愿对此避而不谈。

用“科学的”包装，来影响街上的人们是容易的。你画一张从水中迁移到陆地的想象中的图画，并且用拉丁文给这些水中的动物，起个陆地“后裔”、“中间过渡形式”(想象中的动物)的名称，然后精心捏造谎言：“真掌鳍鱼（Eusthenopteron）先从腔棘目鱼（Rhipitistian Crossoptergian）转变而来，然后转变成鱼石螈属（Ichthyostega）。”如果你戴上厚厚的眼镜，穿着白大褂，以科学家的口气说出这些话，你就一定能说服许多人。因为，一向为进化论效劳的媒体，会很快以赞许的笔墨，将这个重大新闻向世界公布。第十六章

结论：进化论是个骗局

虽然还有许多其它宣布进化论无效的证据以及科学诉讼，但在本书中，我们只能讨论其中的部分。甚至这些就足以展示最重要的真理：尽管进化论披着科学的外衣，但它只是个骗局，是为了维护唯物主义哲学的利益，不是基于科学而是基于洗脑、宣传和欺诈的谎言。

我们根据前面的章节，总结如下：

进化论已经崩溃

进化论在最初阶段就是个失败的理论。因为，进化论者甚至没能解释单个蛋白质的形成。概率、物理及化学定理，都没有提供生命偶然形成的可能性。

偶然形成单一蛋白质的可能并不存在；那么，千万个蛋白质按序结合并形成活细胞；数十亿个细胞形成后偶然合成生物；从中又产生了鱼类；路过陆地的鱼类又变成了爬虫、鸟类。难道地球上数百万不同的生物，就是这样形成的吗？这符合逻辑和理性吗？

即使你认为它不合乎逻辑，可进化论者却相信这个童话。

但是，这仅仅是理念或信仰。因为，他们甚至还没有一个证据，来证实这一理论。他们从未发现过半鱼、半爬虫或半鸟等那样的过渡性动物。他们也没能证明，组成蛋白质的单一氨基酸分子，会在所谓的原始地球条件下，形成蛋白质；即便在最先进的实验室里，他们也没能成功。进化论者自己的每一次

试验反而证实: 地球上任何时候从未发生过进化的过程, 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进化论将来也不会得到证实

面对这种情况，进化论者只有在梦中安慰自己：将来的科学，会以某种方式解决所有的难题。但是，科学能否证实毫无根据、不合逻辑的主张，全然不是个时间问题。相反，随着科学的进步，它只能更清楚更明白地戳穿进化论的荒唐。

事情一直这样进行着。对活细胞的结构和功能更多细节的发现, 更清楚地揭示, 按照达尔文时期的原始生物水平理解的那样，细胞不是一种简单而随意形式的合成物。

事物自身的证据表明，否认创造的事实，主张生命来自完全不可能的巧合, 然后顽固地维护这样的主张, 这可能成为将来蒙受羞辱的根源。由于进化论的真面目，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在世人们前，公众舆论就开始看到了真相。所以，过不了多久，对进化论盲目而狂热的拥护者，再不能抛头露面了。

进化论最大的障碍: 灵魂

世界上有许多相似的物种。例如，有许多类似于马或者猫的生物，很多昆虫看起来彼此相像。人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但不知为什么，人与猿之间表面上的相像，却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当这种有趣的联系搞得沸沸扬扬时，一些人就相信这个虚假的进化论了。事实上，人与猿表面上的相像不能说明什么。犀金龟和犀牛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因此把昆虫和哺乳动物与某种进化联系起来，将是多么的可笑。

除了表面的相像, 猿并不比其它动物更接近于人类。其实, 如果考虑智能因素的话, 能够运用几何原理建造奇妙蜂

巢的蜜蜂，用工程学的奇迹织网的蜘蛛，就比猿更接近于人；它们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人类更优越。

暂且抛开外表上的相像，人与猿之间还有一个巨大的差异：猿是一种动物，而且从意识的方面看，它只是与马或狗毫无差异的动物。然而，人是有意识、强意志的生灵；人会思考、说话、理解、推理、决策和判断。所有这些特征，都是人所拥有的灵魂的功能。人类和其它动物之间的巨大差异就是灵魂。身体上的任何相像，无法弥合人与其它生物之间的这个差异。在自然中，唯一拥有灵魂的生物就是人。

真主根据意愿创造

如果进化论者提出的假想果真如此，那重要吗？根本无济于事！因为，进化论提出的基于巧合的每一进化阶段，只能是奇迹的结果。如果生命的确通过这些阶段的延续，而逐渐产生的话，那每个阶段只能是一种有意识的意志实现的。那些阶段不可能偶然发生——就因为它不可信。

如果说一个蛋白质分子，是在原生大气状态下形成的，就必须记住：概率、生物和化学的法则已经证实，那是不可能偶然出现的。但非要主张那是可能形成的，就只好承认：除创造者的意愿之外，再没有其它选择。同样的逻辑适应于进化论者提出的所有假设。例如，既没有古生物学的证据，也没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或逻辑理由，能够证实这样的变迁：鱼从水中跑到陆地，然后变成了陆地动物。但是，如果有人非要说，鱼爬到陆地并变成爬虫的话，这样说话的人就应该接受造物主的存在；造物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仅仅通过一个“有”，使一切变为现实！而对创造奇迹的其它解释，只能囿于固执己见，是自相矛盾和违背理性的。

现实一目了然。一切生命都是完美的设计，是卓越的创造。这同时给我们提供了造物主存在的具体证据——具有无限力量、知识和智能的造物主存在的证据。

这个创造者就是真主，统领天地和其中一切的主宰。

创造的事实

在本书前面的部分，我们分析了主张生命不是被造物的进化论，是完全与科学事实相反的谬论。我们看到，现代科学已通过古生物学、生物化学和解剖学等分类科目，揭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真主创造了全部生物。

实际上，为了看清这个事实，我们不必求助于生物化学实验，也不必仰赖地质发掘中的复杂成果。我们只要观察周围的任何生物，就可以看见其中有着超凡智能的迹象。昆虫或深海中的极小的鱼体内，存在人类不曾有过的伟大工艺和设计。连没有头脑的一些生物，都可以完美地执行人类无法完成的复杂任务。无疑，支配整个自然的伟大智能、设计和计划，向人们展示了创造者——即真主存在的有力证据。真主赋予全部生物以卓越的特性，并向人类显示真主的存在和能量的明显迹象。

在下面的章节里，我们只分析自然界无数创造证据中的几个例子。

蜜蜂与蜂巢的建筑奇观

蜜蜂生产超出它们实际需要的蜂蜜，并且把它储存在蜂巢里。大家知道，蜂巢是由大小均等的六棱柱体建成的。你是否想过，蜜蜂为什么用六棱柱体建造蜂巢，而不是八棱柱体或五边形呢？

因此，数学家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六棱柱体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面积的几何图形。”

这种结构的蜂房使用蜂蜡最少，而储存蜂蜜的容量最大。这十分符合几何原理和省工节材的建筑原理。

建造蜂巢所使用的方法也非常惊人：蜜蜂从两三个不同的地方，开始建造蜂巢，排成两三行同时编织蜂巢。虽然它们从不同的地方开始，但众多的蜜蜂建造同样的六边形，然后将它们连接起来，织成了蜂巢，而且在中心“合拢”！六边形的连接点，如此精巧地衔接在一起，以致看不到后期组合的任何痕迹：每个菱形的锐角都是70°32′，每个蜂房的容积几乎都是0.25立方厘米。还有，它们的建筑速度也相当惊人：一个蜂群在一昼夜内能盖起数以千计的蜂房。

诚然，面对蜜蜂如此非凡的作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确实存在指导这些生物的无上的意志。进化论者想利用“本能”的概念来蒙混过关，并企图把它说成蜜蜂简单的一种属性。然而，如果蜜蜂本能地工作，如果本能支配所有的蜜蜂，并且在毫无信息沟通的情况下和谐地工作，那就意味着：存在一种统帅这些小动物的“智能”。

更确切地说，是这些小动物的创造者真主在统领它们，在“激发”它们必须那样做的灵感。在14个世纪以前，《古兰经》已经向人们宣告这个事实：

“你的主曾启示蜜蜂：‘你可以在山上和树上筑房，以及人们所建造的蜂房里。然后，你从每种果实上吃一点，并驯服地遵循你的主的道路。’将有一种颜色不同，而可以治病的饮料，从它的腹中吐出来；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一种迹象。” ——（《古兰经》第十六章(蜜蜂):68-69节）



杰出的建筑师：白蚁

看见白蚁在地面上建造的“宫殿”时，没有人不会感到震惊。因为，蚁巢是高达5-7米、占地100多平方米的建筑奇迹。充当保护层的外壳厚50厘米，像石头一样坚硬，是白蚁把土粒互相粘连垒成的。蚁巢内部是满足白蚁各种需要的成熟的系统；由于白蚁身体结构的需要，它们不能在阳光下出现。在蚁巢内，有通风系统、小道、幼蚁房、走廊、生产特殊菌的庭院、安全出口、适合冷热天气的房间，总之，应有尽有。更为惊异的是，建造这些神奇巢穴的白蚁，都是盲蚁！[181]



先不论这个事实。当我们比较白蚁与巢穴的大小时，就发现白蚁成功地完成了比自己大300倍的建筑工程。

白蚁还有一个惊奇的特性：如果我们把建筑初期的蚁巢一分为二，一段时间后，白蚁重新将它们合二为一时，就会看到所有的走廊、巢沟和道路，又相互贯穿起来了。白蚁好象从未分离似地、在专一的地方做着它们的事情。

啄木鸟

我们知道，啄木鸟通过啄凿树干筑巢。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一点是，这些动物如此强烈地用脑袋连续敲击树干时，怎么不出现脑溢血之类的事？因为，啄木鸟啄击树干所使用的方式，就如人类用脑袋往墙上钉一颗钉子。如果有人冒险想做这样的事，那么他在脑震荡之后，可能引起脑溢血。可是，啄木鸟能在2.10与2.69秒之间，能够把坚硬的树干啄击38-43次，并且对它毫无影响。



啄木鸟之所以不受损伤，是因为其头部的结构，是为适应这种工作而造化的；啄木鸟的头骨上，有一个能降低并缓冲撞击强度的“减震”系统，其头骨之间有特别软化的组织。[182]

蝙蝠的定位系统

蝙蝠毫无麻烦地在漆黑的环境中飞翔；它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导航系统。我们把它叫做“声波定位”系统，该系统凭借声波的回声，来判断周围物体的形状。

一个年轻人只能觉察每秒20,000次振幅的声音。而装备了特别设计的“声波系统”的蝙蝠，可以利用每秒50,000与200,000次之间振幅的声波。它把这些声波，每秒钟以20或30次的速度传向各个方向。声波的回声很强，这使蝙蝠不仅知道沿途物体的存在，而且能查明快速飞行的猎物的位置。[183]

鲸鱼

哺乳动物需要均匀的呼吸。因此，对它们来说，水不是一种非常便利的环境。而作为海洋哺乳动物的鲸鱼，用一种比许多陆地动物远远有效的呼吸系统，解决了这个问题。鲸鱼呼出时，每次释放它们所用空气的90%。因此，它们只能需要很长的间隔呼吸。同时，它们有一种叫做“肌血球素”的高度浓缩的物质；它帮助鲸鱼在肌肉中储存氧气。在这些系统的帮助下，比如长须鲸，能潜入500米的深水里，并且在40分种内，根本不用呼吸地游泳。[184] 另一方面，与陆生动物的位置相反，鲸鱼的鼻孔长在背上，以便容易地呼吸。



蚊子的设计

我们总是把蚊子看成一种飞行动物。其实，蚊子的发育阶段是在水下度过的，并且离开水下世界时，所有器官配备了在水外需要的附加“设计”。蚊子开始飞行时，利用能够探明猎物位置的特殊的感应系统。这些系统像一架装有热度、气体、湿度和气味探测器的战斗机。蚊子甚至还有“根据温度探测”的能力，以帮助它在黑暗中发现猎物。



蚊子的“咋血”技术，来自非常惊人的复杂系统。由“六面刀片”组成的切割系统，像锯子一样地割破皮肤。在切割过程中，蚊子在伤口上分泌出一种使人的表皮组织麻木的物质，因而使人意识不到自己的血正在被吸取。同时，这种分泌物还防止血液凝固，以保证继续吸血。

即便缺少其中的一个因素，蚊子将不能以血为食，也不能繁衍后代。这种小动物超越的设计，其本身就是创造的明显证据。《古兰经》把蚊子作为一个特别的例子，向那些有理智的人们展示真主的存在:

“真主的确不嫌以蚊子或更小的事物设任何比喻；信道者，都知道那是从他们的主降示的真理；不信道者却说：‘真主设这个比喻的宗旨是什么？’他以比喻使许多人入迷途。”（《古兰经》第二章(黄牛)：26）

目光犀利的猎鸟

猎鸟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使之在攻击猎物时，能够掌握恰好的距离。另外，它们的大眼睛里含有更多的视觉细胞，这使眼力会更好。猎鸟的眼睛里有100多万个视觉细胞。

在数千米的高空飞行的猎鹰，其眼睛能清楚地扫描地球上的动静。就像战斗机从数千米远的高空，探清它们的目标



一样，猎鹰能察觉到地面上最细微的颜色或运动。鹰眼拥有300度的宽广视角，而且能把目标图像放大六到八倍。猎鹰飞越4,500米的高空时，眼睛能够扫描方圆30,000公顷的面积。它们从1,500米的高度，会容易地识别藏在草丛里的兔子。显然，猎鹰这种非凡的眼睛结构，是特别为这种动物而设计的。

蜘蛛网

蜘蛛的捕猎技术极佳。它们编织的网不是静态的，而是编在猎物出没的地方，虽不大但很有用。然后，它把猎物紧紧绑在那里，陷于其中的猎物根本无法逃生。蜘蛛网的结构会使猎物愈陷愈深，像是对它们更大的警告。为了储存食物，蜘蛛用另外的“绳索”捆住猎物，就像把它们“打包”了。

那么，蜘蛛怎能以如此优秀的机械设计与化学结构，做出这样的网呢？蜘蛛不可能像进化论者所说的那样，偶然获得了这种技能。蜘蛛没有诸如学习和记忆的本领，甚至没有执行这些事情的脑子。显而易见，蜘蛛的这些技能，是由崇高的造物者真主赋予的。

蜘蛛网中隐藏着非常重要的奇迹。蜘蛛用来织网的丝，其直径少于千分之一毫米，强度却比一根相同直径的钢丝大五倍；蜘蛛丝的另一特性就是非常的轻，其长度足以环绕地球一圈，而重量只有320克。[185] 钢是工厂里生产出来的特别物质，是人类生产的强度最大的材料之一。可是，蜘蛛能在体内生产出比钢丝绳更为牢固的丝。人类制造钢材时，运用了几个



世纪以来的知识和技术。请问，蜘蛛吐丝时，究竟使用哪些知识和技术呢？

我们从蜘蛛身上看到，人类所有的科技方式都比蜘蛛落后。

冬眠动物

冬眠动物能自在体温与外面的温度一样寒冷的情况下生存。它们是怎样做到这个的呢？

哺乳动物是温血动物。这表明在正常状态下，它们的体温保持不变，因为它们体内的天然自动调温器，会持续地调节温度。例如，仓鼠这样的小动物，其正常体温是40度，在冬眠期间，体温降到稍高于零度的地步，好象有一把调节的钥匙。身体的新陈代谢也慢了许多；它们开始非常缓慢地呼吸；每分钟300次的正常心跳，降到每分钟只有7-10次；正常的身体反应中止，大脑的电子活动，减少到几乎失去知觉的地步。

在非常寒冷的天气下，静止的危险之一，是这些动物的组织会被冻僵，并被冰体摧毁。但是，冬眠动物由于拥有特殊的功能，而免于这个危险。冬眠动物的体液内，有大量的高分子化学材料。因此，这降低了它们的冰点，并防止由此产生的危害。[186]

电鱼

某些鱼类，如鳗鱼和刺鱼等，会利用体内产生的电流，保护自己免于敌方的威胁或麻痹猎物。在每一种生物中——包括人——都有一定量的电流。可是，人类不能左右这些电流，也不能在自己的控制下利用它。然而，上述动物体内的电流高达500-600伏，并能够利用电流来对付它们的天敌。而且，它们不受这电流的反作用。

为保护自己而消耗的能量，会在一段时间后恢复，就像电池充电后再次使用一样。鱼不仅出于防御目的而使用小小体内的高电流；电流除帮助它们在深水中探路外，同时也帮助它们在看不到目标时做出判断。鱼能够通过体内的电流发送信号。这些电子信号碰到固体之后会反射回来，反射给鱼提供目标的信息。这样，鱼能确定物体的距离和大小。[187]

动物聪明的计谋：伪装

动物生存的特征之一，就是隐藏自己的艺术——即“伪装”。

动物隐藏自己的两个主要原因：猎食与反猎食。伪装不同于其它别的方式，这需要聪明、技巧、美学与协调。

动物的伪装技术的确很惊人。要识别隐藏在树干上的昆虫或叶子下的动物，几乎是不可能的。

吸取植物汁的叶虱伪装成棘刺，以此喂养自己。用这种方







上图：模仿树刺的寄生虫。右上图：为了隐藏自己而悬于叶子之间的蛇。右下图：为不被发现置身于树叶中央的毛虫。

法，它们骗过了最大的天敌鸟类，并且保证鸟不会栖息在这些布满荆棘的植物上。

乌贼

乌贼的皮下是富有弹性的厚厚的色囊，叫做“色素胞”。这些色素主要是黄色、红色、黑色和棕色。细胞信号扩散，以适当的图案护住皮肤。这样，乌贼“借用”了它所落脚的岩石的颜色，完成了出色的伪装。

这个系统非常有效。乌贼还会在自己身上变出像斑马线那样的颜色。[188]




左图：展开的茅膏菜。 右图：关闭的茅膏菜。

不同的视觉系统

对很多海生动物来说，视觉在猎食和防御中极为重要。因此，大多数海生动物，都拥有专为水下生存而设计的完美眼睛。

在水下30米的地方，视觉能力相应地越来越受深度的限制。但是，在这个深度生存的生物，却有着与环境相关的眼睛。

与陆生动物不同，海生动物拥有适合深水居住环境的、完美的球形“镜头”。与陆生动物宽而椭圆的眼睛相比，这种球形结构在水下更实用。它观察近距离物体时会自动调焦；当注视远距离的物体时，整个聚焦系统，在眼睛内的专门肌肉的帮助下向后拉。

鱼拥有球形眼睛的另一原因，是由于水中光的折射。因为，眼睛里充满几乎与水的密度同样的液体，当外部形成的图像进入眼睛时，就没有折射发生。从而，眼晶体全神贯注视网膜上的外部图像。与人类不同，鱼在水里看得清清楚楚。

像章鱼这样的动物，则拥有更大的眼睛，以弥补深水光亮的不足。低于300米时，大眼睛的鱼类，需要捕捉周边生物发出的反射，来注意到它们。因此，它们眼睛里的视网膜上，有大量蓝色的感光细胞。

我们从这些例子中了解到，每一种生物都有专门设计的与众不同的眼睛，以满足它们的特殊需要。这个事实证明，它们必须按照造物主的方式造化——拥有永恒智能、知识和能力的真主的造化。

特殊的冻结系统

冻僵的青蛙表现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物结构。从它们的身上看不出生命的迹象：心跳、呼吸、血液循环完全停止了。然而，当冰雪融化时，同一只青蛙又复活了，似乎刚从睡梦中醒来一样。

通常，在冰点状态下，生物面临很多致命的危险。但是，蛙类却没有这种危险。在这种状态下，它具有生产大量葡萄糖的特性。正如糖尿病患者一样，蛙的血糖脂达到很高的数值。有时，可以高到550毫摩尔/公升。(蛙通常的数值在1-5毫摩尔/公升之间，而人类的在4-5毫摩尔/公升之间。) 这种浓度极高的葡萄糖，在正常情况下会引起严重的问题。

但是，在冻僵的青蛙中，过多的葡萄糖却阻止细胞脱水并防止收缩。蛙的细胞膜对葡萄糖的渗透力非常强，因此葡萄糖容易进入细胞。体内高浓度的葡萄糖降低结冰的温度，在寒冷中只引起动物体内非常少量的液体结冰。研究发现，葡萄糖也能滋养结冰的细胞。在这个时期，除了体内的自然养料作用以外，葡萄糖也阻止像尿素合成那样的新陈代谢反应，并防止细胞不同的食物源的耗尽。

那么，蛙体内大量的葡萄糖，又是怎样突然产生的呢？答案十分有趣：这个生物的体内，装备了一个负责这项任务的特殊系统：冰刚刚出现在皮肤表面时，一种信息传到肝，使储存在肝内的部分肝糖变成了葡萄糖。得到信息的五分钟后，血糖开始稳定地增加。[189]

毫无疑问，为了满足动物自身的需求，给它们配备完全改变新陈代谢机制的系统，只能是具有超凡智能和知识的创造者完美的设计。任何偶然的巧合，都不可能产生如此完美而复杂的系统。



信天翁

候鸟通过使用不同的“飞行技术”，把能量消耗减到最小。信天翁也有这样的飞行风格。这种动物92%的时光在海上度过。它们的翅膀跨度宽达3.5米。信天翁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们的飞行技巧：能够不拍打翅膀地飞行好几个小时。因此，它们利用风的作用，连续在空中展翅滑行。

连续展开3.5米宽的双翼，需要大量的能量。但是，信天翁能以这个姿势坚持数小时。这是由于从它们诞生起，就拥有特别的解剖系统。在飞行期间，信天翁的翅膀被风力阻滞了。所以，它无需使用任何肌肉力量。翅膀只是由肌肉撑起的，这极大地帮助了这种鸟的飞行。该系统减少了飞行中的能量消耗。因为，信天翁不需要拍打翅膀或浪费能量来伸展翅膀，所以，它就不使用能量。它仅仅利用风力，悠然地飞行数小时，这根本不在话下。例如，一个10公斤重的信天翁，当它作1,000公里的旅行时，只失去体重的1%。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小的比率。人类模仿信天翁，制造出迷人的滑翔机。[190]

艰难的迁徙

生活在太平洋的鲑鱼，有返回它们曾孵化过后代的河流的特性。这些在海洋中度过部分生活的动物，为了繁殖又回到淡水中。

初夏，当鲑鱼开始旅行时，其颜色为鲜红色。但是，它们的旅行快结束时，颜色变黑了。它们开始迁徙时，首先接近海岸并努力进入河流。它们以跳跃的方式，越过汹涌的河流向孵化地逆流而上，途中还要战胜瀑布和堤坝等障碍。长达3,500–4,000公里的旅行接近尾声时，雌性鲑鱼欣然得卵，就如雄性鲑鱼有了精子一样。到达孵化地以后，母鲑鱼产下三到五千个左右的卵，而公鲑鱼使它们受精。由于迁徙和孵化，这些鱼受

到严重的伤害。排卵的母鲑鱼变得疲惫不堪；它们的尾鳍破损，皮肤开始变黑。公鲑鱼也同样受苦。不久，河流中浮现着死鲑鱼。但是，新一代鲑鱼即将诞生，并开始相同的旅行。

鲑鱼怎样完成这样的旅行，孵卵之后怎样回到大海，又怎样找到回去的路，正是有待回答的一些问题。虽然有人提出很多看法，但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是什么力量使鲑鱼经历数千公里的旅行，返回到它们并不知道的地方呢？显然，有一个无上的意志，在统治和引导着所有这些生物。这就是真主，众世界的养育者。

考拉



对许多哺乳动物来说，桉树叶里的油脂是有毒的。这是桉树用来对付敌方的“化学武器”。然而，有一种特殊的动物，却能较好地利用这些毒汁，并以此为生：有袋动物考拉。考拉不仅以这些桉树为栖息地，也以它们为食，并从那里得到所需的“饮料”。

像其它哺乳动物一样，考拉也不能消化树里的纤维素。这样，它依赖可以消化纤维素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大量汇集在大小肠的接合处；盲肠是肠道系统末端的延伸部分。盲肠是考拉消化系统中最有趣的部分。这个器官像个发酵中心，它通过延缓叶子里的毒素，使微生物得以消化。因此，桉树里的毒油对考拉没有丝毫影响。[191]

静态中的捕猎能力

南非的茅膏菜，用它粘性的绒毛诱捕昆虫。这种植物的叶子充满长长的红色绒毛。绒毛尖上覆盖着一层液体，其中带有吸引昆虫的气味。这种液体的另一个特性是粘性极高。接近



图中可以看到展开的茅膏菜逐步关闭。

气味的昆虫，会被这些粘性绒毛紧紧粘住。不久，整个树叶合拢，绒毛将昆虫缠住，该植物通过消化昆虫，获得自己需要的蛋白质。[192]

不能移动固定位置的植物，却有如此本领。这无疑是一种特别设计的证据。一种植物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意识、意志或巧合，具备这样的捕猎方式。因此，无视创造者的存在和力量，更是不可能的举动；正是造物主给它们配备了这种能力。

羽毛的设计

乍一看，鸟的羽毛结构似乎非常简单。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它们时，就会发现羽毛非常复杂的结构；它轻巧、坚固并防水。

为了便于飞行，鸟应该尽可能的轻。由角蛋白组成的羽毛正好适应这个需求。羽毛茎干的两边是静脉，在每条静脉上有大约400个极小的倒刺。在这400个倒刺上，又是更小的800个倒刺，即每个倒刺上有两个。挤在一根小小羽毛上的这800个更小的倒刺中，在每个倒刺的前半部分上，还各有另外20个倒刺。这些倒刺像缝合起来的两块布一样，把两根羽毛彼此扣紧。一根羽毛里大约有3亿个极小的倒刺。鸟的全部羽毛里，倒刺的总数大约为7000亿左右。把羽毛用倒刺和弯钩，彼此牢固地锁在一起，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羽毛应牢牢地绑定在鸟身上，以便在任何运动中不致脱落。由倒刺和弯钩组成的这个

体系，使羽毛紧紧附着在鸟身上，所以，不论遇到大风、暴雨还是大雪，都不能造成羽毛的脱落。

而且，鸟腹部的羽毛，与翅膀和尾巴上的羽毛是不一样的。尾巴上的羽毛相对较大，起着方向盘和刹车的作用；翅羽较宽，翅膀拍打时扩大面积，因此增加升力。



蜥蜴：水上行走的专家

很少有动物能在水面上行走。这种稀有的动物，就是生活在中美洲，并在水下可以看见的蜥蜴。蜥蜴后脚趾的边上，长着使它们能够泼水的蹼。当它们在陆地上行走时，这些蹼就卷起来。如果这种动物遇到危险时，它就开始在河面或湖面上，非常迅速地奔跑。然后，它的后脚上的蹼张开了，这样，在水上奔跑时得到了更广的接触面。[193]



蜥蜴是能够在水面与空中平衡移动的罕见的动物之一。

蜥蜴的这种独特设计，是造物主有意识创造的证据之一。

光合作用

无疑，植物在宇宙成为可居住的地方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主要的角色。它们为我们清洁空气，使我们居住的行星保持宜人的温度，平衡大气中气体间的比例。我们从空气中吸入的氧，是由植物生产的。我们食物的主要部分也来自植物。植物的营养价值，源自其细胞中的特别设计；这也归功于它们的其它特性。

与人和动物的细胞不同，植物的细胞能直接利用太阳能。它把太阳能转变成化学能，并用非常特殊的方式，把它储存在营养物里。这个过程叫做“光合作用”。实际上，这个过程不是由细胞实施的，而是由叶绿素，即供给植物绿色的细胞器完成的。这些只能在显微镜下看到的绿色细胞器，是地球上唯一能在有机物中储存太阳能的“实验室”。

每年，地球上的植物生产的这类物质的数量在2000亿吨左右。这对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至关重要。植物的生产行为，是在非常复杂的化学过程中实现的。在叶绿体中发现的数千种“叶绿素”，对色光的反应时间极短，大约在千分之一秒的惊人的时间内完成。因此，人类仍然观察不到在叶绿素里发生的很多活动。

把太阳能转变成电能或化学能，是最近的技术性突破。为了做到这一点，人们使用了高科技的仪器。但是，一个小得肉眼根本看不见的植物细胞，数百万年以来，却一直执行着这项任务。

这完美的系统，向人们再次显示了创造。光合作用的复杂系统，是有意设计的机制——真主创造的机制。一家无与伦比的工厂，竟然出自极小的叶子之中。这种完美的设计，只是万物中存在的迹象之一；它向人们揭示，所有的生物都是安拉——众世界的维护者的创造物。

预告！

你现在要读的这一章，揭示了你生命中一个重要的秘密。你应该非常仔细而完整地阅读；因为，这一主题会改变你对这个外部世界的根本看法。本章的主题不只是一种观点，一种不同的方法或任何一种传统的哲学思想：这是一种人人必须承认、并被今天的科学所证实的事实——不管是否信仰宗教。

物质的真正本质

依靠良知与智能观察自己所处之环境的人们认识到，宇宙中的一切有生物和无生物，一定是被创造的。所以，问题就成了“所有这一切的创造者是谁？”

显然，“创造的事实”本身揭示，宇宙中的每一个方面，都不可能是宇宙自身的产物。例如，一个小虫子不会创造自己，太阳系不会创造或组织自己；植物、人类、细菌、红血球、蝴蝶等等都不会创造自己。甚至这一切“偶然”形成的可能性，也是不敢想象的。

因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我们看见的一切都是被造物。而且，我们所看见的所有事物中，其本身不可能是“创造者”。创造者不同于我们用眼睛所看到的一切，是看不见的超然的力量；但创造者的存在与特性，昭示在所有的存在中。

那些否认真主存在的人们，正是在这一点上提出异议。这些人不相信真主的存在，除非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见他。这些漠视“创造”事实的人们，对整个宇宙中显而易见的“创造”视而不见，并虚伪地证明宇宙和其中的生物不是被创造的。进化论就是它们徒然努力、走向末路的关键例子。

否认真主的人们所犯的基本错误在于：很多人并非真地否认真主的存在，而是对真主有了错误的理解。他们不否认创造，而对真主“在哪里”这一点上产生迷信的信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真主在“天”上。他们默默地遐想，真主在一颗非常遥远的行星后面，并偶尔干预“人间事物”；
或者他根本不管一切：创造了宇宙，然后把它抛弃；让人们自己确定他们的命运。

另外，有人已经听说，在《古兰经》里写着真主“到处”存在，但他们不能领悟其确切的含义。他们悄悄认为，真主围绕在物质周围，就像无线电波或一种看不见的无形的气体。

然而，这些不能确定真主“在哪里”的观念和别的信条(或许因此而否认他)，全部基于一个共同的错误。他们怀着没有任何根基的偏见，然后得出对真主的错误判断。这个偏见是什么呢？

这个偏见涉及自然和物质的特性。我们如此习惯于对物质存在的迷信，以致从不考虑物质是否确实存在，或者那只是个影子。现代科学推翻了这个偏见，并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而壮观的事实。在下面的几页里，我们将努力解释《古兰经》中早已指出的巨大事实。

电子信号的世界

我们对自己生活的世界的全部信息，是由我们的五官感觉传达的。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是由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及触觉构成的。我们从不认为“外部”世界与我们的感受有所不同，因为我们从出生起，只依赖这些感觉认知世界。

在科学的许多不同领域内的现代研究，同时提出了很不相同的理解，并对我们的感官以及我们通过感官认识的世界，提出严肃的怀疑。

这种理解的起点是：我们脑海中形成的“外部世界”的概念，只是电子信号在我们大脑中产生的反应。苹果的红色、木头的硬度；你的父母亲、家庭和你拥有的物品、房子、工作和这本书，仅仅是你脑中的电子信号。

弗雷德里克·威斯特解释说，科学已经触及了这一主题：

> “有些科学家声明‘人类是图像，他经历的一切是暂时的、虚幻的，宇宙是个影子’。这种说法好象得到了当今科学的证明。”[194]



来自物体的刺激效果，变成光电信号后在大脑中引起“感应”。当我们“看”时，其实在看大脑中的光电信号。

著名哲学家乔治·伯克利对此评论如下:

“我们相信物体的存在，只是因为我们看见并接触了它们，是由我们的感觉反射过来的。但是，我们的感知只是头脑里的想法。因此，我们通过感觉迷住的物体，不过是想法而已，这种想法本来就在我们的头脑里.....既然这一切只在头脑里存在，那么，这就意味着：当我们想象头脑之外存在的宇宙和事物时，就上当受骗了。因此，在我们的头脑之外，决不存在周围的事物。” [195]

为了验证这个主题，让我们想想我们的视觉；它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外部世界的最广泛的信息。

我们如何观看、听闻、品尝的?

视觉活动由眼睛接收外界光线的刺激，通过视神经、大脑中的视觉中枢的共同活动来完成。外界物体发出或反射的光线，从眼睛的角膜、瞳孔进入眼球，穿过如放大镜的晶状体，使光线聚焦在眼底的视网膜上，形成物体的图像。

也就是说，光线变成光电信号，并由神经元传输到位于大脑后部的一个极小的点上——即视觉中枢。视觉活动实际上发生在这个漆黑，并完全与光源隔离的小点上。

现在，让我们再考虑这个看似平常的过程：当我们说“我们看见了”时，看见的实际上是进入我们眼睛的刺激效果、变成光电信号后在大脑中引起“感应”。即，当我们说“我们看见了”时，其实在看大脑中的光电信号。

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所有图像，是在一个只有几立方厘米的视觉中枢形成的。你正在读的这本书，你所见到的无限的景观，你注目的地平线，都映入这个小小的空间。我们必须记住的另一点是，光线与大脑隔离，即大脑内部一团漆黑；大脑本身与光线没有联系。

我们可以举例解释这个有趣的情形。让我们假设，我们面前有一根燃烧的蜡烛。我们坐在蜡烛的对面，并久久地观看。然而，在此期间，我们的大脑与蜡烛的光源，未曾有过直接的接触。即使我们观看烛光时，我们的大脑里面却是漆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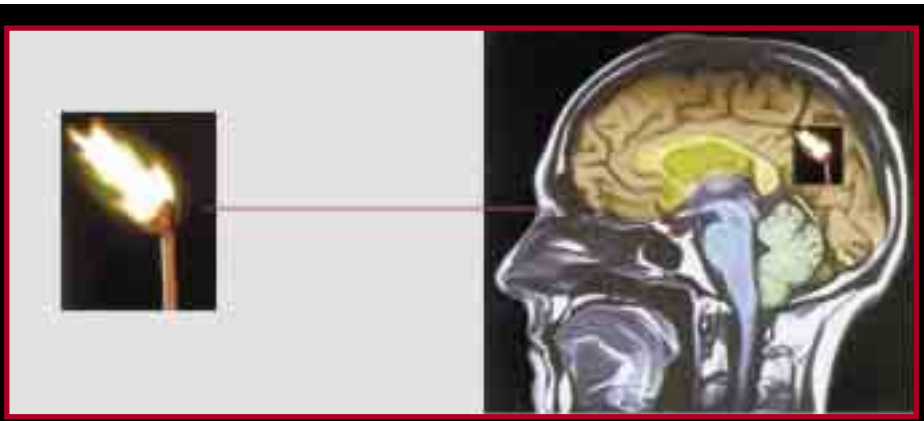
R.L.格雷戈里用下面的解释，说明我们习以为常，但又不可思议的视觉特点：

> “我们对视觉太熟悉了，但需要解决有关问题时，我们只好发挥无比的想象力了。请好好想一想。我们在眼睛里看到的，是极小的颠倒的图像，并在周围环境中，看见分离的固体物质。从视网膜的模拟图像中，我们认识物体的世界，而这并不亚于奇迹。”[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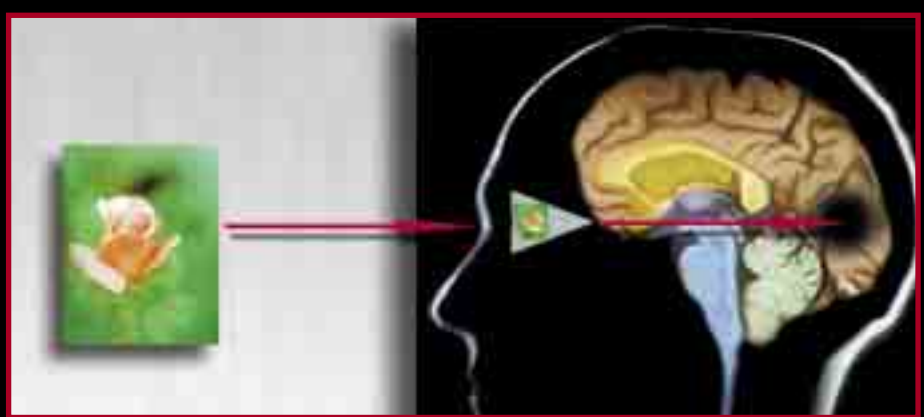
我们的其它感官，与这种情形一样。声音、触觉、味道、气味都以电子信号的形式传输到大脑，并在大脑中的相关中心得以感知。

听觉也是这样发生的：外耳通过耳廓收集声波，并将其传输到中耳；中耳通过振动，将声波传输给内耳；内耳通过振动，把声波翻译成电子信号、传输给大脑。正如眼睛的情形一样，听觉活动最后在听觉中枢中实现。光线与大脑隔离一样，声音也与大脑隔离。因此，不管外面多么嘈杂，大脑里面依然静悄悄。

不过，即使最细微的声音也被大脑所察觉。这种声音如此精确，以致健康人的耳朵，在没有任何大气噪音或干扰的情



即使我们在感觉火的光与热的瞬间，我们的大脑内依然一片黑暗，温度也毫无变化。



来自物体的光束倒射在视网膜上。在此，转换成电子信号的图像，传输到大脑后部的视觉中枢。由于光线不能进入大脑，因此光线也不可能到达视觉中枢。这意味着我们能从一个光线到达不了的一个小点上，观看着五光十色的世界。

况下，能够听到一切。正是你那与声音隔离的大脑，欣赏着管弦乐队的交响乐，听见喧闹之地的杂音，以宽广的频率，感知树叶的瑟瑟声和喷气式飞机的隆隆声。但是，如果那时用一个精确的仪器，来测量你大脑中的音量，大脑看见的却是个无声的世界。

我们嗅觉的形成与之相似。来自花草或玫瑰的挥发性分子，进入鼻子中的嗅觉感受器；它位于鼻子上皮细胞中的敏



我们在漆黑的大脑里，看见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就像透过窗户，从漆黑的屋子里看着一座多彩的花园。

感的纤毛间，并在感受器中发生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以电子信号的方式传送到大脑，并且形成嗅觉。最终我们闻到的不论是好是坏的气味，都是这些挥发性分子经过交互作用，而变成的电子信号，仅仅在我们大脑中形成的感知。你在大脑里能感觉香水、鲜花的气味；你喜欢的食物、大海的味道；你喜欢或不喜欢的其它气味。像声音和图像一样，气味分子本身并未进入大脑，进入大脑的只是电子信号。换言之，自你出生时起，你所闻到的所有气味，属于外部物体；它们只是通过你的感官得到的电子信号。

同样，人的舌面上有四种不同类型的化学感受器。它们是用来品味酸、甜、苦、咸的。我们的味觉感受器，经过一系列的化学过程之后，把这些感觉转变成电子信号，并且把它们传送到大脑。这些信号在大脑中感觉到味觉。当你吃巧克力或喜欢的水果时，口中的味觉是大脑对电子信号的“翻译”。你永远不能接触外面的物体；你永远不能看见、嗅出或品味巧克力本身。例如，如果切断大脑中的味觉神经的话，那你所吃食物的味道，就到不了你的大脑；你将完全失去味觉。

对此，我们用另一个事实来说明：我们不能确定品尝食物时的感觉，也不知道另一个人品尝同样食物时的感觉，或者当

我们听声音的感觉，与另一个人所听的同一声音的感觉。林肯·巴尼特就此说道，没有人能知道另一个人感觉到的红色或听到的音符C（哆），会与自己感觉到的一样。[197]

我们的触觉与上述感觉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当我们触摸某一物体时，帮助我们认识外部世界和物体所有信息的，是由皮肤的感觉神经传输到大脑的信号；触觉在我们的大脑里形成。与一般的认识不同，我们感受触觉的地方，不是指尖或皮肤，而是大脑里的触觉中心。

大脑对物体的电刺激做出评断的结果，使我们对那些物体有了不同的感觉，比如，硬或柔，热或冷。从这些刺激中，我们得到帮助认识一个物体的全部细节。关于这个重要的事实，两位著名的哲学家B.拉塞尔和L.韦特格尼斯坦（Wittgeinstein）的想法如下:

“例如，不可询问并检查柠檬是否真地存在，以及它怎样开始存在的。柠檬不过是由舌头感觉到的味道，鼻子闻到的气味，眼睛看到的颜色与形状，并且这些特征只能成为研究和



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所有图像，是在一个只有几立方厘米的视觉中枢形成的。你正在读的这本书，你所见到的无限的景观，你注目的地平线，都映入这个小小的空间。所以，

我们看见的不是物体外部存在的实际尺寸，而是我们大脑中感觉到的尺寸。

评价的主题。科学永远不会认识物质世界。”[198]

我们不可能到达物质世界。我们周围的全部物体，诸如看到、听到、摸到的物体，都是感知的集合。视觉中枢和其它感官中枢，处理了这些数据；大脑一生中所面对的物体，并非存在于我们外面的“原物”，而是大脑里的“复印件”。我们正是在这一点上被误导了：把这些副本当成我们外部的真正物质的例子。

我们脑子里的“外部世界”

至此，从我们所描述的物理事实，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我们看见、触摸、听到的一切，我们称为“物质”、“世界”或“宇宙”的概念，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发生的电子信号。

例如，某人所吃的水果，其实不是真切的水果，而是大脑中的感觉。某人说成“水果”的物体，实际上是水果的形状、味道、气味、质量在大脑里组成的电子印象。如果突然切断进入大脑的视神经，水果的图像也将突然消失。或者说，切断从鼻子的感受器到大脑的神经，嗅觉就会完全中断。就如水果一样，它不过是大脑对电子信号的解释。

需要考虑的另一点，是对距离的感觉。距离，比如你与本书之间的距离，只是在你大脑中形成的一种空的感觉。一个人认为离自己很远的物体，其实也是大脑里的存在。例如，有人仰望天上的星星，以为它们距他有数百万光年之远。然而，他所“看见”的星星，实际上是他的视觉中枢中的星星。你读这些文字时，其实不在你认为的房间里；相反，房间却在你里面。你一看见自己的身体，就以为你在身体里面。但是，你必须记住，你的身体同样是大脑里形成的一幅图像。

这同样适用于你的其它感觉器官。例如，你认为听到了隔壁房间的电视的声音，其实你正体验大脑里的声音。你既不能证明隔壁有个房间，也不能证明那个房间里的电视的声音。你认为来自几米远的声音和你身边谈话的声音，是你大脑中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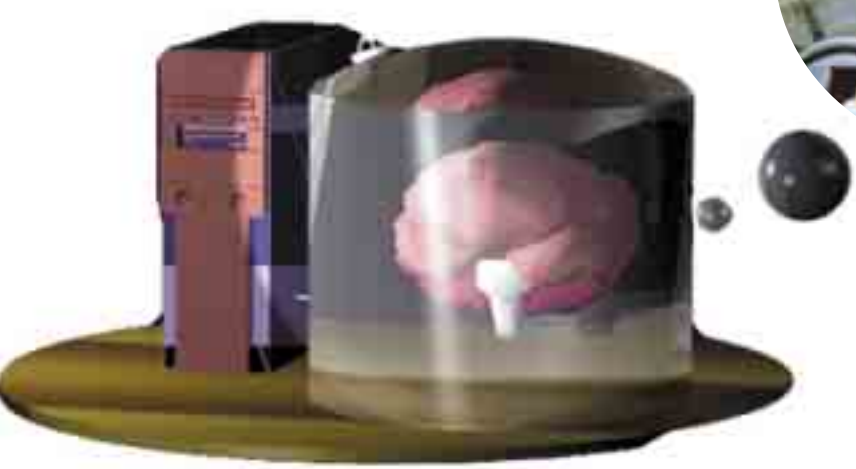
立方厘米的听觉中枢感觉到的。除这个感觉中枢外，再没有什么左右、前后的概念。即，声音不是来自右侧，也非来自左侧或空中；不存在声音到来的方向。

你感觉到的气味也是如此；它们不是从遥远的地方到达你这里的。你推想在嗅觉中枢形成的末端效应，是外部物体中的气味。但是，正如你的视觉中枢的玫瑰图像一样，玫瑰的气味也在你的嗅觉中枢中；你不会知道玫瑰或气味是否真地存在。

我们通过感知认识的“外部世界”，只是进入大脑的电子信号的汇集。在我们的一生中，大脑处理这些信号；我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生活在误导之中——自以为“外部世界”中存在的物质，是最初的“版本”。我们之所以被误导，是因为我们永远不能通过自己的感官，到达物质本身。

还有，解释并赋予信号涵义的大脑，使我们认为自己属于这个“外部世界”。例如，让我们想想听觉吧：正是我们的大脑，把声波转换成交响乐的。也就是说，音乐也是大脑营造的感觉。同样，当我们看见颜色时，进入眼睛的只是不同波长的电子信号；把这些信号转换为颜色的，也是我们的大脑。“外部世界”中并没有颜色。既没有苹果的红色，也没有天空的蓝色和树的绿色。它们显得那样，只是因为我们的感觉如此。“外部世界”完全取决于感觉者。







现代物理学的发现显示，宇宙是感觉的汇集。美国有名的科学杂志《新科学家》，在1999年1月30号的封面上，以下列问题谈到这个事实：“超越现实：宇宙真是最初的嬉戏与虚幻的物质吗？”

如果眼睛的视网膜里有一个最轻微的缺陷，就会引起色盲。有人把蓝色看成绿色，有人把红色看成蓝色，也有人把所有的颜色看成不同色调的灰色。对他们而言，物体的外面是否有颜色，已无关紧要了。杰出的思想家伯克利也提到这个事实：

> “一开始，人们认为颜色、气味等等‘真地存在着’；但后来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并且发现它们只依靠我们的感觉而存在。”199

总之，我们看见带色的物体，不是因为它们有颜色，或它们是我们之外独立物质的存在。事实上，我们归因于物体的全部性质，就在我们之中，而不在“外部世界”。

那么，“外部世界”中还剩下什么呢？

“外部世界”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反复提到“外部世界”及在我们脑海中形成的感知世界；后者是我们看见的世界。但是，既然我们实际上从未到达“外部世界”，又怎能确信这样一个世界的真正存在呢？

诚然，我们不能确信这个世界的存在。既然每个物体只是一种知觉的收集，而且这些知觉只存在于大脑里，那么，更确切地说，真正存在的唯一世界，是感知的世界。我们知道的唯一世界，是存在于我们脑子里的世界：一个设计、录制、生动的世界；简言之，是在我们脑子里创建的世界。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唯一世界。

我们决不能证明，在脑子里观察到的知觉与物质相关。这些知觉很可能出自“人造的”来源。

观察这一点是可能的。虚假的刺激会在我们头脑里产生想象中的“物质世界”。例如，让我们想想录入各种电子信

号的先进的录音设备。首先，我们把所有相关的数据（包括身体图像），以电子信号的方式传入这个设备；其次，让我们想象：你的大脑脱离身体后还能够存活。最后，让我们利用具有神经作用的电极，将这台录音机与你的大脑连接起来，并将录好的数据发送到你的大脑。这时，你将感到自己好象生活在这一人工环境中。比如，你会轻易地相信，你正驾车疾驶在高速公路上。我们绝不可能理解，你只是由大脑组成的。这是因为，你的头脑中需要构成的世界，并非真正的世界，而是外部的刺激起了作用。这些刺激完全有可能来自人为因素，如录音机。

著名哲学科学家伯特兰·拉塞尔就此写道：

> “我们用手指按压桌子时的感觉，是我们指尖上的电子和质子的一次电子干扰；根据现代物理学，是桌子上的电子与质子的接触而产生的感觉。如果我们指尖的相同干扰，以其它方式出现，就算没有桌子也会有相同的感觉。”200

是的，一旦离开与真正存在的物质的联系，那些想当然的感觉，就容易欺骗我们。我们时常在梦里经历这种感觉。我们在梦中经历的事件，看见的人、物体和场景，似乎都是真实的。但是，这些只不过是感觉。梦与“现实世界”之间没有基本的差别，它们都是大脑里的经历。

谁是感知者？

就如迄今我们所陈述的一样，毫无疑问，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所谓的“外部世界”，都是在大脑中形成的。但是，这里出现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的所有自然事件，都是固有的知觉，那我们的大脑又是什么呢？由于我们的大脑属于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就像手臂、腿子或其它物体一样，那么，它也应该同样是一种知觉。

我们通过梦进一步说明这个主题。让我们假定，我们在脑

子里看见了一直在说的梦境。在梦里，我们将拥有想象中的身体、想象中的手臂、想象中的眼睛和想象中的大脑。在梦中，如果有人问我们“你在哪里看？”，我们将回答“我在大脑里看”。然而，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大脑，只是一颗想象中的脑袋和大脑。看到影像的不是梦中想象出来的大脑，而是一个比之更“超凡”的“存在”。

我们知道，梦境与我们称为真实生活的场景之间，并没有物质性的区别。所以，当有人在“真实生活的环境中”，问“你在哪里看”时，我们上述例子里的答复“在我大脑里”，则毫无意义。在两种情况下，看见并感觉的实体不是大脑，那毕竟只是一大块肉。

当我们分解大脑时，看见的只是类脂和蛋白分子；这同样存在于其它生物体里。这表明在我们叫作“大脑”的这块肉里面，不存在观察图像、形成意识或创造称为“我自己”的存在。

R.L.格里高利提到人们的大脑，在感知图像方面所犯的错误:

> “有一种必须回避的诱惑：人们说眼睛造就了大脑里的图像。大脑里形成的图像暗示，看见它需要某种内部的眼睛——但这更需要看见眼睛之图像的一只眼睛.....等等眼睛与图像之间无穷的复原。这是可笑的。”[201]

这正是处于困境中的唯物主义者的一个难点；它们只承认物质是真实的存在。那么，可以看见的“内部眼睛”、它所看见与反应的感觉属于谁呢？

关于谁是感知者，卡尔·彼尔布雷姆（Pribram）也关注在科学与哲学界，引起重视的这个问题:

自希腊人开始，哲学家们推测机器中的“幽灵”、“小人里的小人”等。这个“我”在哪里——使用大脑的实体？谁是实际的知道者？或者说，正如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曾说的“我们寻找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202]

现在，请想一想：你手中的书、所在的房间，总之，你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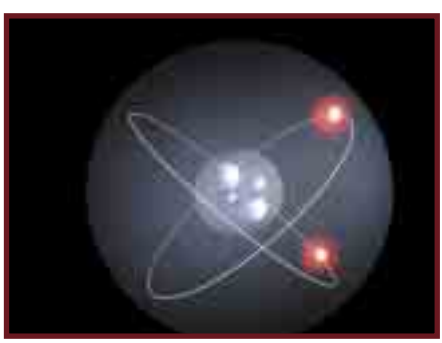
前的一切都是你大脑里看到的。看见这些图像的果真是原子吗？那既盲又聋又无意识的原子吗？为什么一些原子有这种性质，而另一些却没有呢？我们思维、理解、记忆、快乐、伤心以及别的一切行为，都是由这些原子之间的电气化学反应所构成的吗？

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时就会发现，在原子中寻找意志，则毫无意义。显然，看、听、知的存在，是一种超越物质的生命。这一生命是“活着的”，而且，它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物质的图像。这一生命通过利用我们身体的图像，把它面前的知觉联合起来。

这个生命就是“灵魂”

我们叫作“物质世界”的感知的总和，是灵魂观察到的一个梦。正如我们在梦中拥有的身体和看见的物质一样，它们并无真实之处；我们占用的宇宙和拥有的身体，也没有物质的现实。

真正的生命是灵魂。物质只是由灵魂看到的知觉组成的。著述并阅读这些文字的聪明的人类，不是原子和分子的分别堆积——也不是它们之间的化学反应，而是“灵魂”。





大脑是由蛋白质和脂肪分子组成的细胞堆。 它是由叫做神经元的神经细胞形成的。这块肉没有观察图像、构成意识或创造我们称为“我自己”的能力。

真正绝对的生命

所有这些事实，使我们面对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物质世界的一切事物，只是灵魂所看到的知觉；那么，这些知觉的根源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考虑以下事实：物质没有“自治的”存在；因为，物质是由知觉产生的，是“人造的”事物。即，这个知觉必须是另一力量作用的产物；这表明物质必须是被创造的。而且，这个创造应该是连续性的。如果没有连续而协调的创造，那我们所说的物质，将会消亡或丢失。这正如只要广播信号继续，电视屏幕上的图像才会播出。那么，是谁使我们的灵魂观看星星、地球、植物、人类、我们的身体和别的一切呢？

很明显，的确存在一位造化整个宇宙的超然的造物主：他创造知觉的总和，并不断地继续造化。因为，这个造物主展现了如此宏伟的创造，所以，他当然拥有永恒的权利和威力。这个造物主把自己介绍给我们，他降示经典，并亲自通过这本经典描述我们、宇宙和我们存在的原因。

这个造物主就是真主，他的经典就是《古兰经》。

天地的事实表明，即宇宙是不稳定的，唯有真主的创造，使它们才有可能存在；当他结束这一造化时，它们都将消失。这一切，都在以下经文中解释道：

> **“真主的确维持天地，以免毁灭；如果天地要毁灭，则除真主外，任何人不能维持它。他确是至容的，确是至赦的。”**（《古兰》35：41）

我们在开始的篇章里提到，一些人对真主没有真正的理解，他们因而想象：真主只是天空某处的存在，并不真地干预世间事务。这个逻辑的依据，实际上基于这种思想：宇宙是物质的集合，真主在这一物质世界的“外部”——在一个遥远的所在。在一些假宗教里，对真主的信仰就局限于这种理解中。

但是，根据我们已所作的分析来看，物质只是由感觉组成的。而唯一真正绝对的存在是真主。这表明，只有真主才是存在：除他之外的一切，都是图像。因此，不可能把真主设想为这一物质整体之外的孤立存在。真主的确“无处不在”，并且周知万物。这个现实在《古兰经》里解释如下：

> **“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是维护万物的；瞌睡不能侵犯他，睡眠不能克服他；天地万物都是他的；不经他的许可，谁能在他那里替人说情呢？他知道他们面前的事，和他们身后的事；除他所启示的外，他们绝不能窥测他的玄妙；他的知觉，包罗天地。天地的维持，不能使他疲倦。他确是至尊的，确是至大的。”**（《古兰》2：255）

真主不受空间的限制和周知万物的事实，在《古兰经》的另一章节里说明如下：

> **“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无论你们转向哪方，那里就是真主的方向。真主确是宽大的，确是全知的。”**（《古兰》2：115）

由于肉体的存在物分别是一种知觉，所以，它们看不见真主；但真主能看见他所创造的全部事物。《古兰经》对这个事实这样说明：**“众目不能见他，他却能见众目。他是精明的，是彻知的。”**（《古兰》6：103）

就是说，我们不能用眼睛察觉真主的存在，但真主却完全围绕在我们的体内、体外、外观和思想中。离开他的知识，我们不能发音说话，甚至不能呼吸。

当我们观察生命中的感官知觉时，最接近我们生命的，不是这些知觉，而是真主的本体。《古兰经》揭示这一隐藏在现实中的奥秘：**“我确已创造人，我知道他心中的妄想；我比他的命脉还近于他。”**（《古兰》50：16）当一个人认为他的身体是由“物质”组成时，他无法理解这个重要的事实。如果他认为他的大脑是“他自己”，那么，他所接受的外部空间，将

是离他20-30厘米的地方。但是，当他想到并没有物质这样的东西，一切都是想象中的事物时，诸如外部、内部、远近的概念就失去意义了。真主已经围绕着他，真主离他是“临近的”。

真主告知人类，他是“临近”于他们的：**“如果我的仆人询问我的情况，你就告诉他们：我确是临近的，确是答应祈祷者的祈祷的。”**（《古兰》2：186）另一节启示同样的事实：**“当时我曾对你说：‘你的主是周知众人的。”**（《古兰》17:60）

人类为这种想法所误导：认为最接近他的是他自己。实际上，真主比我们自己更接近我们。他在《古兰经》中呼唤我们重视这一点：**“（你们）怎么不在灵魂到将死者的咽喉的时候——那时侯，你们大家看着他，我比你们更临近他，但你们看不见。”**（《古兰》56：83-85）正如本节经文所说的，人们在并未意识到这个明显事实的状态下生活，因为他们用眼睛看不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只是阴影的人，不可能具有独立于真主的力量和意志。**“真主创造你们，和你们的行为”**（《古兰》37:96）一节经文显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真主的控制下发生的。《古兰经》陈述这个现实：**“当你射击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射击，而是真主射击了。”**（8：17）从而强调任何行为，不能脱离真主的控制。由于人类是阴影般的生灵，他就不能自己实施射击的行为。然而，真主赐予这个影像以自我射击的感觉。事实上，执行全部行为的正是真主。因此，如果一个人认为，是他自己实现了这些行为的话，那他显然是故意欺骗自己。

（你们）怎么不在灵魂到
将死者的咽喉的时候
——那时侯，
你们大家看着他，我比你们更临近他，
但你们看不见。（《古兰》56：83-85）

这就是现实。人可以不去承认它，并且可以认为自己是个不依赖真主的生灵；但这不会改变什么。当然，人的不明智的否认，是违背真主的意志和愿望的。

你所拥有的一切实质上是幻影

显而易见，“外部世界”并不存在的物质现实，是符合科学与逻辑的事实；一切都是真主永恒地呈现在我们灵魂之中的“影集”。人们通常只是不包括或不想包括“外部世界”概念中的一切事物。

如果你真诚并大胆地考虑这个问题的话，你会发觉你的家、里面的家具、也许新买的汽车、办公室、珠宝、银行账户、衣橱、配偶、孩子、同事和你所拥有的其它事物，实际上包括在为你设置的“虚构的外部世界中”。你用五官在周围看到、听到、闻到的一切事物，都是这个“虚构世界”的一部分；你喜欢的歌手的声音，你坐的椅子的软硬，你喜爱的香水的味道，使你温暖的阳光，缤纷的花朵，窗前飞翔的小鸟，海面上疾驶的游艇，富饶的花园，工作中使用的计算机或世上技术高超的音响.....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这就是现实。因为，世界只是为了考验人类而创造的图像的汇集。人类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受到并不真实的知觉的考验。这些知觉显示了特别的吸引力。《古兰经》提到这个事实:

大多数人为贪图今世的财富和安逸，而抛弃了宗教信仰；他们仅仅重视今世却忘记了后世。金银财宝、银行存款、信用卡、时髦衣服、新款汽车等等成了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他们为今世生活的“魅力”所欺骗，从而忽视可以得到后世收获的礼拜、济贫、功修，并且说“我有事要做”，“我有理想”，“我担任某项职务”，“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我的事情还没完成”，“我将来做宗教上的这些事”。他们只为



如果人们深入思考在此说过的话，他将意识到自己周围的这个神奇、非凡的环境：世上的一切事件只是想象……

今世的荣华富贵而消耗生命。《古兰经》描述这种对生活的误解：“**他们只知道今世生活的表面，他们对于后世，是疏忽的**。”(30:7)

我们在本章阐述的事实，即一切事物只是影像的事实，对揭示这些毫无意义的欲望和追求，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事实清楚的显示，人们所拥有并努力得到的财富，贪婪所得的财富，夸耀的儿女，认为最亲近的配偶与朋友，她们诱人的身段，高高在上的职位，就读的名牌大学，度过的假期——只不过是幻像。所以，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时光与贪婪都是无效的。

这就是人们并不经意地自我愚弄的原因：他们炫耀财富和地位，或者夸耀似乎永远存在的“游艇、直升飞机、工厂、持有的股票、别墅和土地”。这些乘坐游艇到处闲逛的阔

佬们，向人们炫耀自己的小车，不停地谈论财富，自以为他们的地位比别人高，并认为他们因此而获得了成功。这些人应该意识到，一旦发觉他们的成功只是幻像的时候，自己处于何种境地。

实际上，这也是梦里多次见到的场面。在梦中，人们也拥有房子、小车、价值连城的宝石、成堆的钞票和金银；在梦中，人们也得到高官厚禄、数千工人的工厂、掌握统治众人的权势、穿着人人羡慕的服饰……。就像有人夸耀梦中财富时，被人奚落的境地一样，炫耀今世看到的影像，也会让人笑话。总之，人在梦中及今世所看到的一切，终究是大脑里的影像而已。

同样，人们对今世经历的事情作出的反应，当他们认识真相时就感到惭愧。那些互相残酷争斗、大喊大叫、行骗、受贿、伪造、说谎、吝啬、干歹、打骂、暴虐、全力追求官职、嫉妒、使劲炫耀、自吹自擂的人们，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做着梦中之事时，就会感到羞愧。

> “迷惑世人的，是令人爱好的事物，如妻子、儿女、金银、宝藏、骏马、牲畜、禾稼等。这些是今世生活的享受；而在真主那里，却有优美的归宿。”
> 《古兰》3：14

既然正是真主创造了所有这些影像，那世间一切事物的最终拥有者，就只能是真主。《古兰经》强调这个事实：

“**天地万物，只是真主的。真主是周知万物的。**”(4:126)

为了虚幻的贪欲而放弃宗教信仰，并因此丧失永恒的生命，是莫大的蠢举。

我们应该很好地把握这段旅程：我们在此并非告诉大家，你所“拥有的全部财富、儿女、配偶、朋友、职位迟早将会消失，因此它们没有任何意义”，而是想说，“你似乎拥有、其实根本不存在的一切事物，只是睡梦一场，是真主为了考验你而组成的影像”。你知道，这两种说话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虽然一个人不想立即承认这个事实，并且宁愿以他所拥有的一切实在的事物，来欺骗自己，但最后他死去并再生时，来世中的一切事物，将变得一清二楚。那天，人们的**“眼光是锐利的”**（《古兰》50：22），而且人们容易把一切看得更清。但是，如果他为了追求虚幻的目标而度过一生的话，就会希望自己宁愿在今世从未生活过，而且说**“但愿尘世的死亡已了结我的一生！我的财产于我毫无裨益，我的权柄已从我的手中消失。”**（《古兰》69：27-29）

另一方面，一个聪明人应做的，是他在今世仍有时间的时候，努力了解宇宙中最伟大的真相。否则，他将在梦中虚度一生，最终面对痛苦的处罚。《古兰经》针对那些在今世追求虚幻(或“海市蜃楼”)，并忘记自己的创造者的人们，最终将面临的结局说明如下：

> **“不信道者的善功恰如沙漠里的蜃景，口渴者以为那里有水，等到他来到有蜃景的地方时，没有发现什么，却发现真主在那里。真主就把他的帐目完全交给他，真主是清算神速的。”**（24：39）

唯物主义者缺乏逻辑依据

本章一开始，我们就清楚地阐明，物质并非唯物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绝对的存在，而是真主创造的感觉的汇集。唯物主义者以极其教条的方式，对抗这一摧毁其哲学的明显事实，并且提出毫无根据的相反命题。

例如，20世纪唯物主义哲学最大的鼓吹者之一、热心的马克思主义者乔治·波利特兹尔（Politzer），把“公共车例子”作为物质存在的“最大证据”。按照波利特兹尔的观点，当那些认为物质是知觉的哲学家们看见公共汽车时，也会逃命，而这正是物质存在的证据。[203]

另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者约翰逊，当他得知物质是知觉的汇集时，就试图通过踢石头的行为来“证明”物质的存在。[204]

波利特兹尔的导师、与马克思一起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恩格斯提出了一个相似的例子: “如果我们吃的蛋糕只是知觉的话，那它们就不会消除我们的饥饿。”[205]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著名的唯物主义者的书籍中，也有相似例子，如“当你在脸上挨了一巴掌时，就会理解物质的存在”这种冲动的语句。

唯物主义者的这些例子在理解上的混乱，是他们把“物质是知觉”的解释，说成“物质是光的计谋”。他们认为知觉的概念，只局限于视觉以及关乎物质的触觉中。公共车把人撞倒后，人们会说: “瞧，发生车祸了，所以这不是知觉。”他们不理解的是，在公共车碰撞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撞击和痛苦，都是在大脑里形成的感觉。

梦的例子

解释这个现实的最好例子是梦。一个人在梦里会经历非常真实的事件。他会从楼梯上滚下来，并摔断腿子；会遇到严重的交通事故，可能压在公共车下，或者津津有味地吃了蛋糕。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历的类似事件，也有着与睡梦相同的感觉。

一个人梦见自己被公共车撞倒了，在梦中的医院里再次睁开眼睛，并且发现自己残废了；但这只是一场梦。他也会梦见自己死于车祸，死亡天使取走了他的灵魂，并且开始了他在后世的生活。（这次事件在现实生活中，以同样的方式经历着，就像梦里的感觉。）

这个人在梦中非常清楚地经历了事件中的影像、声音、撞击、灯光、颜色和其它感觉。他在梦中的感觉与“真实”生活中的一样自然。他在梦中吃的蛋糕使他满意，尽管那只是知觉；因为满足也是知觉。然而，实际上这个人那时正躺在床上。那里并没有可以考虑的楼梯、交通和汽车。做梦的人经历并看到了外部世界中并不存在的感受和知觉。梦中的事实说明，我

们经历、看到、感受的与“外部世界”没有物质联系的事件，非常清楚地揭示了“外部世界”绝对由感觉组成的事实。

相信唯物主义哲学的人们，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他们被告知物质本质的这个现实时，就怒火中烧了。他们引用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提出的肤浅的论据，做出情绪化的声明。

但是，这些人必须想到，他们自己在梦中也会做出同样的声明。在梦中，他们也读着《资本论》，参加会议，与警察作战时击中了头部，而且感到伤口的痛苦。有人询问梦中的情景时，他们会认为梦中的经历，也是由“绝对的物质”组成的——正如他们假定醒来后看到的事物是“绝对的物质”那样。然而，不论是梦中还是日常生活，他们看见、经历或感受的一切只是感觉的组合。

并联连接神经的例子

让我们看一下波利特兹尔的车祸例子：在这次事故中，如果被撞者通过五官进入大脑的神经，以并联方式连接到另一个人的大脑中时，比如波利特兹尔的大脑，当公共车撞击那个人的同时，也将撞击坐在家中的波利特兹尔。更确切地说，经历事故的那个人的所有感觉，波利特淄尔也将经历，正如从同一录音机的两个不同的喇叭里，听着同一支歌曲那样。坐在家中的波利特兹尔将感到、看见并经历公共车的刹车声，骨折的疼痛，送入手术室的情景，石膏的生硬与手臂的软弱无力。

把神经与那个人并联的别人，会自始至终地经历那场事故，就像波利特兹尔一样。如果事故中的那个人昏厥的话，他们都将昏厥过去。而且，如果把事故中的所有知觉用设备记录下来，并将这些知觉传送给其它人的话，那公共车会把这个人撞击多次。

梦中的世界

对你来说，现实是用手触摸、用眼睛看见的一切。在梦中，你同样会“用手触摸、用眼睛观看”，但在现实中，你既没有手也没有眼睛，也没有能够触摸或看到的任何事物。除你的大脑外，没有任何使这些事物发生的物质性的现实。

把真实生活与睡梦彼此分开的是什么呢？两种形式的生活，最终在大脑里形成了。如果我们在梦中可以轻松地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那同样可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从梦中醒来时，我们没有逻辑上的理由，不认为已经进入一个叫做“真实生活”的更长的梦境。我们考虑梦境的理由是奇异的，真正的世界只是我们习惯和偏见的产品。这提醒我们，从我们认为的地球生活中彻底醒悟过来，就像我们从梦中醒来一样。



所以，哪一辆撞人的公共车才是真的呢？唯物主义哲学对这个问题没有一致的答案。正确的答案是，他们都在自己的头脑中，详细地经历了这场事故。同样的原理适合蛋糕和石头的例子。如果把心满意足地吃了蛋糕的恩格斯的感觉神经，并联到另一个人的大脑时，当恩格斯满意地吃完蛋糕时，那个

人也会同样感受到。如果把约翰逊踢石头时感到脚痛的神经并联到第二个人，那人将同样感到痛苦。

那么，哪块蛋糕、哪快石头才是真的呢？唯物主义哲学对此仍然无法给予一致的答案。正确而一致的答案是：恩格斯和第二个人在大脑中吃了蛋糕，并产生饱感；约翰逊和第二个人踢石头的时候，在他们的大脑里经历了全部细节。

我们把关于波利特兹尔的例子变动一下：将被车撞击的那个人的神经连接到波利特兹尔的大脑，将坐在家中的波利特兹尔的神经连接到被车撞击的人的大脑。这样，波利特兹尔会认为车撞了他，虽然自己正坐在家里；而那个实际上被车撞了的人，永远不会感到事故的冲击，并认为自己正坐在波利特兹尔的家里。

在蛋糕和石头的例子中，可以使用完全相同的逻辑。正如我们所见，人不可能超越并脱离各种感觉。在这方面，尽管灵魂没有肉体、没有形体、缺乏物质重量，但一个人的灵魂，可以支配任何种类的物质表现。人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认定这些立体图像是真的，并绝对相信它们的存在；这是因为每个人依赖由感官引起的知觉。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大卫·休姆针对这个事实强调如下：

> “坦白地说，当我把自己包括在‘我自己’中时，总会偶然地发现一种独特的感觉：热与冷，光与影，爱与恨，辣与甜，或别的概念。一旦没有知觉的存在，我永远不会在特定时刻获取我自己，并且**观察到的只是知觉**。”[206]

大脑知觉的形成，不是哲学而是科学事实

唯物主义者声称，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话是一种哲学观点。但是，我们把“外部世界”说成知觉的汇集，这不是一个哲

学问题， 而是明白的科学事实。图像和感觉如何在大脑里形成， 是所有医学学校都会详细讲解的课程。二十世纪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所证明的这些事实， 清楚地显示物质没有绝对的实体。从某种意义上说， 每个人正在观看“其大脑里的显示器”。

任何相信科学的人， 不论是无神论者、信佛者或持有其它观念的人，都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唯物主义者可能否认创造者的存在，但他不能否认这个科学现实。

在领会如此简单而明了的事实时， 卡尔·马克思、恩格斯、乔治斯·波利特兹尔和其它人的无能为力， 实在令人吃惊；尽管他们生活的时代，对科学的理解水平和能力有限。当今时代， 科技非常发达， 而且近期的发现使我们更容易地理解这个事实。另一方面，唯物主义者领会这个事实时，却充满恐惧——尽管只是部分地， 并且意识到这个事实明确地粉碎了他们的哲学。

唯物主义者巨大的恐慌

土耳其的唯物主义者们对本书所提出的主题， 即物质只是知觉的事实，暂时没有做出大的对抗性反应。这给我们一种印象：我们的观点还没有说清楚，并且需要进一步地解释。但不久以后， 事情就会清楚了： 唯物主义者对人们普遍接受这个主题，而感到十分不安；而且，就此感到极大的恐慌。

一度时期， 唯物主义者利用他们的出版物、学术会和座谈会， 公开流露出自己的恐慌。他们焦虑而绝望的布道暗示， 他们正忍受知识危机的严峻痛苦。他们所谓的哲学基础——进化论在科学上的崩溃， 已使他们受到重创。现在， 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正丧失物质本身； 这是比达尔文主义更大

的精神支柱，而且受到更大的打击。他们宣布，我们关于物质的论题，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并完全“破坏了他们的文化结构”。

在土耳其的唯物主义界，坦言这种忧虑和恐慌的，是对唯物主义负有辩护任务的《科学和乌托邦》杂志的专栏作者热南·培昆路院士（Renan Pekunlu）。培昆路在该刊上的文章，以及参加的座谈会中，都提出《进化论的骗局》一书，是对唯物主义的头号“威胁”。使他更担忧的是，你正在读的关于达尔文主义无效的这一部分。他向自己的读者和(极少数)的听众传递信息：“你们千万不要被唯心论者的说教夺走，保持你对唯物主义的信仰”，并把俄国血腥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人列宁作为参照。同时，他建议大家阅读列宁百年前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培昆路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重复列宁的说法，提醒人们“千万别去想这个问题，否则你将偏离唯物主义轨道，并被宗教吸走”。他在前面提到的唯物主义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引证了列宁的话:

“你一旦否认客观事实，而给我们以感觉，那你已经失去反对宗教的武器了；因为，你已坠入不可知论和主观主义之中——那正是宗教所需要的。一旦捉住爪子，就失去鸟儿了。而且我们的信念已成为宗教的猎物，即淡化、微妙的信仰主义；他们把‘感觉’不当作外部世界的影像，而是特殊‘元素’的那时起，你就被俘虏了。人的情感、智能、精神、意愿都荡然无存。”[207]

这些话明确论述了列宁惊讶地意识到的事实，并企图抹去以类似方式，困扰自己和当代唯物主义“同志”的思想。但是，培昆路和别的唯物主义者比列宁更要伤心；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些提出来的事实，比百年前更加明确。在世界历史中，

这个主题第一次以不可抵抗的方式得到了解释。

虽然如此，仍有不少唯物主义科学家，以肤浅的立场反对“物质只是幻像”的事实。本章阐述的这个主题，是一个人一生中可能遇到的最重要、最使人激动的主题之一。在此之前，我们还没有面对如此重要的主题。还有，那些科学家的反应、演说和文章中所采取的方式，无疑表明了他们是何等的浅薄。

一些唯物主义者对这个主题的反应，显示了他们对唯物主义盲目地追随，导致他们在逻辑上的某种伤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去理解这个主题的缘由。例如，《科学与乌托邦》的另一个作者阿拉艾汀·薛奈院士（Alaettin Senel），抛出了与热南·培昆路相似的信息：“忘掉达尔文学说的覆灭，真正的威胁是这个主题。”由于感到自己没有哲学依据，他因此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么，你就证明你所提出的。”更有趣的是，这位作者所写的文章表明，他绝不会理解被他看成威胁的这个事实。

例如，薛奈在一篇专门谈论这个主题的文章里承认，外部世界是大脑里感觉到的影像。但是，他接着又声称，图像分成了两种：一种与物质相关，另一种与物质无关，而属于外部世界的图像与物质相关。为了支持这一断言，他举出了“电话的例子”。概括而言，他写道：“我不知道我大脑中的影像，是否与外部世界相关，但我打电话时发生了相同的事情。我用电话交谈时，我看不见与我说话的人，但我随后与他见面时，就能证实这次对话。”[208]

这位作家实际上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怀疑我们的知觉，我们就会看看物质本身并核查真相。”可是，这是明显的误解，因为我们不可能到达物质本身。我们永远不能从大脑中出来，并知道“外面”是什么。不管电话里的声音是否与其它因

素有关，我们通过打电话的人能确认这件事。但是，这个确认也是大脑形象化经验的产物。

作为事实，这些人在梦中经历相同的事件。例如，薛奈在梦里也会看见自己打电话，然后通过他交谈的人，来确认这次谈话；或者说，培昆路在梦中感到正面临“严重的威胁”，并建议人们去读列宁一百岁的作品。但是，不管他们做什么，这些唯物主义者无法否认他们经历的事件，以及他们在梦中与之交谈的人们，不过是知觉这一事实。

那么，谁能确认大脑中的影像是否有关联？是大脑里形成的影子存在的再现吗？无疑，唯物主义者不可能找到在大脑外部产生资料并加以确认的信息源。承认全部知觉是在大脑里形成的、但又假设人能够从中走“出来”，并在外部世界确认这些知觉；这暴露了这个人理解能力的有限及其错乱的推理。

然而，我们在此阐述的事实，对那些有正常理解力和推理水平的人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每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会知道，我们所阐述的事实，对他来说，不可能用自己的感官能力，来测试外部世界的存在。可是，从种种迹象来看，对唯物主义盲目地追随，扭曲了人们的推理能力。基于这个原因，当代唯物主义者才会拿出几个逻辑严重缺陷的例子，如他们的导师企图通过踢石头或吃蛋糕，来“证明”物质的存在。

我们必须说明，这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因为，缺乏理解是一切不信教者的共性。真主在《古兰经》里，特别说明他们是“**不理解的民众**”。(2：171)

唯物主义者掉进历史上最大的陷阱

我们提到的横扫土耳其唯物主义界的几个恐慌的例子表

明，唯物主义者面临历史性的彻底失败。物质仅仅是一种知觉的事实，已经得到现代科学的证实，并以明确、易懂和有力的方式提出了。剩下的只是唯物主义者看到他们盲目信仰、依赖的整个物质世界的崩溃。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唯物主义思想始终存在。由于他们非常相信自己和信仰的哲学，所以，他们对抗创造他们的真主。他们提出的假想主张，物质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并认为这一切中，不可能有个创造者。他们傲慢地否认真主的存在时，就把他们假定真正存在的物质作为庇护所。他们对这种哲学如此自信，以致不可能想到去解释与之相反的事实。因此，本书提到的物质的真正本质，使这些人感到非常惊讶。这里阐述的事实，已经摧毁了他们的哲学基础，并且没有进一步争论的余地。物质，他们构筑其思想、生活、傲慢和否认的基础，突然之间消失了。当物质不存在时，唯物主义又如何存在?

真主的德性之一，就是对不信者设下陷阱。**“他们用计谋，真主也用计谋；但最好的计谋者是真主。”**（《古兰》8：30）

真主给那些认为物质存在、并这样信仰的唯物主义者设下陷阱，使他们以看不见的方式受到羞辱。唯物主义者信奉财产、地位、声望、属于他们的社会、全世界及别的一切事物的存在，而且由于依赖这些东西，而傲慢地违抗真主。

他们自负地抗拒真主，并变得越来越无信仰。他们这样做时，依赖的完全是物质。然而，他们如此缺乏理解力，以致不曾想过真主就在他们的周围。真主在《古兰经》中宣告不信教者面临的恶果:

“难道他们欲用计谋？不信道者，将自中其计。”（《古兰》52：42）

这很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失败。当唯物主义者的傲慢与日

俱增时，他们已完全自欺了，并通过奇谈怪论，在对抗真主的战争中遭到严重失败。《古兰经》清楚地告知我们，这些对抗创造主的不信道者的结局：**“我这样使每个城市都有一些罪魁，以便他们在那里用计谋；其实，他们的计谋，只害自己，但他们不自觉。”**(6：123) 在另一个节里，强调相同的事实：

“他们想欺瞒真主和信士，其实，他们只是自欺，却不觉悟。”(2：9)

当不信教者努力使用计谋时，他们并未认识到古兰中强调的**“他们只是自欺，却不自觉”**的非常重要的事实。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事实，正是虚幻的用于自欺的设计，如同他们的每个行动一样，其计谋就是大脑里形成的影像。他们的傻话使他们忘记，自己始终与真主在一起；因此，他们陷入自己狡猾的圈套中。

并非只是以前的不信教者，才面临从根本上粉碎其狡猾计谋的现实，当今的不信者也面临同样的现实。真主指出**“.....无疑，恶魔的计策，确是脆弱的”**（4：76），并断定他们的计谋一开始就面临毁灭的结局。真主同时给信士们以喜讯**“.....他们的计谋不能伤你们一丝毫”**。（3：120）

真主在另一节中说道：**“不信道者的善功恰如沙漠的蜃景，口渴者以为那里有水，等到他来到蜃景的地方时，没有发现什么。”**(24：39) 唯物主义如同本节经文所启示的那样，也是为对抗真主而建造的“海市蜃楼”；当他们求援于它时，发现它不过是个幻境。真主用这样的幻境羞辱了他们，并诱使他们觉得，这些知觉的汇集似乎是真的。那些“显赫的”人物、教授、天文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和不论职位如何的人们，都被孩子般地戏弄了，并且由于他们把物质作为自己的神灵而丢尽脸面。他们假定图像的汇集是绝对的，并把

其哲学和意识形态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他们投入严肃的讨论中，并采用了所谓“理智的”布道。他们自以为聪明得足以提供关于宇宙真相的论据，更重要的是，他们凭有限的智力，去争议关于真主的命题。真主用下面的经文解释他们的情形:

“他们用计谋，真主也用计谋，真主是最善于用计谋的。”（《古兰》3：54）

逃离某些陷阱是可能的；然而，真主为不信教者而设立的陷阱却非常牢固，他们根本无法逃脱。不论他们做什么或者向谁求助，除真主外，永远找不到任何帮手。真主在《古兰经》里告知:

“除真主外，他们不能为自己获得任何保护者，也不能获得任何援助者。”(4：173)

唯物主义者从未想过，他们会落入这样的陷阱。他们用尽20世纪所有的手段之后，满以为能够加固否认的障碍，并把人们拉到不信道者的行列中。《古兰经》描述这些不信教者愚顽的思想及其结局:

“他们用一个计谋，我也用一个计谋，但他们不知不觉，你看他们的计谋的结局是怎样的。（结果）是我把他们和他们的宗族，全体毁灭了。” (27：50-51)

经中说明的事实意味着：唯物主义者意识到他们拥有的一切，只是一个幻想，因此那一切已经毁灭了。他们所见证的财物、工厂、黄金、钞票、子女、配偶、朋友、职务和地位，甚至他们自己的身体，所有他们认为存在的事物，从他们的指间溜走，像上述经文所说的那样，“毁灭”了。此刻，它们不再是物质而是灵魂。

无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意识到这个事实，可能是最坏

的事情。他们拥有的一切只是幻象的事实，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等于在这个世界上“死之前的死亡”。这个事实使他们只与真主在一起。其实，真主已经呼唤我们注意，每个人实际上独立地面对他：**“你让我独自处治我创造的那个人吧！”**（74：11）这个超凡的事实，在许多章节里重复着：

“你们确是孤孤单单地来见我，犹如我初次创造你们的时候一样。你们把我所赏赐你们的，抛弃在背后……。”（《古兰》6:94）

“复活日他们都要单身来见他。”（《古兰》19：95）

这说明：把物质作为自己神灵的人们，其实来自真主、并回到真主那里。无论他们是否需要，他们已经顺服着真主的意愿。现在，他们等待末日的审判；在那一天，他们都将被清算；尽管多么的不情愿，但他们可能去理解它……

结论

迄今我们所解释的这个主题，是我们在你的一生中，曾经告诉的最伟大的真理。因为，证明整个物质世界其实是“影子的存在”，这是理解真主的存在、真主的创造及理解他是唯一绝对生命的关键。

理解这个主题的人意识到，世界并不是大多数人所猜测的那种地方；世界不是一个绝对真实的存在，就像徘徊在大街上的人们，在酒馆里打架的人们，在豪华咖啡馆里炫耀的人们，吹嘘财产的人们，或投身于空洞目标的人们所假想的那样。世界只是知觉的汇集，是一种幻象。我们在上面列举的所有人，只是在大脑里看到的这些知觉的影子生命，虽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瓦解了否认真主存在的唯物主义哲学，从而使其彻底破灭。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这样的唯物主义者对这个主题感到恼火的原因，并且警告他们的信徒，当他们得知这一主题时，就“别去考虑”这个概念。事实上，这些人处于缺乏智能的悲惨境地，以致他们无法理解在大脑内部形成知觉的事实。他们以为用大脑看到的世界，是“外部世界”，并不能领会与之相反的明显证据。

这些疏忽，是真主让那些不信教者缺乏智能的结果。根据《古兰经》，不信教者“**有心却不用去思维，他们有眼却不用去观察，他们有耳却不用去听闻，这等人好象牲畜一样，甚至比牲畜还要迷误。这等人是疏忽的**。”(7：179)

你可以凭借自己的反思，来探索这个观点的更高层面。为此，你必须集中注意力，仔细考虑你是如何看到并触摸到周围物体的。如果你深切地思考，就会发现看、听、摸、思及此时读本书的有智能的生命，只是一个灵魂，并且在屏幕上观看称为“物质”的知觉。理解这一点的人，会脱离欺骗了大多数人的物质世界的领域，从而进入真实存在的领域。

纵观历史，许多有神论者或哲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个现实。伊玛目兰巴尼、穆乎伊丁·伊本·阿拉比和麦伟兰纳·迦弥（Mevlana Cami）等伊斯兰学者，都以《古兰经》的启示并运用他们的理智，认识这个事实的。西方哲学家，如乔治·伯克利也通过理智领会了同样的事实。伊玛目兰巴尼在《麦克图布》（Mektubat）中写道，整个宇宙只是一个“幻象与推想（感知）”，而唯一绝对的生命是真主:

> “真主.....他所创造的这些生物的实质，只是虚无.....。真主创造了这些感觉和幻象的所有领域.....。宇宙的存在就在这些感觉和幻象中，而它并非物质.....。在现实中，外部（世界）中只有无上生命的存在（即真主）。”[209]

伊玛目兰巴尼明确指出，人类面前的全部影像只是幻象，他们“在外部”没有原物:

“这个虚构的循环是想象中的描述。可以看见它被描述的程度；但用的是智力的眼睛。在外部，似乎是用头上的眼睛看到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它在外部既没有名称也没有痕迹。那里没有可以看见的祥情。甚至从镜子里照出的人脸，也是如此。它在外部没有恒久不变的性质。无疑，其性质和影像都是想象。真主是全知的。”[210]

麦伟兰纳·迦弥根据《古兰经》启示，并用自己的才智，发现了相同的事实：“宇宙中存在的一切，都是感觉和幻象。他们要幺像镜子里的映像，要幺像影子一样。”

但是，历史上，能够理解这个事实的人数毕竟有限。像伊玛目兰巴尼这样伟大的学者曾经写道，把这样的事实告诉大众，可能会很难，而且大多数人可能不容易领会它。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这个事实已经被科学所提出的证据所验证。宇宙是一个阴影的事实，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如此具体、清楚、明确的方式描述了。

因此，当人们普遍理解真主启示的事实，并成为唯一绝对的存在——真主的群体时，二十一世纪将成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二十一世纪，十九世纪的唯物主义信条，将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中，人们将领悟真主的存在和造化，将领会像无限与永恒这样的事实，人们将从几个世纪的蒙昧、谎言和迷信中解脱出来。

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不可能被影像所阻拦。

时间的相对论和命运的事实

我们上面的叙述表明，现实中并不存在“三维空间”，那完全是凭知觉产生的偏见，并把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引向“无限”。与之相反的主张，将是丧失理性和科学事实的迷信；因为，并没有三维物质世界存在的有效证据。

这个事实驳斥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假设：物质的绝对与永久的假设。唯物主义哲学立足的第二种假设，就是时间的绝对与永久的迷信。这与第一种假设一样的迷信。

时间的知觉

我们所说的时空知觉，实际上是在同一时刻，与另一时刻作比较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例子来解释。例如，当一个人敲打一个物体时，他会听到一种特别的声音。当他在五分钟后，敲打同一物体时，听到的却是另一种声音。这个人的知觉在第一种声音和第二种声音之间有一段间隔，并把这段间隔叫做“时间”。然而，当听到第二种声音时，他听到的第一种声音，只是大脑里的一个想象；那仅仅是他记忆中的一点信息。这个人通过比较记忆生活中的时刻，形成了时间的知觉。如果没有这种比较，也就不可能有时空知觉。

同样，有人看见某人从门里进入房间，并坐在房子中间的安乐椅里时，他就做了一种比较。当这个人坐在椅子里时，他打开门、走进房间、朝椅子走去的图像，是在大脑里汇集的点滴信息。当他把坐在椅子里的人与自己得到的这些信息比

较时，时间上的感觉便发生了。

总之，时间的产生，是储存在大脑里的一些幻象比较的结果。如果人类没有记忆，那么，其大脑将不会做出这样的解释；因此，时间的知觉永远不会形成。有人说他已经30岁了，只是因为他已经在大脑里积累了与30年相关的信息。如果他的记忆不复存在，就想不到这些早先时间的存在，并只能经历单一的生活“瞬间”。

对“永恒”的科学解释

让我们通过引述有关科学家和学者的解释，来努力阐释永恒这一主题。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遗传学教授、思想家弗兰乔斯·雅各布（Francois Jacob），在他的《可能与实际》一书中，解释有关时间倒流的现象：

> “倒放的电影，使我们得以想象时间向后流逝的一个世界。牛奶自己从咖啡中分出来，并跳出杯子、进入奶锅的世界；一束光线从墙上发出，并汇集到一个陷阱(重力中心)，而不是从光源射出的世界；在无数水珠惊人的合作下，石头才有可能跳出水面，斜着跳进某人手掌中的世界。然而，在可以逆转时间的世界里，我们大脑的进程、记忆汇集信息的方式，同样具有逆转的功能。同样的情形适合过去与将来，而世界将以目前的样子一样，精确地呈现在我们面前。”[211]

由于我们的大脑习惯于事件的特定顺序，因此，世界不能象上述一样地操作，而且我们假设时间总是向前流动。但是，这是在大脑里得出的一个决定，因此完全是相对的。实际上，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时间怎样流动，甚至不知道它是否流动。这表明时间不是一个绝对的事实，而只是某种知觉。

时间的相对论，也是二十世纪最主要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所验证的事实。林肯·巴尼特在他的《宇宙与爱因斯坦博士》一书中写道：



“与绝对空间一起， 爱因斯坦放弃了绝对时间的概念——稳定、恒久、无情、普遍的时间流逝， 从无限的过去流向无限的未来。至于《相对论》难懂的说法，源自人们对时间知觉勉强地承认， 就像颜色的知觉也是一种知觉一样。就如空间是具体目标的可能顺序一样，时间也是事件的可能顺序。对时间主观性的最好解释，来自爱因斯坦自己的话: ‘个体的经验向我们展示了一系列事件的安排； 我们记忆中一系列单纯的事件， 根据‘更早’和‘更晚’的标准排序。因此，个体的确存在着自我时间或主观时间。这种时间本身是不可测量的。我可以把数字与事件联系起来，这样，较大的数字，与迟于早些时候的事件相联。”[212]

在巴尼特的书中，他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话: “空间和时间是直觉的形式， 它们不能更多地离开意识， 就如我们的颜色、形状或大小的概念。”根据“广义相对论”: “除我们测量的事件顺序外，时间没有独立的存在。”[213]

既然时间是由知觉组成的， 那它完全依赖于感知者， 因而是相对的。

时间流动的速度，不同于我们测量它时所使用的参照；因为，人体内没有确切指示时间流速的自然钟。林肯·巴尼特写道：“正像如果没有分辨颜色的眼睛，就不存在什么颜色；如果没有事件发生的标记，也就没有瞬间、小时或一天了。”[214]

时间的相对性在梦里清楚地经历着。虽然我们在梦中看到的事物，好象持续了数小时，但实际上那只是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事。

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进一步验证这个主题。假定我们被关进一间特别设计的单窗房间里，并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房间里有一台钟，它能让我们看到在房间里度过的时间。同时，我们从房间的窗户里看到，太阳以特定的间隔起落。几天后，我们在房间里度过多少时间，其答案在于从时钟获得的信息和估算太阳起落的次数。例如，我们估计在房间里已经度过了三天。然而，如果把我们关进房间的那个人，来到我们身边，并告诉我们在房间里只度过两天；而我们从窗子里看见的太阳是假的，房间里的时钟也走得特别慢似的。于是，我们的估算就毫无意义了。

这个例子证实，我们对时间估计的信息，基于相对的参数。时间的相对性，也是科学方法证明的科学事实。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主张，时间随物体的速度和重心距离的变化而变化。当速度加快时，时间就缩短、压缩、放慢，似乎来到一个“停止”点上。

让我们用爱因斯坦提出的例子来解释这个现象。想象一下，有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人留在地球上，另一个几乎以光速在太空遨游。当遨游者回来时，他看见兄弟的年岁比自己大了。其原因是，以光速在太空遨游的兄弟的时间，流逝较慢。同样的例子，适合在太空旅行的父亲和留在地球上的儿子：如果爸爸出发时27岁，儿子3岁的话，当父亲30年（地球时间）后回到地球时，儿子将是33岁，而他的父亲却只有30岁。”[215]

应该指出，时间的相对性，不是由时钟的快慢或春天的姗

姗来迟引起的。它是整个物质系统分别运行期间的结果；该系统一直深入到次原子粒子中。换言之，时间的缩短不像一个人经历的慢动作画面。在时间被缩短的环境中，人的心跳、细胞复制、大脑作用等等，都比地球上缓慢而动的人的运行要慢。人们继续他们的日常活动，却根本注意不到时间的缩短。的确，直到做出比较时，时间的缩短才变得明显了。

《古兰经》中的相对论

从现代科学发现得出的结论是，时间并非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绝对事实，而是相对的知觉。更有趣的是，直到二十世纪的科学，才发现的这个事实，1400多年前的《古兰经》却告诉了人类。《古兰经》中有关于时间相对性的各种描述。

我们在《古兰经》的许多章节中，看到被科学证明的事实：时间是由事件、处所和环境决定的心理知觉。例如，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在《古兰经》启示中是非常短暂的：

“在那时，他将召唤你们，而你们将以颂词答应他。你们将猜想自己在坟墓里只逗留一会儿。”（17：52）

“在他集合他们的那日，他们仿佛只在白昼逗留过一会儿，他们互相认识，把与真主相会之说称为谎言的人，确已亏折了，他们不是遵循正道的。”（10：45）

有些《古兰》经文指出，人们对时间的知觉不尽相同，而且有时人们觉得很短的时间似乎很长。人类在末日审判期间的对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主说：‘你们在大地上逗留了几年？’他们说：‘我们逗留了一天，或者不足一天；请你问问能计算年月的（天使）吧’。他说：‘你们只逗留了很少的年月，假若你们知道’。”（《古兰经》23：112-114）

一些别的经文指出，时间在不同的环境里有不同的流动速度：

“他们要求你早日昭示刑罚。真主绝不爽约。在你的主那

里的一日，恰如你们所数的一千年。”（《古兰经》22:47）

“众天神和精神在一日之内升到他那里。那一日的长度是五万年。”（《古兰经》70：4）

这些经文清楚地说明时间的相对性。20世纪的科学发现的这个事实，《古兰经》早在1400年前，就已经告知人类；这显然是围绕整个时间和空间的真主的启示。

《古兰经》的很多章节揭示，时间是知觉。这在《古兰经》的故事中尤其明显。例如，真主让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在山洞里沉睡了三百多年；当他们醒来时，还以为自己在那里只呆了一会儿，无法计算究竟睡了多久：

“我就使他们在山洞里几年不能听闻。后来我使他们苏醒，以便我知道两派中的哪一派更能计算他们所停留的时间。”（《古兰经》18：11-12）

“我如此使他们觉醒，以便他们互相询问，其中有一个人说：‘你们逗留了多久？’他们说：‘我们逗留了一天，或不到一天。’他们说；‘你们的主最清楚你们逗留的时间。你们自己派一个人，带着你们的这些银币到城里去，看看谁家的食品最清洁，叫他买点食品给你们，要叫他很谨慎，不要使任何人知道你们。”（《古兰经》18：19）

下面的经文也是说明时间属于心理知觉的证据：

“难道你没看见那个人吗？他经过一个荒凉的颓废的城市，他说：‘真主怎样使这个已死的城市复活呢？’故真主使他在死亡的状态下逗留了一百年，然后使他复活。他说：‘你逗留了多久？’他说：‘我逗留了一日，或不到一日。’他说：‘不然，你已逗留了一百年。你看你的饮食，没有腐败。你看你的驴子。我要以你为世人的迹象。你看这些骸骨，我怎样配合他，怎样以肉套在它的上面。’当他明白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我知道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古兰经》2：259）

上述经文清楚地强调，创造时间的真主不受时间的约束。

而人类则受真主规定的时间的约束。如经中所述，人类甚至无法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在这样的状态下，断定时间是绝对的——正如唯物主义以扭曲的心态所作的那样，将是非常不近情理的。

命运

时间的相对性澄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相对性是如此地易变，以致对我们持续了几十亿年的时期，在另一个尺度上不过才一秒种。而且，从世界开始到结束的漫长岁月，也许还不到一秒钟，而是另一尺度的瞬间。

这正是命运概念的本质——大多数人、尤其是唯物主义者不大理解的概念；唯物主义更是完全否认这一点。命运是真主关于过去或未来所有事件的完美知识。大多数人疑问，真主怎能知道尚未经历的事件，而且这使他们不能理解命运的真实性。然而，“尚未经历的事件”并不只是对我们而言的。真主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为正是他自己创建它们的。所以，过去、将来和现在，对真主都是一样的；因为对真主而言，一切已经发生并完成了。

林肯·巴尼特在《宇宙与爱因斯坦博士》里解释，“广义相对论”如何与这个事实连在一起。根据巴尼特的观点，宇宙只能“围绕在宇宙智能组成的整个权威之中”。[216] 巴尼特称为“宇宙智能”的意愿，是真主统辖宇宙的智能和知识。就像我们不难从总体上看出某个统治者的开始、中间、结局以及其间的全部过程一样；而真主自始至终知道我们可以支配的时间。人们只能在属于他们的时间到来时，才经历那些事件，并见证真主已为他们造化的命运。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注意在社会上流行的、对命运肤浅的歪曲性理解。这种对命运的歪曲行为，产生一种迷信：真主已经为每个人确定了一个“命运”，但这些命运有时会被人们所改变。例如，面对一个从死亡线上过来的病人，有人会

说“他战胜了自己的命运”。然而，没有人能够改变其命运。死而复生的人之所以没死，是因为他那时注定还不会死。那些人再次难逃自欺的命运，还说“我战胜了我的命运”，并坚持这样的思想倾向。

命运是真主永恒的知识。因为，真主在瞬间知晓时间，支配整个时间和空间，一切事物都在命运中注定和完成。我们也从《古兰经》中了解到，时间唯独属于真主：一些将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古兰经》把它们当作很久以前已经发生的事而叙述了。例如，人们最终在后世接受真主清算的经文，描述成很久以前已发生过的事件：

“号角一响，凡在天地间的，都要昏倒，除非真主所意欲的。然后，号角再响一次，他们就忽然站起来，东瞻西顾的。大地将因它的主的光明而亮；功过簿将陈列出来；众先知和见证将被召来，他们将被秉公裁判而不受冤枉……不信道者，将一队一队地被赶入火狱……敬畏主者将一队一队地被邀入乐园……。”（《古兰经》39：68-74）

与之有关的其它经文是：

“每个人都要到来，驱逐的天使和见证的天使，将与他同行。”（《古兰经》50：21）

“天将破裂；在那日，天将成为脆弱的。”（69：16）

“他将因他们的坚忍而以乐园和丝绸报酬他们。他们在乐园中，靠在床上，不觉炎热，也不觉严寒。”（76：12-13）

“火狱将为能见的人显露出来的日子。”（79：36）

“今天，信仰者嘲笑不信教的人。”（83：34）

“罪犯们将看见火狱，必堕其中，无处逃避。”（18：53）

正如我们所见，我们死之后将要经历的事件（以我们的观点），在《古兰经》中已被描述，并成为过去的事件。因为，真主不受我们所受的相对时间框架的制约。真主对这些事件具有永恒的意志：人们已经执行了这些事件，所有这些事件已经实施并结束了。每一事件不论大小，都在真主的知识之

内，并记录在天经中，下节《古兰》经文说明这一点:

“无论你处理什么事物，无论你诵读《古兰经》哪一章经文，无论你们做什么工作，当你们着手的时候，我总是见证你们的。田地间微尘的事物，都不能逃避真主的鉴察，无论比微尘小还是比微尘大，都记载在一本明显的天经中。”（10：61）

唯物主义者的烦恼

本章讨论的主题，即潜藏在物质、永恒、无限之中的真理，其实极为清楚了。就如前文所述，这决不是任何种类的哲学或思想方式，而是无法否认的显然的真理。在这个主题上，除技术性的事实之外，理性与逻辑证据也承认，根本没有其它的选择：宇宙是由所有物质组成的、所有人类其中生活的幻象总和；它是知觉的汇集。

唯物主义者在理解这个问题时，处境很艰难。例如，如果我们回到唯物主义者波利特兹尔的公共车的例子：虽然波利特兹尔在技术上知道，他不能脱离知觉，但在特定情况下承认了这一点。即，波利特兹尔认为，直到公共车碰撞时，事件才会在大脑里发生；但公共车的碰撞一发生，事件离开大脑，并获得物质性的现实。这里的逻辑缺陷非常明显：波利特兹尔犯了唯物主义哲学家约翰逊所犯的同样错误：“我碰上石头，我的脚疼了,因此疼痛存在”，而且他不能理解，在公共车的撞击下引起的疼痛实际上也是知觉。

唯物主义者不能理解这个主题的潜意识中的原因是，他们害怕理解它时，将要面对的事实。林肯·巴尼特指出，一些唯物主义科学家已“认识”了这个主题:

“当哲学家把所有的客观现实，缩小到知觉的影子世界时，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人的知觉惊人的局限性。”[217]

物质和时间是知觉的事实，在唯物主义者中引起巨大的恐惧；因为，物质和时间是支持他们关于绝对存在的仅有的

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把它们作为崇拜的偶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由物质和时间(通过进化方式)创造的。

当他们感觉到自己生活的宇宙、世界、自己的身体、别人以及受其想法影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一句话，这一切都是知觉时，他们就被恐惧所压倒。他们依赖、信奉、求助的一切突然无影无踪了。他们感到绝望，并将在末日，像经文描述的那样经历审判：**“在那日，他们将向真主表示屈服，而他们所捏造者将回避他们。”**（《古兰》16：87）

从那时起，唯物主义者努力使自己确信物质的真实，为达到这个目的而虚构“证据”，并急得捶墙、踢石头、大喊大叫，但永远不能从这一现实中解脱出来。

正像他们想要从头脑中删除这个现实一样，他们想让其它人也放弃它。他们同时意识到，如果人们普遍知道物质的真正本质，他们粗糙的哲学和无知的世界观，就会大白于天下，也失去其观点赖以存在的土壤。这就是他们害怕我们在此所述事实的原因。

真主陈述这些不信教者的恐惧，将在后世变得更厉害。在审判日，他们的结局是：

> **“在那日，我把他们全体集合起来，然后，我对以物配主的人说：‘以前你们所妄称为我的伙伴的，如今在哪里呢？’”**（《古兰经》6：22）

那以后，不信教者将见证，他们认为的真正存在，并描绘成真主之伙伴的财产、子女和亲信，都将离开他们并消失殆尽。真主在经中告知我们这个事实：**“你看看他们怎样抵赖。他们以前伪造的（伙伴）已回避他们了。”**（《古兰经》6：24）

信士的收获

物质和时间是知觉的事实，使唯物主义者惊恐万状时，真正的信士却掌握了这个事实。当忠诚的人们认识到物质背后的秘密时，他们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个事实是所有问题的答案。这把钥匙打开了全部的秘密。人们开始容易地理解以前很难理解的许多问题。

前面所说的关于死亡、乐园、地狱、后世及命运等主题可以理解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如“真主在哪里？”，“在真主之前有什么？”，“谁创造了真主？”，“坟墓里的生活将持续多久？”，“天堂和地狱在哪里？”，“天堂和地狱目前存在吗？”等等，可以容易地回答了。人们领会了真主以何种系统、从无到有地创造了整个宇宙。在这个秘密面前，至于“何时”、“在哪里”的问题则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没有可以留下的时间和空间。当人们理解空间的无限时，就会懂得天堂、地狱及世界其实在同一地方；如果理解了永恒，将会理解每一件事都在单一时刻发生：没有可以等待的事物，时间没有消失，因为一切已经发生并且完成了。

深入研究这个秘密时，世界就成了信士的天堂。使人痛苦的所有物质担忧、焦虑和恐惧都消失了。人们悟到在整个宇宙中，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悟到真主以他喜悦的方式，改变整个物质世界；于是，他们一起归向了真主，他们全身心地服从真主了：**“从各种束缚中解脱出来。”**（《古兰经》3：35）

领悟这个机密是今世最大的收获。

领悟这个机密的同时，我们发现了《古兰经》昭示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真主比他的命脉还要接近于他。”**（50：16）众所周知，我们的命脉在我们的体内。而对一个人来

说，比自己的内脏更近的会是什么呢？这种情形可以用无限的现实，轻松地加以解释。本节经文也更好地理解这个秘密。

这是明白的真理。我们必须明确：除真主外，没有任何援助者；除真主外，人类没有别的供给者；除真主外，一无所有；他是唯一绝对的生命——他是人们寻求庇护、援助和回赐的唯一主宰。

无论我们转向哪里，真主始终与我们同在!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收获。

这个秘密与《古兰经》提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更容易被理解：在前面我们所提及的真主 "比他的命脉还要接近于他"（第五十章 戛弗 卷二十六 16）的事实..... 每个都人知道我们的命脉在我们的体内。不可能比自己的肚子更近的距离了。这种情形下可能容易用无限的现实来解释。正如所见，这个章节比这个秘密更好理解了。

这是事实。必须确定的是人们除了真主以外没有任何朋友和帮手。除了真主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寻求避难，请求帮助而得到回报的唯一的绝对的生命是他，真主.....

无论我们转向哪里，真主始终存在.....

科学研究基金会（SRF）研讨会:向公众揭露进化论的活动

近来加紧进行的进化论宣传，严重威胁着国民的信仰和道德价值观。清楚地注意到这一事实的“科学研究基金会”(SRF)，担负着将科学事实告知公众的职责。

伊斯坦布尔：第一次会议

科学研究基金会组织了一系列国际性会议，1998年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进化论的崩溃：创造的事实”，于1998年4月4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次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全世界著名的专家参加了会议，并在土耳其的讲坛上，首次对进化论提出科学的质疑与反驳。来自土耳其社会的各界人士，参加了这次引人注目的会议。在会议厅里找不到座位的人们，从会议厅外的闭路电视中，观看会议的实况转播。

会议的发言者是土耳其及国外的知名学者。科学研究基金会的成员首先揭露隐藏在进化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接着，播放了由该组织制作的录像文献片。





美国“创造研究学院”生物化学与古生物学方面的权威、世界知名科学家杜安·吉什（Duane Gish）教授和肯尼斯·卡明(Kenneth Cumming)教授，以可靠的科学证据，论证进化论完全是错误的。在会议期间，当今在土耳其最受尊重的科学家之一巴布纳（Cevat Babuna）教授，通过幻灯片，演示了人类被创造之每个阶段的奇迹，从而动摇了进化论“巧合假设”的根基。

伊斯坦布尔：第二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的三个月之后，1998年7月5日，在伊斯坦布尔Cemal Resit Rey会议大厅，举行同一系列的第二次国际会议。六位美国人、一位土耳其人在会上发表讲话；他们用现代科学揭示，达尔文学说是如何破灭的。在只能容纳1,000人的会议大厅里，却挤满了全神贯注的听众。现将会议发言人及其主题概述如下：

迈克尔·P·吉朗德(Michael.P.Girouard)教授：美国南路易西安那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演讲主题：“生命有可能偶然形成吗？”他通过各种各样的例子解释，作为生命基本单位

的蛋白质是何等的复杂，并得出结论：它们的存在只能是娴熟设计的结果。

爱德华·鲍得雷克斯(Edward Boudreaux)教授的演讲：新奥尔良大学的化学教授；演讲主题：“化学中的设计”。他指出，为了生命的存在，一些化学元素肯定是有意识的创造。

卡尔·弗雷曼斯(Carl Fliermans)教授：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印地安纳大学的微生物学教授、由美国国防部支持的“细菌导致的化学废弃物的中和”研究项目的主持人。他驳斥了进化论在微生物阶段的主张。

艾迪普·凯哈（Edip Keha）教授：生物化学教授，会上唯一的土耳其发言人。他介绍了细胞的基本信息，并通过证据强调，细胞的形成只能是有意识设计的结果。

大卫·门顿（David Menton）教授：华盛顿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在伴随着非常有趣的计算机显示的演讲过程中，他对鸟的羽毛与爬行动物的鳞片，在解剖学上的差异做了细致的分析，从而证明：鸟类从爬虫进化的假设是无效的。

杜安·吉什（Duane Gish）教授：著名的进化论专家。他在题为“人类起源”的演说中，驳斥了人类从猿进化而来的命题。

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教授：创造研究学院（ICR）院长，著名地质学家。他在演讲中指出，潜伏在进化论后面的，是它对意识形态和哲学所承担的义务；并进一步解释，这个理论已经成变成了一种教条，而且其拥护者把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狂热的信仰。



世界著名的进化论专家杜安·吉什教授，接受由土耳其国会议员内扎特·雅尔辛塔斯（Nevzat Yalcintas）博士授予的基金会徽章。

听完这些演讲后，听众们



卡尔·弗雷曼斯(Carl Fliermans)教授:
现代生物学证明,
生物是绝妙的设计,
而单凭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造物主的存在。



杜安·吉什(Duane Gish)教授:
地质记录反驳了进化理论,并显示
地球生物的出现,
是完整形成并精心设计的。 这是真主创造一切的具体证据



大卫·门顿(David Menton)教授:
30年来,我研究生物的解剖学特征。
我所看到的总是真主创造的证据。



爱德华·鲍得雷克斯(Edward Boudreaux)教授: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及其自然规律,
是造物主为我们人类的利益而精密创造的。

见证: 科学从各方面驳倒了进化论, 它是一个无效的教条。另外, 由科学研究基金会组织, 并在CRR会议厅展出的题为"进化论的崩溃: 创造的事实"的展览, 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由35幅海报组成的展览, 要么精彩地驳倒了进化论的一种基本主张, 要么向人们展现了创造的证据。

安卡拉: 第三次会议

1998年7月12日, 科学研究基金会进行的"进化论的崩溃: 创造的事实"系列国际会议的第三次会议, 在安卡拉的谢拉顿饭店举行。参加会议的三位美国人和一位土耳其人, 提出了明确而实质性的证据: 现代科学已使达尔文学说彻底无效。

虽然, 谢拉顿饭店的会议厅可容纳大约一千名听众, 但实际参加的人数却超过2,500人。因此在大厅外, 为无法在里面找到座位的听众, 安置了可以看到会议实况的大屏幕。在会议厅旁边安排的大型展览: "进化论的崩溃: 创造的事实", 同样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

来自SRF全国会议的场面



安卡拉



三丽厄法



伊兹密尔



巴勒凯西尔



萨姆松



开塞利



吉雷孙



布尔萨

会议结束时，发言者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这证明公众多么渴望了解与进化论相关的科学现实和创造的事实。

随着这些国际会议的成功，科学研究基金会开始在土耳其各地组织类似的系列会议。仅仅在1998年8月与2002年年底之间，在土耳其的80座城镇举行了500次会议。SRF在全国各地继续举办这样的会议，同时在英国、荷兰、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阿塞拜疆、美国和加拿大举办会议。

赞你超绝，除了你所教授我们的知识外，我们毫无知识，你确是全知的，确是至睿的。（《古兰经》第二章：黄牛（百格勒），第32节）

注释

1. Cliff, Conner, "Evolution vs. Creationism: In Defense of Scientific Thinking",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Monthly Magazine Supplement to the Militant), November 1980.
2. Ali Demirsoy, Kalitim ve Evrim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Ankara: Meteksan Publishing Co., 1984, p. 61.
3. Michael J. Behe, Darwin's Black Box,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pp. 232-233.
4. Richard Dawkins, The Blind Watchmaker, London: W. W. Norton, 1986, p. 159.
5. Dan Graves, Science of Faith: Forty-Eight Biographies of Historic Scientists and Their Christian Faith, Grand Rapids, MI, Kregel Resources.
6.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 Symposium, 1941, CH.13.
7. Max Planck, Where is Science Going?, www.websophia.com/aphorisms/science.html.
8. H. S. Lipson, "A Physicist's View of Darwin's Theory", Evolution Trends in Plants, Vol 2, No. 1, 1988, p. 6.
9. Although Darwin came up with the claim that his theory was totally independent from that of Lamarck's, he gradually started to rely on Lamarck's assertions. Especially the 6th and the last edition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 is full of examples of Lamarck's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traits". See Benjamin Farrington, What Darwin Really Said,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6, p. 64.
10. Michael Ruse, "Nonliteralist Antievolution", AAAS Symposium: "The New Antievolutionism," February 13, 1993, Boston, MA
11. Steven M. Stanley, Macroevolution: Pattern and Process,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 1979, pp. 35, 159.
12. Colin Patterson, "Cladistics", Interview with Brian Leek, Peter Franz, March 4, 1982, BBC.
13. Stephen Jay Gould, "The Return of Hopeful Monsters", Natural History, Vol 86, July-August 1977, p. 28.
14.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189.
15. Ibid, p. 177.
16. B. G. Ranganathan, Origins?, Pennsylvania: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88.
17. Warren Weaver, "Genetic Effects of Atomic Radiation", Science, Vol 123, June 29, 1956, p. 1159.
18. Gordon R. Taylor, The Great Evolution Myste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3, p. 48.
19. Michael Pitman, Adam and Evolution, London: River Publishing, 1984, p. 70.
20.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179.
21. Ibid, pp. 172, 280.
22. Derek V. Ager, "The Nature of the Fossil Record",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Ge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87, 1976, p. 133.
23. Mark Czarnecki, "The Revival of the Creationist Crusade", MacLean's, January 19, 1981, p. 56.
24. R. Wesson, Beyond Natural Selection, MIT Press, Cambridge, MA, 1991, p. 45
25. David Raup, "Conflicts Between Darwin and Paleontology", Bulletin,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Vol 50, January 1979, p. 24.
26. Richard Monastersky, "Mysteries of the Orient", Discover, April 1993, p. 40.
27. Richard Fortey, "The Cambrian Explosion Exploded?", Science, vol 293, No 5529, 20 July 2001, p. 438-439.
28. Ibid.
29. Richard Dawkins, The Blind Watchmaker, London: W. W. Norton 1986, p. 229.
30. Douglas J. Futuyma, Science on Tria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3, p. 197.
31.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302.
32. Stefan Bengston, Nature, Vol. 345, 1990, p.765.
33. The New Animal Phylogeny: Reliability And Implications, Proc. of Nat. Aca. of Sci., 25 April 2000, vol 97, No 9, pp. 4453-4456.
34. Ibid.
35. Gerald T. Todd, "Evolution of the Lung and the Origin of Bony Fishes: A Casual Relationship",

American Zoologist, Vol 26, No. 4, 1980, p. 757.
36. R. L. Carroll,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Evolution,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 1988, p. 4.
37. Edwin H. Colbert, M. Morales, Evolution of the Vertebrate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91, p. 99.
38. Jean-Jacques Hublin, The Hamlyn Encyclopædia of Prehistoric Animals, New York: The Hamlyn Publishing Group Ltd., 1984, p.120.
39. Jacques Millot, "The Coelacanth",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193, December 1955, p. 39.
40. Bilim ve Teknik Magazine, November 1998, No: 372, p. 21.
41. Robert L. Carroll,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Evolution,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 1988, p. 198.
42. Engin Korur, "Gözlerin ve Kanatlarin Sirri" (The Mystery of the Eyes and the Wings), Bilim ve Teknik, No. 203, October 1984, p. 25.
43. Nature, Vol 382, August, 1, 1996, p. 401.
44. Carl O. Dunbar, Historical Geology,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61, p. 310.
45. L. D. Martin, J. D. Stewart, K. N. Whetstone, The Auk, Vol 98, 1980, p. 86.
46. Ibid, p. 86; L. D. Martin "Origins of Higher Groups of Tetrapods", Ithaca, New York: Comstock Publising Association, 1991, pp.485, 540.
47. S. Tarsitano, M. K. Hecht, Zo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aean Society, Vol 69, 1985, p. 178; A. D. Walker, Geological Magazine, Vol 177, 1980, p. 595.
48. Pat Shipman, "Birds do it... Did Dinosaurs?", New Scientist, February 1, 1997, p. 31.
49. "Old Bird", Discover, March 21, 1997.
50. Ibid.
51. Pat Shipman, "Birds Do It... Did Dinosaurs?", p. 28.
52. S. J. Gould & N. Eldredge, Paleobiology, Vol 3, 1977, p. 147.
53. Pat Shipman, "Birds Do It... Did Dinosaurs?", p. 28.
54. Ibid.
55. George Gaylord Simpson, Life Before Man, New York: Time-Life Books, 1972, p. 42.
56. R. Eric Lombard, "Review of Evolutionary Principles of the Mammalian Middle Ear, Gerald Fleischer", Evolution, Vol 33, December 1979, p. 1230.
57. David R. Pilbeam, "Rearranging Our Family Tree", Nature, June 1978, p. 40.
58. Earnest A. Hooton, Up From The Ape, New York: McMillan, 1931, p. 332.
59. Malcolm Muggeridge, The End of Christendo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0, p. 59.
60. Stephen Jay Gould, "Smith Woodward's Folly", New Scientist, February 5, 1979, p. 44.
61. Kenneth Oakley, William Le Gros Clark & J. S, "Piltdown", Meydan Larousse, Vol 10, p. 133.
62. Stephen Jay Gould, "Smith Woodward's Folly", New Scientist, April 5, 1979, p. 44.
63. W. K. Gregory, "Hesperopithecus Apparently Not An Ape Nor A Man", Science, Vol 66, December 1927, p. 579.
64. Philips Verner Bradford, Harvey Blume, Ota Benga: The Pygmy in The Zoo, New York: Delta Books, 1992.
65. David Pilbeam, "Humans Lose an Early Ancestor", Science, April 1982, pp. 6-7.
66. Solly Zuckerman, Beyond The Ivory Tower, New York: Toplinger Publications, 1970, pp. 75-94.
67. Charles E. Oxnard, "The Place of Australopithecines in Human Evolution: Grounds for Doubt", Nature, Vol 258, p. 389.
68. Fred Spoor, Bernard Wood, Frans Zonneveld, "Implication of Early Hominid Labryntine Morphology for Evolution of Human Bipedal Locomotion", Nature, Vol 369, June 23, 1994, pp. 645-648.
69. Holly Smith,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ropology, Vol 94, 1994, pp. 307-325.
70. Fred Spoor, Bernard Wood, Frans Zonneveld, "Implication of Early Hominid Labryntine Morphology for Evolution of Human Bipedal Locomotion", Nature, vol 369, June 23, 1994, p. 645-648.
71. Tim Bromage, New Scientist, vol 133, 1992, p. 38-41.
72. J. E. Cronin, N. T. Boaz, C. B. Stringer, Y. Rak, "Tempo and Mode in Hominid Evolution", Nature, Vol 292, 1981, p. 113-122.
73. C. L. Brace, H. Nelson, N. Korn, M. L. Brace, Atlas of Human Evolution, 2.b. New York:

Rinehart and Wilson, 1979.
74. Alan Walker,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39 (2), 1978, p. 54.
75. Bernard Wood, Mark Collard, "The Human Genus", Science, vol 284, No 5411, 2 April 1999, p. 65-71.
76. Marvin Lubenow, Bones of Contention, Grand Rapids, Baker, 1992, p. 83.
77. Boyce Rensberger,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9, 1984.
78. Ibid.
79. Richard Leakey, The Making of Mankind, London: Sphere Books, 1981, p. 62.
80. Marvin Lubenow, Bones of Contention, Grand Rapids, Baker, 1992. p. 136.
81. Pat Shipman, "Doubting Dmanisi", American Scientist, November- December 2000, p. 491.
82. Erik Trinkaus, "Hard Times Among the Neanderthals", Natural History, vol 87, December 1978, p. 10; R. L. Holloway, "The Neanderthal Brain: What Was Primi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Supplement, Vol 12, 1991, p. 94.
83. Alan Walker, Science, vol 207, 1980, p. 1103.
84. A. J. Kelso, Physical Antropology, 1st ed., New York: J. B. Lipincott Co., 1970, p. 221; M. D. Leakey, Olduvai Gorge,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72.
85. S. J. Gould, Natural History, Vol 85, 1976, p. 30.
86. Time, November 1996.
87. L. S. B. Leakey, The Origin of Homo Sapiens, ed. F. Borde, Paris: UNESCO, 1972, p. 25-29; L. S. B. Leakey, By the Eviden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88. "Is This The Face of Our Past", Discover, December 1997, p. 97-100.
89. A. J. Kelso, Physical Anthropology, 1.b., 1970, pp. 221; M. D. Leakey, Olduvai Gorge,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72.
90. Donald C. Johanson & M. A. Edey, Lucy: The Beginnings of Humank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1, p. 250.
91. Science News, Vol 115, 1979, p. 196-197.
92. Ian Anderson, New Scientist, Vol 98, 1983, p. 373.
93. Russell H. Tuttle, Natural History, March 1990, p. 61-64.
94. Ruth Henke, "Aufrecht aus den Baumen", Focus, Vol 39, 1996, p. 178.
95. Elaine Morgan, The Scars of 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
96. Solly Zuckerman, Beyond The Ivory Tower, New York: Toplinger Publications, 1970, p. 19.
97. Robert Locke, "Family Fights" Discovering Archaeology, July / August 1999, p. 36-39.
98. Ibid.
99. Henry Gee, In Search of Time: Beyond the Fossil Record to a New History of Lif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9, p. 126-127.
100. W. R. Bird, The Origin of Species Revisited.,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Co., 1991, pp. 298-99.
101. "Hoyle on Evolution", Nature, Vol 294, November 12, 1981, p. 105.
102. Ali Demirsoy, Kal›t›m ve Evrim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Ankara: Meteksan Publishing Co., 1984, p. 64.
103. W. R. Bird, The Origin of Species Revisited.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Co., 1991, p. 304.
104. Ibid, p. 305.
105 J. D. Thomas, Evolution and Faith. Abilene, TX, ACU Press, 1988. p. 81-82.
106. Robert Shapiro, Origins: A Sceptics Guide to the Creation of Life on Earth,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6. p.127.
107. Fred Hoyle, Chandra Wickramasinghe, Evolution from Spac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4, p. 148.
108. Ibid, p. 130.
109. Fabbri Britannica Bilim Ansiklopedisi (Fabbri Britannica Science Encyclopaedia), vol 2, No 22, p. 519.
110. Richard B. Bliss & Gary E. Parker, Origin of Life, California: 1979, p. 14.
111. Stanley Miller, Molecular Evolution of Life: Current Status of the Prebiotic Synthesis of Small Molecules, 1986, p. 7.
112. Kevin Mc Kean, Bilim ve Teknik, No 189, p.7.
113. J. P. Ferris, C. T. Chen, "Photochemistry of Methane, Nitrogen, and Water Mixture As a Model for the Atmosphere of the Primitive Earth", Journal of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vol 97:11, 1975, p. 2964.
114. "New Evidence on Evolution of Early Atmosphere and Lif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vol 63, November 1982, p. 1328-1330.
115. Richard B. Bliss & Gary E. Parker, Origin of Life, California, 1979, p. 25.
116. W. R. Bird, The Origin of Species Revisited,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Co., 1991, p. 325.
117. Richard B. Bliss & Gary E. Parker, Origin of Life, California: 1979, p. 25.
118. Ibid.
119 S. W. Fox, K. Harada, G. Kramptiz, G. Mueller, "Chemical Origin of Cells", Chemical Engineering News, June 22, 1970, p. 80.
120. Frank B. Salisbury, "Doubts about the Modern Synthetic Theory of Evolution",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 September 1971, p. 336.
121. Paul Auger, De La Physique Theorique a la Biologie, 1970, p. 118.
122. Francis Crick, Life Itself: It's Origin and Nat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1, p. 88.
123. Ali Demirsoy, Kal›t›m ve Evrim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Ankara: Meteksan Publishing Co., 1984, p. 39.
124. Homer Jacobson, "Information, Reproduction and the Origin of Life", American Scientist, January 1955, p.121.
125. Reinhard Junker & Siegfried Scherer, "Entstehung Gesiche Der Lebewesen", Weyel, 1986, p. 89.
126. Michael Denton, 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 London: Burnett Books, 1985, p. 351.
127. John Horgan, "In the Beginning",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64, February 1991, p.119.
128. G.F. Joyce, L. E. Orgel, "Prospects for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of the RNA World", In the RNA World, New York: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 1993, p. 13.
129. Jacques Monod, Chance and Necessity, New York: 1971, p.143.
130. Leslie E. Orgel, "The Origin of Life on the Earth", Scientific American, Ekim 1994, vol. 271, p. 78.
131. Gordon C. Mills, Dean Kenyon, "The RNA World: A Critique", Origins & Design, 17:1, 1996
132. Brig Klyce, The RNA World, http://www.panspermia.org/rnaworld. html
133. Chandra Wickramasinghe, Interview in London Daily Express, August 14, 1981.
134. Jeremy Rifkin, Entropy: A New World View, New York, Viking Press,1980, p.6
135. J. H. Rush, The Dawn of Life, New York, Signet, 1962, p 35
136. Roger Lewin, "A Downward Slope to Greater Diversity", Science, vol. 217, 24.9.1982, p. 1239
137. George P. Stravropoulos, "The Frontiers and Limits of Science", American Scientist, vol. 65, November-December 1977, p.674
138. Jeremy Rifkin, Entropy: A New World View, p.55
139. For further info, see: Stephen C. Meyer, "The Origin of Life and the Death of Materialism", The Intercollegiate Review, 32, No. 2, Spring 1996
140. Charles B. Thaxton, Walter L. Bradley & Roger L. Olsen The Mystery of Life's Origin: Reassessing Current Theories, 4. edition, Dallas, 1992. chapter 9, p. 134
141. Ilya Prigogine, Isabelle Stengers, Order Out of Chaos,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4, p. 175
142. Robert Shapiro, Origins: ASceptics Guide to the Creation of Life on Earth. Summit Books, New York: 1986, s. 207
143. Pierre-P Grassé, Evolution of Living Organism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p. 103.
144. Ibid, p. 107.
145. Norman Macbeth, Darwin Retried: An Appeal to Reason. Boston: Gambit, 1971, p. 101.
146. Malcom Muggeridge, The End of Christendo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0, p.43
147. Loren C. Eiseley, The Immense Journey, Vintage Books, 1958, p. 186.
148.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184.
149. Norman Macbeth, Darwin Retried: An Appeal to Reason, Harvard Common Press, New York: 1971, p. 33.
150. Ibid, p. 36.
151. Loren Eiseley, The Immense Journey, Vintage Books, 1958. p. 227.
152. Dr. Lee Spetner, "Lee Spetner/Edward Max Dialogue: Continuing an exchange with Dr. Edward E. Max", 2001, http://www.trueorigin.org/spetner2.asp
153. Ibid.
154. Ibid.
155. Francisco J. Ayala, "The Mechanisms of Evolu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39, September 1978, p. 64.

156. Dr. Lee Spetner, "Lee Spetner/Edward Max Dialogue: Continuing an exchange with Dr. Edward E. Max", 2001, http://www.trueorigin.org/spetner2.asp
157. S. R. Scadding, "Do 'Vestigial Organs' Provide Evidence for Evolution?", Evolutionary Theory, Vol 5, May 1981, p. 173.
158. The Merck Manual of Medical Information, Home edition, New Jersey: Merck & Co., Inc. The Merck Publishing Group, Rahway, 1997.
159. H. Enoch, Creation and Evolution, New York: 1966, p. 18-19.
160. Frank Salisbury, "Doubts About the Modern Synthetic Theory of Evolution",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 September 1971, p. 338.
161. Dean Kenyon & Percival Davis, Of Pandas and People: The Central Question of Biological Origins (Dallas: Haughton Publishing, 1993), p. 33
162. Michael Denton, 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 London, Burnett Books, 1985, p.145.
163. Fix, William, The Bone Peddlers: Selling Evol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84), p. 189
164. W. R. Bird, The Origin of Species Revisited, Thomas Nelson Co., Nashville: 1991, pp. 98-99; Percival Davis, Dean Kenyon, Of Pandas and People, Haughton Publishing Co., 1990, pp. 35-38.
165. W. R. Bird, The Origin of Species Revisit-267 ed, pp. 98-99, 199-202.
166. Michael Denton. 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 London: Burnett Books, 1985, pp. 290-91.
167. Hervé Philippe and Patrick Forterre, "The Rooting of the Universal Tree of Life is Not Reliable", Journal of Molecular Evolution, vol 49, 1999, p. 510
168. James Lake, Ravi Jain ve Maria Rivera, "Mix and Match in the Tree of Life", Science, vol. 283, 1999, p. 2027
169. Carl Woese, "The Universel Ancesto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95, (1998) p. 6854
170. Ibid.
171. Jonathan Wells, Icons of Evolution, Regnery Publishing, 2000, p. 51
172. G. G. Simpson, W. Beck, An Introduction to Biolog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5, p. 241.
173. Keith S. Thompson, "Ontogeny and Phylogeny Recapitulated", American Scientist, Vol 76, May/June 1988, p. 273.
174. Francis Hitching, The Neck of the Giraffe: Where Darwin Went Wrong, New York: Ticknor and Fields 1982, p. 204.
175. Richard Lewontin, "The Demon-Haunted World",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9, 1997, p. 28.
176. Robert Shapiro, Origins: ASceptics Guide to the Creation of Life on Earth. Summit Books, New York: 1986, p. 207.
177. Hoimar Von Dithfurt, Im Anfang War Der Wasserstoff (Secret Night of the Dinosaurs), Vol 2, p. 64.
178. Ali Demirsoy, Kalitim ve Evrim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Ankara: Meteksan Publishing Co., 1984, p. 61.
179. Ibid, p. 61.
180. Ibid, p. 94.
181. Bilim ve Teknik, July 1989, Vol. 22, No.260, p.59
182. Grzimeks Tierleben Vögel 3, Deutscher Taschen Buch Verlag, Oktober 1993, p.92
183. David Attenborough, Life On Earth: A Natural History, Collins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June 1979, p.236
184. David Attenborough, Life On Earth: A Natural History, Collins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June 1979, p.240
185. "The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Spider Silk", Endeavour, January 1986, vol. 10, pp.37-43
186. Görsel Bilim ve Teknik Ansiklopedisi, pp.185-186
187. WalterMetzner, http://cnas.ucr.edu/~bio/ faculty/Metzner.html
188. National Geographic, September 1995, p.98
189. Bilim ve Teknik, January 1990, pp.10-12
190. David Attenborough, Life of Birds, Princeton Universitye Press, Princeton-New Jersey, 1998, p.47
191. James L.Gould, Carol Grant Gould, Life

at the Edge, W.H.Freeman and Company, 1989, p.130-136
192. David Attenborough, The Private Life of Plants, Princeton Universitye Press, Princeton-New Jersey, 1995, pp.81-83
193. Encyclopedia of Reptiles and Amphibian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Academic Press, A Division of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p.35
194. Frederick Vester, Denken, Lernen, Vergessen, vga, 1978, p.6
195. George Politzer,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Philosophie,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4, pp.38-39-44
196. R.L.Gregory, Eye and Brain: The Psychology of See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1990, p.9
197. Lincoln Barnett, The Universe and Dr.Einstein,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 New York, 1948, p.20
198. Orhan Hançerlioglu, Düsünce Tarihi (The History of Thought), Istanbul: Remzi Bookstore, 6.ed., September 1995, p.447
199. V.I.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1970, p.14
200. Bertrand Russell, ABC of Relativity,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ondon, 1964, pp.161-162
201. R.L.Gregory, Eye and Brain: The Psychology of See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1990, p.9
202. Ken Wilber, Holographic Paradigm and Other Paradoxes, p.20
203. George Politzer,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Philosophie,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4, p.53
204. Orhan Hançerlio¤lu, Düflünce Tarihi (The History of Thought), Istanbul: Remzi Bookstore, 6.ed., September 1995, p.261
205. George Politzer,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Philosophie,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4, p.65
206. Paul Davies, Tanr› ve Yeni Fizik, (God and The New Physics), translated by Murat Temelli, Im Publishing, Istanbul 1995, s.180-181
207. Rennan Pekünlü, "Aldatmacanin Evrimsizliği", (Non-Evolution of Deceit) Bilim ve Utopya, December 1998 (V.I.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1970, p. 334-335)
208. Alaettin Senel, "Evrim Aldatmacasi mi? Devrin Aldatmacasi mi?", (Evolution Deceit or Deceit of the Epoch?) Bilim ve Utopya, December 1998
209. Imam Rabbani Hz. Mektuplari (Letters of Rabbani), Vol.II, 357. Letter, p.163
210. Imam Rabbani Hz. Mektuplari (Letters of Rabbani), Vol.II, 470. Letter, p.1432
211. François Jacob, Le Jeu des Possibl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2, p.111
212. Lincoln Barnett, The Universe and Dr. Einstein,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 New York, 1948, pp. 52-53
213. Lincoln Barnett, The Universe and Dr. Einstein,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 New York, 1948, p.17
214. Lincoln Barnett, The Universe and Dr. Einstein,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 New York, 1948, p.58.
215. Paul Strathern, The Big Idea: Einstein and Relativity, Arrow Books, 1997, p. 57
216. Lincoln Barnett, The Universe and Dr. Einstein,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 New York, 1948, p.84
217. Lincoln Barnett, The Universe and Dr. Einstein,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 New York, 1948, p.17-18